

旅游传播论

Lüyou Chuanbolun

赵建国 王大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旅游传播论

Lüyou Chuanbolun

ISBN 978-7-5004-9819-3



9 787500 498193

定价：42.00 元

旅游传播论

Lüyou Chuanbolun

赵建国 王大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游传播论/赵建国、王大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004-9819-3

I. ①旅… II. ①赵…②王… III. ①旅游学: 传播学 IV. ①F590
②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4892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邀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本书作为学术著作呈献给读者哪些有新意的东西呢？

其一，初步构筑了旅游传播理论体系。

在本书之前，还没有人写过专门探讨旅游传播理论的著作。这个理论体系相对来说还是简明的，它主要包括旅游和旅游传播本体论、旅游传播特征论、旅游传播本源论、旅游传播者论等。至于旅游传播过程和旅游传播效果等内容则穿插在上述四大内容之中。

其二，独立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和传播”这一基础的、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之质疑。本书认为实物传播不需要符号，实事传播需要非符号与符号的混合使用，符码传播则属于纯符号传播。这个内容虽然表面地看与旅游传播似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它是一个传播学基础问题，很重要，同时也是理解旅游实体传播、实体体验的理论前提。顺便向读者提示一下，本书与已经出版的《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观照》、《信仰及其传播》、《经济活动传播论》属于同一个系列，即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系列。尤其是《经济活动传播论》与本书在基础理论上有所衔接，请互相参照。

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观点集中在关于旅游传播的特征探讨方面，包括：旅游的核心内容是实体体验和实体传播；直接体验是旅游传播的最重要特征；“取经式”传播与非对称传播是旅游传播的一个特征；旅游传播源信息具有累积性等。

此外，本书关于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以及他的文

化散文中存在的“天人感应”观念问题的探讨，也是新的视角和新的见解。

其三，概括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术语。

“底色文化回应”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新术语。它是旅游过程中反复、普遍出现的现象，本书对这一现象以“底色文化回应”作了抽象和概括。

“体验式传播”也是本书使用的新术语。把旅游体验式传播分为现场观察式体验传播、进入式体验传播、参与式体验传播三种类型，有助于对旅游体验的深入分析和认识。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旅游与旅游传播	(1)
第一节 旅游概说	(1)
一 旅游的定义	(1)
二 旅游“六要素”、旅游“三体”与旅游“三大效益”	(2)
三 旅游与休闲	(3)
四 旅游与迁移	(4)
五 旅游学与旅游史简说	(5)
第二节 旅游是文化活动	(5)
一 旅游是一种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	(5)
二 “文化至上论”	(8)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旅游活动的一面	(9)
四 中西旅游文化比较	(11)
五 旅游与爱国主义、故乡情怀	(12)
六 旅游与宗教信仰传播	(15)
七 旅游垃圾文化	(16)
第三节 跨文化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18)
一 旅游不一定是跨文化交流	(19)
二 跨文化旅游与文化冲突、融合	(19)
三 跨文化旅游与文化休克	(21)
四 底色文化回应	(23)

第四节 旅游是经济活动	(32)
一 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	(32)
二 重新认识“无烟工业”、“清洁产业”	(34)
三 旅游景区的“小经济行为”	(34)
第五节 旅游是传播活动	(36)
一 旅游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活动	(37)
二 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与旅游传播的社会功能	(38)
三 旅游传播研究现状简介	(42)
 第二章 旅游传播的特征	(46)
第一节 旅游传播与实体传播	(46)
一 实体传播简介	(46)
二 实体传播与符号	(47)
三 旅游与实体传播	(58)
第二节 直接体验——旅游传播的最重要特征	(64)
一 体验与旅游体验	(64)
二 游客凝视	(75)
三 体验式传播	(77)
四 体验经济与消费体验式传播	(85)
五 旅游审美体验与旅游高峰体验	(87)
第三节 “取经式”传播与双重非对称传播	(91)
一 “取经式”传播	(91)
二 双重非对称传播	(94)
第四节 旅游传播源信息的累积性	(98)
一 什么是旅游传播源信息的累积性	(98)
二 不少作家、学者在不同旅游地不约而同地 诉说着这种文化累积	(101)
三 中国古迹更加突出的累积过程	(105)
四 景观信息累积起始的条件	(106)
五 另类的“累积”	(107)
第五节 旅游与旅游传播对人类社会的独特贡献	(113)

一 开阔眼界和思路·····	(114)
二 国外旅游不可避免地会提供另外一个社会参照系·····	(125)
三 对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对促进世界和平有独特贡献·····	(127)
四 对缓解、治疗人类身心疾患的独特效果·····	(130)
第三章 旅游传播本源——旅游目的地与传播(一)·····	(133)
第一节 旅游传播本源的特征——知名度高、传播力强·····	(133)
一 真正的旅游目的地都具有知名度高、 传播力强的特征·····	(133)
二 争夺旅游资源也是争夺旅游传播源·····	(135)
第二节 保护旅游传播本源的原真性·····	(135)
一 古迹、环境的原真性·····	(136)
二 艺术品也推崇原创真品·····	(145)
三 游客也追求原汁原味地观察、体验旅游 地当地社会生活·····	(147)
四 自然景观的原始状态也有极高的旅游传播价值·····	(148)
第三节 旅游传播本源的前台与后台·····	(148)
一 主动展示后台，传播“内部信息”·····	(148)
二 顾及后台，就意味着要改善整体生态·····	(150)
第四节 旅游地形象及其传播·····	(151)
一 本源形象与诱导形象·····	(151)
二 旅游城市形象传播·····	(151)
三 旅游地形象传播渠道、策略·····	(152)
第五节 旅游环境与旅游传播·····	(155)
一 欧洲和美国的旅游环境比较好·····	(155)
二 乞丐现象一直伴随着旅游·····	(157)
三 旅游接待地应当创造宽容的旅游环境·····	(158)
四 游客多寡也构成旅游环境的一部分·····	(159)
五 旅途与旅游传播·····	(160)
第六节 旅游传播本源的传播策略·····	(164)

一	强化珍贵性、唯一性	(165)
二	突出关键时间点的原真物品	(165)
三	保留旅游传播源的神秘性	(165)
四	见物还要见人	(168)
五	旅游传播源的异质互补整合	(168)
六	让游客目睹考古过程	(169)
七	利用传统节日,创造新的节日	(169)
八	适当的“舞台化真实”	(170)
第四章	旅游传播本源——旅游目的地与传播(二)	(171)
第一节	自然景观与旅游传播	(171)
一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会传达出不同的 自然景观信息	(172)
二	自然景观美与美学修养	(173)
三	自然景观信息的开发	(174)
四	自然景观的保护	(176)
五	自然景观传播的途径	(177)
第二节	人文景观与旅游传播	(177)
一	名人的踪迹会形成历史文化遗产	(178)
二	一些并非完全原真的景观也可能 具有很好的旅游价值	(181)
三	在特定的氛围中才能有相应的感受	(182)
四	大遗址	(183)
五	英国的“蓝牌”和俄罗斯的标牌	(184)
第三节	民俗与旅游传播	(185)
一	民俗旅游	(185)
二	关于民俗旅游与传播存在问题的探讨	(186)
第四节	工业遗产与工业旅游传播	(188)
一	工业遗产与工业旅游	(188)
二	现代工业生产厂区的旅游开发	(188)
三	大型工程也可以形成旅游资源	(189)

四 传统手工艺·····	(189)
第五节 博物馆与旅游传播·····	(190)
一 博物馆及其功能·····	(190)
二 综合类博物馆受冷落及其原因·····	(191)
第六节 世博会、奥运会与旅游传播·····	(192)
一 世博会、奥运会作为旅游传播所呈现出的特点·····	(193)
二 上海世博会与旅游传播·····	(194)
第七节 旅游传播源的不断开发——太空旅游·····	(197)
 第五章 旅游传播者(一)——旅游主体·····	(199)
第一节 旅游主体(旅游者)与旅游传播·····	(199)
一 旅游者与旅游传播·····	(200)
二 旅游消费与旅游传播·····	(209)
三 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影响·····	(212)
四 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220)
第二节 旅行家与旅游传播·····	(221)
一 旅行家与旅游传播·····	(221)
二 旅行家独特的精神结构·····	(226)
第三节 记者、作家、艺术家、人文社会科学家与旅游传播·····	(227)
一 作家与旅游传播·····	(229)
二 艺术家、艺术作品与旅游传播·····	(233)
三 人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与旅游传播·····	(240)
 第六章 旅游传播者(二)——旅游介体·····	(243)
第一节 导游与旅游传播·····	(243)
一 导游·····	(243)
二 导游的讲解能力与旅游传播效果成正比·····	(245)
第二节 旅游公司与旅游传播·····	(247)
第三节 旅馆、饭店与旅游传播·····	(250)
一 旅馆、饭店简介·····	(250)
二 旅馆、饭店与旅游传播·····	(250)

三 服务者·····	(251)
第四节 交通和交通工具对旅游传播的影响·····	(252)
一 交通和交通工具与旅游·····	(252)
二 交通和交通工具对旅游传播的影响·····	(253)
第五节 旅游传播与传播媒体·····	(259)
一 旅游传播与媒体·····	(259)
二 巧妙策划,吸引媒体·····	(261)
三 关于“看景不如听景”·····	(261)
 附章 第五章“旅游传播主体”延伸阅读	
——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贡献·····	(263)
第一节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263)
一 余秋雨的“出走”与意义·····	(263)
二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267)
第二节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	(272)
一 艺术成就·····	(273)
二 富有文化深度的思想内涵·····	(283)
三 两个需要商榷的地方·····	(287)
四 两个个案分析、赏析·····	(291)
第三节 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295)
一 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295)
二 余秋雨与传播媒体·····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04)

第一章

旅游与旅游传播

把旅游与传播放在一起研究，不是随意的、牵强的粘附，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研究旅游传播正是考察旅游本身。

本章可以看做旅游和旅游传播的本体论。

第一节 旅游概说

一 旅游的定义

现在并没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统一的旅游的定义。笔者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想直接给出一个简明的定义：旅游就是离开居住地到外地去游览。这是指典型的旅游。如果想涵盖再广一些，可以再加一个中心词“休闲”：旅游就是离开居住地到外地去游览或休闲。

其实，汉语“旅游”这两个字就很好地诠释了旅游的内涵。“旅”的基本意思是：出行的，在外做客的。“旅”就意味着离开居住地、离开家，到外地去；就意味着它需要旅行，需要或长或短的行程，即旅程。但这种旅行以游览为目的。“游”，就意味着从容地行走，就意味着游览、观看、欣赏，而且是在游动中、在身体的不断移动中浏览、观看、欣赏。它不同于坐在屋里看书、看电视。因此，离开居住地到外地去游览，是旅游最基本的内涵。

有了这个简明的定义之后,还想对两个有影响的定义做一点辨析。

瑞士学者汉泽克尔(W. Hunziker)和克拉普夫(K. Krapf)合著的《普通旅游学纲要》一书给旅游下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不会导致永久居留,并且不从事赚钱的活动。”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对旅游的定义,旅游是指“为了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离开他们惯常的环境,到某些地方并停留在那里,但连续不超过1年的活动”。

上述两个定义都显得有些宽泛,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不会导致永久居留”,“离开他们惯常的环境,到某些地方并停留在那里”,都与笔者所说的“离开居住地到外地去”一致。之所以说这两个定义宽泛,是因为“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以及“为了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的“活动”,包含了“游览”之外的许多活动,而在笔者看来,典型的旅游就是游览活动。

当然,有学者认为旅游的目的包括六大类:“休闲、娱乐、度假”,“探亲访友”,“商务、专业访问”,“健康医疗”,“宗教/朝拜”,“其他”。旅游并非仅指传统意义上的观光、休闲活动。这是相当宽泛的,如果把这些活动都当做旅游的话,可以看做是广义的旅游。而笔者所给出的定义是指狭义的旅游。

二 旅游“六要素”、旅游“三体”与旅游“三大效益”

旅游“六要素”是指游、购、娱、吃、住、行,它构成旅游活动的主要内容。其中,“游”是核心内容,没有它,就很难称作旅游了。谁在游、购、娱、吃、住、行?当然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者。

旅游“三体”是指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介体,这三体被称为“3t”,即 tourists,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industry。旅游主体就是旅游者,旅游客体就是旅游景区或旅游产品,旅游介体就是旅游企业或旅游组织。从消费角度看,旅游者是消费者,旅游资源是消

费对象,旅游企业是消费营运商。应当指出,没有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和旅游介体的存在都是无意义的。

旅游肩负着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重任。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意味着它具有实现经济效益的功能。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和独特的传播活动,意味着它具有实现社会效益的功能。自然环境既是旅游的对象之一、又是旅游活动的承载体,而旅游是大众广泛参与的活动,旅游对环境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因而旅游还承担着实现良好环境效益的功能。

不难看出,旅游“六要素”、旅游“三体”与旅游“三大效益”是对旅游活动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三 旅游与休闲

(一) 旅游与休闲

上边提到的联合国旅游组织关于旅游的定义,把休闲包括在旅游中。

在笔者看来,休闲的概念要大于旅游。一般地说,旅游是休闲的一种方式,但休闲并不都是旅游。在家打扑克、下棋、看电视、聊天等都可以叫做休闲,但它们不是旅游。

由于市场制度下技术进步对于人类劳动有“挤出效应”,增加职工的休闲和旅游时间,就可以通过减少劳动时间来达到均衡分配工作机会的目的。休闲日益广泛和多样化,并对人类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带来重要影响,从而产生了休闲学。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以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为标志。他在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1995年起实行5天工作制;1999年实施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日;2008年又实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社会主流人群已经有1/3以上的时间是在休闲中度

过的。甚至有研究认为，在闲暇时间保有量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大量的闲暇时间为旅游提供了时间保证。

对于旅游者来说，旅游活动是一种休闲活动。表面看，它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旅游休闲的“真正收益”，是旅游后的工作与生活中的不断增值。

（二）人生的目的是休闲吗

有学者说：“从哲学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目的不应该是劳动（生产活动）而是休闲，劳动是为了更好地休闲。在许多方面，就其过程而言，生产活动类似于动物的谋生过程，更多地具有某种无奈的成分。休闲比劳动更能成为人类寻找本性和塑造本性的直接工具。”^①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乌提卡保存的罗马时代的一座公共会堂建筑上铭刻着“狩猎、沐浴、游玩、尽情欢乐，这就是生活”。

然而，很难确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劳动是为了更好地休闲，但休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劳动。动物的谋生过程就是它的本性，谋生也是人的本性，不管是否无奈。休闲和劳动都是体现人类本性的活动方式。把休闲看做人生的唯一目的，似乎有失片面。

四 旅游与迁移

旅游和迁移都属于人类的流动。但旅游是人短暂的流动与停留，迁移是人在流动后长期甚至终生的停留。

旅游的目的是游览、观光，迁移的目的是居住或工作，尽管有时也伴随着旅游。显然，迁移对迁移者的影响是实际和巨大的，在很多方面，迁移者别无选择；而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却是局部的、可选择的。

关于迁移与传播，笔者将在接下来要写的书中论述，在此不多说。

^①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五 旅游学与旅游史简说

由于现实需要,现在旅游研究比较热,但成熟的旅游学科理论尚未出现。旅游研究者勃德威(Bodewe)在1981年说:“旅游还只是一种对已建立学科的应用,还没有足够的学说支撑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①虽然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这段话依然足以描述现在的旅游学概况。所谓“学说”,主要是指基础理论。旅游基础理论建设很薄弱,还有待努力。

旅游历史的研究著作不少,但力作较少,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更不好找。

关于旅游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旅行是旅游的前奏,旅游由旅行发展而来。

有学者认为,全球旅游业发展经历了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和体验旅游三个阶段。

关于中国的旅游历史,谢颜君教授主要从“自有时间”和“审美意识”这两个视野入手,将完整意义的“旅游现象”的肇始定在南朝。

第二节 旅游是文化活动

一 旅游是一种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

(一) 旅游的本性就是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

旅游的魂魄是文化;旅游的本性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活动。同时,文化能够提高旅游品位,旅游可以传播文化神韵。

宏观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化活动的两翼。旅游属

^① 参见邹统钎、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序”,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于“行万里路”的内容，而且是其中饶有兴味、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文化的贡献不可低估。托·富勒说过：“行路多者见识多。”这正如我们中国人平时常说的“见多识广”。旅游创造文化，旅游传播文化。若问旅游传播了什么，答曰：旅游传播的主体内容是文化。

许多长途旅行留下的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余秋雨写道：“站在犍陀罗遗址中，我直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现在，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以梳理。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①

就旅游对象之一的“山”来说，有“看山如观画，游山如游史”的说法。“观画”表明了旅游的审美内涵，“游史”表明了山中蕴涵着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1986年美国律师汤普森游历了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后深有体会地说：“旅游就像一堂广闻博见的文史课，又像一场有趣的游戏。”广义地讲，不管是审美还是历史都可以看做文化的内容，而且是文化的正宗内容。

游记产生于旅游，而游记也是了解历史的一个窗口。旅游家芮麟就记录了开封20世纪30年代风沙肆虐的自然环境：“我于未来前，好友都告诉我，说春天刮大风时，尘沙是多到对面看不见人的，我总有些不信。现在到了这里，方知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他还专门为这里的风沙写了一首诗，名曰《大风歌》：

南人西来必先悸，闻道风沙春最厉。
汴梁小住送春归，日白天青乃无比。
方意危言初耸听，巨风一夕连天起。
风卷狂沙沙卷风，风袭沙追弥望是。
猎猎猎，虎虎虎，
满城灰沙满城雾，漫天烟云漫天土。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75页。

是蛟龙斗？抑鬼神怒？
 老树随风倒，老屋随风毁，
 大地昏黑万象沉，日月无光天亦死！
 车辍涂，贾罢市，
 思妇搔头怨，征夫渡头阻。
 耳无闻，目无睹，
 口无言，心无主。
 归来且自掩重户，
 无边尘沙依旧簌簌下如雨。
 挥不胜挥，止不可止，
 茫茫一片烟和雾，
 漠漠一天尘与土。
 空自怀洁癖，干净复何处？
 对此惟有暗叫苦！
 中州儿女独不奇，笑谓风沙春更厉，
 今兹乃其小者耳，今兹乃其小者耳！^①

尽管当代开封人还有对开封风沙多的抱怨，读到这段内容后就会理解当地治理风沙已经有了不小进展。

（二）不断培育新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不断更新、发展的，文化创意就在于不断开掘、培育新的文化内涵。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

“陪你到天涯海角，爱你到海枯石烂”，这是青年男女相互表达爱情的山盟海誓，而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真正的“天涯海角”就在三亚。“天涯海角”不仅成了三亚的代名词，而且成了浪漫爱情的孕育之地、美满婚姻的结缘之地。根据这一特定的文化含义，三亚市政府从1996年起每年年底举办“天涯海角国际婚礼节”。当地政府力图把婚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284页。

庆活动同旅游度假结合起来,培育出具有国际影响的三亚旅游品牌。不难看出,在这种旅游创意和策划中,核心内容是具有中国特征的爱情、婚姻文化。

二 “文化至上论”

“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最根本的是文化。”^①文化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确实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把文化说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真正动力”,就需要分析了。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的需要、需求,最根本的是人的需要、需求。“人”在这里是一个整体概念,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需要、需求。说得更严密些,是人的合理需要、需求。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某些不合理需要、需求,比如吸毒,不能包括进去。

过去曾有理论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生产力中包括人,人的需要、需求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但还是没有说到根本上,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需要、需求,正是人的需要、需求才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需求与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和谐一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的文化内容不仅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还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比如消费主义所滋生出来的物欲横流,就对可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再比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春节文化中,烟花爆竹这个文化习俗就消耗能源、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浪费钱财,与可持续发展并不协调。

现在有一种普遍倾向,无限美化文化,夸大文化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种倾向称作“文化至上论”。其实,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还有民族和地域之分。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即使是先进文化,其中也有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合理甚至落后的内容。

不同文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促进和阻碍的作用。

^① 许嘉璐:《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北京日报》2010年2月1日。

“文化至上论”在旅游领域极为活跃。文化是旅游的魂魄。由于旅游的需要,各种民俗都被抬了出来。一些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陋俗也被奉为至宝,被不加批判、不加选择地“弘扬”。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旅游活动的一面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不利于旅游活动的一面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明显不利于旅游活动的一面。

《老子》曰:“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既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旅游自然不被鼓励。

《论语·里仁》云:“父母在,不远游。”父母的存在是远游的一大障碍。

《礼记·曲礼上》云: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不登高、不临深都与旅游无缘,更与探险无缘。

《汉书·元帝纪》载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国人安土重迁,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移。农耕文化、小生产既是安土重迁观念产生的根源,也是这种观念播散的有利土壤环境。“穷家难舍,故土难离”,“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穷窝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却愿在家相对贫,不愿天涯金绕身”,“利刀难断东流水,天涯难隔家乡情”,“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等等,表达的都是家乡观念。而“背井离乡”是颇有些悲壮和不得已意味的。

古代出门难,是抑制旅游的重要因素。“出门人,三分小”,道出了出门在外与人打交道时处于不利地位的实情,与当地相比出门人总是矮三分。“行船走马三分险”,表达的主要是水路和旱路的艰险。“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说的是夜路容易遭遇不测,要趁早赶路,不到天黑就要停下来找住处。总起来说,“出的门多,受的罪多”。所以,最好少出门或不出门,少到外地或不到外地。说到这里,我们就更能理解家乡观念了。

梁实秋《雅舍小品·旅行》中说得更绝对一些:“我们中国人是

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①

梁启超曾分析过中华文化保守、“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等的地理原因，他说：“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雅耶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磨砺相资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革其单调的保守之特性。”^② 保守、“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等都不利于旅游。

得益于改革开放，当代中国人已基本摆脱传统文化中不利于旅游活动的那部分观念，中国人的旅游活动已经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接近世界发达国家。如果说古代奔波于旅途之上的多是往来的商贾、宦游的士人、公行的官员、云游的僧侣、赶考的学子以及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骚客文人，现在普通民众已经开始成为旅游的主体，大众旅游越来越成为现实。

（二）中国传统旅游文化中不健康的一面

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自然要受整体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凡事讲究表面的完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或缺点，比如几乎所有剧作都是“大团圆”结局。这种风俗习惯也表现在旅游文化中。鲁迅在 1925 年指出：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③

① 梁实秋：《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②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十七，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 页。

③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1 页。

鲁迅批评过的“十景病”、“八景病”直到现在仍未绝迹，一些地方仍在凑自己的“十景”、“八景”。不知道是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邻国日本也有“八景”、“十六景”之说，作家庐隐在游记中记载：“日光共有十六景。”^①

四 中西旅游文化比较

择要而言，正像有学者概括的那样，中国旅游文化以向善寻美为目的，西方旅游文化以求真逐利为宗旨。这是一种比较鲜明的对比。也应说明，“求真逐利”在西方传统中存在，但当代西方旅游“求真”依然存在，“逐利”的意味却越来越淡。

中华民族是一个审美的民族，“天人合一”观念使得中国人懂得尊重和依循自然，无论是园林的创意和营造，还是对自然山水的保护和点缀，都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层次。难怪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狄更生游泰山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只有中国人才真懂得爱护自然，他们在山水间的点缀是没有一点辜负自然的；实际上他们处处想法子增添自然的美，他们不容许煞风景的事业。他们在山上造路是依着山势回环曲折，铺上本山的石子，就这山道就饶有趣味，他们宁可牺牲一点便利，不愿斫丧自然的和谐。所以他们造的是妩媚的石径；欧美人来时不开马路就来穿山的电梯。他们在原来的石块上刻上美秀的诗文，漆成古色的青绿，在苔藓间掩映生趣；反之在欧美的山石上只见雪茄烟与各种生意的广告。他们在山林丛密处透出一角寺院的红墙，西方人起的是几层楼嘈杂的旅馆。听人说中国人得效法欧西，我不知道应得自觉虚心做学徒的究竟是谁？”^②读了狄更生这段话，我们会有一点遗憾，他所激赏的中国人在山水审美方面的长处，这些年来在旅游开发中有所丧失，一些著名的旅游景区也学着西方人的样子盖旅馆、架

^① 庐隐：《蓬莱风景志》，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② 参见徐志摩《丑西湖》，《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缆车，破坏了自然景观的整体和谐。

中华民族性格也造就了自己的旅游性格。中华民族具有稳健内敛、观物修身的旅游性格。

中华民族旅游性格对旅游传播产生了影响。由于这种“向善寻美”，所以就有出洋使者的“宣威海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明朝政府“将南亚和东亚纳入进贡体系”的重要任务，其动机“可能完全是政治性的，把中国的进贡制度带给已知的整个世界”^①。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示了多么明显的“向善”意向，“观物修身”也自在字里行间。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追寻山水之美的意图表露无余。

五 旅游与爱国主义、故乡情怀

爱国主义、故乡情怀本身就是文化主体内涵的一部分；旅游活动会进一步凸显这种文化内涵。

史达尔夫人说过：“别的国家看得越多，就越会热爱祖国。”

德国著名作家海涅写过不少游记，他说过：“人实在太古怪了！在祖国我们牢骚满腹，那儿的每一件蠢事，每一种不合理的现象，都使我们愤愤不平，我们像孩子一样都在盼望离开那里到远方去；而一旦我们终于真的来到远方，我们又觉得太遥远了，暗地里又常常怀念故乡褊狭的、愚蠢和谬误的事物，我们又想坐在原来那间熟识的房间里，如果可能的话，就在炉子后面造一幢房子，蹲在里面取暖，读着《德意志大众报》。我去英国旅游时，情况也是这样。德国的海岸才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我便对刚才满眼都是的条顿睡帽和假发有了古怪的留恋之情，虽然我离开时看着他们就心烦。当祖国在我眼底了无踪迹的时候，我又在心里找到了它。”^②

^① [美]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② [德] 海涅：《旅行杂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英国散文家哈兹里特也有类似表达：

当我们离开祖国在外游历之时，我们便不是原来的自我而变成另外一个也许更令人羡慕的人。我们不仅离开了朋友，也远离了自我。于是诗人便唱出了如此优雅的诗句：“离开了祖国，我也离开了自己。”要想忘掉痛苦的思绪，最好是暂时离开那些能够引发伤心回忆的联系或事物，然而只有自己出生的故乡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因此，假如我能够有另一次生命，我愿用今生的时间遍游各国，而将来生永远留守在我的故土。^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有广泛漫游，他则用诗句表达了漫游中强烈的爱国、爱故乡的情怀：

我曾经漫游在异邦，
在海的彼岸，与陌生人交往。
英格兰啊，只在那种时光，
我才知道对你的爱的分量。^②

美国诗人亨利·范戴克在游历了欧洲之后，写下了诗篇《属于我的美利坚》：

观光旧世界，周游四方，
置身闻名宫殿驰名都市，
赞叹欲坠的城堡帝王的雕像，时光美妙！
可是如今我想已经饱览古色古香。

于是重返家园，重返家园，属于我的美利坚！

① [英] 威廉·哈兹里特：《论出游》，参见李玉花等《英语名人游记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30—31页。

② [英] 华兹华斯：《我曾经漫游在异邦》，参见《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译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我又神往家园，我多么渴望回到家园，
超越大西洋的障碍，回到青春自由的大地，
空气充满阳光，国旗缀满星星。

啊，伦敦是男人的城市，力量无所不在；
巴黎是女人的城市，秀发里插着鲜花；
在威尼斯想入非非多么甜蜜，研究罗马多么堂皇；
可是安身托命，走遍天涯海角，唯有家园好。^①

中国人面对大好河山时所激发出的爱国情怀也很激越，尤其是“国破山河在”时，更是如此。《世说新语·言语》载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②

面对大好河山，更激发出光复神州的决心。

对于许多人来说，旅游的地方越多，故乡情怀就越强烈。阎肃作词的歌曲《故乡是北京》就表达了这种情怀：

走遍了南北西东
也到过了许多名城
静静的想一想啊
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不说那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
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

① 参见杨自伍《英语诵读精华》（研究生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 刘义庆：《世说新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唱不够那红墙碧瓦太和殿
道不尽那十里长街卧彩虹
只看那紫藤古槐四合院
便觉得甜丝丝脆生生京腔京韵自多情

不说那高耸的大厦旋转的厅
电子街的机房夜市上的灯
唱不够那新潮欢涌王府井
道不尽那名厨佳肴色香浓
单想那油条豆浆家常饼，
便勾起细悠悠蜜茸茸甘美芬芳故乡情

最后，还要指出，广泛旅游之后所形成的爱国、爱故乡的情怀，与从不出门而自有的爱国、爱故乡的情怀相比，前者往往不再褊狭、短视，表现出爱吾国以及人之国，爱吾乡以及人之乡，甚而四海为家的宽阔胸怀。

六 旅游与宗教信仰传播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旅游者虽然也包括宗教信徒，但宗教信徒的宗教活动与宗教旅游有着明显的差别，宗教旅游者的旅游并不以宗教朝圣参拜活动为主要目的。

许多旅游目的地与宗教文化有关，比如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等。因此，旅游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对宗教信仰传播有帮助。

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活动本身就有明显的宗教文化色彩，比如，前往巴勒斯坦的导游手册被称为“神圣地理学”。再比如，德国北部的诺尔登海岛有明文规定：“地球是属于上帝的，你不能污染它，也不能徒劳地伤害这里的生命。”这当然是生态主义者的表达，但也展露出了对上帝的信仰。

旅游为宗教活动带来经济上的帮助，同时，教堂也为旅游者提供

了宗教体验的机会。旅游业被看做是教堂维修的有用的收入来源；教堂也为旅游者提供了宗教体验的机会。通过旅游，人们得到了许多宗教知识。

欧洲探险旅行与宗教传播和攫取财富密切相关。15世纪末，罗马教会就致函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感谢他许诺“他的航海事业将人类可居住的世界统一于基督教”。当有人问达·伽马是什么促使他去印度时，他回答：“是基督徒和香料。”安田朴将葡萄牙人对印度的征服称为“胡椒的十字军”和“桂皮的朝觐者”^①。

七 旅游垃圾文化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旅游文化中也有垃圾文化，我们必须批判和剔除。

所谓旅游垃圾文化，就是在旅游活动中展示和传达给人们的、影响人们正确理解和接受优秀文化的谬误、畸形信息。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六类：^②

第一类是没有根基的“奇文化”。一段时期以来，造奇之风盛行，“中国最大”、“亚洲第一”之类的新景观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不可否认，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它既有电视发射的实用价值，又有观赏城市夜景的旅游价值，尤其是它独特的设计与浦东新区城市面貌和上海的传统社会功能相辉映，使它成为这个现代大都市建设发达城市经济的豪迈气概和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但在这些造奇之中，还有一些由于忽视了区域文化特征，成为没有根基的垃圾文化，如建在无锡号称“神州第一大佛”的灵山大佛。无锡—太湖区域原有自成体系的传统文化，鱼米之乡、丝织业、战国时期的吴越之争、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传说、民间艺人阿炳的故事、小手工艺品等，已构成它的鲜明的文化特征，相比之下，这样一座大佛建在这里

^①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68页。

^② 参见徐永计《旅游垃圾文化流源辨析》，《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

显然是不协调的。这些增建的新景观没有文化的根基，不仅本身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观赏价值，而且破坏了区域文化的一致性，影响整体景区文化特征的表达。

第二类是“抄袭文化”。创作一些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是增加自然景观文化内涵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某些美好愿望，表现人们的传统审美情趣，从而提高自然景观的文化品位。比如杭州西湖的美景自然美不胜收，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三潭印月、花港观鱼让人流连忘返；而听了西湖由来的那则动人的仙女金凤护宝珠的神话故事，更能引起人们许多美好的遐想，使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们那种创造美、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和传统，西湖也因此增加了一道美丽的光环。然而，现在的故事创新的少，而抄袭的却很多。比如现在的“仙女文化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凡有水光山色，就有仙女故事，而且情节大同小异，似乎是仙女满天飞，天下的大小湖泊要么是她们洗澡的地方，要么就是她们丢掉的宝镜、珍珠。其结果，自然无从谈起其美感受。

第三类是“假文化”。凡是旅游景区都会有一些名人的逸闻轶事，或由古代文学作品衍生出来的故事。这些文化的内涵提高了景观的文化品位，提高了游人的游兴，如山西平遥古城尹吉甫的故事，杭州西湖苏轼的故事，漓江的九马画山，九寨沟的生肖岩壁；有的甚至正是这些文化使景观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如张继的《枫桥夜泊》之于寒山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于岳阳楼，《三国演义》之于成都武侯祠，等等。但为了增加文化内涵，一些新近开发的景观编造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一听就穿帮，使人扫兴。

第四类是“丑文化”。在旅程中适时地插入一些笑话、故事是导游艺术的体现，它可以缓解游客的紧张、疲劳，活跃气氛，并且能够起到拉近与游客距离的作用。但这些笑话、故事应该是健康的，给人以美感或有益的启示，也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让人轻松，而且具有再传播的价值。但实际上，现在不论走到那里，所听到的要么是一些不健康的“黄色幽默”故事，要么是诋毁时政、贬低领导人形象的“黑色幽默”。这不仅影响了行业的形象，也给秀丽的风景蒙上了一层灰

色。它不仅不能让人轻松，反而在哄笑之后难以消受，沉重而不快。

第五类是“迷信文化”。在一些宗教场所，旅游从业者大肆渲染宗教神灵。在他们的渲染下，佛就是万能的，他掌握着人的命运，诚心地拜佛就会解决人生路上的任何问题，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即使是做过恶事也会“回头是岸”。但因为身在宗教场所，所以人们就失去了辨别能力，毫无防备地接受了它。于是烧香拜佛、请菩萨、请法物，甚至在一些地方如四川的松潘川主寺、乐山、峨眉山，导游还引领游客参加所谓的佛事活动，给法物开光；有的还接受所谓的高僧点化。

在民族传统中，人们往往赋予某些事物以某种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也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比如珍珠，古人认为它是水之精，能灭火，所以可以镇宅，是镇宅之宝。但我们在宣传介绍这种珠宝文化时，应该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出它的局限性，从而客观地介绍它的审美价值和药用价值。不加分析地渲染它的象征意义就成为迷信宣传。现在这种迷信宣传充斥着几乎所有的旅游景区。将珠玉宝石的文化渲染成一种非人力所及的神化功能，将珠宝的拥有与婚姻、财富、地位、子女成就、家居风水必然地联系起来，神乎其神，就极具欺骗性。

第六类是“恶文化”。“恶文化”就是恶化、丑化当地文化。旅游从业者以关心游客安全的面目出现，无限夸大当地文化中丑、恶的一面，有的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如商业道德低下，治安秩序混乱，满街的假货、短斤少两、蛮横无理、盗匪遍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往往以宣传介绍少数民族文化的面目出现，大肆渲染落后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族劣根性。

第三节 跨文化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旅游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异质文化信息的碰撞、交流、传播。跨文化旅游中发生的许多现象和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此。

一 旅游不一定是跨文化交流

有学者说“旅游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体验、是一种跨文化交流”^①，是“跨文化交流以及高层次消费活动”^②。世界旅游组织也认为，旅游是文明之间的对话。

如果是跨文化旅游，比如，中国游客到欧洲去旅游或美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说旅游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是对的。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旅游都是跨文化旅游，因而也不都是跨文化交流。不少旅游，比如大部分国内旅游，是文化内交流。河南省郑州人到开封或安阳去旅游，很难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北京人到河北省保定去旅游，也同样是如此。

说旅游是“高层次消费活动”，也容易产生争议。旅游中确有高层次消费活动，但许多普通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很难说是“高层次消费活动”。尤其是大众旅游日益普及的今天，把旅游一般地说成是“高层次消费活动”不够准确。

如果说旅游主要是一种体验和精神活动，因而属于高层次消费活动，倒是有一定道理。

二 跨文化旅游与文化冲突、融合

（一）文化涵化

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当不同群体由于长期直接接触而使各自文化发生规模变迁，便是涵化。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按照探讨这一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会（The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夏季研讨会的界定，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

①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3 页。

② 同上书，第 34 页。

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①。

旅游学所说的涵化是指旅游过程中一切由文化接触所引致的社会文化变迁。涵化可以有同化、整合等方式。同化是一种文化被强势文化所遮蔽并与强势文化相适应。整合是原有文化保持了其某些特征又吸收了异文化因素，两种文化融为一体。涵化的结果是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缩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冲突是涵化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文化融合才是涵化的通常和理想的方式。

（二）跨文化旅游与文化冲突

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始自哥伦布，当哥伦布进入美洲时，就与古巴和海地当地土著发生了冲突。

法国著名旅游学家罗贝尔·朗卡尔指出：“旅游者在与接待地区居民相遇时，会意识到各种价值体系的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旅游通过个人之间的实际相遇，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冲突，一种社会的冲突。”^② 这种冲突并不总会发生，但文化差异越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文化冲突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

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冲突并不少见。比如，据德新社惠灵顿2005年12月9日报道，一名参加传统欢迎仪式的毛利文化表演者用头撞向一名荷兰游客并撞断了他的鼻子，因为他认为该游客在嘲笑自己。双方为此对簿公堂。通常，在这种仪式上，导游会请游客捡起放在脚下的一根羽毛或树枝，以此表明自己的来意是友善的。原告一方在当地法庭上说，当时，荷兰人约翰斯·谢弗斯在新西兰罗托鲁阿某民俗村庄里代表一个160人的参观团对毛利人回礼。曾有人提醒谢弗斯任何笑的表示都会被毛利人视为不敬，但是，在仪式的最后部分，谢弗斯“无意中露出了紧张的笑容”。一名参加仪式的毛利人于是走

① 参见邹统钎、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② [法]罗贝尔·朗卡尔：《旅游与旅行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页。参见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上前去用头相撞，撞断了谢弗斯的鼻子。^①

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冲突几乎不可避免，但是随着跨文化旅游日益增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理解越来越多，这种冲突有可能减少甚至避免。

（三）跨文化旅游与文化融合

旅游有可能逐渐整合异质文化，培养世界公民意识，这就是旅游的文化涵化作用。

人们发现旅游的发展加速了文化融合，也带来了文化趋同。无疑，这种文化融合与趋同是旅游中的文化传播带来的。

通过旅游，各个不同的民族社会都进入了国际化的进程，它们逐渐同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体制衔接起来，同时，各国本身的参照体制却在解体；这样，“接待”旅游或“出发”旅游的各个不同社会都被带入了出于同一原因的变化之中。^②

文化融合是好事，文化趋同则需要甄别和选择。如果向着一种强势文化趋同、向着一个方向趋同，就需要警惕和避免。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各种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那样一种态势。

三 跨文化旅游与文化休克

在跨文化旅游中，如果文化差距过大，超出了旅游者的理解范围，文化休克就会出现。

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个体遇到不同文化时的一种体验，

^① 《笑容惹祸》，《参考消息》2005年12月12日，第6版。

^② M. F. 朗方：《按照世界一体化的逻辑》，《外交世界》1980年8月。参见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这种冲击是由于在某一新文化环境中人们无力去应对所造成的。由于过度承受了各种不能理解的陌生的刺激,面临着生活与行事的不同方式,人们遂丧失了提出问题、理解回答甚或是辨认食物的能力。^①文化休克是获得普遍承认的旅行者进入异域、异质文化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度过文化休克期是每一个真正的跨文化旅行者、旅游者必须要过的难关。

文化休克这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跨文化旅游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为我们认识和处理跨文化旅游活动提供了一种理论。

语言不通是产生文化休克的首先的原因。价值观的不同是产生文化休克的深层的根本原因。旅游地东道主应给那些处于文化休克期的旅游者以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从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的旅游者,其文化视野和文化观念会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短期访问多种文化的旅游者可能持续地处于文化休克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适应每一种新的文化。然而,在被访问地有朋友的旅行者所体验到的文化休克在程度上要低于那些没有朋友的人们。

并非每一类型的旅游者都必然经历文化休克。大众旅游只为旅游者—东道主的互动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机会,这种预先组织、预先采购、经过组合、配有导游的短期团体旅游,为大众旅游者提供了一个使他们得到保护的环境泡囊,他们无法与新的文化以及外国东道主有直接的交往,也不会有紧张与焦虑之感。^②

现代旅游的便利让大多数人加入了旅游的行列,但它减弱了人们的旅游体验,旅游的便利性也减少了人们在旅游中的刺激感。丹尼尔·布尔斯廷指出:

过去,旅行者有冒险感,那是由于他们会遭遇无法预料和带有风险的事,现在长途旅行变成了包办的旅行,这种冒险感也就

① 参见[澳]赖辛格等《旅游跨文化行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冲淡了。旅行者变成了“游客”，他消费的是大批量生产的并有保证的产品。旅行社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可能和在家里一样方便，与“当地人”随便接触的情况越来越少，即便接触，也是越来越平淡。房间早已订好，菜单事前备就，支票也已事先付出。总之一切风险（包括天气恶劣和行李丢失）都以保险的方式照顾到了，手里因持有偷不走的钱而安心，旅游者出去转了一趟回来，脑子里记住的东西不多，但带回的照片倒不少。使他满意的或者使他抱怨的事情，跟他游览的那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主要和承包他旅行的原居地的旅行社有关。^①

这里所说的“冒险”，应该包括文化休克。

团体包价旅游，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减少文化休克现象的出现。但在这种过程中，旅游者无法走出自己的“文化圈子”，跨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

四 底色文化回应

底色文化回应现象在所有旅游活动中都存在，只是在跨文化旅游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跨文化旅游中来讨论。

（一）何谓底色文化回应

遇到任何文化表现，观察者总是与自己的母文化相比较，观察者自己的母文化是审视、置放和接受所遇文化表现的背景和底色。这是旅行、旅游中一再出现的现象，但学术界并没有对它在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概括，笔者以“底色文化回应”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它。这种回应，在面对异域文化时，不是第一反应，也应该是伴随着第一反应或紧随第一反应之后的反应。正如余秋雨在考察中国以外的古老文明时所坦言：“不错，我沿途见到的每一个古文明的废墟都埋藏着各自极为深刻的玄机，我也试图一一参悟，但参悟的终点，总是中华文明。

^①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这似乎有点狭隘，却又无可奈何。”^① 余秋雨所说的“参悟的终点”总是中华文明，就是中国人面对异域文化时底色文化回应的一种表现。

现代作家孙伏园在游莱蒙湖（Lake of Lemman）时写道：“当着这个人口上，有一个再小也没有的小岛（île de peilz）曾经摆仑（通译拜伦）描写过的。我们从前以为三潭印月不算小，阮公墩总还算天下最小的岛了，哪知与这个小岛一比，阮公墩也许还是大洲呢。我们虽然没有上去，因为轮船是不停的，但远远地望去，岛上只有两棵树，岛外只有三五只白鹅。我想第三棵树固然未必种得下，这几只白鹅也许因为岛上无可容足才浮到水面上来的罢。”在国外看到小岛就想到了国内的阮公墩。他接着写道：“出了西蓉古堡，我们又在它的近旁徘徊久之。我们不禁想到了中国。古堡建筑的时代，正当中国南宋，西湖也正出着风头。但那时有谁歌咏丽芒呢，看古堡的遗迹，沙维华公爵所豢养的，武士以外还轮不到诗人。而他们毕竟脱出了中古黑暗的时代，古堡只供后人的赏玩了，中国即使早把西湖歌咏到烂熟，现代文明的曙光始终未见。奈何！”^② 看着莱蒙湖想到了西湖，看到了莱蒙湖的进步，又想到了中国还没有到达现代文明。

无独有偶，另外一位游者竟然在外域的沙漠中也想到了阮公墩。

忽然从车左面望去，沙与天相交的线中间，发现洋洋的大海，海中许多小岛罗列着。忽然在车前面又发现同样的怪景。洋洋的大海有时又变成一个清澈的小湖，简直像西湖一样，中间点缀些湖心亭、阮公墩一般的小岛，我们问车夫那是些什么地方，车夫说“那是‘幻境’，不是真的，今天算是你们很好的运气，平常也不是容易看见的”。我们才知道中国所谓海市蜃楼者就是那样东西，《史记》所谓海上三山常为风所引去者，大概也是这样的幻境。^③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② 孙伏园：《丽芒湖上》，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7页。“丽芒湖”通译莱蒙湖。

③ 王礼锡：《开罗短游》，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在这种中国底色文化回应中，不仅有实体的西湖和阮公墩，还有中国的成语“海市蜃楼”和古老的《史记》记载。

女作家冰心在1924年游玷池（Spot Pond）后写道：

看三三两两成群携手的人儿，男孩子都去领卷袖，女孩子穿着颜色极明艳的夏衣，短发飘拂。轻柔的笑声，从水面，从晚风中传来，非常的浪漫而潇洒。到此猛忆及曾皙对孔子言志，在“暮春者”之后，“浴乎沂风乎舞雩”之前，加上一句“春服既成”，遂有无限的飘扬态度，真是千古隽语！^①

即使身处异域，看到西方少男少女穿着夏装，想到的竟是《论语》中的“春服既成”，中国传统元文化如此顽固地成为观察西方服装文化的抹不去的底色。作家王统照见到荷兰马尔孔、瓦林丹两个渔村小岛时，写道：

中国古诗句说“觅得桃源好避秦”，马尔孔、瓦林丹两个小岛如时在数百年前，海上交通纯靠人力，它们又孤悬海中四无依傍，真也可说是“海中桃源”了。^②

有点与世隔绝，保存老习惯与旧风俗，即使在海上，也要用中国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观照了。

作家冯至曾经到过瑞士罗迦诺的乡村，

脚刚踏上轻松的土地，举目一望两旁的浓绿，便深深嗅到浓郁的故乡气味。不只气候和北平夏季的乡间很相似，就是几种违阔许久的生物，也在这里重逢了：中午是无边无际的蝉声，夜晚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25页。

② 王统照：《荷兰鸿爪》，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窗外时常有窸窣窸窣的声音，那是蝎子在墙缝里出没，更有成群成队的壁虎，灰色的，绿色的，在壁上和草间爬来爬去，有时清早起来，露水未晞，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长逾尺，绿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静，它一动也不动，你可以轻轻地在它身旁赏玩许久，不提防有一个大的蝗虫跳出，它也飞箭般紧跟着窜入草的深处。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乡所有的。西瓜，蜜桃，这些暑中的鲜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叶子，成荫地伸出矮矮的墙头。只是暗绿色，瘦而长，火焰形的扁柏，三三两两地被移种在别墅里，或是白色的圣母堂旁，给我们一些异乡之感。

这可以说是在故乡一样的乡间。^①

外域的一切，动物、植物等，都与故乡比，相似的与不相似的，都以故乡北平的尺子量。

在长途考察即将结束，即将从尼泊尔走进祖国大门的时候，余秋雨动情地写道：

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口口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问回来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到一个地方。已经很近，就在前面，我们在离别之后读懂了它。^②

游历考察异域文明，最终归宿点还在祖国，这几乎是所有旅行者、旅游者发自心底的共同声音。玄奘不远万里从印度取经回归大唐正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① 冯至：《罗迦诺的乡村》，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198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作家赵树理在 1958 年访问朝鲜的时候写道：“我是生长在中国北部农村的人，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容易偏注意当地农村，这次到朝鲜来也还是如此。”“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有天然的水源，不但水稻田里不缺水，就连美帝杀人罪证的炸弹坑也变成了无数的小水坑。我虽然也是丘陵地带的人，可是中国的北部没有这样多的水源，所以对水源特别爱慕。”^① 缺水的晋东南使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对水格外关心，看到朝鲜水多的地方，马上反映出中国北部农村的缺水，这是区域地理、地域文化作用的结果。

当余秋雨看到以色列人在沙漠中种植的果品和鲜花时，他写道：“与此相应，它的喷灌滴灌和海水淡化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我看来，黄河上游乃至整个中国西北高原，都应该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② 他没有忘记水资源较为贫乏的中国，应该向以色列学习节约和充分利用水的技术。

以上都是名人，他们文化水平高，尤其是母文化修养深厚，到国外出现底色文化回应应在情理之中。即使普通人也不例外地具有这种底色文化回应。75 岁的周遵梅与 70 岁的卢文桃是夫妻，当记者问起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时，卢文桃说，以前只知道美国很强大，来了以后要亲眼看看怎么强大。美国人很有礼貌，用餐很客气，坐的旅游车很清爽，没有国内旅游车和公共汽车那么多广告。周遵梅插话说：“美国旅游车过收费站时都不用停下来，一扫描就过去了。先进的东西中国人都应该学习。”^③

（二）底色文化回应与对比

底色文化回应与对比本为孪生姊妹，二者往往同时出现，不可分割。

黄炎培游东京的公园时，就在中国的底色文化背景下与日本公园乃至整体文化作了对比：“浅草公园，完全和上海城隍庙一样；不过

① 赵树理：《朝鲜农村印象记》，参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2 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7 页。

③ 于浩轩：《中国赴美旅游首发团很开心》，《世界新闻报》2008 年 6 月 24 日。

有两点微微的同：同是摆摊卖物，而商品应用科学处较多，如玩具大都应用化学，而一以具有半机械性能活动者为主；家庭用具，如洒扫用、洗濯用、盛物用，种种新创或改良物品，大都应用化学与物理学，而一以增高工作效能为主；至于舶来品，几乎可云绝迹，恰与上海城隍庙绝对的相反。还有一点，同是男女对神龛拜跪祈祷、献供品、捐金、卜祸福，但所献供品，限于极少数之果物，捐金至多不过一二圆，所燃白烛，长等于笔帽，而比笔帽还细，随处表示他们的小，而又表示他们的节俭朴实，与吾国随处表示奢侈，又绝对的相反。”^①

既然心底深处涌动着母文化，就免不了将所遇到的文化与之相比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谓底色文化回应本身就自然包含着母文化与所遇文化的比较。在比较中，强势的母文化往往对异域文化审视、贬斥，弱势的母文化往往对异域文化羡慕，取学习的态度。黄炎培主要表现为后者。比黄炎培还要早，近代的黎庶昌在看到法国的造纸和纺织技术时所取的态度也是后者。他说：造纸“凡经机轴六次，皆一气呵成，神速异常，不假人力”。制呢则“次第一如中国纺织棉布，并无差异；所异者，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②。曾到过苏联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苏联集体农庄已经有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什么脱粒机、收割机等等，我过去都没见过，看了以后真是不胜羡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呢？”^③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到国外游历，多取羡慕、学习的态度。

原先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由于到国外感受到了明显的不同，对比之下，游客自然就能分辨出如何更好。这是一位中国旅游者对日本手机文明的感受：

① 黄炎培：《黄海漫游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② 参见钟叔河《从东放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91页。

③ 参见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1页。

平日里，总会在公车、会场、餐馆、楼道等公共场所，听到突然响起的高分贝手机铃声，接打电话者甚至如喊叫一般，旁若无人。这种被别人的手机铃声、电话内容干扰生活、打断思绪的感觉着实不爽。而一次赴日旅行的经历，却让我真正领教了日本人生活中的“手机文明”，叹服之余不禁为国人身上存在的一些手机陋习而感到汗颜。

这位旅游者惊讶地发现“一路乘坐地铁、参观旅行、逛街购物、餐馆就餐，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听到一声手机铃声、没有听到一人大声接打电话，完全摆脱了国内经常遇到的手机困扰”。他进而设想，“如果国人也能如日本人这样自觉地管理好自己的手机，将通话的声音压到最低，并将这种文明影响推广到其他类似的领域，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①。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旅游获得宽阔视野之后的底色文化回应与对比，往往就不再坐井观天、唯我独尊了。庐隐在记述日本美景时写道：

其实中国的江南北川，也何尝没有好风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但是“蓬莱”另有“蓬莱”之景，其潇洒风流、纤巧灵秀，不可与中国流丽中含端庄的西子湖同日而语。所以我虽赞许蓬莱之美，亦不敢抹煞西子湖之胜：燕瘦环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处呢！^②

各有其美，美有不同，很难说谁比谁更美。

（三）底色文化回应与反思

当余秋雨看到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对艺术文明的扶持、保护和对文

① 张金刚：《日本公共场合手机静默》，《北京青年报》2010年7月20日。

② 庐隐：《蓬莱风景志》，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艺复兴的贡献时，他想到的当然又是自己的祖国。“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①在比较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官僚、豪绅对公共艺术的淡漠。

这里，在底色文化回应中已经包含了对自己文化母体的反思。这是底色文化回应中更高层级的回应。回应自然包含比较，比较进一步就是反思。反思之所以是更高层级的回应，是因为反思意味着对母文化的批判和拷问，意味着为母文化的升华带来了新的希望。正如鲁迅所说：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觉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②

下面是在底色文化回应中对母体文化反思的更为突出的一个例子。余秋雨写道：“在欧洲，经常可以在对比中领悟：多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对权力，对大众，对学问的半推半就、似进似出的全方位矫情，致使中国长期以来缺少宏大的精神建树。”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总是直关社会利害，构不成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寞间徘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

^①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② 鲁迅：《不满》，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人的虚假。^①

也许这种反思或批判显得尖刻，然而它能给人以启发，比不痛不痒的废话好得多。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广泛接触和了解，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比较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四）底色文化回应与多元文化回应

底色文化回应是人类很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过程，在多数情况下，正像我们在上面论述的那样，它是积极和富有弹性的。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把遇到的所有的新现象都以母文化为尺度来审视和丈量，也许思维就会有模式化和尺度过于单一的缺陷，有时难免表现出固守母文化的情性心理。尤其是用母文化中有局限性的观念来审视和丈量时更是如此。近代人张德彝曾游历欧美，他在巴黎见到“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这就是避孕套。我们看他是如何议论的：

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②

显然，他是以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和性意识来看待避孕套这种新事物的，这种观念和意识不要说放到现在觉得陈旧落伍，即使在当时也有保守、僵化之嫌。现在人们都知道避孕套可以节制生育，还可以预防性病。

在全球化日益递进的今天，我们有理由设想，一部分阅历广、视野开阔、有多种文化背景的人士，其母文化融合了异质文化的养分，甚至更有以两种以上文化都成为“母文化”的高层次人才，当他们遇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523页。

② 参见钟叔河《从东放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78—79页。

到新的异域文化时，他们的底色文化回应不再是单一的、单色调的，而是多元的、富有容量和弹性的，是富有全球眼光的。这可以叫做多元文化回应。比如，王统照在观览荷兰小岛渔村瓦林丹时，就不是单一的中国文化眼光：“我们都觉得这渔村中人爱清洁的习惯与日本人相同，木屐、肥衣自是他们的风尚。”^①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简单的例子。

第四节 旅游是经济活动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过：“旅游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经济性较强的文化事业。”确实，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并存于旅游活动中。

由于人们把旅游看做经济活动，并很看重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作了许多研究，笔者在这里只作简要论述。

一 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

把旅游看做一种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而且，对旅游的早期研究，多集中在它的经济方面。连林语堂这样的文化人也较早看到了这一点：“旅行在过去是一种快事，现在却变成一种实业。今日的旅行工具无疑地比一百年前更为完美，各国政府及其所设的旅行社已经在发展旅行业，结果现代人大抵比从前的人旅行得更多。”^②

的确，现代旅游业已成为一种重要产业。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1996）指出：“无论用哪一种经济指标（总产出、附加值、资本投资、就业和税收贡献）来衡量，旅游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① 王统照：《荷兰鸿爪》，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② 林语堂：《论游览》，参见《林语堂散文全集》第2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旅游发展也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认为,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行业有 24 个,间接相关的行业有 124 个。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旅游部门直接收入每增加 1 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加 4.3 元;旅游部门每增加 1 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 5 个就业机会。

旅游业的发展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传递,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旅游城镇的发展,例如广西的东兴和凭祥,就是通过发展旅游成为新兴城市的。^①

旅游被称为“无烟工业”,它又是“无形贸易”、“风景出口”,因而可以“清洁创汇”。

不过,应看到,过分依赖于旅游业的经济有着先天的缺陷。旅游受客源地政治局势动荡、战争、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旦发生不可预测事件,必然导致旅游接待国或地区经济萎缩。旅游接待地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某些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也会导致旅游业乃至整个经济严重受挫。作为现代旅游活动主要组成部分的休闲度假旅游季节性很强。如果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作为基础产业,淡季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闲置,从而带来经济和社会问题。难怪有人说过分依赖旅游业的经济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

旅游活动也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800—1000 美元时,国民将普遍产生国内旅游动机;达到 4000—10000 美元时将产生出国旅游动机;超过 10000 美元时,将产生洲际旅游动机。

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方式对旅游发展有影响。商贸经济促进旅游发展,小农经济抑制旅游发展。

旅游作为文化活动能够传播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同样能够传播包括旅游经济信息在内的许多信息。

^① 李周、操建华等:《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 页。

二 重新认识“无烟工业”、“清洁产业”

旅游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烟工业”或“清洁产业”，对环境不造成破坏。然而，随着与旅游有关的各种环境问题的出现，它已成为过时的观念。

1995年4月27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的兰沙罗特岛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这个《宪章》指出：“旅游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旅游能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失……旅游赖以发展的旅游资源是有限的。”

确实，如果不用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旅游的理念来指导旅游发展，就会出现“旅游破坏旅游”。比如，成千上万旅游者的步履，几乎将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名城的博物馆内珍贵的镶嵌画地板磨平。过去的普陀山“见屋皆寺庵，逢人尽僧尼”，有着“海天佛国”浓重的宗教文化气氛，现在已经变成具备“食、宿、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的综合性的旅游小城市。不少游客游过此地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此地不可不来，但不可再来。”

著名的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就发生过环境保护向旅游妥协的事情。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规定，严禁游客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但当地在景观最奇特的保护区的核心区蛋岛旁边建设了敞开式的观景台，游客可以直接到达正在孵化产卵的鸟前10米左右的地方。鸟岛的鸟种群数量最近10年下降了70%，这显然与旅游的扩张有关系。

一些地方的生态旅游变成了“旅游破坏生态”。旅游的表面繁荣会破坏有限的旅游资源，使旅游发展不可持续。

三 旅游景区的“小经济行为”

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它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但是，一些

旅游地的“小经济行为”，显示出一种“小家子气”，传达出低级庸俗的“金钱至上”信息。

罗马教廷当局曾经颁布圣令：所有朝拜过彼得和保罗墓地以及罗马城内各教堂的信徒，都可以获得赎罪券——对现世部分或全部罪责赦免的契据。这一圣令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朝圣的热情，1299年，卜尼法斯八世宣布赦免1300人，并发给那年想前往朝拜圣彼得墓地的朝圣者赎罪券。据估计，那年前往罗马的外乡人有200万之多，他们谦恭地带着祭物，将财物放在圣彼得墓前，两个神父拿着耙子日夜不停地搜集钱币。

在中国，许多旅游地专门设置财神像，宣扬向财神投钱币可以“财运亨通”。周庄沈厅内的财神雕像前就扔满了钱币，财神雕像也被投币砸得伤痕累累（见图1-1）。这些钱到了财神手里吗？明眼人自然清楚，它进了景点管理者的腰包。但许多游客投掷钱币，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图1-1 周庄沈厅内的财神雕像前扔满了钱币，财神雕像也被投币砸得伤痕累累（赵建国摄于2010年6月23日）

有的景区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随意搭建一些低劣的“迷宫”之类的东西，把优美的景区环境弄得不伦不类。请看徐州云龙山上的一

处“梦幻迷宫”(见图1-2),显得多么扎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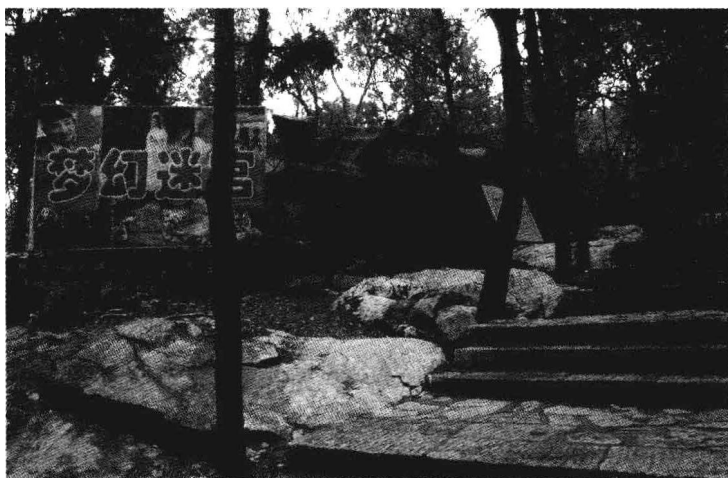


图1-2 徐州云龙山上的“梦幻迷宫”
(赵建国摄于2009年12月15日)

第五节 旅游是传播活动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在《宽容》(*Tolerance*)一书的序言中塑造了一个孤独的漫游者的形象。漫游者超越部落所居的无知山谷(Valley of Ignorance),走到山外,找到一条通向更美好家园的道路。这位勇敢的漫游者向部落成员道出了山外世界的真相,为部落成员走出山谷指明了方向。“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他地方。”但在守旧的老人带领下,人们杀死了这位漫游者。没过多久,这个山谷遇到一场特大干旱,半数以上的人死去了。人们找到了已经被杀死的那个漫游者“用石子堆起的路标”,沿着这位先驱者的道路,走出了干渴的山谷,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这位勇敢的漫游者不向山谷里的人们传播山外的信息,如果

没有漫游者留下走出山谷的路标（路标也是一种信息），无知山谷的人们就会干渴而死，这里的文明将因无法传承而灭绝。漫游者用艰难步履留下了一个词，它就是“传播”，传播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至今。

一 旅游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活动

前边已经谈到旅游的本性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活动。实际上，我们说旅游是文化活动，就等于说旅游是传播活动；我们说旅游是传播活动，就等于说旅游是文化活动。文化的本性、本能就是要传播，文化与传播本为一体，不可分割。所谓传播，就其传播的社会信息而言主要是文化。“自古以来，旅游就与文化的传播相生相伴。每一个旅游者，实际上是文化的传播者，是促进沟通交流的文化使者。”^①

旅游活动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碰撞。“旅游不仅是生活方式行动，它同时也是文化和思想激活及交流的方式。……旅游的要义是，程式化的生活有意义的转换（即变换常态的生活方式）、精神放飞、审美鉴赏、心理调节和意志锤炼，还有文化交流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②

旅游是一种传播活动，应该获得广泛的认同。由于旅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不同于媒体上的大众传播，它主要是在异地的游览活动中发生的，所以，它又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活动。由于旅游具有广泛性、全民性、世界性，所以它又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性的传播活动。

旅游的整个过程，包括从产生旅游动机、选择旅游地，到在旅游地游览、休闲，以及往返旅途，再到返回出发地后与亲友聊旅游体会、见闻等，都伴随着交流和传播。习惯上人们所说的“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娱、购，是旅游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内容，同时这六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伴随着传播，并且没有传播、交流就

① 刘云山：《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光明日报》2010年3月24日，第3版。

②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无法吃、住、行、游、娱、购。

国外有“旅游是读写在大地上的书”、“游遍天下，学到一切”的格言。培根在《论远游》中说：“对于年轻人，旅游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在旅游类型中，有求知型旅游，寓学于游。1988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口号是：“旅游：教育所有人。”（Tourism: education for all.）可见，旅游的教育作用获得了广泛认同。教育、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传播、交流活动。既然旅游是一种学习方式，能够取得教育的效果，那么它自然也就是一种传播、交流活动。

关于旅游传播的特征，本书有一章专门论述，此处从略。

二 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与旅游传播的社会功能

（一）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1948年，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一文中，分析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并提出“三功能说”。他认为，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功能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环境监视功能：瞭望哨的作用；（2）社会协调功能：在有分工合作的社会各组织之间进行协调和统一；（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继承和创新使社会得到发展。拉斯韦尔的原话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传播的某些特定功能。传播有三个明显的功能：1. 监视环境；2. 联系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对环境做出反应；3. 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①

1959年，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又从社会学的角度，补充了“娱乐”功能。由此形成了经典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赖特认为，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包括四个方面：（1）环境监视：警戒外

^① Our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will deal with the specializations that carry on certain functions, of which the following may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1.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environment; 2. the correlation of the parts of society in responding to the environment; 3.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ocial heritag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参见熊澄宇《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来威胁、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的信息需要。(2) 解释与规定: 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 而是为了向特定方向引导和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3) 社会化功能: 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4) 提供娱乐: 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 这方面占传播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

笔者在经典的“四功能说”基础上, 把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归结为:

1. 传递信息, 监视环境;
2. 引导舆论, 协调社会;
3. 传承文化, 教育大众;
4. 提供娱乐;
5. 形成传媒产业, 为社会创造财富。

这可以叫做大众传播的“五功能说”。

(二) 旅游传播的社会功能

既然旅游是一种传播活动, 而且是一种大众性的传播活动, 那么它就应当具有相应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认真比照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与旅游传播的社会功能, 我们不难发现, 旅游传播基本上具备大众传播的所有社会功能, 只不过多数功能更具有旅游的特性, 个别功能与大众传播相比显得有些弱化。

总体上说, 旅游传播的文化遗产传递功能、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是最明显不过了。旅游传播也具有某种引导舆论、协调社会的功能, 但比较弱。

下面我们简要分析旅游传播的社会功能:

1. 传递信息, 监视环境

旅游传递信息, 但多数信息与监视环境关系不大。

然而, 旅游活动可以使人们更清醒地看待自己所居住的生态环境, 也更全面地了解其文化及社会环境, 因而旅游传播确有一定的环境监视功能。但与新闻传播相比, 它的监视环境并不是全方位的。我们不能指望旅游把监视环境的任务全方位承担起来。这里所说的环境, 不仅是指与“环境保护”同义的环境, 更包括整个社会

环境。

旅游本身就是对旅游景点的一种监督。当年，徐志摩游西湖后曾写过《丑西湖》，就对西湖风景区提出了不少批评。他写道：“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里，我每回去总添一度伤心：雷锋也羞跑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哈得在湖心里造房子，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工厂的烟代替了出岫的霞，大世界以及什么舞台的锣鼓充当了湖上的啼莺。”^① 这是一种舆论监督。

旅游活动在监视环境方面有独特性。如果旅游点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破坏，那么整个生态环境的状况就可能更加不好。例如，当人们带着一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预置心理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看到的却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没草尘土扬，没有青草如茵，只见裸露的干草根！也不见了牛羊悠闲自在的景象”^②，所有来到这里的旅游者都会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拯救草原！拯救环境！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如果旅游地生态环境好，那它就为旅游出发地树立了一根标杆，成为改善旅游出发地环境的参照物。本书作者赵建国曾在2006年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访学和游览，在蓝天白云下生活了两个多月。乘飞机回国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第一眼印象竟然是：怎么天空是灰色的！这种印象理所当然会转变为阻止空气污染，还祖国蓝天白云的呼吁与努力。如果没有在俄罗斯的眼睛看和口鼻呼吸，这种愿望就不会这么强烈。

多数旅游景区，尤其是自然景观和生态旅游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和谐的自然生态，会给旅游者树立一根环境标杆，留下一个参照系，用这个标杆和参照系来与自己日常生存的环境进行对比，并以此来改良自己日常生存的环境。

2. 引导舆论，协调社会

旅游可以引导社会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更加注重锻炼身体和保持

^① 徐志摩：《丑西湖》，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哈得”通译哈同，犹太人，富翁。

^② 风信子：《裸露的呼伦贝尔》，《书摘》2010年第6期，第29页。

健康。旅游可以使紧绷的社会神经松弛下来，可以缓解社会的紧张感。

旅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生产和消费处于动态平衡，释放消费能量，促进生产发展。

3. 传承文化，教育大众

很明显，多数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文化传递功能。

文化传递功能又称社会遗产传递功能。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生活状况，以遗址、建筑、雕塑、壁画、文学艺术、工程、陵寝等各种形式遗存下来。通过旅游活动，人们就可以从中了解历史、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

旅游教育功能的最重要特点是“寓教于游”，在轻松、愉悦中获得知识和培育、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历史上，16—18世纪，英国富有阶级已把小孩到欧洲大陆修学旅游看做一个扩大视野的机会。

中国的“红色旅游”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

4. 提供娱乐

旅游的娱乐功能一点也不亚于大众媒体。

娱乐是旅游的主要目标之一。游乐、游玩、游戏，欢乐游、逍遥游，浪漫之旅、梦幻之旅等与“旅”和“游”连在一起的词汇，都有浓郁的娱乐气息。旅游作为一种娱乐、休闲、养生和生活情趣，中国古代士人已经充分挖掘和体验过。宋代大儒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①。

与一般娱乐活动相比，旅游娱乐是在外地进行的。因此，这种娱乐成本较高，同时，还可以使多数游客能够放得开，纵情欢娱，但也使某些游客过于放纵，超出日常生活的道德底线。

5. 形成旅游产业，为社会创作财富

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前边的“旅游是经济活动”中论及，这里从略。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

三 旅游传播研究现状简介

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旅游有其合理性和实践需求,因而已经有一些研究旅游传播的论文问世,但还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

多数论文集中在实用层面和个案分析层面。这方面的论文有梁海燕的《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①谷明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②李蕾蕾的《旅游地形象的传播策略初探》,^③巫宁的《信息传播:旅游目的地营销与服务的关键环节》,^④金周益的《旅游地形象定位和形象传播的探讨》,^⑤郭贤智的《旅游广告媒体及其对旅游的影响》,^⑥郭鲁芳的《旅游目的地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因素》,^⑦周年兴、沙润的《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过程与生命周期初探》,^⑧徐立新的《旅游品牌营销与传播沟通机制研究》,^⑨刘德昌、付勇的《我国旅游景区品牌传播策略初探》,^⑩杨园

① 梁海燕:《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福建地理》2005年第4期,第40—42页。

② 谷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7期,120—125页。

③ 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的传播策略初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87—93页。

④ 巫宁:《信息传播:旅游目的地营销与服务的关键环节》,《旅游学刊》2007年第10期,第67—70页。

⑤ 金周益:《旅游地形象定位和形象传播的探讨》,《科技资讯》2006年第6期,第146—149页。

⑥ 郭贤智:《旅游广告媒体及其对旅游的影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第86—87页。

⑦ 郭鲁芳:《旅游目的地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因素》,《旅游学刊》2006年第8期,第6页。

⑧ 周年兴、沙润:《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过程与生命周期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年第1期,第55—58页。

⑨ 徐立新:《旅游品牌营销与传播沟通机制研究》,《商业经济》2007年第5期,第92—97页。

⑩ 刘德昌、付勇:《我国旅游景区品牌传播策略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第173—176页。

的《中国旅游业品牌创新研究》,^①等等。

对旅游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很不够。王洁发表在《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上的《试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旅游传播》,探讨了旅游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阐述了旅游传播的四大功能,并提出了实现有效旅游传播的原则和方法。该文认为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旅游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基础理论方面,旅游与文化传播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王晓如的《试析宋代宗教对旅游的影响》、^②袁忠的《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播》^③等论文都属于这个内容。旅游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视角。赵飞羽、明庆忠、王波的《游客对旅游地的跨文化传播之初探》,^④方世敏的《略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⑤欧阳军的《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相互作用的弹簧机制》^⑥等论文都是这样的视角。

李锋的《旅游传播学理论体系刍议》^⑦认为,“旅游传播学属于边缘性的交叉应用学科,在整个旅游学科体系中属于技术应用学科”。旅游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旅游信息的选择、传播和控制,旅游信息的反馈和评估等”。笔者同意旅游传播研究的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看法,但它既有应用学科或技术应用学科属性的一面,也有基础理论属性的一面。

目前还没有旅游传播研究的专著问世。我们能看到众多的关于旅游的书籍,多数集中在旅游知识和景区介绍、旅游开发等实用方面。

① 杨园:《中国旅游业品牌创新研究》,《科协论坛》2007年第4期(下),第144—145页。

② 王晓如:《试析宋代宗教对旅游的影响》,《唐都学刊》2005年第1期,第128—131页。

③ 袁忠:《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播》,《探求》2005年第3期,第56—59页。

④ 赵飞羽、明庆忠、王波:《游客对旅游地的跨文化传播之初探》,《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年第2期,第50—53页。

⑤ 方世敏:《略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143—147页。

⑥ 欧阳军:《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相互作用的弹簧机制》,《人文地理》2003年第1期,第35—39页。

⑦ 李锋:《旅游传播学理论体系刍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37—139页。

有关旅游理论研究的书籍较少,而在这些不多的书籍中,除了一般旅游学概论的著作或教材外,有关于旅游经济研究的,比如辛克莱(M. Thea Sinclair)、斯特布勒(Mike Stabler)的《旅游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旅游文化研究的,比如杨乃济的《旅游与生活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谢贵安等的《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有旅游美学的,比如仇学琴的《现代旅游美学》(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有旅游心理研究的,比如甘朝有的《旅游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旅游史研究的,比如吴必虎等的《中国景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邹树梅的《旅游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有综合介绍旅游学术研究状况的,比如邹统钎、高中、钟林生的《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甚至还有旅游哲学研究的专著,比如曹诗图的《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但遗憾的是,旅游传播研究的专门著作还是空白。

与旅游传播研究擦边的,有一本陈志辉等编著的《旅游信息学》。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编,旅游信息与旅游活动。共三章,旅游信息、旅游活动、旅游决策与旅游信息。第二编,旅游信息工作。包括五章,旅游信息源、旅游信息采集、旅游信息的整理加工、旅游信息检索与传递、旅游信息服务。第三编,旅游信息业。包括三章,旅游信息商品化与旅游信息市场、旅游信息化、旅游电子商务;第四编,旅游信息管理。包括三章,旅游信息管理基础:操作系统、旅游信息管理基础:数据库技术、旅游信息管理系统。^①不难看出,这些内容与传播学的框架不一样,也与本书的思路和主要内容很不相同。

几乎所有涉及旅游信息的研究,都集中在有关旅游供求信息上。比如,澳大利亚学者 Leiper 关于旅游通道的论述:旅游通道同时也应该是一条信息的通道。一方面是市场需求信息从客源地流向目的地,另一方面是具有促销功能的目的地信息从目的地流向客源地。^②

^① 参见陈志辉等《旅游信息学》“目录”,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邹统钎、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本书所讨论的旅游传播，旅游供求信息不是主要关注点，而是要从传播学角度全面探讨旅游传播特征、旅游传播本源、旅游传播主体，而且在探讨旅游传播信息的内容方面，主要关注旅游本源所传播的历史文化信息、自然信息等。构筑旅游传播理论体系是本书的目标之一。

第二章

旅游传播的特征

前边已经谈到，旅游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活动，那么它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它们包括：旅游的核心内容是实体体验和实体传播；直接体验是旅游传播的最重要特征；“取经式”传播与非对称传播；旅游传播源信息具有累积性等。当然，许多情形下，旅游可能会成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了解的是旅游地表面和片面的信息。这应当是旅游传播比较明显的弱点。

第一节 旅游传播与实体传播

一 实体传播简介

笔者在本书的姊妹篇《经济活动传播论》中提出的实体传播概念与实体传播、符码传播这一新的传播分类，是旅游传播的重要基础理论和框架。本书除了简要介绍与此相关的最基本的内容外，更重要的是继续展开对实体传播的探讨。对于本节文字，请读者注意与《经济活动传播论》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阅读。凡是《经济活动传播论》中已有的内容，在本书中出现只是整体结构的需要，笔者肯定要把它们压缩到最浓缩的程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

实体传播是相对于符码传播而言的。被传播信息所指代的对象

在场,换一种说法,信息与它所指代的实际事物为一体,就是实体传播。信息与它所指代的实际事物为一体是实体传播最重要的特征。我们采用“实际事物”的说法,是想表达实体传播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实物传播,第二种是实事传播,第三种是动作、表情传播。

除了实体传播之外,所有的传播方式都是符码传播。符码传播就是信息被编成符号、密码、数码进行传播,信息与信息所指代的实际事物对象是分离的。信息与信息所指代的实际事物对象相分离是符码传播最重要的特征。信息被转化成口头语言、文字语言、图像等符号进行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所有信息被编码、压缩成数字0和1来传送是目前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数字化传播也是最先进的符码传播方式。

符码传播要将信息内容转化成口头语言、文字语言、图像等符号来传播,所以符号就成为传播学的基础概念。所有符码传播都要经历编码和译码(或叫做解码)的过程,所以信息论和传播学中都有对编码、译码的研究。符号成为传播学的基础概念,编码、译码这两个术语伴随着信息论和传播学的最初诞生这样的事实,就告诉我们传统的传播学以符码传播为主要对象。

二 实体传播与符号

实体传播与符号的关系,在笔者最初提出实体传播的概念和实体传播与符码传播的分类时,没有作深入探讨。在这里,将作专门讨论。之所以要专门探讨这一问题,是因为笔者发现,许多传播学者认为,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和传播的。显然,这是涉及传播学基础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辨析清楚。

(一) 符号学概要

1. 什么是符号

通常人们对符号有如下认识。

符号是用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可以表示某事物等具

体存在,也可表示精神抽象的概念,是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有意义的象征物,是传播者与受众间的中介质,承载着交流双方向对方发出的信息。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就是语言的声音形式部分,也可以说是它的外在形式;所指就是语言的语义内容部分,也就是它的内在含义。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所有符号的共同之处。美国符号学的创立者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指出,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它是“确定另一事物(它的解释者)去特指一个它所特指的对象(它的对象)的任何事物”^①。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说,对符号系统的研究,来自一个很低级的非常原始的感觉,这就是符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可以直接感觉到的指符(signans),另一个是可以推知和理解的被指(signatum)。”^②这在本质上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别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传播学学者郭庆光认为:“简言之,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③与这种观点相近,有学者认为“符号就是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如声音、图形、姿态、表情等”^④。符号是由物理载体和意义构成的统一体。

通常认为,符号具有指代性、社会共有性和发展性、多义性、灵活性、认同性、隐含性等特征。符号具有指代和交流两大基本功能。

“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派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从长远看来,两者都应被囊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叫作交流。”^⑤这里的交流学科应

① 参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② 雅各布森:《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参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③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④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⑤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该是指传播学。

2. 符号与实际事物的关系

不管在表面上看符号与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离得多么遥远,符号总是与客观世界有着割不断的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伊柯代表了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一个符号学派。

在伊柯的早期论著和《符号学理论》一书中,他都提议探求感知现象学中的意义概念与文化单位里的语义观念的相通并容的程度。伊柯指出:“站在这个角度来重温胡塞尔的论说,可以使我们将符号学上的意义简单地解说为对某种感知经验所进行的社会性的编码。”^①

符号不过是对客观世界感知经验的编码。

在符号的分类中,除了语言符号之外,还有非语言符号。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非语言符号是指除语言之外的其他所有传播信息的符号,一般包括鼓声、烽火、标志、图像、手势、表情、姿态、病症、口哨、气味等。”^②“符号可以是物,是词语,也可以是约定俗成的标记,还可以是姿态。”^③也就是说,非语言符号中有许多都是实际事物。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这些实际事物,当其作为符号而存在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为自身而存在,它们传达的不是自身的信息,它们都把我们引向其他东西。比如,“烽火”告诉我们敌人来犯。两手成“T”形的“手势”,表示暂停或停止,等等。

但是,这些能够成为符号的实际事物,与整个世界实际存在所有事物的数量相比,只占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量存在的实际事物,都没有被人为赋予符号功能。

即使上边提到的除标志、图像外的鼓声、烽火、手势、表情、姿

① [荷兰] 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8页。

②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③ 石福析:《西方哲学中的“符号”概念》,《光明日报》2010年7月13日,第11版。

态、病症、口哨、气味等也并不总是作为符号而存在，比如气味，各种各样的气味并不都被赋予符号的功能；再比如病症，千姿百态的病症，多数并不是符号。

（二）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和传播的吗

著名符号学家雅各布森认为：“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①这是一个影响广泛并且获得普遍认同的观点。比如，中国传播学者李彬写道：“世界上没有离开符号而单独存在着的消息，正如没有不包含信息的符号。符号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信息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②下面的说法正是上述观点的推论：世界上的信息只有经过编码变成符号之后，才能传播。

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广义的信息的构成和传播不需要、至少不一定需要符号，而狭义的信息的构成和传播却是需要符号的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信息。

关于信息，有广义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

在广义的概念中，中国信息哲学专家邬焜作出了贡献。他认为信息定义可以精确地表述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③既然信息就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那么，物质自身就应该能够显示其存在方式和状态的信息，否则，我们便无从获得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信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的信息是自身显示，不需要人为的符号来充当中间物。郭庆光谈到信息的广义概念时指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④这种说法与邬焜在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理解“物质的普遍属性”会是符号，也不能理解“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符号。所以，广义

① 雅各布森：《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参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②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③ 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46页。

④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的信息是由符号构成和传播是说不通的。

关于信息还有狭义的概念，这是传播学界许多人所理解的信息概念。比如，钟义信认为：“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过程以及关于这种状态和过程的知识。它的作用在于消除观察者在相应认识上的不定性，它的数值则以消除不定性的大小，或等效地以新增知识的多少来度量。”^① 其中，“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过程”与前边的广义概念一致，而“关于这种状态和过程的知识”则是信息的狭义概念。郭庆光也论述过信息的狭义概念：“一切‘表述’（或）反映事物的内部或外部互动状态或关系的东西都是信息。”^② 这两位学者提到的“知识”、“表述”、“反映”等都是需要符号的。

甚至有更为狭义的信息定义，在专门讲信息技术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表述：“简单地说，信息就是消息，是以语言、文字、图形、图像等作为载体呈现的消息。”^③ 这个定义已经指明信息是用语言、文字、图形、图像等符号呈现的。

通过对广义的信息和狭义的信息概念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看法：广义的信息的构成和传播不需要，至少不一定需要符号，而狭义的信息的构成和传播却是需要符号的。

诚然，在符码传播中信息一般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在实体传播中信息的构成和传播却并非一定要靠符号。郭庆光具体谈道，“自然界的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物界的扬花授粉、鸡叫蛙鸣，人类社会的语言交流、书信往来，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④。在这位学者列举的这些信息传播例子中，除了语言交流书信往来是符号传播，“鸡叫蛙鸣”对于鸡和蛙来说也许具有“符号”意义外，“刮风下雨”难道是“刮”的符号“下”的符号吗？“电闪雷鸣”难道是符号在“闪”符号在“鸣”吗？如果“扬花授粉”“扬”的是花的符号“授”的是粉的符号，那么，这些植物就无法传宗接代了。

① 钟义信：《信息的科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苗逢春主编：《信息技术》高中版第一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 如果客观事物不传播自身信息, 符号传播的信息从何而来

所有主张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和传播的学者, 都没有设想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果客观事物不传播自身信息, 那么, 符号传播的信息从何而来? 他们只能解释说, 宇宙物质世界本来就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我们知道, 符号是人为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宇宙物质世界本来就是由符号构成的, 那就几乎等于承认了精神先于物质存在这样的唯心主义理论了。

其实, 答案很简单, 符号传播的信息只能从客观事物中来。

3. 符号不是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别的东西, 所有实物发出的信息都是指向自身

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指出: “符号共性是它们不是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别的东西。”^① 另外一些符号学家也有类似表述。皮尔士指出: “对于符号, 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复制的东西, 它可以具有感性的形式, 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 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去加以解释, 以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② 美国学者莫里斯 (C. Morris) 也指出: “如果任何东西 A 是一个预备刺激, 在发端属于某一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的那些刺激物不在场的时候, 引起了某个机体倾向于在某些条件下应用这个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去作出反应, 那么, A 就是一个符号。”^③

“不是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别的东西”, 传达“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 符号 A 所指代的“那些刺激物不在场”等都表明了符号的指代功能, 它不是指向符号自身, 而是指向“别的东西”、“对象”和“不在场”的事物。符号的所指把接受者引向具体的物体或特定的所指对象。也就是说, 符号是用来指称事物的。文字符号“桌子”这个词会使我们想到饭桌、书桌、电脑桌等许多具体实物, 而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符号本身上; 公路上的红灯则指示我们要停车, 而不是要我们

① [法] A. J. 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0 页。

② 参见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459 页。

③ 同上。

把红灯本身当做目的物，等等。

明乎此，我们就会发现，与符号传递信息不同，所有实物发出的信息都是指向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能被看做符号。太阳发出的光和热的信息都使我们意识到太阳的存在。风声对耳朵的刺激和风力对皮肤的吹拂都使我们把注意力指向风。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实物传播自身的信息通常不需要符号。

阿波罗载人登月的宇航员从月球采回了 381.7 公斤的月球样品，苏联三次不载人登月，只采回了 0.3 公斤的月球样品。人类对月球的地形地貌、表面环境、地质构造、内部结构、化学成分、岩石组分与分布、演化过程与历史的绝大多数科学知识，均来自阿波罗计划。^①

月球的原初信息是包括这些月球样品在内的实物传递的，而不是靠月球符号来传递的。

霍克斯指出：“甚至连最普通的建筑也以各种方式组织空间，这样，它们就起指示作用，发出某种关于社会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个社会对人的本性的各种先决条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除了对提供避身之所、娱乐、医疗等问题的公开的关心以外。”^② 一句话，建筑这种实物本体在传递着自身的种种信息。

4. 符号并不能传达实体世界的全部信息

任何符号都无法把实体世界的全部信息原封原样地传递出来，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在描摹某种景物的时候，说文字、画作不能全部、真实地描写出来。其实，这不是自谦，这是真实的告白。

冰心在叙述国外银湾（Silver Bay）的美景时说：“河亭（Brook Pavilion）建在湖岸远伸处，三面是水。早起在那里读诗，水声似乎和着诗韵。山雨欲来，湖上漫漫飞卷的白云，亭中尤其看得真切。大雨初过，湖净如镜，山青如洗。云隙中霞光灿然四射，穿入水里，天

^① 欧阳自远：《人类必须走向深空——纪念“阿波罗飞船载人登月”40周年》，《文汇报》2009年7月6日。

^② [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光水影，一片融化在彩虹里，看不分明。光景的奇丽，是诗人画工，都不能描写得到的！”^① 景色的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灿烂绮丽，的确是再高明的画家也不能描摹，再多才的诗人也无力歌咏的。

巴金在记述自己的海行时写道：“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多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海上明月所染出的画面，之所以“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是因为所有的人间名作，都不能把这幅巨大无边的自然画幅的全部景致真实传达出来。作者接着写道：“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② 一点不错，在晚风、明月中的感受用文字这种符号只能传达十之一二。真乃陶渊明《饮酒》诗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甚至在大自然的杰作面前，有些作画者羞于拿起画笔。凌叔华面对富士山时就是这样：“这目前的确是一幅神品的白云图！这重重舒卷自如，飘渺神逸的白云笼罩着千层万层青黛色蜿蜒起伏多姿的山峦是何等绰妙，山下银白色的两个湖，接着绿芊芊横着青青晓烟的水田是如何的清丽呵！我倚在柱子旁看痴了。我怕我的赞美话冲犯山灵，我恐怕我的拙劣画笔猥亵了化工，只默默地对着连带来的写生本都不敢打开了！”^③

刚才叙述的都是自然景观实体，人文物品实体也是如此。有游记作者记述自己参观法国作家福楼拜故居的书房时写道：“整个书室差不多费了一小时的工夫，只能说是草草地看完了。本来这些地方，只能亲眼来看，一写出来就无味了。”^④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六）》，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② 巴金：《海上生明月》，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③ 凌叔华：《登富士山》，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④ 洪素野：《诺曼底印象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5. 即使符码传播, 其接受过程也并非完全离不开符号

电影、电视、摄影等都属于符码传播, 它们在传播的编码、译码过程中当然需要模拟信号(符号)、数字信号(符号)与视觉影像之间的转换。

但是, 受众在银幕、荧屏、照片上看到的动态和静态的画面, 非常接近实体世界。诸如日月星辰、山脉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 还有各种体育比赛、事件报道等, 观者在接受它们的时候, 往往不需要再进行符号转换, 接近于在实际生活中直接感受这些事物。受众看到黄河、长江, 它就是黄河、长江的一部分, 而不是像看到文字符号黄河、长江那样需要转换; 受众看到足球比赛中球员的各种动作, 更不需要符号转换, 那就是现场中的真实动作。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电影、电视、摄影的接收过程, 就其动态的图像和静态的画面来说, 往往不需要符号转换。请注意, 我们并没有把影像中的事物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事物画等号的意思。

当然, 如果有人物对话或画外音, 接受的时候仍然伴随着符号转换。

6. 小结: 实物传播不需要符号, 实事传播需要非符号与符号的混合使用

在实事传播中, 尤其是在动作、表情传播中, 非符号与符号被混合和综合使用来完成传播活动。实事包括日常生活活动和事件。一次聊天、一次会议、一次聚餐、一次旅游、一种行为等都属于日常生活活动。典型的事体就是事件, 比如能够成为新闻报道对象的那些重要事件, 一场战争、一个谋杀案、一项奥运会新纪录的诞生等。实事传播包括日常生活活动传播和事件传播。其实, 实物很难从实事传播中分离出去, 因为任何生活活动或事件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物质实物环境。就实事传播中的实物传播来说, 它属于非符号传播。而其中的人物对话则多属于符号传播。至于实事传播中的各种行为, 多数不具有明显的符号意义。人的各种体态、姿势、动作、眼神等, 有的具有明显的符号意义, 比如点头表示肯定, 摇头表示否定, 鼓掌表示欢迎, 挥手表示告别等; 但更多的体态、姿势、动作、眼神等符号意义不明显, 有的处于符号与非符号之间, 有的则很难找到其符号

意味。

符号学学者霍克斯也发现：

甚至当我们不在对别人说话时，或别人不在对我们说话时，来自其他“语言”的信息也争先恐后地涌向我们：号角齐鸣、灯光闪烁、法律限制、广告宣传、香味或臭气、可口或令人厌恶的滋味，甚至连客体的“感受”也有系统地把某种有意义的东西传达给我们。^①

其中提到的号角齐鸣、灯光闪烁、香味或臭气、可口或令人厌恶的滋味等，都是实体信息传播，它们传递自身信息不需要借助于符号。“客体的‘感受’也有系统地把某种有意义的东西传达给我们”中，包含了范围更广的客观实体传递信息的含义。

施拉姆说过：“传播不是全部（甚至大部分不是）通过言词进行的。一个姿势、一种面部表情、声调类型、响亮程度、一个强调语气、一次接吻、把手搭在肩上、理发不理发、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牌，这一切都携带着信息。”^②毫无疑问，施拉姆所列举的那些例子都携带着信息。问题是，除了停车标志牌外，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很难被看做符号，尤其是很难被看做纯粹的符号。

萨皮尔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交流。”^③如果说“文化形式”包含着符号的话，那么“社会行为”就是符号不能涵盖得了的了。既然“社会行为”也“或明或暗地包含着交流”，包含着传播，那么，这种传播难道仅仅是符号传播吗？

严格说来，动作、表情传播已经包含在实体传播中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活动和事件都包含有行为或动作、表情。但由于许多动作类型有其特殊性，比如各项体育运动的动作、舞蹈、各种机器的

① [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② 参见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③ [美] 萨皮尔（Edward Sapir）：《语言、文化和个性文选》，参见[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操作动作、手术操作动作、航天员在太空环境中的动作等，不单独提示出来不足以显示其特征。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简图（见图 2-1）表示以上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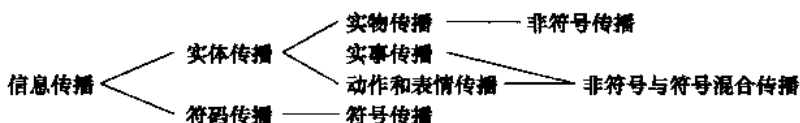


图 2-1 实体传播、符码传播与符号传播、非符号传播

上图 2-1 可以这样简要地表述：实物传播不需要符号，实事传播需要非符号与符号的混合使用，符码传播则属于纯符号传播。

不一定需要符号的实体传播却是需要符号的符码传播的基础，而且实体传播带给人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更实际。“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被蛇咬是实体传播，正因为这种给人带来巨大伤痛 of 实体传播，才导致对蛇的类似物——井绳（我们可以把它看做蛇的符号）的长时间惧怕。

（三）重新认识符号

1. 符号地位的夸大与传播范围的缩小

如果用上述观念看郭庆光为符号下的定义，笔者认为，“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有其合理性，但说符号“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就需要推敲了。信息表达和传播可以通过符号，比如在符码传播中；也可以不通过符号，比如在实体传播中。所以，“不可缺少”把符号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夸大了，同时也把传播的范围缩小了，把它局限在了符码传播中。

符号是相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言的，它是人类社会的衍生物。在已有的人们对符号的描述中，它们只适用于符码传播，而超出了符码传播的范围就有局限性了。正像牛顿力学在特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到了爱因斯坦的视阈中就显现出局限性一样。

2. 关于广义的符号概念

在有的符号学研究者那里，有一个广义的符号概念。格雷马斯

说：“我们企图从中得出一些结论，把事物和过程看做符号——人们甚至可以指它们为自然符号。”^①如果把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看做符号——“自然符号”，这就是一个广义的符号概念。在这个广义的符号概念下，说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并且一定要通过符号才能实现信息传播也未尝不可。然而，绝大多数符号学研究者谈论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并且一定要通过符号才能实现信息传播这个问题时，使用的都是符号的狭义意义。

特别需要注意，广义的符号可能会导致符号概念的泛化，使符号这个重要概念失去意义并产生混乱。因此，狭义的符号概念，是人们在谈论信息与符号的关系时的预设语境。

三 旅游与实体传播

（一）旅游的核心内容是实体体验和实体传播

旅游就其核心内容而言主要是实体体验和实体传播。旅游最吸引人、最不能被代替的也正在于此。旅游之所以不能被影视、图文等符码传播所取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体传播所获得的体验是任何符码传播所不能达到的。游览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要是实物传播，民俗旅游既有实物传播也有实事传播。

当然，旅游中也伴有符码传播，而且实体传播与符码传播往往是交融在一块儿的。但一般情况下，符码传播不能够成为旅游的主体内容，否则就失去了旅游的真谛。

许多游者记下了旅游中的实体传播，尽管他们没有使用实体传播或实物传播这样的术语。

（二）旅游中的实物传播

1. 自然实物传播

徐志摩说：“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葛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

^① [法] A. J. 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 页。

句里我们读得最深邃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与五老峰，雪西里与普陀山，来因河与扬子江，梨梦湖与西子湖，建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斯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性灵上不长疮痍、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① 作者列举了大自然中许多实体的山水、植物、动物等传达出我们能够接受的信息（“消息”）。徐志摩对旅游的观察、体验很敏锐，我们读他写的游记会受到有价值的启发。由于他把大自然比喻为最伟大的一部书，所以这部书传达信息时便使用了“文字”、“符号”。请读者注意，这里的“文字”、“符号”并不是书面的文字、符号，而是徐志摩的一种比喻性说法，与我们前边所说的实物传播不需要符号并不矛盾。徐志摩自己也作了说明：“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人人懂得那就不会是书面文字符号，因为书面文字符号需要专门学习才能懂得，并不是人人能够懂得的；“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永远一致也不会是人工符号，众所周知，不同语言文字系统中符号是不一致的，比如汉语的“红色”和英语的“red”，不仅发音不同，而且字形也完全不一样。

2. 人工实物传播

王统照记述了自己游历当时荷兰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水闸——吉慕顿（Ijmuiden）新水闸，他写得非常细致：“新闸的边岸平洁，坚固，完全用水泥、大石砌成。旁有一所专司看守者住的小房，内中装有电力设备。岸上有不少的圆铁柱，桩下通有大力的电流。新闸比旧的既然宽大（这边的河面也宽得多），一切设置全凭机械的应用。铁制的电杆两行分列。闸面横阔将近三丈，完全是钢骨制成，平时可通行入，可走火车，如有船只经过，隔好远，司启闭的工人便开了红色灯

^①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葛德”通译歌德。“阿尔帕斯”通译阿尔卑斯，欧洲南部山脉，著名旅游胜地。“雪西里”通译西西里。“来因河”通译莱茵河。“梨梦湖”通译莱蒙湖，即日内瓦湖，著名风景区。“威尼斯”通译威尼斯，意大利水城。

光，同时在闸两端阻止行人。我们上去走了一半的路程，听见警铃响，向河道的来路上看，一只大轮在微茫中缓缓开来。于是我们不能到对岸，退回原立的岸上，等待看这大水闸是如何启闭。闸两面的红灯光明了，小屋子中的电铃叫响，不久那伟大的钢门在桥中心活动了，向两面分开，与对面要出闸的轮船是一样缓缓地做有规律的运动。两扇巨大的铁门向南北分张，那份重量可想。河水被积压得发出沉重的叫响。即时，石岸下骤然添置了几尺高的水痕。经过五分钟，铁门完全靠到两面，空荡荡的水面，尽容那只五六千吨的巨轮如蜗牛似的冲过去，她走时十分小心，虽然碰不到移开的闸面。”^① 这里有静态的实物，更有动态的实物，他们都传递着自身的信息。我们也能发现，在这种静态和动态的实物传播中，基本上不需要用文字或有声语言来做解释，实物自身就能比较准确地传递出自身的信息。

有些手工制作物（实物），只有现场制作才能保持其特有的全部真实信息。费孝通曾经在美国拜访一位叫杜洛斯的农民，当说起中国时，这位农民说自己没有到过中国，中国好坏“我没有看见”。但是当与费孝通同去的朋友下厨房做了拿手的红烧鸡和红烧白菜后，

那位主人吃着了这味儿，脸上露着满意的笑容，一块又一块，最后大声地说了：“中国东西真好，从此我知道了。”这坚决的声调是典型的。他尝着了，他有经验了，他不怕下断语了。他决定了他的态度，也就负责了，不容易改变了。^②

这位美国农民亲口品尝了中国人现场做出的红烧鸡和红烧白菜（实物），他直接感受了菜肴的色、香、味等信息，经过验证的东西最容易使人相信，而且不会轻易动摇。

强调现场制作和品尝，是因为不少饭菜不仅制作需要特定的火候等，而且品尝也需要恰当的时间。比如到开封旅游品尝“提起像灯

^① 王统照：《荷兰鸿爪》，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214页。

^② 费孝通：《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笼，放下似菊花”的传统美食灌汤包，必须现包现吃。假如不现包，包好稍放一段时间，其中的灌汤就会渗透到面皮里，从而不再是灌汤包。同样，如果不马上吃，包子里的灌汤也会浸入面皮或蒸发掉。初到开封的游客吃灌汤包时，有时可能由于需要等待而不耐烦，他们还不知道灌汤包必须现包，不能事先包好。知道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游人买了速冻的灌汤包回到出发地一蒸，压根就没有“灌汤”。

3. 人体实物传播

人体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实体，高矮胖瘦、五官、头发、妆饰等都是人体的信息。这是哥伦布等人当年到达圣萨尔瓦多岛时所见：“岛上的土著居民使西班牙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这些人和他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人种都大相径庭。他们全身赤裸，涂着各种颜料，有的人只涂在脸上、鼻子上或者眼睛周围，有的则遍及全身，给人一种野性的神奇感。发亮的棕色皮肤好像紫铜，脸上没有一点胡须。头发粗而直，齐耳以上剪得很短，有的则将长头发束起披到肩上。他们的面容虽然被颜料所遮盖，但却给人以愉悦之感。这些土著人前额高大、眼睛明亮、中等个头、肌肉发达、线条分明。大多数人在30岁以下。在场的土人中只有一个年轻妇女，线条很美，和她的同伴一样也是全身赤裸。”^①

4. 文物真品保留和传递历史信息也是一种实物传播

上海博物馆入藏王羲之《上虞帖》有着曲折而生动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上海博物馆专家在清理古代书画时发现了此帖，但当时并未“识宝”，又被冷落了3年。后来有关领导和专家重提此事，请谢稚柳先生鉴定。谢先生对此帖与唐宋其他法书名作进行比较研究，充分肯定此帖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一时尚难断定此帖是哪一朝代的摹本。正在他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此帖右上角的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墨印映入眼帘，又见下面一印，但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晚上，他在灯光下又琢磨良久，忽然记起清末有一收藏者曾在逃难时把《上虞帖》缝入棉衣，由北方带到南方，以后便

^① 曾彦一：《哥伦布》，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杳无音信。此帖会不会就是当年“消失”于南方的国之瑰宝？再过了几日，谢先生在展开此帖研究时，又突然想到这方无法辨认的印章可能是南唐的“内合同印”。于是，上海博物馆借来了先进设备，拍摄了软X光片，奇迹出现了，果然显现出“内合同印”。“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印在宋代被称为金印，而历史记载《上虞帖》正有此两印。这一证据，基本确定了《上虞帖》是唐摹本的说法。博物馆文化以其历史穿透力澄清着历史的迷雾，缕析着历史的脉络，使漫长历史的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演绎成为可能。^①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真正的唐摹本《上虞帖》，“内合同印”就不会显现出来。高质量的旅游者看重文物真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能保留和传递历史信息。

（三）旅游中的动作、行为、表情传播

方令孺在《游日杂记》中记述了他看到的一位园丁的动作、神态：“有一个园丁在修剪树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工作像他那样细致了。他爬到一棵树上细细的端详，最注意枝叶的姿势，不肯略微伤害自然生长的形状；在一枝一叶的去留之间，都好像费了莫大的心事。他那种木讷无言，沉没在他工作的深思里，很感动我。”^②看到这些动作、神态几乎不需要语言解释，就能知道他在干什么和干这种工作的认真态度。

孙伏园等人游莱蒙湖时，由于这里“整洁而又繁华”几乎没有见过，“甚而至于我们不敢拿出茶叶蛋等东西来，怕吃完了以后没有地方放蛋壳。但是事有凑巧，湖边凳上坐着一对美国人模样的男女，已经打开了食物包，而且我自己也发见了每隔一二十步路有一个字纸篓，虽然十分清洁，里面并没有看见字纸，但是我们用报纸包了蛋壳，不也是字纸一类东西吗，于是决定另找一凳坐下吃了。”^③本来

① 陈燮君：《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人民政协报》2009年9月14日。

② 方令孺：《游日杂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③ 孙伏园：《丽芒湖上》，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88页。

不敢随便吃东西，怕破坏这里的整洁，但见到其他游客的行为后，就模仿别人的动作、行为，放心地吃起来。这算做一种动作、行为传播。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当拿不准某些行为是否被允许，周围人的动作、行为很容易成为跟着学或模仿的对象。这种情形屡见不鲜。

动作美的传播也常见。徐志摩曾经描写过英国康桥几个女郎撑船的优美动作：“你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多美！尤其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的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捻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竿，只轻轻的，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的一蹲，这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①这是身姿、动作传达出的美。动作美几乎全凭着直感，不需要符号之类的陪伴就可欣赏。

动作、行为也能够传播不良习俗。拉斯·卡萨斯在其《西印度群岛史》第四十六章中详细描述了此事：“两个基督徒在路上看见很多男女穿过村庄。男人手中常拿着一根柴棒和一种草，吸草点燃后冒的烟。这是一种干草，把它放在干叶子上卷成筒，就像圣灵狂欢节时小伙子们做的那种纸枪。然后，把筒的一端用柴棒点燃，在另一端用嘴或鼻子吸冒出的烟。那玩意儿能使肌肉麻痹，使人昏醉，但据说也能使人消除疲劳。当地人将其叫做——如我们今日所称——托巴菰。我在该西属岛屿上见西班牙人也吸此物。当人们指责他们，说是一种恶习，彼等却回答说，只要一上瘾就难以戒掉。我不知烟有何味或有何好处。”西班牙人很快就学会吸烟，并把它普及到世界各地，流毒全球至今。^②

（四）符码传播来源于实体传播

绘画是符码传播的一种，刘海粟叙述自己在莱蒙湖写生时写道：

^①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② 曾彦一：《哥伦布》，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像一座海市蜃楼一般，我片刻也不放过，我沉醉于它那千变万化之中，心悦诚服那层出不穷的发见与创造，我便自然而然转向这世界举起双手，拿了一枝粉笔，在一块粗布上，不断地向着巍峨的峻峰挥洒、上升，努力呀！努力呀！尽情收吸这气象雄壮的白峰，绚烂诡怪的绿波，努力工作挥洒，我就可以享受伟大自然的恩惠了。……我从这湖光山色，认识了无终无极的生命，光荣和伟大。”“有这样清奇的境域，我可以断言，才能产生丰富和美满的作品。”^① 不管是来自旅游中的符码传播还是来自其他活动中的符码传播，它们的源头只能是实体及其传播。

第二节 直接体验——旅游传播的最重要特征

一 体验与旅游体验

（一）体验的概念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体验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事物；二是指亲身经历。体验在英语中为 experience，它有经历、经验和感受、感觉的含义。我们所说的体验主要是指《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第二种含义和英语的含义。显然，体验与感觉紧密相关。感觉是将接收到的信息传入脑的手段。感觉也就是体验。体验的前提是参与，参与才能获得感觉。当然，也不完全排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第一种含义。

有感官体验，也有心灵的感悟，心灵感悟也是一种体验方式。主体性这个概念就意味着人们如何真实地体验这个客体世界。

庆堃在邀请费孝通到美国去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也许不能在字里行间传达这另一种乐趣和境界给你，所以我

^① 刘海粟：《多变的莱梦湖》，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只希望你早一些来这个世界,这个在地球另一面的世界里,我相信会给你看见人生的另一道路。”^① 文字传达和亲自到达那里体验显然是不一样的,文字传达不能代替实境的体验。

人死时,财富、地位都不能带走,能带走的是各种体验。在著名英国学者罗素看来,年岁大的人经历了各种欢乐和悲伤的体验之后,体验了他所干过的所有事情之后,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了。^② 因为能体验的他(她)都体验过了。

(二) 旅游体验

旅游体验(tourist experiences)就是人们离开居住地到外地去游览或休闲的亲身经历、经验、感受。有学者指出:“体验是旅游的本质”,“体验是旅游现象所具有的最一般、最普遍、最稳定的共同属性”,“体验是旅游现象区别于其他现象的独特属性”^③。笔者同意这种判断。

这位学者还以体验为核心为旅游下定义,认为:“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到日常生活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和逗留的各种愉悦体验。”用最精炼的语言概括,旅游是“休闲型旅行”或“异地休闲性活动”。“消遣与审美愉悦体验”是旅游的基石,如果抽掉了它,旅游的大厦就会坍塌。^④

一代又一代的旅游者走过了杭州西湖,他们无法把西湖带回自己家乡或自己家里,然而,每个人心里都荡漾着自己的西湖。当游客离开西湖时,他们带走的是对西湖的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长久记忆。旅游工作者的使命则是要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

这是游记作家芮麟登泰山的体验:“人愈登愈高,山愈深愈大,

① 费孝通:《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 语出罗素的*How to grow old*,原文是:But in an old man 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可是老年人已经饱尝了人间的欢乐与苦恼,一切能做的都做了,恐惧死亡就有点儿可怜又可鄙。)见*Fluency in English* by L. G. Alexander, Longman Group Limited, first published 1967, p. 46.

③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8页。

④ 同上书,第34页。

在山下时以为泰山不大不高的念头，完全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观此则天下万事万物，不特耳闻靠不住，即目见也不一定真确，非身历是往往会受到他人或自己的有意无意地欺骗的！”^① 北京大学杨辛教授 30 年来先后攀登过泰山 41 次，其中 37 次是徒步。他认为：“泰山之妙就在于登”，因为“登”的过程，能让人亲身体验一草一木，一石一泉，进而深刻领悟泰山的情怀。^②

在维也纳圣·米歇尔广场中有一堵短围墙围着数百平方米的断壁颓垣，它们是古罗马遗址。挂在矮墙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维也纳政府将两千年以前建筑的感受，奉献给市民和客人。”强调了让市民和客人对古迹的感受和体验。

旅游体验多种多样。高贵者想做一天农夫，贫贱者想当一天皇帝，他们都想体验一下与自己惯常不同的生活。旅游为它的游客提供一次国王或王后级的奢华经历，在这里享受几天由温顺谦恭的奴仆们侍候的生活，花钱过一周客串君王的生活。下榻在城堡或别墅里，被满脸赔笑的侍从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实现梦想。

为了获得更深刻的旅游体验，出现了一种长宿（long stay）休闲。赶场式的旅行与蜻蜓点水式的旅游很难融人和深刻体验当地风土人情，选择一个地方停留较久的时间，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可以获取广泛和深刻的体验。短时旅游类似于记者的常规采访，长宿休闲相当于作家深入生活，待的时间比较长。

据权威统计，中国游客团队游数量已经由 1989 年的 70% 下降到 2010 年的 30%，自由行比例迅速上升。2009 年国内散客旅游的比例已达到 70% 左右。^③ 散客旅游的特点是追求行程自主和个性旅游消费，自由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带有个性特点的旅游体验。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② 王庆环：《北大学者杨辛缘结泰山阐释民族精神》，《光明日报》2010 年 2 月 10 日，第 10 版。

③ 刘锟：《散客时代来临，旅行社何去何从？》，《解放日报》2010 年 9 月 28 日。

（三）旅游体验的分类

体验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我们可以以感觉为体验分类。所谓感觉是指人脑对当前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人们通常把感觉分为两大类：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外部感觉主要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内部感觉主要包括运动觉（动觉）、平衡觉（静觉）和机体觉。

1. 以外部感觉对旅游体验分类

着眼于外部感觉时，我们可以将体验分为六种类型：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味觉体验、触觉体验、参与感体验。

（1）视觉体验

在人类的各种感觉中，视觉是最重要的。我们常用的一些词汇，比如“观点”、“观念”、“意见”、“见识”、“见解”、“看法”、“重视”、“洞见”等都与视觉有关。成语“见多识广”、“少见多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等，也都凸显了视觉的重要。

“先睹为快”、“一饱眼福”、“叹为观止”，表明在各种感官体验中眼睛的突出位置。有时候，人们也把旅游叫做观光。“观光”凸显出视觉是旅游的最重要体验方式。

芮麟在游了瘦西湖后写道：

“人人都道西湖瘦，究比西湖瘦几分？”这瘦西湖之“瘦”的谜，我今天到了瘦西湖，方才完全了解了。

的确，瘦西湖是瘦的。窄窄的腰，细细的眉，纤纤的一切，充分显示着瘦的美！这瘦的美，是济南大明湖、金陵莫愁湖、杭州西子湖所及不上的！这真如世间瘦的美人，为胖的美人所及不来一样。^①

这段话大概为“百闻不如一见”作了很好的注脚。他对瘦西湖所做的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描述主要依赖于视觉。

我们再来看作家庐隐在《蓬莱风景志》中对日本风景地日光的白云泷的描述，其中以视觉“看”为主：“在华严泷的背后，还有一个白云泷，我们到了白云泷，看见急水如云，从半山奔腾而下，已经叹为奇观；及至到了华严泷，只见三千尺的云梯。从山巅下垂，云梯之下，都是飞烟软雾，哪有一点看出是水。这种奇妙的大观，怎能不引诱人们忘记人间之乐呢？”^①“看见”、“叹为奇观”、“只见”、“看出”、“大观”，短短一段文字，竟有这么多与视觉有关的词汇。

“看”尽管不能移动对象，但也是一种躯体的到场和无声的参与，也可以说，“看”是眼睛对对象的抚摸。“监视”算得上一种视觉暴力和特权，“看”背后隐藏着某种权利。偷窥是一种欲望。“目送”这个词就表明，看，也对人和物发生作用。“目击”这个词就表明，看，肯定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入侵和占用。

在电影《小兵张嘎》中，嘎子被罗金宝带到区小队，嘎子看什么都新鲜，一位游击队员在擦一挺重机枪，嘎子凑了过去。游击队员和他打趣：

“干什么？”

“看看。”

“看到眼里可就拔不出来了。”

在嘎子看来，“看看”是一种权利，“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看看”吗？但在游击队员看来，“看”就意味着侵入，就意味着被赋予了一种特权和享受，所以，“看到眼里可就拔不出来了”。

（2）听觉体验

听觉可以确定声源的位置、距离和移动。通过音色我们可以分辨出火车的声音、汽车的声音，能够分辨出熟人的说话声，甚至走路声。旅游中听林涛、听海涛、听雨声、听林中小鸟的歌唱等都是听觉

^① 庐隐：《蓬莱风景志》，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体验。

“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甫《绝句》），“杜鹃啼血猿哀鸣”（白居易《琵琶行》），由于古诗的流传，几乎成为中国文人的思维定势。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南朝梁王籍的这首《入若耶溪》诗是对山林虫鸟鸣叫声体验的个性表达。晚唐诗人郑谷的《鹧鸪》诗：“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洞庭湖畔鹧鸪的啼声，勾起了天涯游子、迁客流人的羁旅伤愁。由于写鹧鸪及其啼叫如此出色，郑谷被誉为“郑鹧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菩萨蛮》，借鹧鸪的啼叫，倾吐了内心壮志未酬的抑郁和处境孤独的悲愤：“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如果抛开这首词的整体意绪，单说“山深闻鹧鸪”，那是许多游人在深山里的一种听觉体验：旷野中，几声鹧鸪时隐时现，独特的意境油然而生。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聆听寒山寺的新年钟声，是一个旅游项目。有些旅游地设有“听雨亭”、“闻雨轩”等建筑。

徐志摩把山中的各种音响叫做“山籁”：

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是虫子，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掺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静是不静的；但山中的声响，不论是泥土里的蚯蚓叫或是轿夫们深夜里“唱宝”的异调，自有一种各别处；它来得纯粹，来得清亮，来得透澈，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里洗濯过后觉得清白些，这些山籁，虽则一样是音响，也分明有洗净的功能。^①

^① 徐志摩：《天目山中笔记》，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作者对山间各种音响的察觉入微，就连蚯蚓在泥土里的叫声也能听到。更引人注意的是那声音也具有“洗净的功能”，它不仅进入你的耳道，还可以“沁入你的脾肺”。如此看来，它们的确称得上“山籁”。

要想获得充分的旅游听觉体验，需要成为大自然音响的“知音”，正如英国诗人拜伦所说：

在芦苇的叹息中有一种天籁，
在溪水的奔流中有切切低吟，
只要你知音，万物都含有音乐，
地球不过是天体的一个音阶。^①

大自然音响的知音者，可以从大自然中听到各种无比美妙的音乐。

（3）触觉体验

触觉（也称肤觉），是物体作用于肤觉器官引起的感觉，分为痛、温、冷、触（压）等感觉。触觉表明了真正的躯体亲历。在身体直接接触的体验中，以触觉体验最多。

徐志摩记述了在西伯利亚对清新空气的感触：“你们住惯城里的难得有机会饱尝清新的空气；下回你们要是路过西伯利亚或是同样地方，千万不要懒惰，逢站停车时，不论天气怎样冷，总得下去散步，借冰清尖锐的气流洗净你恶浊的肺胃；那真是一个快乐，不仅你的鼻孔，就是你面上与颈根上露在外面的毛孔，都受着最甜美的洗礼，给你慵懒的性灵一剂绝烈的刺戟，给你松散的筋肉一个有力的约束，激荡你的志气，加添你的生命。”^②对清新空气的感受来自肌肤，比如“面上与颈根上露在外面的毛孔”还有“筋肉”，还来自嗅觉器官“鼻孔”，甚至还来自“肺胃”。如果说肺还与嗅觉器官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么胃则是一个消化器官。参加体验的身体感受器官越多，体验越丰

^① [英] 拜伦：《唐璜》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00页。

^② 徐志摩：《西伯利亚》，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富、立体。

一块重达 1.8 吨的墨绿色玉石，安置于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的迎宾区，游客不但能面对面地观赏，该馆盛情邀请每一个参观的游客都来触摸这块珍贵玉石（见图 2-2）。在新西兰，玉石象征威严和力量。中国人和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一向都尊崇外观坚强、内存温润的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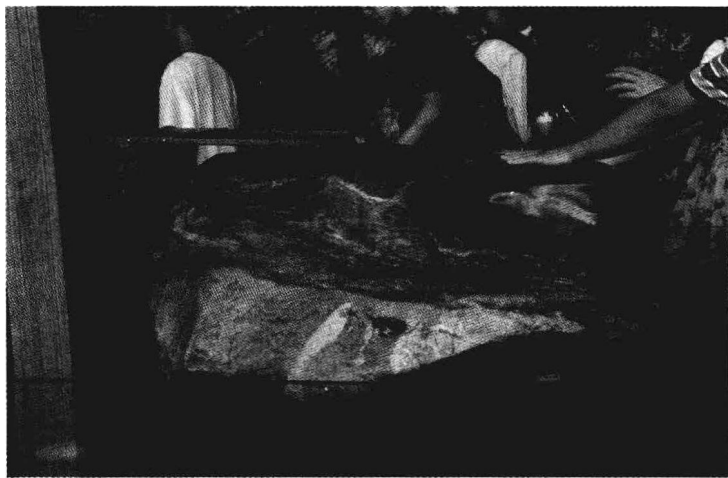


图 2-2 观众在触摸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入口处的大块墨绿色玉石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

上海世博会唯一的台湾企业馆震旦馆内，展台上专门设置了可以让参观者伸手直接接触玉石的小口，许多参观者用手直接触摸了玉石，获得了玉石的质感（见图 2-3）。

性爱活动主要是一种特殊的触觉体验。这种触觉体验主要不是表现在表层的肌肤接触，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深入身体内部的触觉体验，并且伴随着心灵的深度投入。所以，它格外地刻骨铭心。

痛觉、温度觉有时与触觉有关。人体被打痛时，与触觉有关。但内脏器官得病时的疼痛，不是一个简单的触觉问题。接触发烫的物体时，感觉到高温，与触觉有关。但得病发高烧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触觉问题。



图 2-3 上海世博会震旦馆展台专门设置了可以让参观者伸手直接接触玉石的小口（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

（4）味觉和嗅觉体验

味觉有甜、酸、咸、苦、辣等不同的性质。味觉的体验范围小一些，但却是进入肉体的，而且比触觉还要进一步。因为，它往往要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给身体带来影响。

绍兴黄酒具有甜、酸、苦、辛、鲜、涩、澄、香、醇、柔、绵、爽 12 种特点。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对酒有相当的鉴赏力，对中国黄酒情有独钟，他说：鉴赏一种酒是好是坏，可以先看它的颜色，再看它的气味，最后喝一口酒，让它在口腔里慢慢散开，沁入牙缝舌周，让人的味觉器官全面接触酒液，剩下的就是你的感觉了。如果你是一位味感灵敏的人，那么酒的好坏就得以分辨；假如你是一位味感迟钝的人，就不要去做鉴赏酒的事情，更不要充内行，闹笑话。味感好的人，能分辨出多种味道和感觉，如上面提到的那 12 种味感就是。^①

“秀色可餐”这个汉语成语，还有中国评价菜肴的标准色、香、味，意味着视觉与味觉是可通的。

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一般不直接接触对象，但刺眼的

^① 参见季承《李政道：书生意气，生活真人》，《书摘》2010 年第 3 期，第 30 页。

光,巨大的声响,有害的气体同样能直接造成对身体的伤害。遥看珠穆朗玛峰不等于登临它,只有双脚站在了它峰顶的石头上才算真正完成了攀登珠峰。

(5) 参与感体验

参与感体验是一种综合感觉体验,将在后面谈,这里暂时放过。

(6) 与感觉器官相对应的六种信息类型

与六种体验类型大致相对应,有人把信息共分为六种类型:视觉信息、听觉信息、嗅觉信息、味觉信息、触觉信息和意觉信息。

在这六种类型中,需要解释的是意觉信息。人体感觉器官除平常所说的五官之外,还有第六器官——脑子,第六器官脑子的感觉,就是第六感觉,可叫做“意觉”。脑子“意觉信息”,如精神(spirit)、情绪(mood)、灵感(inspiration)、思想(idea)、记忆(memory)、理解(understand)、梦幻(dream)等,都是人体存在的信息。

2. 内部感觉与旅游体验

以上感觉主要是人体的外部感觉(脑感觉除外)。人体还有内部感觉:机体觉、运动觉、平衡觉。

机体觉(organic senses)又称内脏感觉,主要来自内脏器官与大脑,它是机体内部器官受到刺激而产生的感觉。机体觉包括饥、渴、气闷、恶心、窒息、牵拉、便意、性、胀和痛等。机体觉能及时报道体内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器官的工作状态,使人体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维持生命。

运动觉(sense of movement)通常限指对自体各部分及全身的被动和主动运动的内感觉,有时指空间内的外物运动和自体运动感觉的总称。它来自全部感官与大脑。没有运动觉与其他感觉的结合、协调,就不可能形成清晰的视觉映象。

平衡觉(sense of equilibrium)指动物觉察身体的位置和动作的一种复合感觉。它主要来自内耳中的前庭感受器(由三个半规管、椭圆囊和球囊组成)以及眼睛等。平衡觉在从事航空、航海事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平衡觉也和身体运动及其加速度的感受有关。

人体的内部感觉也与旅游体验有关系。旅游中的许多游乐项目比如过山车、滑雪、滑草,甚至太空航行等都与机体觉、运动觉、平衡

觉有密切关系。良好的机体觉、运动觉、平衡觉是完成这些旅游项目的前提，同时还是获得这些旅游项目特殊体验的条件。

3. 对体验的综合分类

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 2002 年依据参与程度和环境上的相关性这两个维度把体验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别：娱乐（entertainment）体验、教育（educational）体验、审美（esthetic）体验和遁世（escapist）体验。应当指出，这四类体验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情况下都是交融的。

娱乐体验、教育体验、审美体验都容易理解，旅游中也会伴随这些体验。

遁世体验人们提及较少，这里多说几句。遁世体验（也称逃遁体验）需求主要根源于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压力。通过旅游暂时摆脱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各种角色，抛却大堆的日常琐事，逃离单调、忙碌的日常生活，把工作置诸脑后，在优美、轻松、异于日常生活的旅游环境中获得宁静、温馨的体验，寻找生活中摆脱束缚和压力的真实的自我，就属于遁世体验。“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狱室移到另一间狱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秀美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①从日常工作、生活中逃离出来，摆脱世俗束缚和压力，生活在放松与愉悦中，是旅游中遁世体验的真谛。

有研究者说：“人外出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远离家中的表面化、不真实的生活，寻求更为真实的体验作为在家生活的补充。”^②外出旅游确实有寻求遁世体验的目的，然而，外出旅游是真实的生活，家中的生活也是真实的生活。旅游也只能“作为在家生活的补充”。所不同的是外出旅游可能更多地展示真实自我，日常的单

^①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 页。

^②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5 页。

位工作和家中生活更多地会将真实自我隐藏起来。

市民农园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逃避体验的性质：游客承租土地，在假日、闲暇期间做农夫，体验亲自耕种劳动的乐趣。

旅游能够放松身心，与遁世体验关系密切。荣格说：“凡是人处在压抑、闭塞的环境中，旅游可以提供人超越现状的解放感。”^① 遁世体验越多、越充分，解放感越显著，身心放松效果越好。

二 游客凝视

在旅游研究中，英国学者 John Urry 在 1990 年提出了游客凝视 (tourist gaze) 这一概念。此术语的出现提示我们视觉体验是旅游体验中最重要的一种。游客凝视是旅游者对旅游景观的一种作用力。本来游客凝视属于视觉体验，应放在视觉体验中论述，但由于它重要，我们把它单列出来专门讨论。

那些被人潮聚合凝视的目标，就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景物。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东方明珠（见图 2-4）、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安徽的黄山迎客松、济南的趵突泉、四川的乐山大佛、石家庄的赵州桥等，就属于这样的景物。一个旅游地，被游客凝视的景观越多，这个旅游地的旅游吸引力就越大。

被游客凝视的景物周围常常是游客最希望拍照留念的地方，这些照片会成为游客永久的记忆。当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还会长久地凝视这些照片。摄影是肉眼凝视的延伸和替代，它试图达到肉眼对景物凝视在时间长度上的延续。

不过，我们常常看到，原本应该凝视的景物，被许多游客在它们面前留个影所取代，使旅游审美体验变得浮皮潦草。留影固然需要，但如果淡化或取消了旅游凝视，旅游的价值顿时就丧失大半。

那些反复被游客凝视的景物，对游客的审美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它们可以有效地提高游客的审美能力。游客凝视这些景观就像阅读、欣赏文艺作品中的精品和经典，使接受者如坐春风，精神境界得

^①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8 页。

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审美能力得到提高。这些景观就像文艺作品中的精品和经典，为游客设立了高水平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一经形成，就会在艺术审美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是旅游活动传播美、提高游客审美能力的最有效、最典型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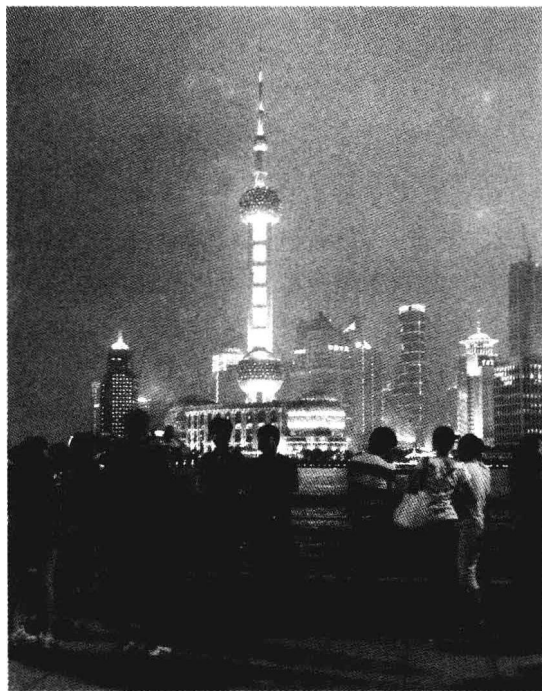


图 2-4 灯光下游客以“东方明珠”为背景留影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6 月 20 日 22 点)

在中国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五岳”和黄山有许多被游客凝视的“经典”景观。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两游黄山，赞叹道：“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是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是我国名山中最美的；从五岳回来，就被它们的景色所吸引而不再去看别的山了。而黄山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是大自然造

化的奇迹。从黄山回来更会被黄山的气势、美丽所折服，因此看过黄山后，五岳也不用去了。可以说黄山是名山中的名山，正像《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中的经典。黄山是山岳自然美的最高典范，它为我们衡量山岳美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杆。看过黄山之后，就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觉。后来又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说法，可以作同样的理解。日本也有类似的说法：

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句俗话说：“不到日光不算见物。”日光的身价可想而知了。^①

不同民族的有些见解是相通的。

不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不能片面理解。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看过黄山之后不再游别的山。自然美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每一座名山都有其独特魅力。比如，早就有“泰山天下雄”的说法，同时泰山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黄山所不及的；也早就有“华山天下险”、“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说法，华山之险峻也有黄山不可比之处。

还有一个与视觉体验有关的术语叫做“轰动注目”（sensation sights）。人们都关注轰动性事件，对轰动性事件的注目就是自然的了。能够成为轰动注目的事件都是新闻报道，包括电视、摄影报道所追逐的对象。

三 体验式传播

（一）什么是体验式传播

传播过程中伴随着直接经历、感受，就是体验式传播。体验是所有传播方式的基础。体验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它是一种以实体传播为主的传播方式。体验是实体传播的主要途径。所有的实体传播都属于

^① 庐隐：《蓬莱风景志》，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体验式传播，所有的符码传播都不能算作真正的体验式传播。

体验可以分为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这里所说的体验式传播指的是直接体验。

实体传播由于伴随着实物和实事，所以它属于体验式传播。实物以什么方式传递自身的信息呢？视觉的颜色、形状、运动速度等；听觉的声音高低、音量大小、音质、音速等；触觉的冷与热、光滑与粗糙等；嗅觉的芳香与腥臭等；味觉的酸、甜、苦、辣、咸等都可以传递实物自身的信息。接受者对于实物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的直接感受，就是实体传播，就是体验式传播。

（二）非体验式传播

1. 符码传播属于非体验式传播

符码传播，具体说来，书刊、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大众媒体所进行的传播，都属于非体验式传播。非体验式传播以体验式传播为基础，没有体验式传播就很难理解非体验式传播。如果说符码传播中也伴随着体验的话，那么，符码传播过程中的体验都不是对信息内容的直接体验，如果有直接体验的话，那只是对传播媒体和传播环境的直接体验，比如看球幕电影、立体电影等，只是对这些传播媒体本身性能的直接体验，而不是对其传播内容的直接体验。

2. 球幕电影和“魔盒”对视频技术的体验是真实的，但传播的内容都是模拟的

如今，中国科技馆外的“大圆球”不再只是个标志性建筑，一幕幕精彩绝伦的球幕 IMAX 电影在这里上演，观众更能在此体验“躺着看电影”的乐趣。

这个球幕影院的观众席比普通影院的更加陡峭，坐在倾斜 30 度的座椅上，仰卧般面向一个包裹着你的巨大球幕，海拔 4000 米的瑞士艾格峰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当镜头越过艾格峰峰顶俯瞰山底时，观众们全都屏息静气，似乎稍一动弹就会掉落山脚。当银幕上登山队员攀登峻美的艾格峰时，观众们感到自己仿佛也在随之步步登高。

突然，山顶的雪崩倾泻而下，巨大的雪球扑面而来，四周一片漆黑，观众们顿时紧紧地靠着座椅。而当画面重新回到阿尔卑斯美丽的

景色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同时睁大着眼睛，生怕错过任何精彩的画面。

球幕影院采用了直径 30 米的半球形银幕，可以使电影画面的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配以世界先进的 IMAX 放映设备，可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球幕影院了。据球幕影院特效影视部主任助理王迎杰介绍，“为了让观众们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们根据座位的高低，把座椅调成三种倾斜度。前排座椅的倾斜度是 135° ，中间座椅的倾斜度是 115° ，后排座椅的倾斜度则为 105° ，保证了视野画面的完整和观众们的观影质量。另外，六声道的立体声音响效果也会带给观众更强烈的视听震撼”^①。

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电力馆中的“魔盒”，运用六面式大体量 LED 屏幕 23 声道展示方式，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观赏体验。据称这是该项技术在世界展示活动中的首次运用。观众站在距底部高 3 米的悬浮玻璃平台上，被 112 块 LED 大屏幕形成的 720 度空间包围，前后、左右、上下都是光影幻动的屏幕，整个人都被包围在影像之中。观众在持续 4 分多钟的多媒体视听盛宴中，感受自然能源转化成人类可用能源的过程。整个“魔盒”仿佛在旋转一般，观众自己也像是整个宇宙能量的一部分。

在球幕电影和“魔盒”中，对视频技术的体验是真实的，但就其传播的内容而言，无论是瑞士艾格峰还是自然能源转化成人类可用能源的过程都是模拟的，观众从观赏中获得不了对它们的真正体验。

3. 4D 电影的模拟仿真也不等同于真实环境的直接体验传播

4D 电影就是在三维立体电影基础上再加上周围的环境特效、模拟仿真组成所谓“四维空间”。环境模拟仿真是指影院内安装下雪、下雨、闪电、烟雾、震动等特效设备；随着内容的变化，观众可实时感受到风暴、雷电、下雨、撞击、喷洒水雾、拍腿、击背等与立体影像相对应的情景。上海世博会石油馆的 4D 电影《石油梦想》对观众

^① 杨易峰、魏艾：《比“阿凡达”还炫的球幕电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 年 3 月 25 日，第 8 版。

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最热门的展馆之一。

应当说 4D 电影已经开始接近真实环境的直接体验，但严格说来，它只是真实环境的模拟仿真，与真实的环境依然有本质区别。因此它仍然不能等同于直接体验。

（三）旅游体验不同于符码传播体验，直接体验是旅游传播最重要的特征

没有直接体验，旅游几乎就不存在了，直接体验是旅游传播最重要的特征。旅游之所以不能被观赏旅游景观的影视等符码传播所取代，就是因为影视等符码传播不能带来真实景观的直接体验。一切深层沟通和理解都不能仅靠文字、影像资料，而必须以脚步、目光、耳朵乃至整个血肉之躯全身心地投入才更为有效。有人在谈到天池之美时写道：“当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定，抬起头来，我几乎是呆了！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天池吗？这就是令无数文人骚客神往的瑶池吗？所有的最优秀绝伦的诗文疾速在我大脑的屏幕上闪现，又一一被擦去，人类创造的文字在这里显得尴尬而窘迫，也许，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无需用语言或别的什么方式，而欲领略她，唯一的方式就是亲身体会。”^① 这里所说的“亲身体会”就是亲身体验、直接体验。

旅游就其主体来说属于体验式传播。当然，毋庸讳言，在旅游传播中也有非体验式传播伴随。

“旅游粉丝”之所以更热衷于自助游或半自助游，是因为这种旅游方式能够获得更多的直接体验。阿尔卑斯山上山的公路旁树立着一块提示牌：“慢慢走，请欣赏”，它切中了旅游的真谛。“正是由于传统的旅游团队无法满足这种旅游活动的真谛，现代旅游者必然要选择更能满足体验要求的自助或半自助的旅游方式。”^② 传统的旅游团队不给游客较长的停留时间，减弱甚至取消了一部分直接的旅游体验。

① 刘业勇：《啊，天池！》，《中国地名》2002年第6期，第29页。

②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四) 体验式传播的类型

所有的旅游活动几乎都带有体验式传播的特征。在旅游体验传播中有现场观察式体验传播, 进入式体验传播, 参与式体验传播, 可以用下面的简图(见图 2-5)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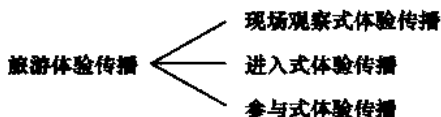


图 2-5 旅游体验式传播类型

1. 现场观察式体验传播

现场观察式体验传播是最常见的旅游传播形式, 可以直接看到景点现场的实物, 但往往有距离, 可能不能直接触摸这些实物。尽管如此, 游客还是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真实的各种景观, 与看电影、看电视都不同。

2. 进入式体验传播

进入式体验传播比现场观察式体验传播进一步, 可以深入景点内部, 可以直接触摸这些景点的许多细节部位。凡是稍有旅游经历的人都会有旅游的可进入性体验。比如到一些溶洞内游览, 许多溶洞造型可以触摸到。

游览旅游景点与欣赏一件艺术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艺术品只能从外部欣赏, 而旅游审美主体可以进入风景之中进行欣赏, 达到景随步移, 步移景换的审美快感。旅游能让人亲自到风景的内部去欣赏, 可以触摸到风景空间内的许多景物。余秋雨在描述自己游览天柱山时写道: “站在天柱山的山岬里实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 只觉得山谷抱着你, 你又抱着山谷, 都抱得那样紧密; 逮不到一丝遣词造句的空间。”^① 这种我在山中、山中有我、我与山不可分割的状况,

^① 余秋雨:《寂寞天柱山》, 参见《文化苦旅》, 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06—107 页。

只有在深入大山之中时才能体会到。

由于许多旅游景观的可进入性，就会使游客获得真切的空间感。绘画、摄影、影视等视觉艺术作品虽然也尽力去表现、描绘空间，寻找增大空间感的方法，如绘画的透视法等，但一幅画画得再真实，一张照片拍得再惟妙惟肖，终究是空间的平面表现，虽然它有时能给观赏者以美感，但却永远也不能把观赏者带进那个真实的空间。现代全景电影、立体电影给人的感觉更逼真、更动人，却无法使微风吹拂到人的身上，使春天的气息扑鼻而入，更无法使观赏者采到新鲜的野花。

3. 参与式体验传播

参与式体验传播，旅游者可以直接投身到某些旅游项目中，比如在内蒙古响沙湾滑沙（见图 2-6）、骑骆驼（见图 2-7）、乘坐沙地车等都属于旅游的参与性体验。



图 2-6 游客在响沙湾滑沙
(赵建国摄于 2008 年 8 月)

与现场观察式体验和进入式体验相比，参与式体验是深度体验。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很受游客喜爱。早在 1878 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后，博览会上展出的气球，星期日游人可以买票乘坐升空。中国人黎

庶昌“随众一试”后写了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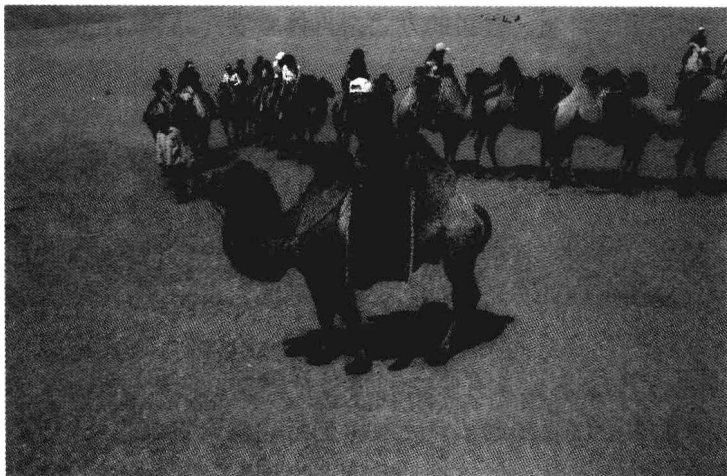


图 2-7 本书作者之一赵建国在响沙湾骑骆驼
(2008 年 8 月)

球下悬大圆木筐，护以铁栏，为站立处，可容五十人。……欲坐者纳十佛郎买票，上升在空中五分时。……既下，则人受一径寸大之铜钱，面铸球形，极其精致，用为纪念。球皮用布缝成，涂以印度胶、松香、白油，日晒雨淋，不易败坏。其大径三十五买特尔，围圆一百零五买特尔，容轻气二万六千建方买特尔。……因有绳系，故下降时不用泄气。间一二日微有走漏，则增气填实之。昼夜兼放。^①

参与性传播是旅游传播的一个特征。

游客在农庄可以欣赏田园风光，品尝当地特产，有兴趣的还可亲手干农活。比如，游客可以参观和参与酿造葡萄酒的全过程，在作坊里品尝，并将自己酿造好的酒带走，回去让亲朋好友品尝。

^① 参见钟叔河《从东放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391 页。

在城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让游客进入摘果、拔菜、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游客充分体验劳动过程,以自采、自制、自买的方式亲自体验农产品制作过程,并购买这些产品和其他乡村农产品。市场上一斤苹果2元,游客采摘就可卖到10元。采摘体验提升了果园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日本的“务农”旅游,在每年的春播秋收季节到农村体验农民生活,去沿海地区参加捕捞虹鳟鱼和采集、加工海带等活动。市民可以购苗、培肥、育种、种菜、浇水,尝试农田管理,带着所收获的农产品参加农业技术展评会,将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做成各种食品请大家品尝。

同时,“观光农业具有吸纳和传播科学技术的动力机制。在当今世界,农业发展已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观光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广泛采用高新技术,从而能够推动农业的发展”^①。

在好莱坞电影城旅游,游客不仅可以看到影片制作的全过程,还可充当电影“演员”,由导演在幕后经过短时间说戏,然后开拍,20分钟可拍完一部片子。之后给游客放映,并可制作录像带回。

(五) 小结简图

我们可以把实体传播与体验式传播、符码传播与非体验式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用简图(见图2-8)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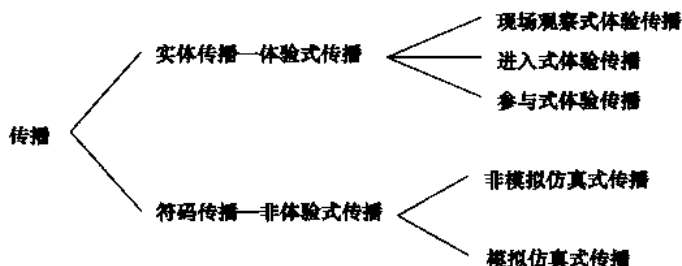


图2-8 实体传播与体验式传播、符码传播与非体验式传播的基本关系

^① 李周、操建华等:《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四 体验经济与消费体验式传播

(一) 体验经济

追求“体验”和提供“体验”环境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就构成了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旅游体验、旅游产业天然就是体验经济。休闲农业是提供休闲体验最适当的产业之一。

体验经济的概念源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在《未来的冲击》中指出：“体验工业可能成为超工业化支柱之一，甚至成为服务业之后的经济的基础；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和希望经济继续上升的人的压力——将推动技术社会朝着未来体验生产的方向发展；服务业最终还是会超过制造业的，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①

美国学者 B. 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H. 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认为：体验是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其意识中所产生的美好感觉；是使每个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事件；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它的每一瞬间都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指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第四个经济发展阶段”。

体验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相比有不同的特性。农业经济的生产周期一般以年为单位，是最长的，工业经济的周期以月为单位，服务经济的周期以天为单位，而体验经济以小时甚至分钟为单位，因而周期短。生产过程具有互动参与性，消费者全程参与生产过程。体验经济的产出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体验多数情况下依附于商品或服务。主观价值难以度量是体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还有高增值性、非生产性和自娱性等特点。

体验是消费者内在的心理感受，是个人在形体、情绪、知识上的参与。因此，体验的“个性化”是体验经济的灵魂。

^① 参见赵放《体验经济与休闲产业“体验化”经营》，《光明日报》2009年5月11日，第10版。

（二）消费体验与消费体验式传播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是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实现途径；消费是人对产品或服务的消耗、使用或占有。消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经历和感受，在这种经历和感受中获得消费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消费活动包括产品消费和服务消费都是一种体验过程，体验并非休闲、旅游等活动所专属。

前边已经说过，既然体验也是一种感受、感觉，我们就可以从人的感觉器官角度对体验来分类。体验也可以分为视觉体验、听觉体验、嗅觉体验、味觉体验和触觉体验等。种种消费体验都可以分属于以上分类中。比如欣赏影视艺术主要属于视觉体验和听觉体验，饭店用餐主要是味觉体验和嗅觉体验，穿成衣主要是触觉体验和视觉体验等。

消费体验带有直接验证性，使用物质产品的过程就是对这种产品质量的实际验证。当实际使用证明这种产品品质优秀时，你会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你亲身的、直接的体验和验证。当你对这种产品的优秀品质深信不疑时，也会连带这种产品背后的文化和人。所有消费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当你购买和使用劣质产品非常恼火时，还会相信制造这种产品的人吗？消费者经过使用实践得到的认识是最有说服力的，此时任何的广告和其他说教都无效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消费体验也是一种体验式传播。消费体验范围内的体验式传播，是指人们在消费产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从产品和服务中直接感受、体验、接受相关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记忆和传递给别人的过程。由于消费的主要对象之一是物质产品，消费体验式传播在许多情形下可以叫做实物传播。

消费体验式传播的直接验证性是一种巨大的优势，是一般信息、文化传播所不具备的。一般信息、文化传播都不具备直接验证的品格，都需要放到特定的实践中去检验。因此，通常情况下，接受者都是要存疑的。正因为消费体验式传播具有直接验证性的特征，所以它的传播效果非常好，是一般信息、文化传播所不能比的。

星巴克追求“星巴克体验”。星巴克认为星巴克出售的不仅是咖

啡,还包括人们对咖啡的体验。除了产品本身之外,还包括时尚且雅致、豪华而亲切的环境。如果说东方有茶道和茶艺,那么,星巴克分别在产品、服务和体验上营造了自己的“咖啡之道”。

星巴克一方面鼓励顾客之间、顾客与员工之间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交流来分享这些体验,另一方面,也鼓励员工之间分享在星巴克的工作体验,使员工为自己是一个星巴克人而感到骄傲。

五 旅游审美体验与旅游高峰体验

(一) 旅游就是审美体验

著名美学家叶朗指出:“旅游涉及审美的一切领域和审美的一切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旅游就是审美,旅游就是审美体验,旅游就是欣赏美和传播美。

哲学家康德说,在审美中,“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①。这与旅游非常相近,因为旅游无利益计较而在寻求愉快。旅游中人与对象的关系是审美关系,劳动或工作中人与对象的关系是功利关系。

哲学家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②除了与上边康德的话在无利害关系方面一致外,黑格尔强调了“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旅游就是要从惯常的工作与生活中解放出来。因此,旅游与审美在使人“解放”和自由这一点上非常相近。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审美愉悦是旅游的一个根本属性。

(二) 美的传播特征

美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分隔之后就失去了原有美。

美是可以传播的,但美的传播是不是信息传播?如果是,那也应

① [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页。

② [德]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当是“信息块”和“信息群”的传播。单独的信息素很难传递美。真正的旅游美，只有到旅游地现场才能得到，它是不能够靠符号传播实现的。

甚至建筑与周围草木也需要时间来磨合，才能达到整体和谐。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建的亭台楼阁点缀着新移栽过来的名贵花木，可是并无多少美感，它们互相之间没有融为一体。美国建筑大师莱特说：“建筑物要像从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那样”；“建筑物应该是自然的，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①。通常，古建筑和周围的花木如果保存得好的话，花木已经长入古建筑身体里了，一种整体和谐美会油然而生。周庄南湖园中有一处建筑就与草木浑然一体，建筑物就像与花草树木一起从地面上长出来一样（见图 2-9）。



图 2-9 周庄南湖园建筑与草木浑然一体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

（三）旅游高峰体验

高峰体验只是旅游体验中的一种，可以说是旅游中的最佳体验。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人、所有的旅游中都会得到高峰体验。但通常旅

^①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4 页。

游会给人以轻松、愉快的体验，就是常说的寓教于游。

什么是旅游高峰体验呢？高峰体验是旅游体验的最高水平，是一种美的极致体验、极值体验。它类似于性生活中的高潮体验，并不是每次旅游都会出现。我们可以用“震撼”和“沉浸”这样两个词来表达进入旅游高潮体验时的心理状态。游者被美震撼了，沉浸在美中，可以说就是进入了高峰体验。还有两个词可以描述这种“沉浸”状态，一个是“物我两忘”，一个是“神游”。“我”和“物”的界限消失了，完全融为一体。神情完全飘游在美的意境中，别的什么也感觉不到。当游客凝视延续了很长时间，凝视者尚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被凝视的美中，此时，就可以断定，已经进入高峰体验。

下面是一些游者进入高峰体验状态时的文字描述：

徐志摩在回忆自己观看泰山日出时这样写道：“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地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地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里，我独自站在雾霭溟濛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①他幻想自己的躯体无限长大，脚下的山峦竟然只像一块拳石，而巨人披着散发在迎接东方的太阳。“不由得大声地狂叫”，那时被震撼了。在“奇异的幻想”中自己变成了披着散发的巨人，那是深深的沉浸，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

苏轼《前赤壁赋》中在“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秋江中的感受：“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里“冯”通“凭”，意为乘。“虚”指天空。“御”指驾驭。意思是大江多么广阔浩瀚，我们像是在天空中乘风遨游，也不知道船将停留在什么地方；多么飘然荡漾，我们好像独立长空，遗弃尘世，飞天成仙了。苏轼沉浸在“神游”状态中。

面对富士山之大美，凌叔华“蓦然觉得我已经伏在美妙宇宙的

^① 徐志摩：《泰山日出》，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怀里，我忘去了一切烦扰疲劳和世间种种，像婴儿躺在温软的摇篮里一样”^①。“伏在美妙宇宙的怀里”，“我忘去了一切烦扰疲劳和世间种种”，说明已经进入物我两忘、沉浸在美妙宇宙中的状态。

徐志摩在写到康桥的克莱亚三环洞桥及其周围之美时，很带感情：“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还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不？只要你审美的本能不曾泯灭时，这是你的机会实现纯粹美感的神奇！”^②没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就是进入忘我状态，“纯粹美感的神奇”就是沉浸在美中。

高峰体验与遁世体验有联系，对美的体验越深刻，越容易进入遁世体验状态。但遁世体验并不等同于高峰体验。进入高峰体验时肯定已经进入了遁世体验，可是进入遁世体验状态时，不一定能够获得高峰体验。

衡量旅游效果好不好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准，一个是有没有获得遁世体验，一个是有没有获得高峰体验。

有了遁世体验就意味着已经真正进入旅游状态，进入不了旅游状态就很难得到好的旅游效果。

不用说，高峰体验是最高标准。别的体验比如娱乐体验、教育体验、审美体验在旅游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高峰体验综合和升华了娱乐体验、教育体验、审美体验、遁世体验，尤其使审美体验达到顶峰。高峰体验多数在面对自然美时出现。因为自然美是大美，是一切美的源泉和范本。同时，人类来自大自然，对大自然有本能的亲近感和皈依感。“当你看着金碧辉煌的建筑物，让廊柱的景象迷住你眼睛的时候，你再马上去看看天空和牛羊在水边吃草的开阔的平原吧。当我们在黎明时分怀着宁静的心情欣赏给大地涂上一片金色的朝阳的时候，当我们在深深的绿草地坐在一座水泉旁边的时候，我们谁不鄙夷所有的艺术品呢？”^③

高峰体验正像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的灵感一样，在相当程度

① 凌叔华：《登富士山》，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②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③ 「英」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1页。

上,可遇而不可求。

第三节 “取经式”传播与双重非对称传播

一 “取经式”传播

(一) “取经式”传播

1. “取经式”传播的含义

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具有不可移动性,旅游就意味着旅游主体必须亲自到达目的地,否则就不能完成旅游活动。换句话说,旅游目的地信源多属于“偏向时间”却不能在空间中流动的载体,它可以在时间中延续,却不能像手机那样实现空间的移动。打个比方,旅游传播就像《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必须经历或长或短的路程亲赴目的地,才能实现旅游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旅游传播的这个特征概括为“取经式”传播。我们强调旅游者必须亲赴目的地,正像唐僧本人必须历经千难万险,行程千万里亲赴天竺国才能取到真经一样,孙悟空或其他徒弟不能代替。如果能够代替的话,就不是真正的“西天取经”了。孙猴子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他到西天拿到真经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他没有唐僧的佛教诚意和修养,佛祖也不会认可他,不会将真经交给他。

“取经式”传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旅游者必须亲自到旅游地现场,否则完不成旅游,也实现不了旅游传播。二是既然是旅游者亲赴目的地实现旅游传播,那就意味着旅游传播源的信息是由游客带出去的,而不是旅游传播源送出去的——这一点就把旅游传播与大众媒体传播区别开来了。旅游传播源,或者说旅游目的地发出的信息,那是旅游的“真经”,这个“真经”旅游者不亲自到现场是无法得到的。三是既然旅游者必须亲自到旅游地现场,那就意味着旅游者必须经过一段旅程。日本有一些仰慕苏东坡的人士,他们模拟苏东坡的赤壁游,在“七月既望”和“十月望”,集中在日本的河岸可以赏月的高台上,欣赏诗文,追慕苏东坡。而在苏东坡的生日,也有一群文人在

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召开“寿苏会”，寄思于苏东坡的风雅。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指出：“但是无论他们心里怎样向往，也无法真实体会到黄州赤壁之游的心情。”“我想在这里替过去仰慕苏东坡、沉醉于虚拟赤壁游的日本文人强调一下：并不是谁都能实现赤壁游的。若不是置身于黄州，这便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①

旅游的这种“取经式”传播与大众传播媒体所进行的传播形成明显对比。大众媒体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的传输方式，可以通过将纸介文本邮递的方式，把信息送到千家万户，受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信息。在大众媒体传播的这些信息中当然也包括旅游景点和其他有关旅游的信息。但是旅游景观的实景信息不到现场是无法体验的，因此即使你贵为总统、教皇，也必须不辞辛苦亲临现场才能得到旅游景观的体验和感受，秘书或仆人是无法替代的。“现代通讯使多数政事商务不必亲自抵达，而必须亲自抵达、不能让设备和别人代劳的，便是旅游。”^②

2. “取经式”传播给许多景观带来“神圣感”

正因为如此，许多景点给人以“神圣感”。也正因为不可移动，尽管现代化交通和现代大众旅游已经使许多名胜有所“去魅”，但与文化艺术经典作品相比，众多传统旅游名胜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它们的“神圣”和无可替代。因为多数文化艺术经典作品可以被数字化、被轻松复制出来，即使有些原作真品不能被复制，也能搞巡回展览。而旅游目的地是不能复制，也不能搞巡回展游的。即使复制出来，多数会受到旅游者的小视和抵制，多数会失败。

旅游获取的信息是接受者靠自身身体的移动，移动到旅游地获得的；大众传播媒体则将信息直接送到了家中，受众得到的是送上门来的信息。可以说，旅游是靠出门走获取信息，大众传播则是受众在家里坐等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旅游景观信息载体本身没有移动，它自身信息的流动、传播靠的是人体的移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传播靠的是信息载体如报纸、电波的移动，信息接受者本身不需要移

^① [日] 内山精也：《海外苏东坡热爱者的殷切愿望——内山精也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演讲》，《光明日报》2010年11月4日，第10—11版。

^②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动。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旅游传播源的“尊严”。

3. 受众直接到信息本源地现场人数最多的一种传播方式

正因为必须亲赴旅游地现场才能实现旅游传播,而旅游又是世界性的大众广泛参与的活动,就使旅游传播成为所有传播方式中,接受者直接到信息本源地现场人数最多的一种传播方式。比如,新闻传播,新闻当事人在现场,有少数记者到现场采访,受众获取新闻信息并不需要到现场。

正因为旅游必须亲赴现场,所以旅游者才获得具体的体验和感受,体验成为旅游传播一个最重要特征。

(二)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为什么把实景演出与旅游连在一起?因为实景演出不可移动,它与旅游景点的不可移动性是一样的,甚至实景演出的“实景”就是旅游景点的一部分。但凡能够移动,就不需要由旅游来完成了。

张艺谋和他的团队自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印象·刘三姐”以来,又打造了“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以及2010年1月24日试演的“印象·大红袍”(武夷山实景演出)五个各具独特魅力的“山水实景”大戏。“印象·刘三姐”中漓江的水、桂林的山、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印象·丽江”里的玉龙雪山、丽江古城、三朵神和少数民族歌舞与服饰;“印象·大红袍”中武夷山著名的大王峰、玉女峰及九曲溪水、大红袍茶树,这些“山水实景”是不可移动的,所以,只能在特定的地方演出,观众也只能在特定的地方观赏。可以说这是旅游与艺术的一种有机结合。它是演出,因此属于艺术,但它只能在特定的地方演出,并且多在著名景点演出,因而又与旅游有密切关系。在许多情形下,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成为了旅游活动的一部分。

世界旅游组织官员赞美“印象·刘三姐”“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机票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①。

^① 王齐国:《“印象”系列的启示》,《光明日报》2010年2月24日,第9版。

正因为是实景，再加上它不可移动，不能搞巡回演出，所以观众的这种视听享受的代价也是高昂的——远道而来的车船、住宿费用，再加上高额入场券。所以，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高昂的费用，往往只好放弃这种艺术享受。

其实，国外“实景演出”更早一些。上个世纪末，余秋雨就曾向读者描述过埃及金字塔下的歌剧《阿依达》。三座举世皆知的金字塔是演出的背景，舞台右侧，是静静的尼罗河和开罗城，舞台左侧，则是撒哈拉大沙漠，夜间的沙漠一片漆黑，但地平线上方却泛着一圈光亮，那已不是落日余晖，而是一种奇异的沙漠天光。如此宏大的场面，即使见多识广如余秋雨也“实在被眼前的壮观镇住了”。“但在策划、导演、设计上都比不上张艺谋的《图兰多》，主要原因是它没有运用好这个背景。”“不仅金字塔完全没有入戏，而且连舞台设计都与金字塔的线条、光色完全无关。其中有一段，数百名白袍、金甲的剧中人走下台来在沙地中行走，让我精神陡然一震，但走着走着又走回去了，居然没有太大的艺术意图，真是可惜。”^①可见，不能为实景而实景，好的实景演出，剧情应该与实景有实质性关联。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以天地为舞台”的艺术梦想，在真山真水的宏阔背景下，展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许多方面是传统舞台不能比拟的，因而其传播效果在许多方面也是传统舞台所达不到的。

实景演出是旅游演艺的一个类型。旅游演艺可分为山水实景演出型、民族风情展示型和文化遗产演绎型三大类。

二 双重非对称传播

（一）双重非对称传播

旅游的双重非对称传播是指，信息主要流向旅游者；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20页。

与“取经式”传播相联系,旅游传播还具有双重非对称的特征。旅游的非对称传播,首先是指,在旅游过程中,信息的传播方向主要由旅游客体(许多情况下通过导游)一方,流向旅游者一方,而旅游者一方向旅游目的和导游所传播的信息数量少、传播范围也有限。这是由旅游的性质所决定的,旅游是旅游者的主动行为,旅游者要到旅游目的地游览、参观,因此,从旅游传播的角度看,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信息是旅游活动的主要动力和内容之一。

不是说旅游者不向旅游地传播信息,但这种信息传播以旅游地为背景,而不是以旅游者惯常的生活环境为背景,因此,就使这种信息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变形和走样。同时,由于这些外来者以旅游为主要活动内容,他们传播的信息也多局限于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内容,而东道主就生活在当地,他们所传播的信息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只要游客有愿望,并付出足够的时间,就有可能比较真实地获取旅游地当地生活的全部信息。当然,事实上,大多数旅游者往往并不能获得当地生活的全部信息。但与东道主对游客的了解相比,游客获取当地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一般情况下都要优于东道主。

旅游的非对称传播还指,在现时代,旅游出发地一般是经济比较发达、收入比较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说旅游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么游客则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出发地文化多属于强势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许多则属于弱势文化。这种非对称,是世界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如果世界能够均衡发展了,这种不对称将会减少或消失。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成为旅游出发地,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能够成为自由的旅游者,那将是一种美好的世界图景。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能够成为自由的旅游者,当做理想世界的一个标志。

当然,并非所有游客都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少量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成为旅游者。如果这些游客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还会被旅游地下层人或普通人小看。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凌叔华在日本登富士山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在黑黝黝的山道上,什么景致也望不到,前面灯笼的光已经不如起先的引人幻想了,拉马的人也从他的口气里听出是一个瞧不起中国的日本人

了，总而言之，山中的神秘性完全消失，只余了不成形的怅惘，及赶路常有的疲倦，徘徊于我的胸膈间。”^① 无独有偶，另外一位中国人也记下了类似的经历，所不同的是它发生在海关工作人员身上：“每一个登岸的客人都要受一番像上法庭似的审问，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更尤其是对乘坐三等舱的客人，那样严密，几乎连他们的祖宗世谱都要问明白。这又何必呢？我在旁听那关员口中吐出破碎不完全的英语，柳叶式的眼内漏着诡谲疑虑的光，我真伤心！几天来在船上一些真率，悠恬的梦，到此破了，消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②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遇到此类情况，对来自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的情感伤害很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游客到欧美等发达国家旅游，经常会被当地人误认为是日本人。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整体实力较弱的一种判断。邹韬奋就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何以只想到日本而不会想到中国？有人说他们觉得所谓中国人，就只是流落在国外的衣服褴褛的中国小贩，衣冠整洁的黄种人便都是日本人。这种老话，我在小学时代就听见由外国留学的人回来说起，不料过了许多年，这个观念仍然存在——倘若上面的揣测是不错的话。”^③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力增强了，这种判断逐渐改变。

当然，许多著名旅游城市往往处于强势文化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旅游者到欧美、日本等国家旅游，就可以领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

许多旅游目的地是人烟稀少但环境优美的深山老林，旅游者则来自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城镇。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势能差。尽管旅游者在旅游地获得了大量信息，历史的、自然的、风土人情的等，但他们多以获得体验和知识、开阔眼界的心态得到这些信

① 凌叔华：《登富士山》，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② 方令孺：《游日杂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③ 邹韬奋：《佛罗伦萨》，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息，往往还多少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心态。这些信息往往停留在认知层面，不会直接成为他们行为的取向。斐儿在《马达山游踪》中记述了去马达酋长住着的乡村，观察马达土人的生活形态：

马达是一种半开化的民族。会织布，会编席，也会种地。他们的屋宇是一种特别的建筑形式：用“阿答”树叶编成的屋顶和墙壁，高高地架在许多木桩的上面。屋顶成尖脊形，上面更加几个尖锥形的装饰。一两把梯子靠在屋子旁边的门口上。没有窗，屋内黑暗而污秽。入门时，令人头昏而作呕。地板上绝少桌椅和家具，据说晚上一家人便席地而卧。饮于是而食于是，生于此也死于此。地板下的木桩间却是养牲口的地方，人畜便这样地只隔着一层木板。晚上人兽的鼾声齐鸣，活显出一个原始人的生活样式。^①

而不发达的旅游地居民则是另一种心态，羡慕发达地区的游客是比较常见的。王统照在离开古老的荷兰马尔孔渔村时写道：“也许在这孤岛上的男女，瞧着游客们自叹。‘有福的人能够到处游览。’但那些游客的心里可不一样。”^②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像一块海绵，旅游地的信息很快被吸收到自己体内，不显山露水。而旅游地的居民则不同，尽管他们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身上得到的并不是全面的信息，但他们就像容易着色的一块板材，外来游客的“画笔”和“颜料”较容易在这块板材上涂抹，游客的穿着、所携带的物品以及举止行为，都可能迅速成为他们追逐或模仿的对象。这就是文化势能差在起作用。

（二）旅游信息的流动方向

旅游信息的流动方向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① 斐儿：《马达山游踪》，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② 王统照：《荷兰鸿爪》，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流向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和国家。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和国家，也是最容易形成游客群体的地方，旅游信息向这里流动是很自然的。

流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旅游信息总是流向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流向较近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旅游信息源的信息流向附近地区很容易理解。

流向风景名胜区。一方面，大量的游客将四面八方的信息汇聚到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之间也相互交换或传递信息。

第四节 旅游传播源信息的累积性

一 什么是旅游传播源信息的累积性

旅游目的地多是名胜古迹，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它“成名”的那一刻起，其信息就开始累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累积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长期累积起来的自然文化遗产就像饱学的老学者，在其身上浓缩着深厚、密集、有价值的文化、科学信息。这就是名胜古迹信息的累积性。

一个景观的文化累积过程构成了这个景观的历史。所有的人文景观都具有继承性，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种景观保存和传递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形态和特征的信息。它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录和显现出文化的演化、递进过程。

经过百年、千年积淀的自然遗产（积淀的时间更长）、文化遗产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百年老店”、“老牌产品”，有着极高的社会、经济价值。

在中国，旅游传播源信息累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泰山，一个是西湖。这里，我们主要说西湖。

西湖的文化累积太深厚了，我们只能择其要而简述。即使这样，恐怕也有挂一漏万之嫌。

早在南宋年间，西湖即有“十景”之说：苏堤春晓、断桥残雪、

雷峰夕照、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单西湖十景就有许许多多的文献和传说，我们只简要介绍苏堤春晓和断桥残雪。

“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首，俗称苏公堤或苏堤。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将它命名为苏堤。苏东坡曾有诗云：

我在钱塘拓湖渌，
大堤士女争昌丰。
六桥横绝天汉上，
北山始与南屏通。^①

苏堤旁遍种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的花木。阳春三月、漫步堤上、新柳如烟、春风拂面、群鸟和鸣，故称之为“苏堤春晓”。堤上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元代又称之为“六桥烟柳”。杭州人将这六座桥俗称为“六吊桥”，民间有“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的歌谣。望山桥南面的御碑亭里立有康熙题写的“苏堤春晓”碑刻。

“断桥残雪”之断桥是一座石拱桥，位于西湖白堤的东端，背靠宝石山，因地势较高、视野开阔，是冬天观赏西湖雪景的最佳去处。每当飞雪初霁，站在宝石山上向断桥方向眺望：西湖银装素裹，白堤雪柳霜桃。桥的阳面已冰消雪化，“雪残桥断”，而桥的阴面却还是白雪皑皑，“断桥不断”，故称断桥。

唐朝张祜的《题杭州孤山寺》最早记载了“断桥”：

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

^① 苏轼：“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参见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76页。

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
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
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①

诗中的“断桥荒藓涩”，告诉我们断桥原是一座苔藓斑驳的古老平板石桥。

断桥还是神话《白蛇传》中许仙与白娘子相会定情的地方。在断桥的桥面上，由伞传情，白娘子终于找到了前世的救命恩人许仙，结为夫妻。在经历水漫金山之后，又是在断桥邂逅重逢，再续前缘。

如果你关注英雄人物，西湖景区内还有“湖上三杰”：岳飞、于谦、张苍水。还有与秋瑾一起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近代民主革命者徐锡麟、陶成章等，都安葬于西子湖畔。

如果你喜欢饮食文化，最有名的是楼外楼的西湖醋鱼。楼外楼创建于1848年，店名取自南宋诗人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②名句。楼外楼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曾经接待过许多中外名人。楼外楼的当家名菜要数西湖醋鱼了，它是选用西湖中养殖的草鱼，先在清水中饿一两天，除去泥土味，然后烹制而成的。成菜后的西湖醋鱼，色泽红亮，肉味鲜嫩，酸甜可口，略带蟹味，是杭州最有代表性的风味名菜。

来过西湖的历代名人数不清，光当代接待过的世界各国元首就不好数清。仅刘庄宾馆就接待过40多位外国元首政要。首次接待的外国元首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卡，他们是在1971年5月到杭州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法国总统蓬皮杜紧随其后。接下来，先后下榻刘庄宾馆的外国政要有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卢森堡首相托恩、马里共和国军委主席巴巴迪亚、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阿根廷总统魏地拉、瑞典首相费尔德丁、美国副总统布什、日本总理铃木、意大利总统佩尔蒂

① 张祐：《题杭州孤山寺》，《全唐诗》第十五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18—5819页。

② 林升：《题临安邸》绝句全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尼、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冰岛总理赫尔曼松、泰国王储、冈比亚总统以及南非国大党主席曼德拉等。^①

至于记述和歌咏西湖的诗文那就简直不可计数了。作家陈祖芬写道：如果想把写西湖的诗文数一数，那么不如去数西湖边那花、那草、那树。

写西湖也没有人写得过苏东坡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在杭州抒发情怀的诗就有400首！诗人毛泽东41次到西湖，但不写一诗。毛泽东说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太绝了，就“不敢造次”^②。

正如余秋雨所说：“我觉得中国漫长的历史使它的山水都变成了修炼久远的精灵，在它们的怀抱中，文化反思变成了一种感性体验。”^③

二 不少作家、学者在不同旅游地不约而同地诉说着这种文化累积

我们顺手拈来不同作家、学者所写篇章的几个段落：

钱塘江是因为举世无双的特大潮涌而出名的，海宁，千百年来一直是观潮胜地。说不清谁是第一个看潮的人，但我眼前的潮水，孟浩然、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看过，乾隆、林则徐看过，孙中山、毛泽东看过，王国维、徐志摩看过……终于，轮到我了。但我注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站在他们站过的地方，看他们看过的风景。看潮水，同时也看那些先期到达的名人，穿着各个时代服装的身影。也许我看

① 沈嘉禄：《“天堂”中的国宾馆》，《解放日报》2009年12月31日。

② 陈祖芬：《西湖重》，《解放日报》2006年5月27日。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全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③ 余秋雨：《访谈录》，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到的只是幻影、只是自己的想象，但我更愿意相信：随着海宁潮在每一天的复活，远去的看潮的人，也逐渐复活了。他们组合成另一道人潮。^①

看潮人看的不仅是潮水，还有过去的看潮名人。每一位游客都会为旅游地增添新的信息，只是名人增添的更多、更引人注目罢了。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东山即指山东邹城的峯山。季札、庄子、老子、孔子、孟子来过，司马迁、蔡邕、李白、杜甫、李阳冰、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郑板桥来过，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来过。秦始皇、刘邦、刘秀、曹操、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乾隆等帝王来过，或封禅、或封赐、或求长生。古籍《书经》、《诗经》、《左传》、《太平御览》、《史记》记载过。^②

知名度并不怎么高的峯山竟有这么多的古代名人来过，还有这么多重要的古代典籍记载过。然而，孔子登峯山而小鲁，是之后人们不断登临它最重要的缘由。旅游传播源信息的累积多能找到其根源。

瑞士的莱蒙湖，“从前拜伦（Lord Byron）也在此徘徊留恋过，咏了不少有名的诗。大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也好几次从法国亡命奔流到瑞士，莱梦湖尤其是他稔游之地，日久徜徉俯仰于山麓水滨。他的名著《新哀洛绮思》（Nouvelle Heloise）中也曾经极意描写湖山的绮丽。还有那位法国的浪漫派大诗人维多器俄（Victor Hugo），也曾经在湖里荡漾着，引起了不少人生广漠之感。他住过那间屋子，现在却还好好的保存着呢”^③。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期间，法国和英国贵族喜好到瑞士旅行，他们一般先到日内瓦，然后再到蒙特勒。据说这条路线为英国大

① 洪烛：《海宁：徐志摩的故乡（二题）》，《海燕》2007年第1期，第52页。

② 参见李木生《峯山》，《美文》1996年第3期。

③ 刘海粟：《多变的莱梦湖》，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莱梦湖”通译莱蒙湖。“维多器俄”，通译维克多·雨果。

诗人拜伦开辟。他从日内瓦、洛桑再到蒙特勒，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墨迹，一篇长篇叙事诗《西庸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使得昔日莱蒙湖畔萨伏依公爵破落的城堡，成为仰慕诗人的游客们的必到之处。

到文化积累厚重的地方去旅游，接受的信息密集，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游人自己也不知不觉领略古人的情怀。“我们若去游山玩水，我们可以只在当前现象的审美中欣赏这景色。若是我们曾经在这山水中留下过一段人生中值得纪念的往事，当前的景色可以更加上一层使人留恋的亲切之感。若这是一个古迹，我们更能因别人曾在这地方发抒过的情意，加重我们当时的心境。”^① 费孝通说的这段话，相信多数有过旅游经验的人会有同感。

有些文化积累丰厚的景观，由于顶尖文化人的频繁到来，其人文艺术水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竟使后来者感到无法再添加什么新东西。这种情况出现在前边提到的杭州西湖，诗人毛泽东在苏轼诗面前“不敢造次”，未写一诗。

黄鹤楼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年），逐渐演变为名胜，至唐永泰元年（765年）已具规模，使不少名士“游必于是，宴必于是”。历代文人墨客流连于此，留下不少诗文书画。唐代诗人崔颢留下了被称为“千古绝唱”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②

《唐才子传》载：崔颢

① 费孝通：《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101页。

② 崔颢：《黄鹤楼》，参见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2页。

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①

后人感慨此事建“搁笔亭”，清江夏县令曾延东撰联曰：“楼未起时先有鹤，搁笔之后更无诗。”武汉黄鹤楼景区内 1991 年重建落成的“搁笔亭”就挂着此联（见图 2-10）。



图 2-10 搁笔亭
(赵建国摄于 2006 年 11 月 5 日)

可是，李白一直记着这件憾事。后来，他在游金陵凤凰台时，仿效崔颢的诗，写了《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②

①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3 页。

②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参见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7 页。

李诗拟崔诗而作，艺术水平极高，难分伯仲。黄鹤楼集聚的人文气息竟然叠加到了金陵凤凰台。

三 中国古迹更加突出的累积过程

余秋雨在《莫高窟》中说过：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做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①

中国文化遗产比国外的有着更加突出的层累性，但并不是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等就不具有信息的累计性，只是这种“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的文物后续的信息累积与繁盛时期相形失色而已。

中国文化遗产烧了、坍了，然后重修，固然是一种文化累积，也显示了一种人文生命的延续，然而，与国外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相比，丧失了较多的原始信息。

^① 余秋雨：《莫高窟》，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四 景观信息累积起始的条件

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形成名胜古迹开始文化累积,需要特定的条件。

其一,自然景色优美或特殊。

泰山的雄伟、壮丽是它人文累积的起始条件。承德棒槌山和双塔山特有的形状是它们人文累积的起因。

许多风景名胜吸引着作家、艺术家,这些作家、艺术家足迹所至,多会留下作品。这些作品就成为此风景地文化积累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美国当代著名作曲家费尔德·格罗菲曾多次赴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科罗拉多河大峡谷旅游。他以音乐来描述大峡谷变幻无穷的美。从1921年写出了第一乐章“日出”,到1931年《大峡谷组曲》全部五个乐章最终完成。

其二,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原属俄国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10月24日21时45分,“阿芙乐尔号”炮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告了“十月革命”的开始。从1948年起,“阿芙乐尔号”作为“十月革命”的纪念舰永久停泊在涅瓦河,并成为海军博物馆供游客参观。其实,“阿芙乐尔号”1905年5月曾参加过日俄间的对马海峡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不过,由于它在“十月革命”中的特殊意义,才被历史长久记忆,其他方面的历史信息才被人们搜集和注意。

其三,与名人、名作品有关。

绍兴、上海、北京等地的鲁迅故居能成为旅游点,那是因为名人鲁迅在此生活和工作过。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而名闻天下,岳阳楼的文化积累越积越多。

其四,本身出类拔萃、足以传世的器物、建筑等。

台北故宫的翡翠玉白菜,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料,依循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雕琢出鲜活欲滴的白菜,叶片上还雕刻了菜虫。

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它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木结构建筑的典范。在近一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木塔经历过多次地震。据史书记载，元顺帝时大震七日，它能巍然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河北邢台地震、唐山大地震等，木塔都未受损。木塔上的留名题记甚多，最有名的，一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1406年）北征时，亲笔题“峻极神功”四字。一是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三年（1508年）到应县，登塔宴赏时题“天下奇观”四字。匾额中文物价值最高的是第三层南面的“释迦塔”木牌，书法精良，并记录了木塔几次修葺的年代。

其五，古树，古代遗存。

古树是历史沧桑的见证，它也是生命力的象征。人们看重和保护它是自然的，在古树身上或周围积累人文信息也并不难理解。

有意无意中保留下来的古代遗存，不管在当时价值几何，由于其年代的久远，自然具有历史价值。年代越久远，历史价值越珍贵。

旅游景点的文化累积也符合“马太效应”规律。景区的文化累积越深厚，人们追加累积的愿望就越强烈。越是有名的景区，名人越是愿意去留下点什么。对于文化累积来说，人们也喜欢“锦上添花”，而不太情愿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有时，无意中就会为原有著名景观涂抹上浓重的历史记忆。陕西华清池早就名闻天下，作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主要发生地更使它成为历史的见证。正因为其名气和良好的环境，尤其是它的温泉等，蒋介石才下榻华清池。蒋介石也没有想到他会给华清池留下如此浓重的记忆。

五 另类的“累积”

遗产信息的累积，现在并没有停止，依然在进行。我们应认识这种累积并积极、主动推进这种累积进程，保护这种累积成果，从而使这些自然和文化景观内涵更加丰实厚重。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警惕和防止一些另类的“累积”。

（一）沉重的历史积淀

在谈及耶路撒冷的历史积淀时，余秋雨指出：

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一次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那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都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

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火气之后才有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①

这是人类历史的无奈。历史积淀也会成为现实民族、宗教冲突的“依据”。

在谈到巴以冲突时，余秋雨指出：“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整理强化了。”^② 其实，许多有历史长度的冲突都有这样特征，过去的谁是谁非很难说得清，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二）游客的“到此一游”

旅游资源历史积累越丰厚越有利于吸引游客，但是这种累积必须经过时间的严格筛选。对于游客来说，越是名胜越是想留下点“纪念”，惯常的做法就是留影、摄像，常见的不适宜之举就是“某某某到此一游”，就连《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有“到此一游”的举动，况凡人乎？

有些中国人在旅游点喜欢“涂鸦”，外国人也难以避免。比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南郊的普希金村（原名沙皇村）中就有这样的“涂鸦”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6页。

^② 同上书，第180页。

(见图 2-11)。



图 2-11 俄国圣彼得堡普希金村中的“涂鸦”
(2006 年 5 月 10 日本书作者之一赵建国在“涂鸦”处留影)

有趣的是，莱蒙湖畔的西庸城堡石柱上也刻有大诗人拜伦的名字，名人也有“到此一游”的举动。不过，此“涂鸦”已经成为这个旅游名胜地的珍贵文物。

顺便提及，也有将“涂鸦”巧妙利用的旅游点。意大利临海小镇亚里斯奥东南 12 公里处有一座海神庙，针对不少人在墙上、树上乱写、乱画、乱刻，管理人员将羊皮纸切成一些小片，发给每个游客两小片羊皮纸，请他们将自己的希望或想说的话一式两份写好，注明地址、姓名等，一份留在本人手里，另一份留在庙里，说是这样就能得到神灵的保佑。这一招果然有效，此后再也没人乱写乱画了。几年之后，改成印一些带花边的纸质留言卡，适当收取费用，后来干脆代替了门票。几十年后，留言卡多了，就用收来的钱盖了一座房子，将留言卡分类保存。从 17 世纪起，来这里的游客大增，不少人是来查找自己或是父兄当年的留言卡的。白发苍苍时看到自己少年时的留言，许多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1689 年，正式存放游客留言卡的档案馆成立。现在庙中珍藏世界各地游客的留言卡已达 4000 多万张，每年

吸引国内外数十万游客来到这地。^① 将游客留言保存下来，也是一种旅游地人文信息累积的方式。

（三）旅游地的“画蛇添足”

对于旅游地来说，常犯的错误是“画蛇添足”——添置一些多余的“景观”。添置这些“景观”的目的当然是为丰富景区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但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首先，它破坏了原有景观的原真性与和谐性，降低了旅游地的文化品位。其次，它浪费钱财，修建时需要投资，拆除时也需要投资。

在国内的旅游地，几乎随处可见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随手拈来几个看看：

河南省鹿邑县明道宫院内添置的不伦不类的假树“幸运树”（见图 2-12），不仅不会美化景区环境，还有损整个景区的美感，甚至让游客对景区核心景观的原真性产生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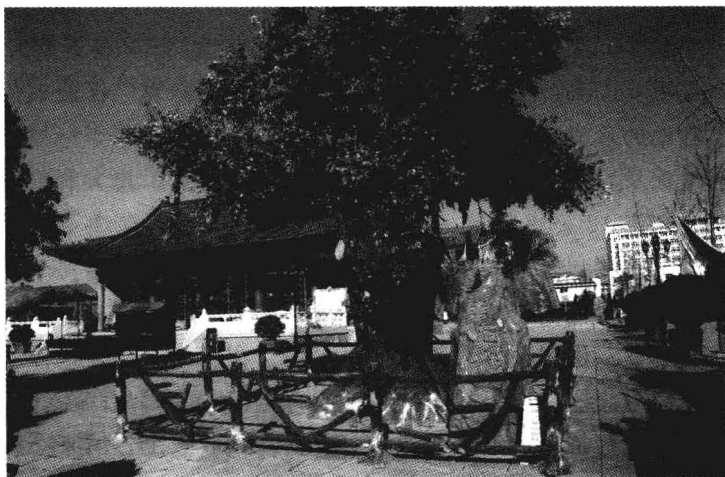


图 2-12 河南省鹿邑县明道宫院内添置的假树“幸运树”

（赵建国 2009 年 12 月 21 日拍摄）

^① 参见王大庆《四千万张留言卡有看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 年 9 月 15 日，第 6 版。

河南省淮阳县太昊陵陵墓后面“著草园”旁边用水泥制作的树桩(见图 2-13), 无论与“著草园”还是与太昊陵墓相处都极不协调, 它既破坏此处遗迹的原真感, 也毫无美感可言。从实用角度看它既不是垃圾桶, 游人坐上休息似也不合适。



图 2-13 河南省淮阳县太昊陵墓园后的画蛇添足之作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

同样是在太昊陵院内, 由绿树组合、修剪成的小亭子(见图 2-14), 即可供人观赏, 也可供人休息, 是一个“绿色”的好创意。它简单而不简陋, 虽有人工痕迹, 却给人以自然、朴拙之感。



图 2-14 河南省淮阳县太昊陵院内的绿树亭子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

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曾有一旅游点名曰“水泊梁山”：

其中人物，虽彩绘着衣，借以声电，但制作粗糙，神情滑稽，已经有辱古典艺术。为甚者，有潘金莲与西门庆白日偷情一幕，一个垂腿坐床，一个慌乱立地，皆赤身露丑，一丝不挂。门外武大郎怒扣房门，且有录音机伴以声音：“快开门，快开门，你们大天白日胆敢行奸，还不快快随我去见官！”游人男女长幼至此，皆哑然无声，哭笑不得。更为甚者，有宋江怒杀阎婆惜一幕，可谓淫盗并侮。宋江举刀在手，阎婆惜敞怀赤下身仰卧于床，两腿叉开，双足上举，面部虽无惧像，录音机中却疾呼“救命”。外面楼梯上，横尸数具，血肉模糊，惨怖之状，不堪入目。^①

水泊梁山与白洋淀毫不相干，此处所谓“景点”纯属以低级趣味吸引游人。

^① 忽培元：《白洋淀咏叹调》，《中国科协报》1995 年 8 月 6 日。

第五节 旅游与旅游传播对人类社会的独特贡献

在中欧，有记者问余秋雨：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

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①

我们根本不会想到余秋雨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但细想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旅游几乎是人的一种天性，很容易推广开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容易推广开来的活动中，会使人的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知识视野，甚至人格品行不知不觉中得以提升，即所谓“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①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198页。

看来,旅游对于精神文明的缔构有着独到作用,这也可以算作旅游的“文化涵化”吧。

一 开阔眼界和思路

(一) 开阔眼界

不远游,焉知天地之宽阔。“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①

旅游能够开阔眼界,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几乎无须论述。

“世界又是很大。北半球的秋天正是南半球的春天。北京的正午恰是美国的子夜。你讲这种语言,他讲那种语言。你的钱他不用。你的法律管不到那里。在这个国家和地区不方便说的话,到了另一个国家和地区却变成了老生常谈。在这里觉得很重大很严肃乃至很惊心动魄的事情,到了他那里只不过是笑谈。世界并不是只你一家,正如不是仅你一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免得坐井观天、鼠目寸光、自吹自擂、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再进一步就会是自欺欺人、抱残守缺、痴人说梦、倒行逆施,一会儿盲目崇洋,一会儿又是盲目排外……反正中国这方面的成语多得是,而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大概比成语更多。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才能进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从中有所获得有所长进。”^②

1879年,孙中山在其兄孙眉的资助下,离家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二) 开阔思路

王蒙在谈到旅游时说:“这是一种机会,你可以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夸张一点说,你离开一下你自己——自己的思维定势、情绪定势和知识局限,你得到一种参考,你见识一下世界,你开阔一下心胸,

①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② 同上书,第157-158页。

你得到一些平素没有得到的乃至不会得到知识和体验，你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思忖一些问题。”^① 旅游能够开阔眼界，开阔眼界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会使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不知不觉的转变、提升。

1. 对比、比较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几乎是多次旅游之后的自然收获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判断。对比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它是人们认识和鉴别事物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是人们的一种重要思想能力。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过：“到中国来使我更加了解我自己的国家，甚至更加了解到了我自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只有在与别的国家和别的国家的人的比较中，才能更清楚地显示出特点和弱点、优势和劣势。

中国当代女作家铁凝也说过：“我在国外最大的收获，是陌生的土地给了我一种新的视角远看我的民族和我的祖国。再也没有比这种时刻更让我如此强烈地想要弄懂我们自己那常常被不恰当地褒扬或者不恰当地贬抑的文化，想要挖掘独属于我们这神秘民族的一切宝藏，想要知道我是谁。”^②

只要有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游览经历，这些经历本身就会教会你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对比。这甚至比专门的对比思维方式的教学训练更为直接和有效。因而，对比的思维方式会在游历广的人脑中扎根，成为旅行、旅游对人的一种宝贵馈赠。

在所有有过真正的旅行、旅游经历的人士留下的文字中，对比、比较的东西比比皆是。

孟德斯鸠说：“有一件事往往使我诧异不已：那就是看到这些波斯人对于我国的风俗习惯有时跟我们一样熟悉，甚至了解这些风俗习惯的微妙情况；能够注意到我敢肯定许多游历过法国的德国人都注

^① 这是王蒙为《漫游美文》写的序中的一段话。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铁凝：《我的小传》，参见《铁凝文集》第5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465页。

意不到的事物。我想是因为他们长时间生活在这里的缘故，何况亚洲人花一年时间了解法国的风俗，要比法国人花四年时间了解亚洲人的风俗更容易，因为法国人喜欢敞开心扉，倾心吐胆，而亚洲人则很少沥胆披肝，交流思想。”^① 粗粗读过就能发现，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比。

余秋雨在卢克索考察后，进入了荒无人烟的阿拉伯沙漠，直抵红海，再穿越沙漠返回开罗。他写道：

我朦胧觉得，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把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写一部文化史论时已经觉得自己在力求宏观了，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加入了学术研究所不可能有的感性整体，但到了埃及，才发现都还不够。

以前，还缺少对比。

这种对比，不是衡量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谁更伟大，而是区分它们不同的生存形态。^②

此前，余秋雨多是中华文化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此后，对比的范围扩大了，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的结果，不仅获得了书斋内难以得到的收获，而且更获得了没有大规模不同文明之间穿梭旅行考察就几乎不可能得到的深刻感悟。他在2001年11月写道：

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①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作者自序。

②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480页。

山中。”^①

正因为有了对其他古老文明的许多具体感受，对于同样是文明古国的祖国就有了此前不曾有的看法和情感：

我从尼泊尔的丛山间进入国境时产生了一个有关母亲的联想。本来，把祖国比作母亲是一种做腻了的小学生作文题目，但我在如许年龄产生这种联想，却有另一番苍凉之情。那就是，我们过去不太懂事，总是在左顾右盼之间责怪母亲的诸多不是，一会儿是她缺少风度，一会儿是她不够富裕，直到访遍她同龄人的种种悲剧，才让我从心底里默认：母亲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中华文明的同龄者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次我只看到了他们溃败的荒路、失踪的山谷、陨灭的大漠，以及早已读不懂前辈遗嘱的成批遗孤，神色紧张而慌乱。这一切，绵延不绝，全在眼前，使我产生了对中华文明的遥远认知，比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强烈得多。

余秋雨深知情感中有不公正，他又加了一个比较的坐标系，这就是很久以来直到现在还处于世界文明高地的欧洲。多种比较对象的存在，可以使比较的结果更加公允和科学。而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寻找多种感性参照系的比较，只有极少数游历极广、视野非常开阔的学者才能做得到。

这种认知带有情感，而情感总是不公正的。因此，我至少还必须投入另一次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来矫正这次的不公正。

新的实地考察，计划尚未形成，地点却已确定，那就是欧洲。这是一个能让中华文明照见自身诸多短处的地方。我的考察重点仍在古代，因为只有古代，才能将各大文明的自在形态作互相比较。

^① 余秋雨：《山居笔记》“序”，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中华文明只有在两种不同坐标的辉映下，才能显出立体而完整的形貌。^①

接着，作者在谈到欧洲之旅时说：“总括起来，我在九十六座城市间找到了三十多个对比点，其中有八个，印象特别深刻。”^②关于这些对比点，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9·11事件”之前，余秋雨较早地指出了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区的所在，在回答海内外媒体对这一问题的采访时，他说：“断言什么地方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只要放下那些自欺欺人的所谓学术概念，睁大自己的眼睛去看，都会得出近似的结论。我自己更珍视的考察成果，是从对比中获得了中华文明的重新认知。”^③这种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知包括下面一个内容：

在国内时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因习以为常而变得熟视无睹。在欧美旅行时更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弊病，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前辈学人因感受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交战中的一再败落而考察西方强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对中华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态度。

现在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因历史悠久而自我原谅或自我夸耀，但与另一些古老文明比一比，总还是自我认识的重要方法。只可惜我们的前辈学人，到这一带来得太少了。

这一路，我已对同伴们多次说过，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补了一门中华文化的课程，课程的有些内容，还很触动感情。

这种情景可以借着一个图像来说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头，晃荡着一些“神牛”，这些牛不干任何事情，却可以随意去吃一切它们想吃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在店铺，在摊上，还是在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页。

② 同上书，第518页。

③ 余秋雨：《千年·叹》“再版说明”，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路人的篮子里。它们走在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车辆，谁也不敢驱赶，只能跟在它们后面。极度的特权造成它们极度的随意，一派神定气闲，完全不理睬这个世界，连眼神也是绝对的不负责任。

对我来说，只有看多了这样的牛，才反过来真正认识了从小就看惯的中国牛，才知道中国牛的眼神里饱含着多少辛劳、服从和温驯。这也就是说，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补上了从小误读的那一课。

同样的道理，我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的祖先。

我们从西亚、中亚、南亚一路过来，除了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农田的耕作情况无法与中国农村相比，要么大片抛荒，要么粗种粗收，也很少见到有人在劳动。^①

在余秋雨之前，王礼锡在《印度一角》中也记述了印度的牛，可相互参照：“街头看见一个人牵着一头牛慢慢地踱着，手上拿着一大把青草。行人有祈福的，就以一文钱买一莖青草给牛吃。有一个小学生走过牛身边，把手摸摸牛，又拍拍自己的身上，大概这也是一种祈福的仪式。”^②

关于余秋雨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的其他内容，笔者将在本书后边的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思想内容中详述，请读者互相参阅。

游历考察过许许多多地方之后，可供对比的资料就太多了，对比就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和行文方式。比如，《行者无疆》中的《木石是非》通篇都是对比，是欧洲和中国建筑的对比。文中写道，最强烈的对比是年代，另一个对比是色彩，还有一个对比是情调。

年代的对比之所以强烈，是因为欧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筑，比如巴特农神殿已经 2400 多年了，罗马的万神殿至少也有 2000 年了，而号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年代上却无法与它们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2—495 页。

② 王礼锡：《印度一角》，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13 页。

相比。中国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多不能解释它，因为欧洲在这方面并不亚于中国甚至超过中国。

其间一个区别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攻击对象整个儿毁坏，非烧即拆，斩草除根，不让它阴魂盘绕，死灰复燃；欧洲则不然，更在乎所有权的转移，即更在乎占领和抢掠。

这是有原因的。欧洲文化本有一种超越政局更迭的稳定性，宗教的力量、贵族的存在又使无数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审美图像和生态图像；而中国较为像样的生态，总是被看成是权力结构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与权力结构共存亡。^①

读者可能觉得这种比较分析已经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深层，但作者没有停留于此，他认为这种思路还有片面性。还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建筑以木材为构架，欧洲建筑以石材为上选，这是从建筑材料上说的；二是欧洲追求宗教意义上的永恒，而中国则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视野开阔的人，所作的不仅是自己国家与别的国家之间的对比，也包括自己国家以外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梁启超从巴黎到凡尔登，走的是笔直的大路，他有感而发：

我们拿英国路政来比较，确是有点不同。英国的道路，不用说也十分修洁，但他总是因山林川泽的形势，而且绕避田园庐墓，所以不免弯回曲折；法国的道路，是仿古代罗马人样子，都画出纵横直线。此事虽小，却很可以表出两国国民的特性：英国人百事都是历史上自然发达，有一种环境起，便做出一种事实来和他顺应，好像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法国人不然，百事都悬出一个理想，拿理想做标准来规立计划，依着计划演成事实。我们试从政治上艺术上种种方面观察，到处

^①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可以看出两国根本精神不同之点，路政亦其一端了。这两种精神，各有好处，别国入学步，怕还是学法国稳当些哩。^①

2. 眼界开阔、思路开阔之后就有可能反思自身

中国作家阿来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以使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②

关于反思，本书前面在底色文化回应与反思中有过专门论述，请参阅。

（三）改变尘世观念，换一个视角看人世

旅游多了，见识广了，会从许多历史遗迹中把尘世看得更透，不少人会由此改变自己的人世观念。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写的《西敏大寺》是他在伦敦游览著名的葬有英国众多名人的西敏教堂时所发的感慨：

我努力地回想在自己的头脑中再重新勾画出我所深思冥想过的一切，却发现它们已变得模糊不清，毫无头绪了。在我的记忆中，一切姓名、碑文、纪念物都互相混淆起来，而这时我才只不过刚刚踏出大寺的门槛。我不禁想到，这座埋葬了如此之多名人的大寺不只是一座警世的宝藏，一部反复述说着名声的虚空的伟

^① 梁启超：《凡尔登》，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② 阿来：《大地的语言》（散文），《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大著作，告诫人们一切最终都将被遗忘。这里更是死神的帝国，在那幽暗的皇宫里，死神正堂皇端坐，嘲笑着人类一切荣光的遗骸，并在王公贵族的纪念碑上洒满尘土，让世人将他们遗忘。“英名不朽”这句大话是多么空虚呀！岁月总是沉默地翻动它的书页，而我们却过分地沉浸于眼前发生的故事，无暇顾及过去曾轰动一时的人物和事迹；每一个时代都是一卷历史，被丢弃一边并渐渐遗忘。……那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眼前这座巍然耸立的大寺难保不遭到与那些更加宏伟的寺庙相同的命运呢？总有一天，这些镀金的、高耸的拱顶将变成踩在脚下的垃圾，那时回荡在这四周的将不是乐曲与赞美之辞，而是风声凄厉地回旋在残垣断壁之间，与倾斜的塔楼上的枭鸣相呼应——而耀眼的阳光穿过这些昏暗的墓堂，常春藤也爬满在倾倒的圆柱上，毛地黄将它的花垂在那无名的坟上，仿佛在嘲笑着死者。人就是这样消逝了；他的名字被逐渐从记录与回忆中抹去；他的一生也化为传说中的故事，而他的纪念碑也慢慢变成一堆废墟。^①

正像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所言：“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

（四）旅行、旅游是许多学者成才的关键推动力或重要条件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时指出：“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② 这些著名人物之所以放射出光芒，与他们的长途旅行有重要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是这样，别的时期也是这样。

1. 多次远行考察是司马迁能够写成《史记》的重要条件

我们来看余秋雨概括的司马迁的行踪：

^①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7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446页。

司马迁 20 岁开始漫游，实在是几乎走遍了当时能够抵达的一切地方。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23—24 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25 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26 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河北卢龙、内蒙古五原。27 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

28 岁，他升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①

司马迁大约在 46 岁那年完成了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2. 远航旅行考察是达尔文发现进化论的关键环节

达尔文能够发现进化论与他的长途旅行有密切关系。我们还是看他本人怎么说：“（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

^① 余秋雨：《历史的母本》，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0—113 页。

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须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不过在航行以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了。”^①达尔文还写道：“可是，上述的各种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同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相比时，就显得不重要了；这种习惯就是：勤奋的劳动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注意。凡是我思考过的或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运用脑力的工作方法的习惯，在整个五年的环球旅行期内一直继续着。我确信，正就是有了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绩来。”^②

他对旅行过的地方记忆犹新：“直到现在，热带地区的植物界的壮丽景象，依旧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曾经骑马或者乘坐小船，穿经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感兴趣的；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③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写道：“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④

① [英] 达尔文：《达尔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4 页。

② 同上书，第 45 页。

③ 同上书，第 46—47 页。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7 页。

二 国外旅游不可避免地会提供另外一个社会参照系

某一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是从有了另外一个社会参照系开始的,或者说是从打破这个社会的封闭系统开始的。而旅游,尤其是国外旅游不可避免地会提供另外一个社会参照系。王蒙说:“世界各国是互为参照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游览——哪怕仅仅是游览——都是极好的启迪,又是极好的超脱和消释。有一些关上门百思不得其解、令人头痛欲裂、只觉得爆炸在即的问题,拿到另一个参考系统的范围一看,实在是小菜一碟而已。”^①

法国青年托克维尔旅美的初衷也是希望客观地描述美国的民主,将其所见所闻忠实地报道出来,他在美国收集了大量资料,向权威人士请教,访问了广大地区,也正是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首次使用了访问法。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许多对美国民主制度、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精彩论述。“我在美国逗留期间见到很多新鲜事物,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身份平等。这是一件大事,它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法律以特定的方向和方针,它让执政者拥有了新的政治箴言,让人民养成了特有的习惯。”“回头来看我们的半球,身份平等虽然在社会上还没有获得像在美国那样的地位,但却正在接近它。而且,民主在支配美国社会之后,好像也开始在欧洲得势。”^②

中国近代人黎庶昌曾作为参赞出使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并游历瑞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制,这是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政体。他虽然没有着重考察外国政治,但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都曾应邀去议院旁听,也一一留下了记载。“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在《与李勉林观察书》中,

^①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他说自己到伦敦月余，“往观会堂者一，往与公朝者二。默察该国君臣之间，礼貌未尝不尊，分际未尝不严。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他认为民政之国比起君主之国来是一种进步。《西洋游记》第二篇介绍瑞士的民主制云：瑞士“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①。

这是当代中国人刘瑜对美国的感受：“就像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可能会对电视、汽车、电梯、男人打领带却不穿裙子、女人穿裙子却不打领带感到奇异一样，来自中国的我，会对发生在美国政治、社会中的诸多现象感到奇异。”

我对美国的电视节目天天在骂总统感到奇异、对美国的前司法部长跑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感到奇异、对一些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农感到奇异、对大学生为了一个万里之外叫做苏丹的国家给本州的政治家建立打分制度感到奇异、对美国人至今还在谴责 30 多年前的“窃听总统”尼克松感到奇异、对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了感到奇异……总之，对一切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见过的现象感到奇异。^②

发达国家的有些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以后会遇到。王蒙说：“有一位新从国内到美国去的朋友，他告诉我美国给他的最初的两个难忘的印象：一是城市大街上常常看见狗屎，二是如果汽车和行人相会于一个城市的交叉口，汽车总是谦让行人，请行人先走。”“诚然，这两个现象同样也引起过笔者的惊奇和注意。在纽约，笔者住在鲁布克林区。第一夜安睡一晚，清晨起床后就出去散步，还来不及欣赏这个大城市的市郊犹太居民区的风光，只觉脚底滑了一下，一低

^① 参见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391—393 页。

^② 刘瑜：《民主的细节》，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20122_82377.html。

头，糟糕，一只新皮鞋上已经踩满了狗屎。”^①现在，中国许多城市中养狗成风，散步时踩到狗屎已经司空见惯。

三 对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对促进世界和平有独特贡献

（一）旅游有意无意间承担起促进国际间了解、和解，促进世界和平的重任

旅游通过文化交流得以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理解和欣赏，对异域的人群抱有一种平等与宽容的态度，从而可能避免许多文化上的冲突。旅游提供的机会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成为可能。了解的最好途径是直接接触。“面对面的观察和思想交流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②

毫无疑问，旅游以多种方式改变了世界，而对许多文化而言，旅游者是世界各地生活情形的活化身。面对面的交流比通过图像或文字更加清晰有力。旅游改变了英国人的“贵族老爷”形象；随着更多阶层的英国人参与到旅行中来，他们对非洲人和远东人的印象也大有改变。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日益增长的青年旅行者们……这些青年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并不盲从，也没有从上代人那里继承下什么偏见，他们更易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把一些观念带出境外。^③

哥尔多尼说过：“绝不离开自己祖国的人充满了偏见。”这句话虽然有些绝对，但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对国外情况不了解，尤其是没有

①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② 艾德蒙德·斯温格尔赫斯特：《面对面：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今昔谈》，参见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亲身接触到域外风土人情的人，真的很难不人云亦云，很难不带有偏见。

费孝通也指出：“在一种传统里长大的人不容易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同的活法。自己是这样，别人也不能不是这样。”^①也就是说，从来不到异质文化、到国外去旅游的人，容易产生自己的活法就是所有人的活法一类的偏见，不容易有宽容对待不同活法的心态。有广泛旅游和阅历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与自己民族和文化不同的人，他们活得也不错，甚至比自己还好，有了这样的眼界就容易有宽容的心态。正像一句英语谚语所说，“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Live and let live.）

现代旅游学研究者指出：

从大处来讲，当今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促进和平与理解的巨大力量。旅游活动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民间交往活动。它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经历着对异域文化从陌生到了解再到欣赏的心理变化的过程，从而不断深化认识，增加相互了解，增强亲近感，客观上拉近了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民族和人民之间的距离。旅游能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相互联系与交流的桥梁。社会学家认为，旅游是社会紧张与冲突的缓解因素，具有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润滑”作用。一些对立国家或地区关系的改善往往首先是以旅游为媒介的。^②

国家间政治外交谈判办不到的事，旅游可能无意间就办到了。旅游已成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解的有效方式与途径之一。

其实，一些有见识的知名人士已经较早地看到了旅游的这种独特社会作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旅游是一切仇恨、狭隘、种族主义以及阻碍好学的敌人。”印度的“圣雄”甘地说：我看到天南海北的文化飘绕过我的庭院，清风吹来了和平的种子，因为旅行是和平

① 费孝通：《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②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旅游有意无意间承担起促进国际间了解、理解、和解、宽容,促进世界和平的重任。

(二) 重复率最高的“世界旅游日”主题口号

世界旅游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从1979年起将每年9月27日定为“世界旅游日”,自1980年起,每年提出一个旅游日主题口号。到目前为止,旅游为促进国际了解、理解、谅解、宽容和世界和平、团结服务与贡献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号。这些口号更容易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接受,其共识程度更高。

1980年,旅游为保存文化遗产、为和平及相互了解作贡献。(Tourism's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peac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1984年,旅游为国际谅解、和平与合作服务。(Tourism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peace and cooperation.)

1985年,开展青年旅游——文化和历史遗产为和平与友谊服务。(Youth tourism: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1986年,旅游——世界和平的促进力量。(Tourism: a vital force for world peace.)

1989年,旅游者自由往来,创造团结的世界。(The free movement of tourists creates one world.)

1992年,旅游是促进社会经济一体化和增进各国人民了解的途径。(Tourism: a factor of grow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olidarity and of encounter between people.)

1996年,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Tourism: a factor of tolerance and peace.)

2001年,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工具。(Tourism: instrument at the service of peace and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从这些口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旅游在增进国际间了

解、理解、谅解、宽容，在促进世界和平、团结中的重要作用的重视和期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旅游具有交流和传播功能。

四 对缓解、治疗人类身心疾患的独特效果

（一）旅游是调节身心、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认为，旅游是调节身心、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没有任何医疗机构能代替旅游达到缓解、治疗人类身心疾患的效果。在各种旅游类型中，有一种类型叫保健旅游。安徒生说过：“旅行对我来说，是恢复青春活力的源泉。”苏联学者克里伐雪耶夫 1981 年在《劳动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旅游能起到防止疾病的作用。研究表明，经常进行积极休息，能降低所谓“时代病”发病率的 20%—50%。这就是旅游在人民的保健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①

旅游中的园艺体验活动可以刺激感官，增加肌肉协调，减少疼痛，帮助病情好转，恢复注意力，增加正面情绪等。

旅游独特的健康价值主要体现在到大自然中去旅游的过程中。布克哈特在谈到意大利建筑家、音乐家、画家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特（Leon Battista Alberti）时说，“当他有病时，不止一次因为看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色而豁然痊愈”^②。徐志摩说：“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③尤其是“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

^① 参见孙文昌、郭伟《现代旅游学》，青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8—159 页。

^②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34 页。

^③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 页。

单就呼吸单就走路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①。

到大自然中旅游，换了整个环境。这是一次野营的记录：“但见也有披着头发的，也有穿着革皮短衣的，大家围着一堆红火，在那漆黑的树林下面唱歌谈笑，和湖波震荡的声，互相答应。远远的还有一种名 Loon 的水鸟，在无人居住的岛上，不住的啼叫，声音十分阴惨。我看着听着，差不多忘记自己是二十世纪的人了！”^② 环境换了，思想情绪也会跟着变换。要想忘掉痛苦的思绪，最好是暂时离开那些能够引发伤心回忆的联系或事物。

由于几乎离开了尘世社会，所以人世的烦恼就抛却脑后了。著名的比特拉克年轻时经常把《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带在身边，并且对其第 10 章的一段难移目光：“人们到外边，欣赏高山、大海、汹涌的河流和广阔的重洋，以及日月星辰的运行，这时他们会忘掉了自己。”^③

这是陈衡哲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鹿湖的感受：

因为鹿湖的纬度很高，所以暮色很久，有时终夜不灭。湖上和天上，都有一种半明不灭的浮光。若把颜色来代表它，要算灰色最近了。我平常以为灰色是极可厌的，直到得了这个经历，才觉得它真是一种极静雅，极高尚的颜色。这样的颜色，夹著那湖水轻轻打岸的声音，便造成了一个精神界的“乌托邦”；凡是属于世俗的思想，到了那里，便立刻被逐出来了！^④

到大自然中去是全方位、全感官的体验，是任何其他体验都不能比拟的。

①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 页。

② 陈衡哲：《加拿大露营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8 页。

③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96 页。

④ 陈衡哲：《加拿大露营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8 页。

（二）某些旅游地有某种独特的治疗效果

塞尔维亚“金松岭”兹拉蒂博尔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松树林“氧吧”。据报道，经医学考证，“金松岭”的松树散发出来的松香气味对血液病和肺病有神奇的辅助治疗作用。一位出生在西班牙的塞裔青年患了血液病，久治未愈，后来医生建议他到兹拉蒂博尔疗养。这位青年回到故乡，住到“金松岭”，一年后血液病痊愈。这样的事例很多，所以每年慕名而来的欧洲及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①

（三）世界上长寿的地方多成为旅游地

世界五个长寿之乡是：外高加索地区（指高加索山脉以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所在地区），巴基斯坦的罕萨，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中国的新疆和田、阿克苏地区，中国的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许多人到这些长寿之乡旅游，甚至居住。

^① 参见威德刚《塞尔维亚“金松岭”的魅力》，《光明日报》2010年5月8日，第6版。

第三章

旅游传播本源——旅游 目的地与传播(一)

追根寻源，旅游传播的本源是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的核心或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旅游吸引物（tourist attraction），它是刺激旅游的主要动力。正是旅游目的地吸引着人们蜂拥而至，将景观自身的各种信息传向四面八方。

由于对旅游传播本源或旅游资源认识上的不到位，不少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流的旅游资源，二流的旅游开发，三流的旅游产品。旅游传播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本章是旅游目的地与传播的概论，包括旅游传播本源的特征、保护旅游传播本源的原真性、旅游传播本源的前台与后台、旅游地形象及其传播、旅游环境与旅游传播、旅游传播本源的传播策略等内容。

第一节 旅游传播本源的特征—— 知名度高、传播力强

一 真正的旅游目的地都具有知名度高、传播力强的特征

旅游传播本源就是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一般泛指在旅游过程中游客所感兴趣的各种事物。

最典型的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首推世界八大奇迹，它们分别是埃及的金字塔、亚历山大港灯塔、爱琴海太阳神像、奥林匹亚宙斯神像、阿尔特米斯月神庙、摩索拉斯陵墓、巴比伦空中花园和秦始皇兵马俑。

“世界遗产”也是典型的旅游资源或旅游传播本源。“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及自然遗产，它集中了地球上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活的历史博物馆。

到2010年为止，中国共有40项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8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

文化遗产有：1. 庐山，2. 故宫，3. 颐和园，4. 长城，5. 天坛，6. 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7. 平遥古城，8.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9. 丽江古城，10. 苏州古典园林，11. 秦始皇陵，12. 大足石刻，13. 武当山古建筑群，14. 莫高窟，15. 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16. 龙门石窟，17. 孔庙、孔府、孔林，18. 明清皇陵，19. 青城山与都江堰，20.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21. 云冈石窟，22. 澳门历史城区，23. 殷墟，24.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墓葬，25. 福建土楼，26. 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27. 五台山，28.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自然遗产有：1.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2. 黄龙风景名胜区，3.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4.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5. 三江并流，6. 中国南方喀斯特，7. 三清山，8. 中国丹霞。

文化与自然遗产有：1. 泰山，2. 黄山，3.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4. 武夷山。

另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1. 昆曲，2. 古琴，3.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4. 蒙古族长调民歌。

世界知名的旅游地很多，比如西班牙被称为“旅游王国”，瑞士被称为“世界公园”。

以上所述仅是旅游资源中最有代表性的，其他没有列举出来的还很多。所有真正的旅游目的地都具有知名度高、传播力强的特征。泰山比其所在地泰安知名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许多人知道泰山而不知

道泰安，因而，京沪线上的泰安站后来改成了泰山站。

二 争夺旅游资源也是争夺旅游传播源

旅游需要资源，旅游的兴盛可能引起对资源的争夺。自然景观有固定位置，不好争夺，而古代传说或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历史记载的历史文化资源就成为争夺的对象。

在中国境内比较有名的有争议的旅游资源如下：湖北、河北、甘肃、山西、河南等地的女娲故里之争，陕西、河南、甘肃等地的伏羲故里之争，陕西、河南等地的黄帝故里之争，陕西、湖南、山西等地的炎帝故里之争，山西、山东、河南、湖南等地的舜帝故里之争，四川、河南、青海等地大禹故里之争，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地的姜尚故里之争，江苏、四川等地的彭祖故里之争，河南鹿邑、安徽涡阳等地的老子故里之争，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庄子故里之争，广饶、惠民等地的孙子故里之争，诸暨、萧山等地的西施故里之争，山东滕州、河南鲁山等地的墨子故里之争，湖北、河南等地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河南、安徽等地的曹操、华佗故里之争，正定、临城等地的赵云故里之争，宁夏、甘肃等地的皇甫谧故里之争，常州、镇江等地的南朝齐梁萧氏故里之争，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的花木兰故里之争，四川、湖北等地的李白故里之争，江苏、安徽等地的朱元璋“出生地”之争，辽宁、河北、江西等地的曹雪芹出生地之争，梁山伯与祝英台故里也有不少地方在争。

甚至山东临清和阳谷在争抢西门庆。有人调侃说：“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处显灵。”从旅游开发角度看，这是在争旅游资源；从旅游传播角度看，这是在争旅游传播本源。

第二节 保护旅游传播本源的原真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一再强调保护优先于旅游

(conservation precedes tourist) 和寻找平衡 (finding a balance) 是遗产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

目前中国对文物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指导思想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对风景名胜的方针是“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可见,对于旅游资源或旅游传播源都是把保护放在了第一位,因为一旦破坏就不可再生。

一 古迹、环境的原真性

(一) 原真的重要性

原真的古迹及其所在的环境,是最宝贵的旅游资源,也是最佳的旅游传播本源。

滇西松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体验“二战”战场的热点旅游地,电视剧《滇西1944》的热播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作战地图,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战场原貌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至于20多年前单独考察此战地的戈叔亚爬到山顶时,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①这个条件不可缺少,如果来到这里已经找不到当年战场的痕迹,就不会有人来了。比如,“官渡之战”这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战役,人们到了河南中牟官渡桥村一带时,除了一块标志牌外,别的东西都很难寻觅,就很难成为旅游地。河南新郑县周淑君女士,1925年由新郑女子小学校长调任中牟县女子小学校长时,凭吊古战场作《官渡桥》诗曰:“也无官渡也无桥,化作烟村柳万条。若问其名还似昨,空存三字到今朝。”

有的文化遗产,原真的文物可能只剩下一丁点,但就是这一丁点文物才能支撑起一大片历史文化遗产或旅游地,别的东西都是陪衬

^① 林天宏:《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31日,第12版。

物。“巴比伦古城除了这段路面，再加上前面的一条刻有动物图像的通道，一座破损的雄狮雕塑以及几处屋基塔基，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亚述人占领时是放幼发拉底河的水把整个城市淹没的，以后一次次的战争，都以对巴比伦的彻底破坏，作为一个句号。结果，真正留下的只有一条路，搬不走、烧不毁、淹不倒，失败者由此逃奔，胜利者由此进入。这老年的沥青，成了巴比伦文明唯一可靠的见证。”^① 这老年的沥青既是巴比伦文明唯一可靠的见证，也是巴比伦文明传递出最真确信息的信源，更是这里能够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有人寻访当年陈胜、吴广起义的旧址，当被告知“这是实实在在的起义原址，我们世代住在这里，一代代传下来，证明没错”。访者写道：“这就够了，绝对不虚此行。”“最有价值的是：这是真的，真的就在这里发生过，而不是伪造的；如属后者，纵是亭台楼阁又有几许价值？”^② 像此类旧址，很难吸引大批游客，但额外的开发与真正的历史价值相去甚远。这样的遗址只能吸引数量不多的有质量的游客。



图 3-1 太昊陵前已干枯的古树依然有文物价值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5 页。

② 石英：《寂寞：大泽乡的土台》，《北方文学》2005 年第 11 期。

文物环境也是文物原真性的一部分。现存的太昊陵，真正原真的文物并不多。但太昊陵区现存古柏 108 株，古槐 2 株，古檀 3 株。尽管有些古树已经枯死（见图 3-1），但它们依然有文物价值，无疑这些古树是太昊陵的重要证物，也是太昊陵的必要环境。封丘县陈桥驿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处，真正与发生在公元 960 年“陈桥兵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实物只有已经枯死的“系马槐”（见图 3-2）。



图 3-2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处的“系马槐”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9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正式开工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其核心内容是

“虚拟莫高窟”。此工程很快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人们将看到一个并不真实的莫高窟,甚至有人称之为“假莫高窟”。

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有“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锦绣中华”以中国浓缩景观为主,“一步迈进历史,一日畅游中国”。“中华民俗文化村”主题是“24个村寨,56种风情”。“世界之窗”主题是“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这些仿制的景观和民俗风情并不能与原真的景观和民俗风情相提并论。

(二) 保护古迹、环境的原真性

1. 首先是认识问题

保护古迹、环境的原真性,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作家李贯通的小说《天缺一角》描写了这样一件事,某县本来是把极其有限的资金用来建亭保护汉画像石碑和古井的,但新建的亭子保护的却是郭书记书写的新碑。李书记指责施工的民工没文化,连哪个是好碑都认不出来。

一个工人说,我们当然没有你们的文化大,可是叫你说哪个好碑?井上的那块,又旧又有残,在农村也就是个垒猪圈的料;这一块碑又新又好看,是县委、县政府立的,还刻着市里郭书记的大名,我们这些老百姓就看着这块碑好!打个比方,一床旧被子,一床新被子,你说保护哪一床?^①

看来,在普通民众中普及这样的理念很有必要:原真的古迹及其所在的环境,是最宝贵的旅游资源,也是最佳的旅游传播本源。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该保护的得不到保护,不该保护的反而却得到了保护。

主要由于对文物古迹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以及城市建设的理念偏差问题,20世纪50年代,总长46公里的明清城墙还环抱着北京;现在,人们只能从仅剩的三楼两段即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以及位于西便门和北京站东街的两段城墙上寻找昔日的旧

^① 李贯通:《天缺一角》,《大家》1996年第1期。

迹了。

2. 保护原真种种

为了保护文物的原真，佛罗伦萨“但丁故居”几个字都不敢凿在墙上，只挂一幅布幔，因为凿了就不再是当日的原貌。

在奥地利，政府经常出卖一些房子，甚至1先令就可以买到一座古堡，并且包括室内的全部东西。比如，买下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列支敦士登大公的情妇居所和白送差不多，可是装修的条件严格异常：不准破坏原貌，不准翻新，不准改造，只能加固和保养。这样一来，装修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奥地利政府的目的是把古堡交给珍惜它的人。

秦兵马俑一号坑经历了局部发掘后，已经暴露出来的陶俑等受到阳光、灰尘、湿度等因素的影响，状况堪忧。专家表示：“对秦陵的最好保护是不动它。”即使技术更加成熟，兵马俑也不会全部发掘并修复陈列出来，大部分兵马俑仍然会深埋土中，这符合文物保护的“最少干预”原则，即如果在目前状态下它不会立即毁坏掉的话，人们应尽量少干预。^①

曹操高陵（是否为曹陵目前仍有争议）的发掘引起普遍关注，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国家早就确定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考古工作方针，也不主张对名人古墓主动发掘和开发利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文化古迹的原真性。有些名人古墓因为建设工程的影响或遭盗掘破坏，国家文物部门采取了抢救性保护考古发掘。

有些文物在特定时期，只有掩盖其本身的真实信息，才能保存下来。徐州户部山古建筑群中有一院落中的“盘龙石柱”是明代以前的艺术珍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台上居民为了防止古老的石雕艺术遭到破坏，和泥涂抹，才使得古老的石柱经过十年浩劫仍保存完好（见图3-3）。正是当年掩盖了文物的真实信息，今天才仍能看到它的真实信息。

^① 参见乐梦融《专家称：“对秦陵的最好保护是不动它”》，《新民晚报》2009年6月24日。



图 3-3 和泥涂抹保护下来的徐州户部山一院落中的“盘龙石柱”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

不恰当的开发会破坏文物，封闭、发展慢有时可能倒有助于某些文物的保存。历史上鄂、豫、陕交界处的紫荆关曾经很繁华。由于丹江上达陕南商洛通西安，下到湖北入汉江，这里的商埠文化起于明代、盛于清代。到了近代，首先是战争使商贸萧条，接着公路、铁路代替了河运，昔日繁华的码头被冷落了，外乡商人离去，本地居民复归农耕，紫荆关明清古迹得以保存至今。

3. 是“延年益寿”还是“返老还童”

对于文物应尽可能使其“延年益寿”而少搞或不搞“返老还童”。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重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下，搞“返老还童”。由于修缮而破坏了文物原真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李健吾在游览罗马女圣蒲登齐娅娜（Pudenziana）小教堂时写道：“正殿的砌画原本是四世纪的，可惜叫后人重修了一下，毁掉艺术的

价值。”^①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也不绝对排斥必要的修缮，然而原则是不能伤及原真。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坏。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個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

^① 李健吾：《罗马简游》，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30页。

只是今日的游戏。^①

大段引用余秋雨关于废墟和废墟的修缮及重建，是因为他讲得好。他既尊重了原真性，又考虑到现代人某些需要，是辩证的，而原真是第一位的。

记得很多年前听说北京圆明园要复原，急忙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废墟之美，该文后来还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人听我的呼吁。我并不是反对一切古迹复原，譬如某些名人故居，以及名声很大而文物价值却不高的亭台楼阁，复原修建是可以的，而对那些打上了强烈的历史沧桑感的遗迹，万不可铲平了遗址重新建造，甚至连“整旧如新”也不可以。人们要叩拜的是历尽艰辛、满脸皱纹的老祖母，“整旧如新”等于为老祖母植皮化妆，而铲平了重建则等于找了个略似祖母年轻时代的农村女孩，当做老祖母在供奉。^②

这种见解有了越来越多的知音，比如，《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充分尊重并保存文物建筑原有历史信息 苏州留园曲溪楼将迎来首次大修》^③的报道称，当地将充分尊重并保存文物建筑原有结构、用材、花饰及色泽等历史信息，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色彩、原形式”的原则对苏州留园曲溪楼进行大修。

4. “真古董”不如“假古董”

向经济利益妥协是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旅游开发规划经历了从资源导向观到市场导向观的转化。然而旅游规划应遵循“资源—市场—文化”的三元导向原则，而不应是“市场”一元导向的原则或“资源—市场”二元导向的原则。但现实往往是一元导向或二元导向占上风。同济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痛心地说：

① 余秋雨：《废墟》，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225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③ 光明日报记者苏雁：《充分尊重并保存文物建筑原有历史信息 苏州留园曲溪楼将迎来首次大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3日，第2版。

近些年，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全面的、根本的破坏（包括旅游开发、房地产等各种经济开发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文革”时期。“文革”只是破坏了一些器物，而近些年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根本性的（如古城、古镇、古寺、名人故居等）。^①

在南京明城墙水西门遗址上新建赏心亭和孙楚酒楼也会破坏遗址本身。根据古籍记载，南京过去确实有赏心亭和孙楚酒楼，但是具体位置和建筑细节都不清楚。这两座新建筑用的是现代材料、现代工艺，最多算是仿古建筑，新建地基不可避免会破坏地下的遗址。遗址首要的是保护，不能让现代建筑侵入遗址的范围。

然而，许多真正的文物却日渐被冷落或破坏，安徽省级重点保护单位寿县千年孔庙被荒废；武汉最大抗战碉堡被拆除为立交桥让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变身夜总会。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说：

中国目前在城市遗产的保护上存在“真古董”不如“假古董”的误区。一方面，我们在不停地拆除城市里仅剩的“真遗产”；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惜斥巨资修建“假古董”，这些都是经济利益驱动，是一种文化短视。

来南京旅游的台湾人陈欣中说：“我们到大陆来旅游，就是要来看真正的古迹，真正的历史，可是我发现，许多真正古老的东西在消失，令人痛心，要知道，真的文物一旦被破坏就无法修复了。”

《南京城市史》的作者薛冰说：“现在一提到弘扬地方文化和历史特色，想到的就是仿古和复建，有关部门热衷于打造历史景观，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违背了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的核心精神——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他认为，真正的文化遗产并不能“打造”，最需要做的，不是用现代的技术来仿古，而是把珍贵遗产保护

^①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好,呈现出其本来的面目,避免它们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似是而非。^①

天灾人祸也会破坏文物的原真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2004—2008年,全国文物古建筑共发生火灾202起,湖北武当山遇真宫、贵州铜仁大江坪川主宫、云南丽江古城区明清建筑群龙神祠、福州鼓楼后街三坊七巷等文物古建筑被大火烧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②

二 艺术品也推崇原创真品

即使是艺术品,人们也青睐原创真品。原创真品传递出的原真信息与复制品、仿制品是很不相同的。高等级的展览会和旅游地无不追求展品的原真性。

2010年,历时一个月,漂洋过海、长途跋涉达8271公里,“小美人鱼”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来到了上海世博园丹麦馆。“小美人鱼”铜像塑成近一百年内,从未离开过故土,上海之行是她首次离开家乡。在世博会丹麦馆内,有一台监视器24小时将“小美人鱼”同步画面传回在哥本哈根设立的大屏幕上。

“小美人鱼”雕像的原型是童话大师安徒生《海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1909年根据这个童话改编的芭蕾舞剧《小美人鱼》在哥本哈根上演,其中扮演“小美人鱼”的芭蕾舞者的优美姿态深深打动了嘉士伯公司第二代创始人、著名艺术收藏家卡尔·雅可布森。他请丹麦雕塑家爱德华·埃里克森于1912年创作了这一青铜雕像,并在1913年将其捐赠给哥本哈根市,安放于长堤公园。后来,“小美人鱼”成为丹麦最著名的观光景点,成为哥本哈根的象征。

除了“小美人鱼”外,观众不难发现,进入世博会各展馆的众多展品,凡是高水平的展馆,只要有可能,都是真品而非仿制品。展品

^① 顾烨、傅双琪:《文化遗产保护面对误区:假古董还是“真文物”》,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3-23/2186105.shtml>。

^② 李韵:《让占有者搬迁腾退是根本之道——从北京拈花寺着火引发的思考》,《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5日,第5版。

的原真显示着博览会的权威和高规格，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博览会才引得全球各地的参观者蜂拥而来。

在上海世博会卢森堡大公园馆门前三米高的钢柱上，一位金色少女身着战袍，微微欠身，呈献上手中的橄榄枝环。远远望去，仿佛是一位圣洁的少女守护着城堡。这就是卢森堡的国宝——“金色少女”。

为纪念“一战”中英勇作战的卢森堡战士，卢森堡艺术家克劳斯·西托（Claus Cito）于1923年创作了这个作品。它被安放在卢森堡市中心宪法广场中央的英雄纪念碑顶端，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纪念碑高达12米，所以肉眼很难看到少女像的真容。而这次在世博园的卢森堡馆，人们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这位“金色少女”（见图3-4）。



图3-4 上海世博园内卢森堡大公园馆门口的“金色少女”像
(赵建国摄于2010年6月22日)

七幅法国国家珍藏艺术品出现在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中。这七幅藏品来自法国奥赛博物馆，它们是法国画家米勒的《晚钟》，马奈的《阳台》，凡·高的《阿尔的舞厅》，赛尚的《咖啡壶边的妇女》，博纳尔的《化妆间》，高更的《餐点》（又名香蕉），以及罗丹的雕塑作品《青铜时代》。这批珍品从未同时在法国境外展出过，为了防止国宝意

外损失,法国不惜工本包租了七架飞机运送,每架只运一件。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艺术珍品。

佛祖真身舍利从尼泊尔用专机送到上海,供奉在尼泊尔馆佛塔的塔心,观众可以登上塔顶,自上而下瞻仰。

埃及馆内展出 8 件均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文物。其中最古老的一件是阿赫霍特普一世的一条金项链,距今已有 3500 多年,1859 年出土时项链串绳损坏,现已修复完好。这些文物中最精美的当属舍松契二世金面具,面具上法老的表情生动鲜活,宛若微笑,耳骨纹路清晰可辨,集中体现了 2900 年前古埃及高超的工艺水平。展出文物中体积最大的是哈索尔神柱,高 2.3 米,由一整块玄武岩雕刻而成,距今约 2500 年。

三 游客也追求原汁原味地观察、体验旅游地当地社会生活

原汁原味地观察、体验旅游地当地人的生活,也是旅游传播源原真性的一个要素。

麦克坎耐尔(MacCannell)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位游客到西班牙一个村庄旅游,由于这个地方没有经过任何修饰,此游客惊喜地说:

那是一活村庄而不是一个经过整修过的“真实”西班牙村庄,人们可以在那里容易看到 Andalusian 式的生活。^①

多数游客希望看到原生态的当地生活,而不是化妆、修饰过的当地生活。

游客希望看到当地人日常的生活方式,有的游客甚至偷窥当地人的私人生活场景(有人把它叫做“后台生活”),也有游客冒险进入当地私密生活区域。有些游客还愿意融入当地的生活。

^① 参见邹统钎、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 页。

四 自然景观的原始状态也有极高的旅游传播价值

原始森林,没有开发过的河流,人迹罕至的高山等,都具有极高的旅游探险价值,因为这里保存着原始生态,有未曾发现的自然秘密(信息),有纯自然的美。

可是,自然景观有这样一个演化和传播规律:即使最纯粹的自然景观,只要成为旅游观赏对象,迟早会被染上人文气息,而且越来越浓重。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许多人青睐纯自然景观,越是人迹罕至越是有旅游兴趣;另一方面,这些纯自然景观一旦成为旅游对象,它就开始叠加人文信息,而且越来越浓重,从而使一些喜欢纯自然景观的游人不再光顾。

中国进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名录的泰山、黄山、峨眉山和乐山、武夷山都是由纯自然景观演化而来。就是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九寨沟、黄龙、武陵源、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三江并流、中国南方喀斯特、三清山、中国丹霞,也染上了越来越浓重的人文色彩。甚至庐山干脆就被直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第三节 旅游传播本源的前台与后台

一 主动展示后台,传播“内部信息”

主动展示后台,就会给人不矫饰,原常、真实的感受。

2010年5月7日和5月14日,广州城遭受“历史性的大雨”“洗礼”,造成交通堵塞、地下车库被淹等。其实,这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只是有些城市侥幸没有碰上而已。城市大多一路表面光鲜地走来,而忽视真实的内在。它暴露出,人们多只重视前台而往往忽略后台。城市建设是这样,旅游发展更是如此。

我们不妨看一下历史。公元前7世纪,伊特拉斯坎人为罗马人修建了马克西姆下水道。这个被誉为罗马“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今天

仍在使用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成就。当众多城市在洪水面前排水系统失灵时,江西赣州却很从容,甚至“没有一辆汽车泡水”。这是由于赣州市以宋代福寿沟为代表的城市排水系统在起作用。据史料记载,在宋朝之前,赣州城也常年饱受水患。北宋熙宁年间,一个叫刘彝的官员在此任知州,规划并修建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同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其中“水窗”的设计最具科技含量,形成消长自然闭合的干道系统。至今,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如今,刘彝的雕像坐落在赣州城北的宋城公园,左边的石碑上刻着光绪年间勘测绘制的“福寿二沟图”。

马克西姆下水道和赣州福寿沟这样的后台建设是过硬的,它也会成为许多人旅游关注的一个点位。法国巴黎下水道是全世界唯一可供参观的城市著名景观,成为旅游的“前台”,它四壁整洁,管道畅通,没有想象中的污秽与臭气熏天。

中国城市地下排水难题,正应了龙应台的话,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①。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重视前台,忽视后台,几乎是所有旅游地的通病。如果一个旅游地不愿意让游客带走“内部信息”,那么这样的旅游地就真的是“舞台化”了,真的是“表演”了。

号称“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一出景区后门就可见到水面上的一层绿色藻类植物,旧船杂陈,电线交错,与景区前台形成强烈反差

^① 周华蕾:《广州遭遇暴雨“洗礼” 暴露城市排水系统常年积弊》,《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3期。

(见图 3-5)。



图 3-5 周庄的“后台”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

二 顾及后台，就意味着要改善整体生态

已经顾及细节，已经顾及后台，那是一种高度成熟、完美的境界。一个城市和一个旅游地，只有发展到臻于完美的地步才会表现出此种气度。我们还是引用余秋雨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意思：“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所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① 顾及前台，实际上是只顾及了游客，顾及后台，才是顾及了自己。只有既顾及了前台又顾及了后台，才是真正顾及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尤其是改善了自身的生存环境。

^①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0 页。

如果看到一个旅游地表面光鲜,后台粗糙甚至惨不忍睹,我们只能说它还处于只能顾及门面的时期,还处于简陋阶段,与完美还有很大距离。同时,可以推断,它的前台,也就是它的光鲜部分,其细节肯定经不起推敲,经不起细细审视,经不起“游客凝视”。

第四节 旅游地形象及其传播

一 本源形象与诱导形象

旅游目的地形象可以分为本原形象和诱导形象(冈恩,1973),其中,本原形象是基于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旅游资源特色而形成的,诱导形象则为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策划提供了更广泛的弹性空间。诱导形象往往是基于本原形象,在其基础上提出的,但是诱导形象同时又不囿于本原形象的禁锢,是旅游形象策划的能动性表现,往往以独到的创意以及对目标市场的心理诉求吻合度显示出来。

香港旅游协会曾根据不同地区的游客来设计香港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这种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就属于诱导形象。针对西方游客,香港定位为“神秘的东方色彩和传统的中国文化”;针对日本游客,设计了“亚洲最便捷、最健康的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针对东南亚游客,主要展示“购物天堂、美食好去处”的形象;而对于祖国大陆的游客,则尽力表现“动感香港,魅力之都”的形象,等等。

二 旅游城市形象传播

如果整个城市主体都成为旅游地,那么这样的城市就是旅游城市。

世界“四大古都”是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和中国的西安。他们理所当然也是著名旅游城市。

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是2%,1900年是13%,到2007年5月全球已有一半人口在城市居住。2008年,地球上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

现在全球范围内有 891 个遗产地址，其中 250 个左右在城市。

外滩是上海城市形象的浓缩，是上海的地标区，几乎所有的游客来上海都要到此一游。它已经成为经典，正像对艺术作品中的经典不能随便添枝加叶一样，对于这样的地方修建和改造要慎之又慎。笔者认为，新建的坐落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其外形放在整个外滩建筑群景观中，显得不协调，过于直、尖、愣。它的外形设计放在外滩中，没有为外滩增辉添彩，至少不是最佳选择。而对于外滩来说，要添加一个东西，当然需要“最佳选择”，否则就对不起历史和未来。

城市创意的核心是城市体验。这种体验包括艺术体验。

城市也应尽可能保留历史痕迹和线索。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东征时，曾途经现在的唐山地界进行休整，屯兵于今天唐山市区的大城山，李世民御赐此山为唐姓，“唐山”由此得名。试想，如果唐山改名，“天下唐人从这里走来”，就被打断了链条。在北京，“苹果园”没有园，“公主坟”找不到坟，“隆福寺”没有寺，“九棵树”找不到树。这些地点与其名称已经没有内在关系了。

有人访问英国广播公司时，主人赠送了一本伦敦画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伦敦与现时伦敦主要地标和建筑物的对比。仔细翻阅后，惊奇地发现，“过去了将近八十年，伦敦竟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英国的城市，特别是伦敦，就像一个建筑博物馆。从罗马时代一直到 21 世纪的建筑，应有尽有。”“于是，我们今天不仅能看到莎士比亚出生时的老房子，还能幸运地到莎翁恋爱时的茅草屋或小花园里走一走，还有那些近百年的红色老电话亭。”^①

三 旅游地形象传播渠道、策略

（一）游客是旅游地形象传播的最有效渠道

西班牙被称为“旅游王国”，到西班牙旅游的游客众多，旅游过西班牙的游客是西班牙旅游形象的权威传播者，西班牙作为旅游目的

^① 牛道斌：《八十年，伦敦没变化》，《羊城晚报》2010 年 8 月 9 日。

地的形象如何他们最有发言权。

一位研究西班牙历史的法国学者写道：“可以想象，1950年以来对旅游者提供的方便以及交通工具的发展，改善了法国人对西班牙的观感。每年的假期都有数十万旅游者拥挤在西班牙边界上，要去观光。1931年，观光客为20万，1951年为50万，1964年为1500万，其中法国人就有600万，即从1950年至1951年的10%增加到1963年至1964年的30%。……1978年旅游者达3900万，也就是等于西班牙的总人口。因此，我们不能说西班牙闭门谢客，禁止外国人前往。它那五边形的地貌从5个方面向全世界大大开放。人们从各方面对它加以考察、研究、拍照、摄影、采访，把它搬上舞台，拍成电影，作成乐曲，随时让摄像、照相，用钢笔做记录，用麦克风录音，好奇的专业人员或业余爱好者分头进行文学创作，看来西班牙再也没有留下什么神秘了。”（让·德科拉，2003）^① 游客越多，旅游地形象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也就越多。

（二）影响旅游地形象及其传播的其他因素

有些信息虽然不如商业广告那样能直接传播旅游地的形象，但却会间接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形象认知。例如，关于某地学术著作的信息，就很可能成为认知目的地形象的主要信息渠道（见表3-1）。

表3-1 英国赴华旅游者的信息获得渠道

信息来源	频率	%
中国驻英旅游促销机构的宣传品	71	41.6
外国旅行商的宣传品	119	70.0
导游书籍、游记书籍、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	144	84.7
以前去过中国的旅游者的介绍	77	45.3

资料来源：谢彦君、Douglas Jeffreg：《英国旅游者对中国旅游供给条件的认知水平及其分析》，《旅游调研》1994年第5期，第25—29页。

^①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其他属于中立的或与旅游无关的信息所包含的关于地点的信息类型有：(1) 新闻发生地：发现奇特景观的报道，也包括劫机与坠机等反面新闻报道；(2) 游记：如《徐霞客游记》中对古代地理景观和地点的记载，已成为今天人们间接认知该地形象的重要信息；(3) 文学作品描述地或故事发生地：如英国古典文学作品、金庸武侠小说都含有大量地点的信息；(4) 电影或电视的地点影像信息：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廊桥遗梦》等故事的发生地或拍摄地，都因此而成为旅游地或具有旅游开发价值；(5) 口头文学：神话与传说发生地可成为旅游点，其内容则构成旅游点的导游解说词；(6) 课本信息：特别是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含有大量关于地点的内容，使未来的旅游者从小就受到影响；(7) 图像信息：包括邮票、货币、烟盒、火柴盒、门票等各种消费品及其包装上所留下的地点和风景图案信息；(8) 名人的国籍与出生地的信息：如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成为伟人故居观光点；(9) 历史事件或战争的发生地：中国的古赤壁，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如柏林墙的观光意义）与纳粹集中营等；(10) 股票上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开发类和景区景区经营服务类的旅游企业不断上市，目前有张家界、泰山旅游、黄山旅游、中视股份、华侨城、峨眉山、京西旅游等7家上市公司，这些旅游上市公司不仅可为本公司的发展开辟融资渠道，同时也可极大地提高相关旅游景点和景区的知名度，传播良好的旅游形象。^①

游客们通过旅游纪念品，常常回忆和联想城市形象，有助于城市旅游形象的保持和传播。法国首都巴黎将它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制成各种旅游纪念品；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都西安以小号的兵马俑模型作为自己城市旅游形象的纪念品。

一张小小的门票也能对传播旅游地形象起作用。门票是游客入门的“通行证”，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许多景区的门票印有介绍旅游线路、旅游表演活动的时间及场次等内容，能使游客在较短的旅游时间内充分游览景区的风光，观赏景区内的表演活动，参与景区内的各

^① 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的传播策略初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90页。

种节目。设计、制作精美的门票还能给游客带来视觉冲击,唤起游客对景区优美风光的联想,激发游客的游览兴趣和热情。门票也是一件值得珍藏的旅游纪念品,是旅游者旅游经历的见证,它能够使游客长久回味、反复咀嚼那段多彩的旅游生活,成为难忘的记忆。因此,有专门收集、保存景区门票的收藏者。

(三) 旅游地形象传播的空间选择

传播旅游景点形象的最佳区位是景点的出入口和景区的外部空间,传播旅游城市形象的最佳部位是出入城市的门户和横穿市区的主干道,传播国家旅游形象的最佳地域是边境口岸城市、国际航线城市和首都。

第五节 旅游环境与旅游传播

旅游环境信息是旅游信息传播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旅游环境,既包括景区内也包括景区外。

一 欧洲和美国的旅游环境比较好

从整体上来说,欧洲有着较悠久的旅游传统,欧洲各国的旅游环境比较好。

古代希腊各城邦,特别是雅典,好客。未经介绍的陌生人也照样受到欢迎,客栈为游客提供食宿。假如来客持有朋友的介绍信,可以在家中得到食宿招待,而且一位被邀请的客人有权携带一名未被邀请的客人同来。

现在的欧洲,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游客的能力,大量寻常的道路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形成了相当好的旅行环境。“在美国用汽车旅行是一件很便利而愉快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公路实在造得好,都是柏油路,平坦广阔,贯通全国,两旁树荫夹道,

汽油站随处都是。有许多地方不必住旅馆，有人家把余下的房间出租，门口贴着‘Intourist’的招贴，里面清洁讲究，价钱比旅馆便宜得多。”^① 这既是为当地居民自己创造的生活环境，也是为外来游客提供方便。旅游满意度并非仅仅来自美丽的风景，旅游者所遇到的行为、所获得的帮助、所得到的信息以及需求得到服务的效率等都对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德国海德堡人把他们的花草都放在窗台上，是执意要美化城市的公共环境，并执意要向路人争奇斗艳。我一直不解人们是怎么维持这种鲜花胜景的。我在欧洲其他很多城市看到的都是这种情况。你随处呼吸着自然的气息，也感受到亲切的人文关怀。这是我的旅行经验，也成为中国城市的期许和标准。”^② 这不是专为游人看的，这是美化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努力，它已经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习惯。

有游记记载了 20 世纪上半叶荷兰瓦林丹小岛，当地妇女欢迎外国人到来的情况：“她们很高兴有外国人参观她们的家庭，绝不阻止。女主人又取出她们的用具，她们的绣工，——手巾，衣边等给游人观赏。虽然语言不通，从面部的表情上显示出她们的喜悦。”^③ 这种令人愉快的旅游环境在游客不多时能够出现，但当长期的大批量游客涌至时，我们就担心能否保持了。

欧洲的旅游环境相对较好，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李健吾当年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我怕极了向导的纠缠，东方人又易于识别，马上就他们就过来包围住我；而且不仅向导、马车夫，旅馆、饭店的伙计（我自己带好了火腿面包的），全是个死死不放。有一个车夫发见了我这笔意外之财，自从我走进了彭贝新城，一直将我尾随到车站，而且咬定没有火车，其实我先已知道，无需他来提醒。”“这也是别的地方

① 邹韬奋：《大瀑布》，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5 页。

② 于海：《人文尺度的城市规划》，《书摘》2008 年第 8 期，第 67 页。

③ 王统照：《荷兰鸿爪》，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7 页。

少有的现象。”^①也许李健吾当年旅游时这是少有的现象，如今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大凡有过旅游经历的人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二 乞丐现象一直伴随着旅游

这是20世纪30年代芮麟游泰山时的所见所闻：“沿路于石壁间、密树中、巉岩下，有无数乱石垒成的小屋，问之轿夫，知是乞儿的居所，现因天热，游山的人少，乞儿都到山下乞食去了，到秋天再来，春天是乞儿最多的一个季节。我们已经很奇怪泰山乞儿之多了，再多将多到何种地步呢？我们看见好好的妇女，正在家里或门前做着针线，看见轿子经过，便抛了手里的工作，到轿边来要钱了。廉耻之心，羞恶之心，在他们的脑海里是完全不存在的，这样的小孩子更多，这批没有廉耻心、羞恶心的小孩子长大起来，我真有些为社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呢！”^②

我们庆幸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有根本改变。可是我们的邻国印度的乞丐仍然盛行。

印度的乞丐大军举世闻名，孟买最大的清真寺三面临海，风景极佳。但外国人都愿意去那里观光。因为到清真寺必须步行十几分钟，而在这十几分钟的路上，路两边排满了乞丐，你一走过，两边乞丐一齐伸手。你不理他们，他们就拉你的衣服扯你的手，嘴里还说着你不懂的印度方言。又黑又瘦的脸上露出白白的眼珠，好不吓人！这可能就是我来印度前朋友介绍的“铺天盖地的乞丐大军”^③。

试想这样的环境中旅游，景观虽是美丽，但欣赏美的心境全会荡然

^① 李健吾：《拿波里漫游短札》，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彭贝”，通译庞贝。

^②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③ 杨牧之：《在那恒河的原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11期。

无存。

三 旅游接待地应当创造宽容的旅游环境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记述了随行的女性伙伴在伊朗的遭遇：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是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刷刷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划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没想到刚刚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

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餐没法带头巾！”^①

入乡随俗，游客应当尊重旅游地风俗习惯。但像这种给游客严格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不容易吸引有异质文化背景的游客到来。旅游地当地人与游客应当互相尊重。文化多元使城市保持常青的活力，单一的文化就不容易获得长期、持续发展，对于旅游城市来说更是如此。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宗教往往是使游客感到受限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边的例子是这样，下边的例子也一样：在 20 世纪上半叶，邹韬奋就有记述：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较大的教堂前都有英、德、法、意四国文字的公告，列举禁例。“尤其有趣好笑的有关于妇女的，例如说凡是妇女所穿的衣服袖子在臂弯以上的不许进去，颈上露出两寸以上肉体的不许进去，裙和衣服下端不长过膝的不许进去，衣服穿得透明的不许进去。”^①

政治制度和政治气氛有时也是游客感到受限制的一个因素。

在丹东口岸出入境检查处，赫然立着这样一个牌子：“严禁携带具有通讯功能的电脑、手机、短波收音机等电子产品入境。”

丹东海关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常会反复告诫出入境人员，赴朝鲜旅游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对朝鲜领导人、政治、经济等情况不要随意发表评论，对不允许参观的景物不准拍照，不许私自和朝方民众聊天和私授物品等。

“朝鲜旅游规矩确实很多。”刘成福也证实，虽然赴朝八日游的费用不过 5000 元人民币，但游客还是有很多规矩要遵守：只能参加旅游团，没有个人自由活动时间，只能参观指定的景点，只能在指定宾馆住宿，夜晚不能外出，不能与当地聊天，不能带手机，即使拍照也要经朝鲜导游同意——这些朝鲜导游实际上是朝鲜旅游局工作人员。^②

旅游本是自由、开放的产物，给游客过多的限制，无异于限制旅游。

四 游客多寡也构成旅游环境的一部分

有些旅游场所需要人群的积聚，比如伦敦市中心、香港、北京王

^① 邹韬奋：《佛罗伦萨》，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7 页。

^② 高浩荣、赵展、于冬：《中国人想去朝鲜看什么》，《国际先驱导报》2010 年 4 月 23 日。

府井、上海南京路等，如果没有较多的人流，就不足以烘托出这些旅游城市繁华热闹的气氛。有些旅游地，比如九寨沟、张家界、苏州古典园林等，人流过大就会破坏这些景区特有的环境氛围，在滚滚人流中达不到游览这些景区的理想效果。大凡游人，在游览自然景观时多希望游人不要过多。因此，游客多寡也是旅游环境，它也应成为旅游组织者和游客选择旅游地的一个因素，旅游地也应考虑游客多寡对游览效果的影响而合理控制游人数量。

泸沽湖超容量接待，过于饱和的游客大大降低了旅游质量。原来清爽的湖光山色现在是人头攒动，原来宁静的村落现在变得人声鼎沸。为了一睹摩梭风情远道而来的游客，满眼看到的不是身着民族服装的摩梭人，而是与自己一样的游客。路旁的花草常常还没有来得及从前一批游客的脚下抬起头来，就又被新的鞋脚踏了上去。

总之，现代大众旅游很像卞之琳在《断章》诗中所写的那样：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在许多风景地，游人已经成为其他游人所游览的景观的一部分和观景时的伴随者。其实，在古代这种现象就已经产生，只不过不太突出罢了。浙江临海人王士性（1547—1598年）曾描述游船到访南京的情景，“至淮清桥乃与清溪合，缘南城而出水关……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①

五 旅途与旅游传播

由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路程就是旅途。旅途所用时间在整个旅游中会占到一半左右，甚至超过一半。我们可以把旅途环境看做旅游环境的一部分。旅途所见所闻是旅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旅游传

^① 《广志绎》卷2《两都》，参见宋立中《晚明清初江南士人“非传统”消费思想刍议》，《光明日报》2011年2月4日，第3版。

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写旅途见闻所占比重绝不在少数。

邯郸市博物馆藏元代白地黑花诗文长方形磁枕上有诗云:“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鸣再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见图3-6)这是古代离家在外的经验之谈,也是当时旅途不安全的写照。在这种旅途环境中,人们旅行、旅游的念头就只好打消了。



图3-6 元代白地黑花诗文长方形磁枕

(赵建国摄于2008年12月)

旅游几乎离不开交通工具。汽车和火车是最常见的旅游交通工具。车外情景固然引人注目,但车内境况也是许多游人感受和记忆较多、较深的内容:

午夜醒来,全车的人,不论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长的、短的、男的、女的,一律在打瞌睡;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斜依着,有的侧倾着,有的张开嘴,有的垂倒头,有的像笑,有的像哭,有的打鼾声,有的说梦话,有的嘴里还流着唾涎,一丝丝地滴下来,各式姿态都有。形形色色,这支笔自愧未能形容于万一。我简直看得不想睡了。有诗为证:

车中观人睡态戏作一绝

如啼如笑复如嚏，可厌可怜亦可亲。

色色形形色色，一般都是梦中人！

中途上来一个穿白色学生装的青年，看见了全车旅客的睡态，笑得嘴都合不拢来，但又不便笑出声来，又不肯给旁人看见他在笑，面孔时时回向窗外去，却不知道我在睡时看着他。但不久我醒来时，那个青年，自己也在打瞌睡了，并且身体像弓一样，倾侧得很厉害。我看他的头一颠一颠的，忽地身子向前一栽，全身扑到地上去了。我仍是睡着，心里说不出的好笑。的确，睡如传染病，坐在一起，谁都得传染上，何况在漫漫的长夜里？但那个青年笑人家打瞌睡，结果自己竟为打瞌睡而跌下地来，则未免太觉有趣了！^①

似漫画，似喜剧，这就是长夜中的火车车厢内的素描。芮麟在陇海线乘火车前往中州途中，看到更多的是车窗外的景色：

十二时，陇海开车。铁路两旁，尽是紫里带白，白里泛红的碎花，千树万树，缤纷不绝，一路为中原平添不少春色，也为我平添不少诗料！询诸同车的人，知系洋槐。本槐须夏天开花，洋槐则春天开花，并且开得比本槐娇艳。徐汴道中，曾有一绝记之：

西来夹路种新槐，紫白缤纷竞着花。

只道眼前风景好，不知身已在天涯。

真的，“不知身已在天涯”啊！

近年来，长途旅行，我已惯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个人，看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着车中的形形色色，望着窗外的万紫千红，一点也不觉得寂寞。就是离家时的那种离愁，离常时的那种怅望，一过徐州，也已完全被我兴奋的心克服了。我的眼，只是看着窗外的天地；我的心，只是想着未来的旅程；我在内心的鼓舞和外物的刺激下，变成了一头具有铁的意志的绵羊！^①

接着他还写道：

彭城西区转悠悠，旅思乡愁一笑休。
千里槐花疑似雪，春光先我到中州。^②

如果我们现在乘坐陇海线火车从徐州到郑州，车道两旁的树木已经不是芮麟所描写的那样了，洋槐树已经很少，代之者多数为杨树。树木的更替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变迁。

接下来的行程中，芮麟记述的依然是窗外景物：

车过泗水，就看见窑洞。洞就山麓或山腰凿成，外狭内宽。据说冬暖夏凉，住着比楼房还舒适。先民穴居之风，不图今日犹及见之。

山全是黄土，没有石块，利于种植。所以一层一层，盘旋而上，连山顶都种满果蔬树木。并且有些地方，均为笔直的削壁，泥土不虞崩溃。这里虽离秦陇尚远，恐怕也是受着黄土高原的影响。

巩县兵工厂在一座小山上，林菁茂密，黑烟缭绕，凭窗远望，心上有说不出的兴奋。

五牢关确系天险。自泗水至陕州，闻须经山洞十三座。陇海路路政车辆，虽然比不上国内其他铁路，但其建筑工程之艰巨，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6—277 页。“常”，指常州。

② 同上书，第 277 页。“彭城”，指徐州。

实不下经行万山中的平绥路。^①

他还在车中得到了这样的诗《陇海车中望秦岭》，写的也是窗外景色：

木未凋零草未枯，连天碧色若干铺。
秋山更比春山好，浓到十分淡到无。^②

不难发现，景随车移。这里已经开始有黄土高原的味道了。

1958年作家赵树理到朝鲜开城去游了一次，他是这样记述沿途情况的：“和前几天到东海岸一样，又是坐了汽车去的，对沿途风光又领略得很不少。这一路上的农村人口，似乎比东海岸公路旁的人口密一些，见到的群众集体活动比较多——深翻农田、筑路修桥、挖渠筑坝，处处都是高插红旗的劳动队伍，处处给人以移山换水的感觉。新翻过的土地、新铺着土石的道路、新掘开的渠沟、正在清理着的水库坝基、才运到河边的桥梁器材……所有这一切用人工改变着大自然的新成绩，几乎覆盖了地面。这种新的气象，一直排到离军事分界线两公里的中立区边沿上。这种新气象，使人百看不厌——从平壤到开城，汽车要走四五个钟头，但是在这次往返中，我的眼睛没有片刻离开车窗，而且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倦。”^③

由于只是一闪而过，从沿途车窗外得到信息多是笼统的、杂乱无章和印象模糊的。

第六节 旅游传播本源的传播策略

与旅游传播本源相关的传播策略很多，这里只归纳和介绍一部分。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295页。

② 同上书，第297页。

③ 赵树理：《开城之行》，《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版2006年版，第278页。

一 强化珍贵性、唯一性

1998年,张家界为黄龙洞标志性景观“定海神针”投保一亿元,创全国为世界自然资源性遗产买保险之先河,使张家界黄龙洞美名远扬。“定海神针”是黄龙洞景区的标志景点,全高19.2米,围径40厘米,为黄龙洞最高石笋,两头粗中间细,最细处直径只有10厘米。为景观花巨资买保险,就意味着此景观的珍贵、唯一,使人更加珍视它,来此亲眼目睹它的欲望更加强烈。

太昊陵陵墓的后面是“蓍草园”,“蓍草春荣”为淮阳的八景之一。传说伏羲就是根据白龟龟背图案,采来蓍草“揲蓍画卦”,所以被称为“神蓍”。该景点工作人员往往说全国只有此处生长此草;稍微留有余地的则说全国只有三处生长此草:一为太昊陵,二为山东曲阜,三为山西晋祠。其实,远的不说,在河南汤阴羑里城的演易台前,就有一片蓍草园。

二 突出关键时间点的原真物品

托尔斯泰故居雅斯纳雅·波良纳内的卧室,“小小一间屋子,床头小几上还放着烛台,半枝残烛——托氏出走那天,半夜起来所点的最后一枝烛”^①。

三 保留旅游传播源的神秘性

作为旅游地,有怪物的喀纳斯湖比只有自然景观的喀纳斯湖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它的神秘性在起作用。许多旅游地都在“制造”和利用自身的神秘性。

^① 瞿秋白:《清田村游记》,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雅斯纳雅·波良纳”在俄语中意为“明亮的林中空地”,瞿秋白将其意译为“清田村”。“托氏”,通译托尔斯泰。

河南省鹿邑县“老君台”上还放置着4发炮弹。旁边有说明：1938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四），侵华日军攻打鹿邑县城，对老君台进行炮击，共打13发炮弹，无一发爆炸。见此情景，日军炮兵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停止了炮击。这些炮弹是当年日军炮击老君台的哑弹（见图3-7）。这个说明使本来就神秘的老子显得更加神秘。



图3-7 老君台上陈列的日军炸弹与说明
(赵建国摄于2009年12月21日)

如果说13发炮弹都成为哑弹是事实，那么原因何在？人们的普遍解释是“老君显灵”。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是不会轻易接受这种解释的。旅游地多一些神秘感有助于吸引游客，多数游客不会较真。

太昊陵也有不少神秘之处。其中的一个是，据民间传说，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打了败仗，只剩孤身一人，且后有追兵。走投无路之时，跑到了太昊伏羲的小庙内，祈求道：人祖爷若能保我平安无事，尔后一旦得天下，一定依照我的宫殿，替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说也奇怪，话音刚落，一只蜘蛛立即在庙门口飞快地结起了蛛网。元兵追到庙前，见蛛网封门，以为里边肯定没有进人，便追向别处。后来，朱元璋得天下建立明朝，于洪武四年派大臣徐达前来，重

修了太昊陵。

有时,科学家的研究也会使某些游览对象更加神秘。

不久前,意大利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的著名壁画作品《创世纪》又爆出惊天秘密:两位美国医生声称画中竟然隐藏着人体解剖学的图像!这些被称作“米开朗琪罗密码”的神秘图案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脑神经外科专家兰·苏克和拉法尔·塔玛尔戈共同发现的。两人此前以游客身份进入梵蒂冈西斯廷小教堂近距离欣赏这幅伟大的壁画时,发觉其中表现“上帝分开光明与黑暗”的部分同壁画其他部分相比不太协调,上帝的颈部和胸部的表现方式显得有些笨拙,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线条。另外,画中其他人物的光源都是来自斜下方,而上帝的颈部却被光源直接照射。这些不同寻常的表现手法令两人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米开朗琪罗当年故意埋下的伏笔。

苏克和塔玛尔戈花费了4年时间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将人类大脑解剖图像和画中上帝颈部的画面重叠对比,出乎意料地发现两者的轮廓竟然惊人地相似!上帝喉咙处凸出的部分就像延脑椎体,而喉咙上部的肌肉则像脑桥。画中上帝所穿长袍上的腰带呈现出来的奇特线条,则代表了人类的脊骨。两位医生认为,米开朗琪罗有意通过略显拙劣的笔触,引导人们发现他在壁画中隐含的解剖学知识。这一研究成果在2010年5月的《神经外科学》杂志上发表后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米开朗琪罗和他的《创世纪》也再度笼罩上神秘的色彩。

热衷于人体解剖的米开朗琪罗想透过作品向人们展露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学识,似乎并非没有可能。可惜,米开朗琪罗在创作《创世纪》时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解释说明,绝大部分有关人体解剖的素描和笔记也已被他本人销毁。这幅影响深远的画作中究竟是否真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密码”,至今仍然是一道无法解开的谜题。^①

显然,此项研究使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更加神秘。

^① 参见马赛《巨幅壁画隐藏人体解剖图——解析《创世纪》的“米开朗琪罗密码”》，《光明日报》2010年6月4日，第8版。

四 见物还要见人

博物馆为啥不吸引人?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郭俊胜认为,主要原因是游客见物不见人。“昏暗的灯光,模糊的图片、生硬的说明、真假难辨的展品,很难吸引游客的目光。”张氏帅府博物馆建馆以来,一改以往单纯陈列的布展方式,充分挖掘老建筑内所承载的历史内涵,让观众体验世事沧桑。“我们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文物回收、征集,包括宣统皇帝溥仪御赐给张作霖的龙袍,帅府当年的红木茶几、挂钟、吊灯,张学良的公文包、怀表、印章以及专门从美国征集回来的张学良晚年用品等。我们还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找到了珍贵的30分钟帅府的影像资料片。”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帅府中的“赵四小姐楼”是一座二层小楼,里面有许多房间,为什么赵四独选二楼东北角一个常年阴冷背光的房间做卧室?专家经过实地观察发现,在这个房间,隔着窗子就能看到大青楼里少帅的办公室。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解说员别样的讲解下更显生动。^①

五 旅游传播源的异质互补整合

王衍用在研究山东邹城的旅游发展问题时,提出了“阴影区”的观点,即不少旅游地之所以不能产生好的效益是因为邻近地区或更大范围内有同样类型的高等级旅游吸引物,从而致使其“灯下黑”。处在阴影区的旅游地要想发挥自己的吸引力,必须另辟蹊径。王衍用认为,曲阜和邹城两地相距不足百里,孔子的影响又大于孟子,使邹城旅游业长期处于萧条状态。为了走出孔子旅游的阴影,应把孟母作为主打品牌,建造“天下母亲园”,宣传天下最好的母亲在邹城,避免因同质竞争而产生的劣势。据此观点,他引申出了

^① 参见毕玉才、苗家生、刘勇《看张氏帅府怎样留住游客脚步》,《光明日报》2009年5月18日。

旅游区位理论,即资源区位看结构,客源区位看位置,交通区位看线路,并提出了应把“旅游可进入性”改为“旅游可出入性”的观点。^①

我们认为,旅游地的相互作用是负面作用(或消极影响)还是正面作用(或积极影响),关键是看这两个相邻近的旅游地(或景点)是同质同构还是异质同构。若这两个相邻近的旅游地(或景点)在性质上雷同(如三峡大坝与葛洲坝,曲阜“三孔”与邹城“三孟”),就可能产生高级别旅游地抑制低级别旅游地的负面作用(同质相斥);若这两个相邻近的旅游地(或景点)在性质上差异很大(如泰山与曲阜“三孔”,三峡大坝与屈原故里),就可能产生高级别旅游地带动低级别旅游地的正面作用(异质互补)和整合效应。因此,杨振之等学者提出了旅游形象叠加效应理论,对影区效应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②

这种异质互补整合策略能够有效地吸引游客,使相近旅游地获得双赢。

六 让游客目睹考古过程

2009年,秦皇陵一号兵马俑陪葬墓坑的考古发掘与展出结合起来。这次发掘地点临近参观主线路,观众在欣赏2000多年前古代奇迹的同时,还可目睹奇迹揭示的过程。公众也想知道具体的发掘过程和论证过程。这种展示形式也会促进考古规范化发掘。

七 利用传统节日,创造新的节日

中国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是传统节日,每到泼水节,游客便蜂

①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② 同上。

拥而至。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中国大连的“国际服装节”等，与生产和商业特色有关，只要有了知名度并形成固定节日，游客也会慕名而来。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节事活动，对于当地旅游和旅游传播都功不可没。

八 适当的“舞台化真实”

“舞台化真实”是针对游客原真性需求而作的适当变通。虽然《威尼斯宪章》提出了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思路，对修复进行了严格限定：“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但这并不能制止国际学术界就文化遗产在现实利用中的争论。

“舞台化真实”体现出这样一种境界：尽管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偏好，但遗产地可根据游客的需要，用“符号复原”或“事件复原”的方式，对真实文化作相应的改进或模仿，提供给游客舞台化的真实。

“舞台化真实”实质上是历史文化的一种舞台化、商品化过程，在旅游活动中会经常见到。

第四章

旅游传播本源——旅游目的地与传播(二)

本章是对旅游目的地与传播的分类论述,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工业遗产、世博会、奥运会等与传播的逐一讨论。

旅游目的地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两大类。民俗、工业遗产、博物馆等都大致可以归入人文景观。

第一节 自然景观与旅游传播

自然景观应当是人类发生旅游兴趣的最初动因。正是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气象万千、争奇斗艳、鬼斧神工,吸引着人们前去观察、体验。正像美国歌曲《月亮河》中所唱,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看。^①自然景观主要传播美,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还能传播自然界中的许多其他信息。流泉飞瀑是自然景观中最具动态美的旅游资源。生物景观是自然旅游资源中最富有活力和生气的部分。

许多自然景观成为旅游胜地之后,逐渐积累了人文成分,从而成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身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就是典型的

^① 《月亮河》(Moon River)中的这句歌词原文为:“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由自然景观逐渐演变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游胜地。这类景观形成的基础是自然山体的可观赏性，游山的人多了，尤其是造访的名人多了，就会逐渐积累人文涵养，自然景观之上不断浸染人文气息。“因景文成，景借文传”。

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僧人、道士，“天下名山僧占多”说的正是这种现象。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有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道教名山有湖北的武当山、四川的青城山、江西的龙虎山等。

在对自然景观反复观察、比较之后，人们归纳了它们的特点。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险，雁荡之秀，青城之幽，为天下人所知并认同。有民歌道：“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夔门天下雄，剑门天下险。”

一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会传达出不同的自然景观信息

有些自然景观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观察，会传达出不同的自然景观信息。

古人对此已有认识，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就说：“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早晨和晚上景色不同，早晨“日出而林霏开”，傍晚“云归而岩穴暝”。四季也带来景色的变化，所谓“四时之景不同”是也。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天“佳木秀而繁阴”，秋天“风霜高洁”，冬天“水落而石出”。观赏四季不同的景色，会带来无穷的快乐。

著名的“灵峰夜景”是指雁荡山灵峰景区内的岩石在夜里呈现出的景致。夜间的灵峰三步一景，移步换形。一峰一石都成风景，而且景景相扣，连成一幅画、串成一曲民谣。在特定角度抬头仰望，山峰仿佛是一只巨大的雄鹰，似敛翅欲停，又似振翅欲飞，在夜幕里仿佛

即将扑面压来，这就是所谓“雄鹰敛翅”。当人们背对雄鹰站立，往后仰头观看时，凶猛的老鹰变成了一对丰满高耸的乳房，所以它又叫做“双乳峰”。再移动一段距离看时，右面较高的岩石，像一位背着行囊从远方归来的青年男子，左面的岩石则像一位窈窕少女，卷发披泻，水袖飘拂；他们紧紧相拥，情意缠绵，人称“情侣峰”。这对情侣的亲昵引得远处一个骑牛的牧童顽皮地从山峰背后探出头来偷偷观看，这就是“牧童岩”；也使得一旁一个梳着发髻的老妪羞转了脸，此乃“婆婆峰”。人们把这些景色串演成一首诙谐的民谣：“牛眠灵峰静，情侣月下恋，牧童偷偷看，婆婆羞转脸。”

其实，夜景“雄鹰敛翅”、“双乳峰”、“相思女”与“情侣峰”都为白天的“合掌峰”所幻化。

中国的自然景观是这样，国外的也不例外。

在徐志摩看来，观赏康桥周围的自然美，“你还得选你赏鉴的时辰。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逢着连绵的雾盲天，你一定不迟疑地甘愿进地狱本身去试试；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间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那才真是寸寸黄金。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①要看康桥周围的自然美，最佳的时间是四五月，而且最好是在黄昏。

有些自然景观只有在特定时间去观赏才能得到相应信息。香山深秋的染霜红叶，东京春季缤纷的樱花，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才能观赏到，错过这个时间段，就只能等到下一个年度。

二 自然景观美与美学修养

有的自然景观所蕴藏的观赏信息，需要较高的美学修养和对美的敏锐的感知能力才能发现。中国游记作家芮麟记述了自己发现泉水流动的美妙声音。“出庵门，使我发现了一个奇迹：泉声，那紧绕耳边

^①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的泉声，竟是每处不同的，初时是潇潇潇潇，下些是琤琤琤琤，再下是淙淙淙淙，后来是将灏灏灏灏，最下便是壑壑壑壑的声音。潇潇声最清，愈下则愈浊，愈重。那种轻轻的水声，非独自缓缓地、静静地走是听不到的。我第一次来是团体，一路谈着，笑着，闹着，当然不会领略到这种静趣。第二次来是坐的轿子经过一次，也未注意及此。此中玄秘，今天方才给我发现了。可见山水要得一知己之难，而我们欣赏山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① 芮麟是泉水声响的知音，他对声音的微妙变化感觉非常敏锐，能分辨出极其微小的音色变化，能听出泉水弹奏出的音乐美。

三 自然景观信息的开发

自然景观是客观存在的，但自然景观的信息却需要不断开发，自然景观依赖于新的科学发现为旅游者提供新的解释、开拓新的自然旅游资源，才能不断增加自身的魅力，引来更多游客，使游客获得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

在辽宁锦州渤海湾畔，有一座海拔 78.3 米、面积 1.2 平方公里的笔架山。在它的脚下，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长 1620 米、宽约 9 米的海上通道，当地人俗称“天桥”。每天涨潮时隐于水下，落潮时露出海面，人们可以沿着“天桥”从海岸直接走到笔架山。所以，有诗曰：

浩瀚渤海湾，绝景笔架山。

退潮通一路，潮涨走千帆。

这样一处世界级的珍稀资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学意义和文化战略意义上的系统理论研究和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受到极大限制，虽坐拥世界珍稀陆连岛奇观之“实”，却无与之比肩的国际品牌之“名”。

^①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1—102 页。

辽宁工业大学教授李湘带领她的团队,对笔架山进行了多项研究和持续不断的拍摄记录。他们不仅深入当地渔村采访,还远赴法国、韩国及我国台湾等地进行同类型景观实地考察,并采用直升机进行空中拍摄,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研究数据,最终将“笔架山”准确地定位为世界上地貌特征最为典型、天然完整、造型优美、潮汐规律、观赏及研究价值极高的“陆连岛”,从而为打造笔架山陆连岛旅游品牌、发展锦州旅游产业、促进渤海湾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依据。^①

珍岛是韩国的第三大岛,在珍岛的陆地同海上的小岛茅岛之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路,涨潮或退潮落差较小时,海路隐没于水下;只有退潮落差较大、海水变浅时,海路才露出水面。每年阴历的三月和五月,各有两三天潮水落差最大,这时每天在海上便会出现一条长2.8公里、宽40多米的“海路”,把大海一分为二,时间仅有1个小时,人们可沿着这条“海路”一直走上茅岛。

而锦州笔架山岛所在海域的潮汐属正规的半日潮类型,即一个太阴日内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前一次高潮和低潮的潮差与后一次高潮和低潮的潮差大致相同,涨潮过程和落潮过程的时间也几乎相等,潮汐非常规律。韩国的陆连岛不仅潮汐不规律,且只有到了全年的最低水位,其连岛沙洲才能够较充分地显露,其陆连岛地貌特征的典型性、造型的优美性、潮汐的规律性、观赏及研究价值等均不及中国锦州笔架山。

1975年,法国驻韩国大使皮埃尔·兰德赴珍岛考察珍岛犬,刚好遇到“海路”出现,他目睹奇观,感叹说:“这真是韩国版的‘摩西奇迹’!”原来,在《圣经》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摩西的记载:摩西遭遇了凶险,在前有红海阻挡、后有追兵逼近的生死关头,上帝吩咐摩西向大海挥动神杖,结果海水分开,摩西化险为夷。回国后,这位大使在报上发表了观感,于是,韩国版“摩西奇迹”的名声便远播世界,为珍岛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随之还诞生了专门为珍岛创作的

^① 参见毕玉才、刘勇、张继锋《锦州:学术研究重新“发现”笔架山》,《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第5版。

歌曲《珍岛物语》，从此珍岛声名远扬。如今，珍岛郡每年都要举办“珍岛神奇海路节”、“灵登节”（祭奠他们的老祖宗，同时祈求海龙王保佑风调雨顺）等活动，珍岛每年吸引40多万名国内外游客。

如果笔架山陆连岛旅游品牌能够形成，其旅游价值要高于韩国珍岛。

四 自然景观的保护

自然景观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些景观自身也在不断地、缓慢地变化，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这些景观的基本面貌，除非大的自然灾害，比如大地震导致山体坍塌、崩裂、河水改道等。然而，人类活动对这些景观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比如，被称为“晋祠三绝”^①的难老泉曾经清澈见底、游鱼成群。晋祠背后的山叫悬瓮山，《山海经》记载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难老泉就是晋水的源头，可见难老泉历史之悠久。李白游晋祠曾题诗：“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莎草绿。”现代作家吴伯箫在1961年写的散文《晋祠——难老泉》中，记述了他5年前游历过的晋祠难老泉：“水的流量不小，一秒钟一点八吨。流水永远不停，雨涝不增，天旱不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游历晋祠时，还有幸见到难老泉泉水淙淙、鱼翔浅底。但由于周围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使水位下降，难老泉终于“老”了，泉水枯竭了。后来，尽管用人工方法使原河道流着自来水，然而难老泉昔日的魅力已难觅踪影。

有些旅游开发也会破坏自然景观。张家界的“百龙电梯”、泰山的索道等毁坏了整个景区的整体性与和谐性。

自然景观原貌被破坏了，它们所携带的信息也会随之消失或改变。保护自然景观也是保护自然信息。

^① “晋祠三绝”的另外两绝是“宋塑侍女”和“古柏齐年”。在圣母殿里围绕着邑姜凤冠霞帔的坐像，有44尊侍女塑像，据说是宋朝的作品。传说西周初年这里栽有两株柏树，因为同样古老，所以叫“齐年柏”。可惜有一株在清朝道光年间被砍伐了。剩下的一株，横卧如虬龙斜倚在擎天柏上，披覆在圣母殿左侧。另有一株“长龄柏”，传说是东周时候栽的。

五 自然景观传播的途径

通过帝王将相的活动传播。在这方面,泰山最有代表性。泰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帝王将相到泰山的祭拜活动,使泰山“五岳独尊”。帝王将相到泰山的活动,在它的名声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宗教活动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大佛教名山”,每一次宗教活动都是这些名山声名传播的极好契机。

通过名人的诗、文传播。这一点本书有多处涉及,此处不赘述。

通过旅游传播。道理很简单,旅游的人越多,这些自然景观的名声越大,人气越旺。

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学术著作传播。历史著作中多有名山大川的记载,我国24部正史中大都带有地理志,如《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国志》、《明史·地理志》等,它们大都带有名山、名川等的记载。学历史也会对它们耳熟能详。考古学、建筑学经常提到保存在名山大川上的名建筑、名人墓,这些名山大川与名建筑、名人墓的名声互相烘托、相得益彰。

通过城镇地名和道路名的移借传播。比如黄山市,人们会把这个城市与黄山联系在一起。有的城市中的道路以名山大川命名,比如恒山路。经常说这个路名,不会不知道恒山。

通过某些标志传播。桂林以象鼻山为城市标志,看到这个标志就会知道象鼻山。

第二节 人文景观与旅游传播

不少人文景观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文景观并不以自然景观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想要彻底剥离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联系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园林属于人文景观。园林中的人工山水，既是自然景观的模仿，又是人文精神的表达。中国园林的诗情画意也受到了文人画的影响。明清是中国园林建筑走向成熟的时代。

顺便说一句，山西乔家大院缺乏绿化，很少有树木。也许，当年草木庄稼遍野，建宅院时就不考虑它们了。

中西园林传达出不同的文化信息。此内容在前边介绍余秋雨对古代欧洲建筑与中国建筑的比较时已经谈到，请参阅。

古人有强烈保留和传播自身信息的愿望，石刻就成为中外古人的重要选择。“由于石头上的文化保留得最久，所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埃及人、玛雅人、巴比伦人以及我们中国人，在初始时期，都把文化刻在坚硬的石头上。这些深深刻进石头里的文字与图像，顽强又坚韧地表达着人类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把自己的一切传之后世的渴望。”^①

人文景观主要蕴涵和传递人文信息。梁思成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写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② 人文景观是旅游传播中信息最为密集的区域。

文物古迹依赖于新的考古发现更新或增加自身的信息传播源。

一 名人的踪迹会形成历史文化遗产

柳宗元被贬永州和柳州，韩愈被贬阳山和潮州，苏轼被谪惠州和儋州等，都为这些当时偏远的地区增添了人文色彩，成为后人（尤其是文人）旅游观瞻的目标之一。苏轼被贬海南后，曾游澄迈通潮阁，他的遗踪就成为当地的一个古迹。《清一统志·琼州府·古迹》谓：

① 冯骥才：《古希腊的石头》，《文汇报》2001年5月11日。

② 梁思成：《平郊建筑杂录》，参见《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本文原载于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由梁思成、林徽因合写。

“通潮阁在澄迈县治西，宋苏轼尝憩其上，有诗。”^①

苏轼曾在徐州做太守，现在以云龙山放鹤亭为中心的云龙湖风景区和黄河古河道已成为全国面积最大、景点最多的苏轼文化游览区。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东坡石床”。宋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十七日，苏轼与挚友数人登云龙山，醉卧在一块山石上，醒来写出《登云龙山》诗：

醉中走上黄茅冈
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
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
路人举首东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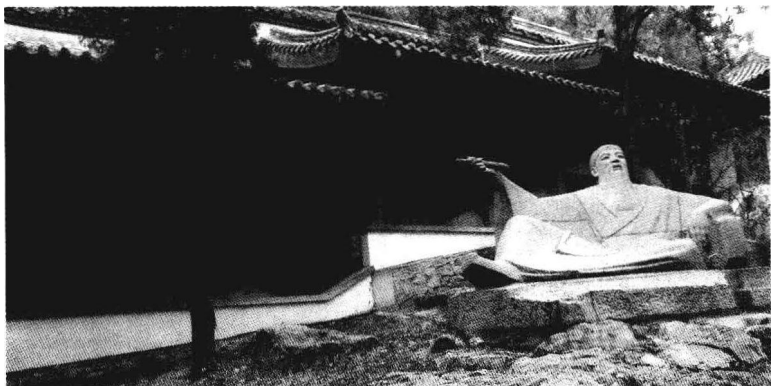


图 4-1 苏东坡“枕石卧云”处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

① 参见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② 苏轼：《登云龙山》，参见王文浩辑注《苏轼诗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877 页。

让人不解的是，这首诗应该有八句，诗人却只写了七句，是诗人醉后写诗的缘故？所以笔者在摘录时就不标逗点句号了。后人根据诗中“冈头醉倒石作床”句，将此石取名为“东坡石床”，并题“枕石卧云”（见图4-1）。

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在新建县拖拉机配件修造厂劳动。他住在解放军某部将军楼，要步行六华里到工厂上班。该厂的干部、工人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个小门，沿着田埂铺出一条通向他宿舍的小路，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小平小道”。这是一条长1.5公里，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见图4-2）。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延伸出来的。



图4-2 “小平小道”
(赵建国摄于2007年8月22日)

1998年，叶利钦夫人奈娜陪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参观乌拉尔工艺美术学院时，向她讲述了自己与叶利钦的爱情故事。正是在校园走廊的一根圆柱后面，风华正茂的叶利钦大胆地偷吻了同专业女大学生奈娜，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接吻。当年奈娜与叶利钦“一吻定情”的那根圆柱，如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在此亲吻留念。

二 一些并非完全原真的景观也可能具有很好的旅游价值

一般情况下,原真是所有旅游景观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然而,某些特殊背景,也使一些并非完全原真的景观具有很好的旅游价值。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内的菲兹洛伊花园(Fitzroy Gardens)内,坐落着一座典型的18世纪英国乡村风格的两层楼建筑,其门楣石梁上刻着JGC和建造年份1755字样,这就是当地著名的历史纪念地和旅游景点“库克船长小屋”(Cooks' Cottage)。

1768年8月26日,库克船长率领20名水手驾驶“奋进号”木制帆船开始航行。1770年4月19日,库克船长作为第一位英国人在悉尼登上了澳大利亚大陆。几天后,他们离开悉尼,继续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向北航行,最后到达澳大利亚大陆最北端的Cape York(现名Cook Town)。库克船长利用上岸修船的机会,考察了当地的地理、气候和动植物,他认为这个地方适合人类生存,随即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这片大陆归大英帝国所有,并首次将米字旗插在澳大利亚土地上。1788年1月26日,第一批英国流放犯人的船队在悉尼登陆,澳大利亚从此诞生,1月26日也因此被定为澳大利亚的国庆日。

“库克船长小屋”原建在英国约克郡北部的大艾顿,是库克船长父母詹姆斯和格丽丝的住宅,上面提到的门楣石梁上所刻JGC即为其夫妇二人的名字缩写。1933年,此建筑出售。得知这一消息后,一些居住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城的著名人士倡议将其买下并搬到墨尔本重建。他们希望此屋落成典礼可以成为1934年墨尔本建市100周年庆典的组成部分。这一倡议得到积极响应,最后由澳洲知名实业家拉塞尔爵士出资800英镑买下,作为礼物送给墨尔本市民。随后此建筑开始拆卸,一砖一瓦都仔细地逐件做好标记并编号,它们被精心包装成253箱和40桶,总重量达150吨,由英国海运到墨尔本,照原样重组建成。

小屋的重建地被选在菲兹洛伊花园,因为此地绿树成荫、环境宜人,并且靠近当地著名的温室。它与花园内原有来自欧洲的植物及维

多利亚风格的喷泉与雕塑相得益彰,十分协调。复建后的小屋按照18世纪英格兰北部乡村普通民居风格陈列着各种家具和装饰品,再现了当年的乡村生活旧貌。小屋楼上是库克船长父母的卧室,楼下有厨房和会客厅,还有一间库克船长每次航海归来后居住的小卧室,屋后的花园内栽种着许多来自英国本土的花草、蔬菜和水果,库克船长的青铜雕像亦屹立其中。

此建筑在1955年和1978年曾做过两次较大的维修,现由墨尔本市政府负责管理及日常运作与维护,是墨尔本每年接待游客最多的历史古迹,也成为澳大利亚最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①

一般文物古迹要求尽可能地保存周围环境,周围环境也是理解这些文物信息的要素之一。但有些文物古迹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更遑论周围环境。所以“库克船长小屋”就具有了唯一性,而且由于库克船长对于澳大利亚的特殊意义,迁移过来的“库克船长小屋”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与“库克船长小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的埃及馆内最宏伟的展品,是来自尼罗河边的一座大约建于2500年以前的神庙。它总重量800吨,从埃及搬到美国时每块砖上都标记了号码,然后按号码组装。它是埃及政府赠送给美国的。失去了原来存在的环境当然是一种缺憾,编号组装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真,但与原真仍有区别。

三 在特定的氛围中才能有相应的感受

在余秋雨看来,“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

^① 关于“库克船长小屋”参阅了司徒一凡《从英国“猴”到澳大利亚的历史建筑》,《光明日报》2009年9月17日,第12版。

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我交融的本味”。^①

游览莱茵河从马恩斯到科隆，两岸布满了旧时的堡垒，朱自清写道：“游这一段儿，火车却不如轮船：朝日不如残阳，晴天不如阴天，阴天不如月夜——月夜，再加上几点儿萤火，一闪一闪的在寻觅荒草里的幽灵似的。最好还得爬上山去，在堡垒内外徘徊徘徊。”^② 月夜这个时间，再加爬上山去，才是体验古堡幽灵最好的时间和方位。

四 大遗址

大遗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文物保护界观念上的一大突破。大遗址概念就是要求文物保护工作不应局限于一墓一物、一塔一楼这样的单体文物，而应该把那些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大遗址成片地保护起来，并统筹考虑地方经济、居民生活、旅游开发、环境改善等多方面的相互和谐。

自2005年开始，国家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2006年，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偃师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古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在内的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名单。目前各地的大遗址保护已经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由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和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组成的“两片三线”为核心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形成。

^① 余秋雨：《江南小镇》，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② 朱自清：《莱茵河》，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五 英国的“蓝牌”和俄罗斯的标牌

蓝牌是英国遗产委员会向大伦敦地区的世界名人故居发放的一种证明。蓝牌制度在伦敦至今已经实施了140年，目的是纪念曾经住过伦敦且又对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世界名人。它是一块直径约50公分的陶瓷圆盘，上面有六行英文，第一行字比较大，写着人名。下面几行是他的职务、身份，还标有在何领域有何卓越贡献、生辰年月，再下一行是某年至某年，最后一行是“在此居住”一类的词。他们当中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等。一看便知，这是纪念文化名人的牌子。因为这些圆盘多为蓝底白字，故统称“蓝牌”。蓝牌镶嵌在该名人故居或曾经居住过的房屋的外墙上，供后人解读和瞻仰。

英国政府规定：凡是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挂上了蓝牌的建筑，属于国家保护的文物。一律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些经历过沧桑的老屋子，绝大多数没有建成博物馆或纪念馆。现居的房主该怎么住还怎么住，只是不得改变外形，房主有责任定期维修，保持整洁完好。

如今，在英国各地，像伦敦、利物浦、伯明翰、爱丁堡、曼彻斯特等大城市都设有名人蓝牌，蓝牌是非常醒目，也是随处可见的。目前仅伦敦的蓝牌总数已经超过了数百块。当人们及游客行走在大街小巷时，看到蓝牌，都会驻足止步，就仿佛在翻阅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①

在俄罗斯，某些著名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民族英雄等住过的一些建筑物的墙壁上都镶有标牌（多为小石板），上面标有这些人物的名字以及在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在此居住等内容。小小标牌表达出俄罗斯人对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尊重和纪念。比如，在莫斯科老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普希金故居临街的墙壁上，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在小石板上刻着：普希金于1831年2月初到5月中旬生活在这里。

在距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座楼房的墙壁上的标牌写道：1917年，

^① 宫丽：《王国维及英国“蓝牌”制度的启示》，《文艺报》2010年5月24日。

从这里进攻克里姆林宫（见图 4-3）。



图 4-3 1917 年 11 月，从这里进攻克里姆林宫
（本书作者赵建国 2006 年 5 月在此留影）

第三节 民俗与旅游传播

一 民俗旅游

民俗可以视作一种动态旅游文化资源。动态旅游文化可从民俗婚式活动、民俗生活活动、民俗节气活动、民俗演出活动、民俗体育活动、民俗工艺品制作等多个方面凸显出来。有文化学者提出，把“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保护自然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同等看待”。

社会风尚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日本古城京都曾出台了一项与众不同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规定凡是穿日本国服——和服出门的女子可以享受优惠待遇。

河南宝丰县马街书会已有近 700 年的历史,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农历正月十三,一年一度的“十三马街书会”有 1000 多人参加,支起了书场 190 多个,前来参观的群众约 30 万人。

二 关于民俗旅游与传播存在问题的探讨

(一) 民俗与日复一日的商业表演

由于民俗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民族节庆活动就成为旅游地经常性的甚至是每天的“表演”活动。

民族节庆活动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空间场所,甚至还带有一定的神圣性,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使之成为一种日复一日的商业表演活动,就会使这些节庆活动失去自身的文化魅力。同时,这种民族节庆的商业表演化,会丧失民族节庆活动的原真性。祭孔大典本应在孔子诞辰日举行,一年一次,但主办地山东曲阜却对外宣布,旅游旺季将祭孔表演改为每周一次。

(二) 某些风俗、民俗的负面社会影响

风俗、民俗并不应总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风俗、民俗在许多旅游设计者和旅游者眼中,它是欣赏的对象,较少考虑它带给社会和人类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

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终依傍着恒河,实际上是毕其一生不留任何余地地糟践恒河。我忿恨地想,早年恒河还清,尚能照见人脸的时候,人们至少还会懂得一点羞耻吧,现在在恒河眼中,这群每天早晨破衣烂衫地一个劲儿排污、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死后还要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河水中飘荡、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么?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个天天被河水洗涤的民族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多么具有诗意,而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又多么需要尊重。这正如一直有人劝我,写得轻松愉快一点吧,别再那么较劲、那么沉重。对这一切解释和劝说我全然拒绝。今后哪怕有千条理由让我来说几句“恒河晨浴”的美丽,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应,良知不答应。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因此不能不较劲,不能不沉重。^①

“恒河晨浴”,多么美丽的字眼!但它一旦成为无数人竞相追逐的一种风俗,就会破坏恒河的生态环境,就会成为人类的悲剧。

(三) 推进现代化进程与保持民俗

民俗由于具有旅游价值,促使许多地方开始保护民俗。在这种保护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过于推崇民俗。民俗是世界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当然应当尽可能地保存、延续下去。但民俗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一些明显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民俗,已经没有生命力,自然会被淘汰。这些民俗现在实际上只有观赏价值,已经没有实际存在价值。湖南张家界茅岩河畔又出现裸体纤夫,旅游公司解释说这是“一系列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民俗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策划和炒作,裸体拉纤已是消失有年的历史陈迹。

有些甚至当地人也不愿意再保持的民俗,为了旅游的需要,政府部门却要求甚至强令百姓保持,这是不合时宜的。为了让某些地方保持原有生活生态,甚至不惜人为割断这些地方与现代世界的联系,推迟这些地方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值得商榷的。这样做固然有利于旅游地的保护,但对于当地人不公平的,他们也有权享受现代生活。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第四节 工业遗产与工业旅游传播

一 工业遗产与工业旅游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其特点是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性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形成能够吸引现代人了解工业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的新的文化旅游方式。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2003年通过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该宪章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工业遗产不仅包括磨坊和工厂,而且包含由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效益与工程意义上的成就,如工业市镇、运河、铁路、桥梁以及其他物质载体。

2001年,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和青海省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成为首批进入“国保”单位名录的工业遗产。2006年4月,黄崖洞兵工厂旧址、中东铁路建筑群、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石龙坝水电站、个旧鸡街火车站、钱塘江大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导弹卫星发射场遗址和南通大生纱厂九处近现代工业遗产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不少地方在原有工业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工业遗址公园。

二 现代工业生产厂区的旅游开发

在德国奔驰公司,游人可以参观奔驰车的总装线,穿上工作服拧几个螺丝钉,还可以直接把车买走。工业旅游直接带动了汽车销售。

中国的燕京啤酒公司、海尔集团,通过工业旅游介绍企业、提升形象,发展了一批忠诚稳定的消费群体。

三 大型工程也可以形成旅游资源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大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都可以成为旅游资源。

王蒙在1984年谈到坐船经过葛洲坝时有这样的文字:“这次完全是一次新的、直觉的冲击,真是钢的工程、钢的技术、钢的气魄、钢的旋律,给人以壮哉伟哉、惊心动魄之感。”遇到逆流而上的船驶来,先打开下面一个闸门,将船放入钢铁壁垒之中,再稍打开上面的闸门,以徐徐提高船下水位。待得船下水位与江面持平时,便是念动咒语、芝麻开门的时刻,而闸面上铺设钢轨、可以走小火车的巨大的钢壁,便应声而开了。“我想,这真是一道钢峡,一道绝不比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逊色的钢峡。”^①在王蒙看来,葛洲坝工程绝不比自然的三峡逊色。

四 传统手工艺

手工劳动的最大特点是技术和劳动主体为一体,它带有地域属性和历史属性。有些地方可以利用手工艺搞旅游经济,因为手工技艺守住了这些东西,有个性、有审美趣味、有唯一性。

过去,大多数传统手工艺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进行生产。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与过去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传统手工艺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处于濒危状态。传统手工艺的具体创造过程由若干道工序构成,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工序是约定俗成的。传统手工艺的经验和技术属于非文字的民间知识体系,其传承主要通过父子、婆媳、师徒等传授方式进行。手艺人只有通过操作才能理解材料的特性,掌握工艺技术的手段,体验和控制手感的分

^①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寸, 品味和创造物品的样式。可以说, 传统手工艺的产品、经验和技術也都是生产的结果。

对传统手工艺采取“生产性方式保护”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这样可以使这些手工艺“复活”和传承。但“生产性方式保护”不等于商品化、产业化、旅游化, 对生产性保护方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产业化。如今, 一些手工艺产品的经济价值权重下降, 而其文化、科学价值的权重上升, 成为彰显文化价值的艺术产品。艺术产品要求独创性、唯一性、差异性和个性化, 而工业化的产品则要求规格化、集成化、标准化和同一性, 两者是相悖的。产业化只适用于符合工业化条件的产业。

第五节 博物馆与旅游传播

一 博物馆及其功能

1946年11月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 将博物馆定义为: “不追求营利, 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博物馆应以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为己任, 以便将收藏品展出, 为公众提供学习、教育和欣赏的机会。”

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当属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在西方, 许多人把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的冬宫和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并称为世界五大著名博物馆。博物馆是对历史的收藏, 一位西方朋友说, “西方人对收藏历史达到痴迷的地步”。中国人有重视文字记载历史的传统, 而收藏历史(实物)的观念相对薄弱, 现在这种观念正在改变, 实物收藏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般认为博物馆有三大传统功能: 收藏保管功能、研究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

西方人已将博物馆概念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整座城市。意大利的

罗马、庞贝、威尼斯，希腊的雅典，捷克的布拉格，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马德里，德国的德累斯顿，都称得上是一座“露天博物馆”。

二 综合类博物馆受冷落及其原因

综合类博物馆受冷落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国际上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庞贝古城、斗兽场等古迹的参观人数也远远高于综合类博物馆。

为什么古迹旧物馆与综合类博物馆在旅游者心目中有天壤之别？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建成正分析说：“这种差别首先缘自古迹的特性。遗址、古建都具有独一性。故宫的金碧辉煌、兵马俑的雄伟壮观都是只能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使人们纷纷前往。”

另一方面，参观古迹时的临场感是在综合类博物馆里无法体验到的。古迹有其特定的景观氛围，观众身在其中能感受到历史的信息。参观秦兵马俑博物馆时，注视着坑中那由数百个神态各异的兵马俑组成的军阵，眼前自然幻化出当年秦国大军横扫六国的叱咤风云。同样是兵马俑，当它们立在展厅的恒温箱里时，给观众的感受就会大相径庭。而这种亲临现场的感受正是古迹的魅力所在。^①

除了上述原因外，博物馆的自身理念也应该反思。某国家级博物馆曾举办过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文物特展，汇聚了大量极品，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位。但开展时，所有文物包括从未公开展展出过的国宝，除标注着文物名称和年代、作者的说明牌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提供给参观者。记者曾问过博物馆为何不配备讲解员，回答是：展品太珍贵了，每件文物蕴涵的文化信息都能讲一天，没有讲解员有如此丰富的知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观众需要了解的不过是文物的一些基本信息，根本不会要求讲解员做专业讲解。当问到为何不配备语音导览时，回答是制作要成本，没钱。一百余件极有价值

^①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如何让游客走进综合类博物馆》，《光明日报》2009年5月18日，第5版。

的文物从全国各地汇聚一处，却由于没有周到讲解，导致很多观众兴冲冲而来，悻悻而归。记者清楚地记得，一位专程从外地赶来的观众愤愤说道：“看不明白，再不来这儿了！”^①

中国的展馆包括博物馆，奖杯、锦旗之类的东西较多，国外的情况可与之对比。与国内不少企业开设的展馆不同，日本企业设立的博物馆里面没有一个奖杯或一面锦旗，它们最大限度地追求达到博物馆本身的效果，更多的是通过展出与本行业有关的历史文化从而间接介绍本企业的产品和历史，有实力的企业还会建立一个专门为人们提供文化享受的展馆。当然，这些努力既使日本民众增加了走进博物馆的机会，也促进了各自企业的发展。^②

其实，综合类博物馆也大有可为，只要有创意，有珍品和真品，参观者也会非常踊跃。2003年1月6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因为“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落下帷幕而变得不普通。在上海博物馆的50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展览把闭馆时间定在子夜，让最后一批观众在迎接晨曦时离开，而气氛比开幕式还隆重热烈。在办展的三四十天间，每天凌晨，摄氏零下五度，在严寒中开始形成队伍，直至早上开馆。进馆后，在两个展厅前依然排起长队。在二楼展厅的《清明上河图》前，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有媒体报道说：“不是计划时期抢购凭票商品，不是春运高峰期苦候返乡车票，不是房产旺市竞买火爆楼盘。前所未有的长队，史无前例的人潮——上海排队看书画。”^③

第六节 世博会、奥运会与旅游传播

现在，世博会、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性旅游盛会。我们完全可以从旅游和旅游传播的角度来审视它们。奥运会

①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如何让游客走进综合类博物馆》，《光明日报》2009年5月18日，第5版。

② 严圣禾：《走进日本企业博物馆》，《光明日报》2009年8月7日，第8版。

③ 陈燮君：《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人民政协报》2009年9月14日。

和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使亚特兰大、巴塞罗那等并不出名的城市名闻天下,游人纷至。

恰好,中国2008年举办了北京奥运会,2010年举办了上海世博会,使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亲身体验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展览会和体育运动会。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对于中国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人直接感受、体验奥运精神和世博会神采,都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一 世博会、奥运会作为旅游传播所呈现出的特点

世博会的宗旨是“欢聚、合作、展示、沟通”,其中的每个词都与传播、交流密切相关。几乎每次世博会都是人类文明的精彩对话。

由于交通现代化,现在的世博会和奥运会都为举办国带来了难得的旅游机会。举办城市自然成为旅游热点,举办城市周边地区也会迎来众多的国外、国内游客。对于举办城市来说,也是改善城市旅游硬环境和软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绝佳时机。北京提出口号“新北京、新奥运”。事实上,北京和上海都抓住这一时机有效改善了城市的软环境、硬环境和城市形象。

游客集中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举办期间和前后一段时间,观众旅游是借参观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机会顺便旅游。按照奥运旅游的一般规律,奥运主协办城市的旅游高峰在奥运闭幕后到来。近20年来的历届奥运会,外国旅游者的人数是参赛人数的25—40倍。有调研发现,一般是奥运当年普通旅游者规避赛事高峰,只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才前往举办国旅游观光和观看比赛,但奥运会后,多数举办城市的旅游都出现了增长的势头,而且这种势头一般会持续好几年。

同时,由于远道而来的客人较多,所以他们多选择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北京,他们会选择故宫、八达岭长城等,周边会选择承德避暑山庄、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等;在上海,他们会选择外滩,周边会选择苏州园林、周庄、杭州西湖等。上海提出的世博会旅游口号是“中国上海,发现更多·体验更多”。

二 上海世博会与旅游传播

上海世博会在不少方面都是空前的，但它的文化、科技传播价值不应过早下结论，还是留待时间去验证为好。

下面是笔者参观上海世博会的见闻和亲身感受。

（一）缺乏真品实物与“强迫”看电影的美国馆

上海世博会美国馆主要是两部电影，其中包括一部名为《花园》的影片，没有像样的实物。美国馆官方网站也说这是“虚拟的美国之旅”。许多观众带着厚望排较长时间的队等候，据报道，开幕仅15天，美国馆的参观者就达到50万人次。但参观完之后，多数参观者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从人们的失望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真品实物在展览会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种情况使笔者想到了2001年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博会。2006年8月31日上午，余秋雨在北京跨文化传播论坛上的发言中谈道：进入中国馆，挡眼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里边是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一座小小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教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基本就完了。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美国不重视上海世博会”，“美国主办和参加过的世博会太多了，已经累了”，不少中国观众内心嘀咕着。但美国人却说，他们“很久没有如此重视过世博会”。这种说法倒不一定完全没有根据，因为美国先后举办过14次世博会，参加过的世博会就更多了。“世博过时”论调时时挂在美国人的嘴边。随着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很多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世博会已经过时，没有再举办的必要。“在普通美国人眼里，世博会早已是好景不再的事物。”国际学术刊物《亚洲研究》主编J. 沃瑟斯特朗就曾持有这样的观点。美国曾缺席2000年德国汉诺威和200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世博会。2001年，美国政府甚至宣布放弃国际展览局的会员身份。知道了上述背景，我们就不难理

解美国对世博会不上心了。

客观地讲,美国馆对美国形象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甚至有人说它是“恶评最多的展馆之一”。但美国的整体形象,尤其是它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形象,并没有在观众心中改变。世博会里的每个国家馆只是展示一个国家的窗口,办好了,确实有助于传播自己国家的形象。但对于早已在世人心中有固定形象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它们的国家馆只会在不同程度上强化受众心中原有的形象,很难改变它们在受众心中的整体形象。其实,美国馆从反面强化了人们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不重视”、“已经疲了”,并没有改变人们心目中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的形象,相反,却从反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象。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世博会、奥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性的、集中的盛会,固然是展示和传播一个国家和组织的不可多得的时机和窗口,然而,日常的传播来得更潜移默化、深入持久。

观众对美国馆另一个不满来自于它的参观顺序设计。作为主要参观内容的两部电影,只要进入美国馆就是必须看的,不看也要等着,只有影片放完了,下一通道才为参观者打开。观众不看的选择权被剥夺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设计,不少参观者肯定会马上放弃观看而进入下一通道,这样美国馆就留不住观众的脚步。也许,展馆设计者当初已经意识到美国馆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足以吸引住参观者,所以才有了这种参观顺序的“强迫性”。从布展和传播角度看,对美国馆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策略。这么说来,美国人还是深谙展览之道和传播策略的。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是美国馆不自信的表现。法国馆就很自信,在参观顺序上没有这种“强迫性”,你不愿意看,尽可马上进入下一个展览内容。

本次世博会大部分场馆都选择了投影、视频、3D、4D等手段。中国国家电力馆的立体“魔盒”、万科馆的天幕穹顶、通用馆的震动座椅、泰国馆的4D立体影像等都是展示的核心,但太多了,就使人们对世博会的展品质量尤其是真品数量产生怀疑。如果展示的是视频新技术倒未尝不可,问题是以视频手段代替真品实物会大大降低世博会的质量。

（二）被众多游客冷落的主题馆和世博会博物馆

排队时间过长，是所有参观过上海世博会的人的共同感受。但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会博物馆的文化、历史含量都很高，却往往不用排队等候就可参观。这说明，多数参观者在追逐时尚、热闹。

世博会博物馆中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参加 1900 年巴黎世博会展览的 7 件铜雕原件（罗丹美术馆珍藏），包括堪称经典的《思想者》、《吻》、《巴尔扎克》、《乌戈林和他的孩子》等。在巴黎世博会上，罗丹展示了他的作品，轰动一时，也让罗丹的艺术生涯达到巅峰。

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到这个展馆的人本来就较少，即使来到这里的观众，多数人也是从这些弥足珍贵的展品面前一掠而过（见图 4-4）。难得一见，却视而不见。这与媒体宣传、报道不够有关，因为在法国馆，同样是罗丹的作品（《青铜时代》）却观者如堵，但也与观众的文化艺术素养有关。这使笔者想起了当年罗丹的雕塑作品在北京和上海展出时，作家铁凝曾经专门乘火车到北京中国美术馆排队



图 4-4 上海世博会世博博物馆内雕塑巨匠罗丹的 7 件原作前有时只剩下了工作人员（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晚 21 点 25 分）

购票看罗丹。当然,那次《思想者》等是大型雕塑,这次是不到一米高的,但都出自罗丹之手。

第七节 旅游传播源的不断开发 ——太空旅游

可供开发的旅游传播源不少。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够成为旅游的对象。英国伦敦一个名为“短袜大众”的爱心组织发起了一个试点项目“无人关注景点游”。这个项目由无家可归者充任导游,参观那些不为人知的景点,让旅游者了解伦敦的不同侧面。

太空旅游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带给人们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从太空旅游中获取的信息也是现在所有旅游项目中不能得到的。宇航员可以说是人类到太空旅游的首批游客,他们在太空中的体验和获取的信息可以作为今后太空旅游的参考。宇航员布兹·埃尔德林说:“从太空往下望,地球就像在你的书桌上。如果你从地图上观察诸如地中海或者美国等地区后,再从太空看看这些地区的模样,真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①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展览馆中有一个展室,其标题用英、西、法、德、俄、日六种文字写道:“下一步向何方,哥伦布?”其中的解说词如下: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 500 年前发起跨越未知海洋的探索 and 发现之旅,改变了整个世界。此前,欧洲和美洲无人预见过全然不同的文化的相遇。没有人想象到“新世界”的出现。

今天,我们居住的星球处处都有人的足迹;它的最边沿地区都已经住满了人;跨越浩瀚的海洋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们已经进入太空,我们谈论着在月球和火星上定居。我们成了宇宙航

^① 邹树梅:《旅游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9 页。

我们还将继续进行对各个星球的探索吗?这一展览显现了今后 500 年我们探索和发现宇宙星球的前景。在我们作出有关未来的探索的决定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今后会面临何种挑战、选择和结局?^①

到太空去旅游,也许在不是特别遥远的未来就可以实现。现在有幸进入太空旅游的有美国富翁丹尼斯·蒂托和南非商人马克·沙特尔沃斯,他们各自为自己的太空体验支付了 2000 万美元的天价。

2005 年 2 月 27 日,美国太空探险公司与香港太空旅游公司在深圳彭年酒店签约,正式授权香港太空旅游公司代理其在中国的业务,推广多个太空游项目,这标志着太空游正式登陆中国。

^① 曾彦--:《哥伦布》,辽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1--212 页。

第五章

旅游传播者(一)——旅游主体

旅游传播者包括旅游主体与旅游介体。本章首先讨论旅游主体，第六章接着讨论旅游介体。这里所说的传播者，并非只传播信息不接受信息，他们既接受信息也传播信息。事实上，在所有传播活动中，传播者首先是一个接受者，只有首先接受信息，才能传播信息。

第一节 旅游主体(旅游者)与旅游传播

旅游观赏对象不能移动，它不像某些实物产品一样，可以被消费者预先试用、观察并检验质量。旅游者会存在对旅游服务的不确定心理。同时，旅游决策却是在旅游之前作出的。游客到陌生的旅游目的地之前，总希望对旅游地的自然、文化环境、旅游资源、旅游设施与服务有所了解。旅游者试图通过信息搜寻减少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者首先是接受者。

这里所说的旅游者既包括普通旅游者，也包括一些特殊旅游者，比如旅行家、记者、作家、艺术家、人文社会科学家等。由于旅行家、记者、作家、艺术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旅游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们还要设专节讨论他们。

一 旅游者与旅游传播

(一) 旅游客源地与旅游传播

旅游客源地 (tourist generating regions) 是旅游者居住与旅行出发的地方, 也是旅游客源产生的市场。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收集信息并对信息分析和评价, 然后准备、预订旅游, 从客源地出发, 开始旅游。旅游结束再回到客源地即旅游者居住地, 并把旅游目的地信息带回居住地。

(二) 旅游者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

在旅游传播中, 旅游者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

1. 旅游者接受者

在旅游景点游览和听导游解说时, 旅游者主要是接受者。民间早就有这样的谚语: “多喊一声哥, 少走十里坡”; “鼻子底下通南京”; “行路能开口, 天下随便走”。多问路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旅行者、旅游者需要获取道路、路况、方向、地点等信息, 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问路。即使是现代旅行者手中有地图、导游图, 甚至有电子导航仪器, 向当地人问路仍然在所难免。旅游者问路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传播过程, 就其主要方面来说, 旅游者主要是接受者, 因为他们需要得到“怎么走”的信息。

作为接受者, 旅游者在游览中应当看些什么或者说接受些什么? 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曾经专门论述过。他认为在游历当中应当游览观察的事物是: 君主的朝廷, 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 法庭, 尤其当法官开庭问案的时候; 还有宗教法院; 教堂及僧院, 和其中遗留的纪念品; 城市的城垣与堡垒; 商埠与港湾; 古物与遗迹; 图书馆; 学院, 辩论会, 演讲; 航海与海军; 大城市附近的壮丽的建筑与花园, 武库; 兵工厂; 国家仓库; 交易所; 堆栈; 马术训练; 剑术; 军操, 以及此类的事务; 上流人士所去的戏院; 珠玉衣服之珍藏; 木器与珍玩。至于那些盛典、宫剧、宴会、婚礼、出殡、杀人以及类似的景象, 是无须乎记忆的; 然而也不可把它们忽略了。“一言以蔽之,

应观看所到之处一切值得记忆的风光名胜和礼仪习俗”。^① 他注重人文方面,自然景观方面涉及较少。

2. 旅游者是传播者

在旅游地与当地人或其他旅游者接触、被当地人或其他旅游者观察、审视时,旅游者是传播者。1866年,中国第一个欧洲旅游考察团在法国旅游时,有当地男妇数人,问团员德善道:“你们是哪国人?”德善答道:“中华人也。”对方又问道:“彼修髯(长须)而发苍者,谅(想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帽耶?”德善笑答道:“皆男子也。”结果“闻者咸鼓掌而笑。归时一路黄童白叟,有咨询者,有指画者,有诧异者,有艳羨者,争先睹之为快”。^② 显然,对法国当地人来说,这些中国旅游者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

当回到出发地向当地人介绍自己旅游过的景点情况时,旅游者是传播者。“倦游预约归来日,海阔天空细细谈。”^③ 培根曾劝导旅游者在旅游结束后仍要注意交流:“一个旅游者返回家以后,不要把他游历过的地方置于脑后,而要与最值得交往的朋友保持通信联系,而且不要把他的旅游收获反映在衣着和举止上,而要在言谈时说说观感。而在言谈中,也最好在回答问题时谈观感,而不是抢先说自己的旅游经历。”^④

在旅游业中,顾客的忠诚度并不一定体现在对旅游产品的重复购买上,而主要表现在顾客对旅游产品的正面口碑传播上。对于旅游目的的旅游消费多数是一次性的,因为旅游者对绝大部分旅游点终生只光顾一次。但这不等于它对之后的消费不起作用,因为游客的口碑传播对于旅游点的客源影响很大。

游客的口碑传播也会对旅行社的经营带来影响。上海曾有两家旅行社一同接待一条日本大型游船,一家是当地名牌大社,另一家是无

① [英] 弗兰西斯·培根:《论远游》,参见《培根随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② 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③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④ 培根:《谈旅游》,参见马诒主编《英语名篇精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名小社。送团那天，大社按常规服务，将游客送进码头海关安检处后就离去了。而那家小社为了带好团，详尽地研究了旅游服务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并且在送团时安排了欢送仪式。那天雨下得很大，在船甲板上的日本游客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赶进了船舱，但这个社的工作人员硬是冒着倾盆大雨站立不动。当日本游客看到这支欢送的队伍站在雨中全身湿透仍纹丝不动时，纷纷又来到大雨倾盆的甲板上，含泪挥手。结果 200 多人的团队，小社接待的有 100 多人，离去时彩旗飞扬，上下呼应，气氛非常热烈。许多日本游客把这感人的欢送场面拍摄下来，回日本后在当地放映，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都把这家小社作为信得过的旅行社，此后就是三四百人的团队，也全部交给这家小社接待。

旅游者既是旅游的主体，又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在旅游中主要是去感知异国异地的文化，同时也把自身的文化和他所感受到的文化有意无意地传播给别人。“旅游文化系统中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文化，经由主体的媒介作用而相互传递，形成传播性特征。旅游文化也就成为一种移动的传播的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随着旅游主体的运动而飘移和扩散。旅游主体是他所在民族、地区文化的载体，中国旅游者承载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西方旅游者承载的是欧洲的成熟文化。由于旅游主体的移动，他所承载的文化，便也随着旅游者的运动而移动和传播。与此同时，旅游主体在移动中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也会对他产生影响，他会将目的地的文化回传给出发地，从而形成碰撞、交流和融合。”^①

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文化之间或是地域文化之差，或是异质文化之别，两种不同的文化由旅游主体的双向传播以及介体的作用而发生接触、交流甚至冲突，出发地的文化常常对目的地的文化产生辐射、冲击和搅动，但目的地的文化通过旅游主体对出发地文化产生的影响更为潜在和深远。马可·波罗在中国漫游 17 年，但《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产生了长时间的影响，直到 15 世纪哥伦布探险仍然在寻找着中国。

^① 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 页。

旅游团体的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个临时性的团体中,各种文化和文明交织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这个群体在旅行移动,于是混合的文化和文明也随之移动,并且在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对抗和扩散。

旅游主体的移动实现了旅游出发地、旅游客体、旅游中介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联结。

(三) 旅游者的相互传播

1. 旅游者社会

外来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多数只做短暂停留,但由众多旅游者构成的整体来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即旅游者群体,有人把它叫做旅游者社会或客人社会。在旅游者社会中,游客之间可以相互传播。

2. 游客之间的相互传播

旅游中的旅游者相互之间的传播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他们的口耳相传。但是,如果口耳相传配合着动作、行为,那就是更为有效的立体式传播了。

3. “旅游传染病”

在不少旅游地,我们可以看到游客之间语言上的互相传递和动作上的互相模仿。有些传递和模仿实际上都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人们却乐此不疲。其中一种就是争相往一些古树上绑挂红布条,据说此举可以为自己带来吉祥。下面是笔者拍下的徐州云龙山放鹤亭旁几株树上挂满了红布条的“景象”,这种“景象”说不上美(见图5-1),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旅游传染病”。

就连上海世博会,也运来了查理斯大桥上的红衣主教扬·聂波姆斯基雕像下的浮雕,因为捷克人相信,只要能够摸一摸浮雕,就能够获得好运。这两块青铜浮雕每块重20公斤,长66厘米,宽53厘米。几百年来,浮雕历经无数人的触摸,中间泛出了金黄色。在捷克馆,很多观众亲手触摸浮雕,希望得到“真实的幸运”。

胡也频在谈到雷峰塔的倒掉时说过这样的情况:“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



图 5-1 徐州云龙山放鹤亭旁几株树上挂满了红布条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

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我的表兄曾这样做过，——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①处在风景区的雷峰塔就这样被游人给挖倒了。看来，“旅游传染病”早就有。

（四）旅游心态与旅游传播

通常，许多人旅游是为了从日常工作压力与生活烦扰中解脱出来，也是为了“换一个环境”，“改变一下自己”。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模式里，那他或许就需要有一个具解放性的改变。而此需要，可以通过赴世界各地旅游以得到暂时的解决。”^②注意，这里所说的解放是暂时的解放，旅游结束之后通常还

^① 参见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注释[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②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要回到原先的环境中。因此,旅游时获得的心态,回到原环境中时完全保持下来的可能性不大。正因为如此,旅游心态与惯常心态不一样。可以说,旅游也是一种解放,从惯常的甚至烦腻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解放就是身心放松、精神放飞。

1. 旅游心态特征:放松与放纵

一旦进入旅游状态,就会出现旅游特有的游客心态。这种心态的特征表现为轻松而无功利目的。正如林语堂所说:“旅行的要素是没有责任,没有一定的时刻,没有信件,没有好事的邻人,没有欢迎的代表团,也没有目的地。”^① 总之是摆脱了日常工作责任和生活琐事的缠绕,进入一种休闲、放松、无干扰的状态中。这种旅游心态特征很值得注意与研究,因为它是旅游心态与日常心态的重要区别。

另外,由于旅游是在外地甚至是身处异国他乡,周围似乎没有了日常的“督促”和“监视”,游客往往有这样的心理:反正谁也不认识自己,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了。同时,旅游地往往也对外来游客比较宽容。于是,“做客山中的妙处,尤在你永不需踌躇你的服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桀卜闪,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尽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颜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② 许多到外地的旅游者恐怕都有类似心理。

如果说放松是人们旅游所期待也能够得到的积极心态,那么,对于有些游客来说,放松过度,很可能就走向了放纵。正像 Malcolm Crick 在其著名的综述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旅游世界是由许多倒逆现象构成的:从工作到玩耍,从常规道德准则到道德失常,从节俭到挥霍,从约束到自由,以及从有责任感到自我放纵。对某些人而言,旅游是从现实生活枷锁中的一种挣脱;它可以不承担义务,可以

^① 林语堂:《论游览》,参见《林语堂散文全集》第2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

^②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参见《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桀卜闪”通译吉卜赛。

随心所欲，可以不受限制。”^①对日常的压力、压抑、不满的过度冲决就表现为放纵。应当说，这是一种消极心态，它会给旅游地和旅游者本人带来不利影响。

2. 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旅游心态

所谓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旅游心态，是指旅游时受游客固有价值观、既有政治倾向以及过度悲伤等影响而具有的一种旅游心态。通常情况下，它会干扰旅游本来特有的心态。

卢梭说过：“一个人抱着什么目的去游历，他在游历中，就只知道获取同他的目的有关的知识。”这带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味道，由于有了某种目的，可能对大千世界中别的东西视而不见、听若未闻。王蒙的旅游心态就很好：“我要将我的漫游的见闻告诉你们，然而更重要的不是我到了什么地方和我看见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的漫游的心态——饶有兴味，心平气和，广结善缘，八面来风，努力去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一切。而不是撅着大嘴，气急败坏，拒人于千里之外。”^②旅游有助于心胸宽广，而带着开阔的心胸去旅游，可以吸取更加广博的知识，更加有助于形成宽广的心胸。

梁启超在游锡兰岛时记述了同游者张君劢碰到一个土人，“他问那人你们为甚么不革命，闹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对。诸君评一评：在这种潇洒出尘的境界，脑子里还是装满了政治问题，天下有这种煞风景的人吗？”^③确实，这位张君没有真正进入旅游状态，既有政治观念还在明显驱使他。

J. 比尼古尔的《趾高气扬的旅游者在非洲》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揭示了发达国家的某些旅游者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去旅游时的心态。

（五）旅游者的个性与旅游传播

随着旅游者旅行经验的积累和消费观念的日益成熟，现代旅游

①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②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③ 梁启超：《游锡兰岛》，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者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更能展现个性的新的旅游方式。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美国家的年轻人就在追求个性的亚文化的熏陶下,开始所谓的“背包旅行”,以对抗包价旅游方式越来越浓的商业气息。一般来说,在包价旅游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比较少,而那些个性化旅游者则有较多机会亲近当地文化和自然。

背包旅游者是指那些年轻的、有节约意识的旅游者,他们偏好经济的接待设施,强调在旅游中与别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接触,独立安排具有灵活性的旅游线路,较长的而不是较短的旅游时间,他们参与的娱乐活动通常是非正式的。他们在旅游中期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个性体验和冒险经历。他们中的部分人表现出更鲜明的旅游个性,个性更强的背包旅游者会说:“我的感觉不能忍受那些经常被旅游者光顾的地方。”

背包旅游者通过相互联系建立非正式交流系统,他们将自己在旅游目的地的经历和个人感受写成报告或文章,或者以口头传播的方式告诉他们的同路人,帮助那些后来的人建立起对旅游目的地的心理预期。分享在旅游目的地的各种感受成为年轻人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并因此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化认同。当然,目的地的各种旅游接待设施也经常利用这种背包旅行者的非正式的人际和话语系统,以口碑效应的形式传播他们的优质服务。

有些旅游者并非背包旅行者,他们旅游愿望强烈并且也常常独行,因为他人会妨碍他们的旅游计划和旅游兴趣。像下面一类情况,包团旅游是不会遇到的:“七点一刻,我走下山,沿着教堂的东侧,走向铁桥后面,所谓裴尔吉的坟墓,豁然在目!可惜铁栅栏门关了,只能遥望,而且隔着黄昏,也望不清白。其实一下车,从站台的尾端往西望,就是我的目的地。没有错过,也像错过,那种味道决不是若有所失四个字形容得尽的。”^①多数旅游点下午关门时间较早,赶到时已经关门。由于旅游时间的限制,而且可能没有机会再来,面对心

^① 李健吾:《拿波里漫游短札》,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7 页。

仪已久的游览对象却只能隔栏相望，这种境况和心情笔者也曾在旅游中多次体尝。

旅游与休闲能够彰显个性，我们当然也能够通过旅游与休闲认识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的个性。林语堂说：“倘不知人民日常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我们倘非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我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无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我想中国人在玩耍寻乐的时候，比之于正经事情的时候远为可爱。”^① 休闲与旅游，是全面认识和理解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性格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六）境外游中每一个旅游者都代表着自己国家的形象

浙江湖州人潘明德生于1908年，他于1930—1937年骑自行车环球一周，游历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200个团体和个人签字，其中得到印度尼赫鲁、土耳其凯末尔和美国罗斯福的接见、签字。他的环球游在世界人民中传播了中国人的形象。

埃及哈姆迪（Hamdy）觉得一个国家的具体形象，体现在零散的旅游者身上。在出境游中，一些中国人的旅游形象有待改善。他批评部分中国游客：

一、很少有人听导游讲解文物，只想购物、拍照；二、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游时一脸困倦……^②

电梯门一开，不管里面有没有人，有的中国人就抢着冲进去了。文明的做法应该是等电梯里的人出来后再进，而且女士优先。在街上扎堆抽烟的多半是中国人，旁若无人地打电话或大声讲话的中国人也不鲜见……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在纽约第五大道看到过的情况。

① 参见杨乃济《旅游与生活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② 参见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二 旅游消费与旅游传播

旅游消费当然是指旅游者的消费。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读旅游消费行为”^①，“我们可以将旅游消费活动理解为信息流、资金流、能量流、物质流的综合传播过程，而这些传播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和系统性”。

由于旅游商品购买和消费的地点同一性和时间同步性，即购买的过程就是旅游产品的消费体验过程，因此旅游者的购买决策相比较于其他商品而言，对于信息的依赖程度非常强烈。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介入能有效帮助消费者进行信息的筛选和抉择。其中，报纸、杂志、电子等大众媒体之间联动所构成的“信息链”对于旅游消费者构成了引导主体：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声画合一”所营造出来的形象美感，纸质媒体生动具体的文字刻画，旅游信息在媒介中“新闻化”的形式转换等，间接形成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系统的完整展示，诸如香港“购物天堂”、云南西双版纳的“旖旎风光”、杭州的“人间天堂”、西藏的“古朴旷远”等，都是借助媒体所营造出的经典形象。这些都对旅游消费主体起到了直接诱导作用。

除了大众传播，这个阶段人际传播的介入也是比较频繁的，它发挥相应强化或者弱化大众传播的辅助作用。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旅游购买决策的谨慎性，相比较于大众媒介传递出来的带有鲜明广告意味的“说服力信息”，亲戚朋友之间“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更能让消费者放心。这个阶段，潜在的旅游消费者往往会结合自己在大众媒介上形成的目的地形象偏好，并尽可能地参照周围人已经有过的相关旅游购买行为的经历，来作出相应的购买决策。

对于团队包价或者半包价旅游而言，出行的游客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组团，由代表旅游中间商利益的导游带队，在整个行程中不断与外界群体发生各种形式的互动。组织传播贯穿于旅游购买活动始

^① 唐娟、孙卫华：《旅游消费过程的传播学解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7年5期，第21—26页。

终。旅游活动所涉及的组织门类繁多,如旅游业中不同业态的企业、旅游行业协会组织、旅游政府部门、园林部门等。这些组织在行政划分上可能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但是它们的服务对象或者目标市场都是以旅游者或部分或者全部主体,组织协作的共同目标就是为旅游者购买行为的顺利进行提供协同服务。

各种旅游行业协会、旅游相关企业以及它们所处的更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构筑了传播模式的更大的宏观运转环境,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交互式传播结构。旅游者、旅游企业、大众传播媒体、未来潜在旅游消费者是旅游消费反馈阶段涉及的最为突出的四大主体。通过这个过程,实现了循环式信息传播,这些主体首尾衔接、循环互动,符合传播过程中的“信源”、“信宿”、“讯息”、“媒介”以及“反馈”这五大要素,传播主体既作为传播者,又成为受传者,其角色、作用关系都是非固化的。

对于旅游者而言,经历一段时间的外出游览,是一种身体疲劳、精神则相对亢奋的阶段。旅游者对旅游经历的感触较深,也比较愿意与亲戚朋友分享其旅游产品消费经历,同时旅游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人们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之后的较高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无论“分享”还是“炫耀”,都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旅游者在这个过程的人际传播中具备相当的主动性。

大众传媒对于旅游信息的播报已成为旅游发展的监控和推动机制之一,在购买后的回馈阶段,大众传媒的介入也是较为频繁的。无论是将旅游业的信息传播到消费者那里,还是将消费者的“分享”、“炫耀”甚至“抱怨投诉”传递给旅游业,大众传播的作用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中越来越不容低估。对于某些投诉、建议行为,消费者更倾向于借助受众面广泛的大众媒体进行,而这也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关注的新闻题材之一,而大众媒体则通常通过对旅游企业的直接调查、采访形式实现新闻取证。黄金周旅游预警系统是大众传媒对旅游信息进行播报的典型例子,黄金周期间的井喷式消费对某些旅游热点景区的接待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超过了当地的环境承载力,大众传播介入使得旅游信息预警系统在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上更为广泛,有效地协助了旅游旺季的游客分流,协调了游客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均衡

分布。

购买后的回馈阶段是旅游者从目的地返回到客源地之后的行为阶段。这个过程的传播看似一种旅游消费的“终点”，但实质上又是一种信息交流过程中的起点。图 5-2 说明了这一回馈阶段的传播模式，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充分发挥效应的虚拟假设基础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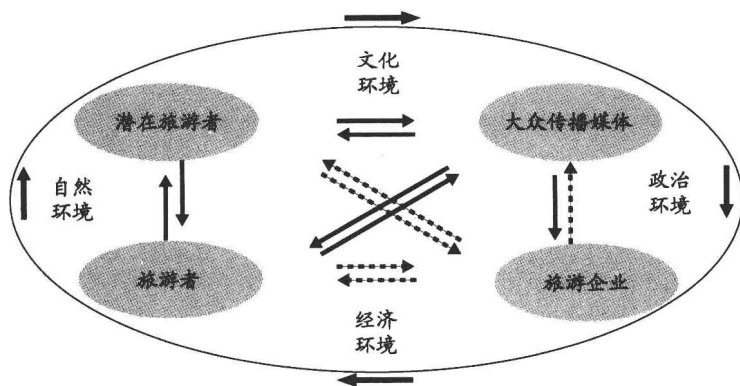


图 5-2 旅游消费回馈的传播模式

说明：图中实线表示现实的相对充分的传播，虚线则表示传播程度不充分。

组织传播在这一阶段主要指的是旅游企业在旅游者购买行为结束之后，通过组织策划的包括消费意见的征询等各种方式，形成从旅游组织到旅游消费者、旅游消费者到旅游组织相互的信息流。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组织传播在消费环节往往表现得很不充分，存在着以下认识误区：旅游消费者从目的地返回往往被视为旅游消费过程的终结，旅游组织链条中缺乏对于旅游消费过程后续服务的追踪与跟进的环节。消费者后续服务的“缺位”往往容易导致消费者绕过旅游企业，运用“向大众媒体曝光”这种极端不利于旅游企业未来市场前景的方式来解决旅游消费过程中的争端。

从旅游者的决策、购买、购买后的返回这三个阶段看，最后一个阶段往往被看做信息在旅游者、旅游企业、传播媒体之间震荡传递的一个中止符。就我国目前的旅游传播的反馈现状而言，从旅游经营商到旅游者的传播显然是缺位的。

在旅游者到达旅游目的地之前,旅游者不能直接观察和接触旅游目的地,这就更增加了旅游宣传推销活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有学者注意到,旅游者在旅游区所表现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多不会在他们回家以后继续保持下去。

三 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影响

(一) 施密斯(Smith)关于旅游者对当地居民产生影响的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更显著的是旅游者对当地居民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者是施密斯(Valene L. Smith),其代表作是他在1977年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关于不同类型旅游者对旅游地社区影响强度的关系,有学者根据施密斯的研究整理如表5—1:

表5—1 不同类型旅游者对旅游地社区影响强度

旅游者类型	旅游者数量	对社区影响
1. 探索者	非常有限	 弱 强
2. 社会名流	极其少见	
3. 非常规游客	不普遍但可见到	
4. 特殊游客	偶尔可见	
5. 小团体游客	客流量稳定	
6. 大批量游客	不断涌入	
7. 包机游客	大批量抵达	

资料来源:邹统轩、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施密斯主要是以游客数量来考察对旅游地社区的影响,这自有其道理。然而,“探索者”、“社会名流”等人数虽少,但影响力不可低估。比如,中国学者余秋雨可以归类为“探索者”,

他对一些旅游目的地比如平遥古城、都江堰、岳麓书院的影响是远超“小团体游客”、“大批量游客”、“包机游客”的。施密斯重点考察的是短期影响,长期影响也不能忽视,它往往更加深刻。

(二) 游客对旅游地的多方面影响

1. 大批量游客对旅游地的影响不可忽视

本来,短期的少量的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和居民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大量旅游者持续不断地来到旅游地时,他们对目的地的影响就不可忽视了。这种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两种地域文化的碰撞即旅游地和客源地文化相遇的结果”。^① 旅游地,特别是著名的旅游地,由于所吸引的客源市场的地理分布相对广泛,会经历多种地域文化的交流、沟通和影响。这时,各种信息、文化对旅游地居民的冲击力就不可小看了。

我们来看一位记者对自己的家乡泸沽湖的观察和报道:

泸沽湖虽然地域封闭,但人们每天接触电视、广播、报纸、书刊,外来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当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正在起着变化。比如,这里的婚姻制度已嬗变为三种形式:一是走婚制,这是母系社会婚姻的主要形式,约占70%强。二是“阿夏同居婚”,这是“走婚”这棵树上生出的一根枝杈。这种婚姻指已结成情侣关系的男女同居一家,但不另立门户,男到女家或女到男家由两家协商而定。三是一夫一妻制。后两种形式约占30%,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据我观察,文化水平较高或有工作的,婚姻一般为“一夫一妻”或“同居婚”。这种趋势使母系社会的冰山一角似已开始融化,最具特色的婚俗文化现象的魅力正在减弱。

过去,这里的民风民俗最厚正,但近几年也出现了打架、斗殴、赌博等歪风。过去,在交往中,诚实为本,骗人为耻,现在做买卖时以次充好、少给多收现象时有发生。

僧侣的戒规和宗教仪式的庄重与过去相比也发生了变化。碰巧,

^① 李蕾蕾:《跨文化传播及其对旅游目的地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96页。

我们在里格岛遇上了殡葬仪式，一位名叫扎西的僧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出家人，却有一个同居的阿夏，与拉克六斤的五妹结婚并生有一男一女；他白天去念经，晚上主持篝火晚会，亦歌亦舞，是姑娘们喜欢的对象；他的职业是僧人，却用自家房产开了个旅馆，采购、收钱，扮演着商人的角色。小伙子聪明漂亮，那副潇洒劲头，村里的年轻人都很羡慕。

对于种种文化现象的变化，各类人等众说纷纭。这里摘录几段村民的议论：在湖边的木楞房旁，几个老人坐在粗大的木桩上。一个头戴毡帽、身材魁梧的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走南闯北，赶马经商，远到印度，走过不少地方，也算见过世面吧。但还没见过现在的年轻人，骑着马走村串寨，见到老人，遇到喇嘛也不下马，说是骑给游客看的，真是活见鬼。”另一个老人插话：“别说是村中间骑马，就连转尼马堆也有人不再行走了，骑着马转。”另一个老人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什么人都谈着钱，钱，钱，他们真是没见过钱。我年轻的时候，曾用十多匹马驮过钱。”又一个老人说：“他们天天谈论歌舞厅，我就悄悄地摸进去看了一下。哎呀，这哪里是在跳舞，那男的双手抬着女人，完全是我们葬礼中孝男举贡品托盘的姿势嘛！”议论引来了一阵阵笑声。

杨二车娜姆在她的《走向女儿国》一书中说：“老人们的谈论，我并不完全赞同。社会在发展，民族也需要发展，永远保持传统是不可能的。永远保留那种自然经济状态，孙女重复外祖母，女儿重复母亲，那种亘古不变的历史应该成为过去。任何人也没有能力让时间倒流，关键是怎么变，怎么发展？如何少走弯路？如何认识传统？又如何辨别外来文明？这是值得思索的。如果认为外来的、一切新鲜的都是对的，不加选择地一概吸收，那么，不要几年工夫，在泸沽湖，将再也看不到真正的摩梭人，说得严重一些，只能见到一些穿着摩梭服装的服务员。”“那些紧挨着祖母房的卡拉OK厅、发廊等所谓的现代文明进入泸沽湖，似乎是一股混浊的河水滴入纯净的泸沽湖。这里有一种隐痛，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城市病，随着现代文明传染给了我的故乡。湖边，在古老的猪槽船边，我看到一堆堆塑料口袋、饮料瓶。这些东西，100年也不会腐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的母亲湖

正在被人强奸。”“外边进入的东西，并不全是精华，而是一些说不清是垃圾还是娱乐品的东西。连前所（村名）那么偏僻的地方，每到晚上，许多年轻人就挤在那间密不透风的录像厅里，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精武门》、《生死关头》、《鸳鸯情侣》之类的港台制品，无非是拳头加枕头的玩意儿。真不知道，受这些东西熏陶的我的兄弟姐妹，将来走向何方，我很担心。”^①

笔者参观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地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看到，在校学生面对游客而视若无人，正常上课，就是对游人的适应。

2. 旅游地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平台和冲突的“战场”

旅游出发地的文化是旅游者的母体文化，旅游者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带有母体文化的深深烙印。旅游目的地是出发地和接待地两种文化交融的平台和冲突的“战场”。

事实上，文化传播者常常在试图影响对方之前，就已经受到对方的影响。利玛窦在澳门就开始学习中文和着手“四书”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影响实际上是双方相互适应的一系列调整过程。

尽管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机会是存在的，但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如具有文化相似性才能促进他们之间的交往。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大，摩擦与误解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交流的有效性就越小。

美国夏威夷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朱卓任教授在天津讲学时曾提出：“中国要发展旅游，要搞长期旅游，就必须提供西餐”。他主张“在（外国）旅游者旅行期间，每两顿饭中应有一顿西餐。三餐中至少要有一餐是西餐。早餐一定要是西餐”。朱教授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于是就想寻找一些对他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东西，而食品就是其中之一。食品是一直伴随着人成长的，看到了熟悉的食品就会使人觉得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从心理上带

^① 邵春：《变迁中的女儿国——泸沽湖忧思录》，《中国旅游报》2000年8月14日，第4版。

来了安全感”。^① 提供西餐给西方游客以饮食文化相似的感觉。

3. 游客身份的特殊性

首先,旅游者与移民、学生和外籍员工不同,他们不必去刻意适应当地社会。例如,有外国学者认为旅游者被赋予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管制的豁免权,并且可在自己民族的小小的文化玻璃罩里浏览外部景观。尽管旅游者会经历文化冲击,但这种冲击仅存在于旅游过程的开始阶段,并且这对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刺激和兴奋的经历,因为它可以满足寻求感官刺激的动机。其次,旅游者可以置身于一个特殊的社会位置上,一种可以观察和审视到访社会的陌生人或局外人的位置。

一些游客非常热衷于与当地居民打交道,而另外一些游客则只是把当地居民当做风景的一部分来看待。

4. 示范效应

发达地区的游客到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旅游,其行为往往具有示范效应。他们以自己的思想、生活方式对旅游地居民产生各种影响,这就是示范效应。示范效应包括正面示范效应和负面示范效应。

从主流来看,出发地文化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常常导致后者的改善和变迁,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第二,政治的改良。第三,社会结构和风尚的变迁。第四,文化的拯救和发展。^②

英国游客跟随库克到国外旅游,所到之处对当地人产生了影响。“当地居民仔细地观察英国旅行者的礼节和行为,并经常加以效仿。因此,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渗透,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人们羡慕英国的自由政治,它给这个国家和在它势力范围中的那部分世界带来了和平和财富。”^③

在西班牙,20世纪50年代旅游者刚刚涌入的时候,交际场合中年长女伴陪伴未婚少女的做法还是十分普遍的,但当西班牙青年男女看到年轻的英国游客的所作所为时,这种现象很快消失了。尤其是一

① 吴正平:《旅游心理学教程》,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71页。

② 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4页。

③ 艾德蒙德·斯温格尔赫斯特:《面对面: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今昔谈》,参见威廉·瑟尼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些男性主宰社会对性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些社会中,性爱是一种在妓院里才能放纵的苟且偷欢。在意大利,对陪伴到当地跳舞场所的年轻男性的需求使旅馆出现了紧张的气氛。在旅馆里,侍者们被期望能一直工作到深夜,因此,他们不能与度假的女性自由交往。他们对正常工作时间的要求应当满足,不然他们就会报以罢工。更加强烈的冲击来自有关英国战后福利国家所提供的工作条件的信息。于是一种新的情绪和心态在旅游度假区工人阶层中逐渐生成。度假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条件和选举习惯,而在过去,这些是由雇主和教堂来左右的。^①

旅游出发地社会环境文化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和输出,往往大于目的地社会环境文化对出发地的影响和输入。如果说目的地文化仅仅满足了旅游者的猎奇心理、成为其固有文化的补充的话,那么出发地文化经由旅游者的“携带”和传播,则有可能改变整个目的地的文化方向和社会格局。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不具备与出发地文化相抗衡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旅游出发地的社会环境文化,既给其旅游者注入了优越的文化素质和审美眼光,也有可能助长其傲慢和偏见,导致目的地居民的反感和不满。^②

负面的示范效应方面,甚至有学者在1974年发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旅游人数的变化与谋杀、强奸以及其他暴力犯罪事件的变化之间,存在强烈的对应关系。

负面效应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对旅游地淳朴民风的颠覆和伤害。女作家铁凝写过一篇并不为读者熟知的短篇小说《峡谷歌星》。大峡谷是一个旅游地,当地少年就干起了旅游向导的营生,叫做“领人的”。在这些“领人的”中间,有一位少年会唱歌,并且在这一带小有名气,一支歌两毛钱,游人自点,外加一毛。

一个夏天,歌星把一对时髦的年轻男女领进了峡谷。这对男女让歌星唱了多首歌曲,感觉钱不白花。当这对男女告诉歌星他们也是

① 艾德蒙德·斯温格尔赫斯特:《面对面: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今昔谈》,参见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92—93页。

② 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领人的”，是专门领歌星到北京、深圳、广州、海口时，歌星兴奋起来，开始免费为他们唱，并殷勤地接过他们身上的“双肩背”、折叠伞、旅行水壶，背上自己的肩。歌星唱了许多首，最后一首是《三百六十五里路》，但歌星已经哑了。

第二天早晨，歌星背着一个行李卷找到了这对男女住的饭店，准备让他们领走。这对男女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没想到歌星把他们的顺口编造当了真。当女的要歌星再唱一首，“让我们最后考考你”时，歌星已经发不出声了。

从此，歌星成了哑巴。他仍在大峡谷里活动，但已不再领人，而是牵着一只狗，让游人与狗照相。

这个虚构的故事告诉我们，城里人随口编出的一句假话，竟然给旅游地少年带来这么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是生理的，因为歌星成了哑巴；更是心灵的，歌星还会相信外来的游客吗？

5. 刺激旅游地传统文化复兴

旅游研究者雅法尔·雅法里认为，旅游为拯救具有旅游价值的一切文化价值作出了贡献：“许多宗教或古建筑之所以从被毁坏的境地中拯救出来，更多的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民众看来所具有的价值。”^① 旅游可以刺激当地纯真的手工艺品、传说、舞蹈、民歌民乐、地方戏、礼仪、风味食品、民族服饰等复兴，也会使传统民居、古迹和其他重要景观得到保护。

当然，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伴随着传统文化向商品化、表演化的蜕变。在文化旅游开展之前，广西那坡县当地的黑衣壮人以农耕和畜牧为主，在日常劳动、过六月节、婚配丧葬时民歌伴随其中。在这些共享的场合中，黑衣壮人传唱民歌的对象是与之拥有共同生活环境、生活经验的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拥有共同的民歌符号体系。文化旅游开展之后，其中的部分黑衣壮人以演员的身份，在专门的演出场地进行民歌表演。此时他们传播民歌的对象变成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地游客，他们变成了壮族民歌的传播者。

有研究者归纳了被运用于文化旅游中的壮族民歌产生的一些新的

^① 参见谢贵安、华国梁《旅游文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功用:

(1) 实用性功能减弱, 审美功能加强。在文化旅游当中, 壮族民歌逐渐从与其相关的生活事项中脱离出来, 其实用功能被大大减弱; 与此同时, 由于壮族民歌被转化为独立存在的文化样式展示给游客, 其艺术性被加以强调, 审美功能、观赏性也就随之被加强。

(2) 自娱功能削弱, 娱他功能增强。传统壮族民歌是主要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自娱; 而在文化旅游当中则转变成以取悦游客为目的的他娱。

(3) 商品功能的凸显。通过文化旅游市场, 壮族民歌被转变为文化商品由经营者与游客之间的交换来实现价值。此时, 壮族民歌就具有了消费性和盈利性。

(4) 广告功能的产生。广西的民歌文化旅游已经打造出许多诸如“刘三姐”品牌、“黑衣壮”品牌、南宁“民歌节”品牌, 其中所吸纳的壮族民歌被当做一种文化名片向外界宣传、推广。经营者试图通过这些品牌内容在广大游客中的知名度、熟知度、权威性, 对当地的文化旅游进行宣传、推广, 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到当地的文化旅游经营中来。壮族民歌变成了当地文化旅游的广告。^①

此外, 壮族民歌还被刻录成光盘。一张张小小的光盘对于当地壮族民歌的传播有着很大影响。可复制性使得民歌的受众在数量上猛增; 可流通性又使它借助游客的流动传播到四面八方, 从而拓展了民歌传播的地域范围; 光盘的不可更改性使得壮族民歌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许多旅游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弱势地位, 为了提高旅游业的收益, 往往屈从于游客的态度和观念。

藏式民居是在西藏那种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下产生的建筑, 墙非常厚、窗户比较小, 表面上的颜色很艳丽, 一般都是碉楼式的, 没有洗手间。如今藏式民居已经开发出了作为旅馆的民居, 既保留了民族特色, 又加上了现代设施, 受到游客欢迎。

^① 参见徐乐娜《广西文化旅游之兴起对当地壮族民歌的影响》,《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第65页。

6. 刺激旅游地商品经济发展

云南香格里拉县(原中甸县)碧塔海景点,不久前还是一个淳朴的、原始的藏族村落,偶有游客进入,藏族牧民只是将游客当做远方的客人或亲人予以热情接待,不属经济行为。经过几年旅游开发之后,受外来游客商业性行为的影响,当地藏民的经济意识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已经开始以出租马匹、出租牦牛摄影及出卖农副产品给游客等方式来获取经济利益,原有的价值观、淳朴的风俗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三) 做绿色旅游者

世界自然遗产——四川九寨沟,曾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桑塞尔先生誉为“世界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处自然景观”。九寨沟有一路标——“除了摄像请什么也别带走,除了脚印请什么也别留下。”别的景区也有类似的提示:“进去只留下脚印,出来只带走相片。”旅游对游客来说,最主要的是收获了体验,而不在于从景区带走了什么物质的东西。这里还想提醒中国游客,到美国野外旅游不要随便捡东西,比如在海边捡贝壳带走,因为美国人认为野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属于大自然的,不能捡回家。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最后几句诗也适用于旅游: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四 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多是暂时的和非重复的。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是“最为肤浅的文化相遇形式”。

但一般认为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利大于弊。这种交往突破

了文化群体之间的彼此封闭、隔离、独立,至少使每一种文化都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并且为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与历史等提供了可能与机会,它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一个起点。

世界上大多数旅游地居民对待外来游客的态度,普遍经历了由欢迎到冷淡,再由冷淡到不满,最后再由不满到厌恶四个阶段的演变。究其原因就是旅游人数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导致了旅游地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下降。^①

在国际旅游者与当地东道主之间的各种交往之中,可以体验到的跨文化差异,包括双方的语言及言谈方式或非语言行为诸如肢体语言或手势、宗教信仰、时间取向、对隐私的态度等。在国际旅游者与当地入之间,这些差异正是文化误解与冲突的潜在基础。

一般认为,最重大的文化差异存在于东方与西方社会之间。文化差异与旅游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国外有学者指出,阿拉伯国家的东道主并不欢迎非伊斯兰教的旅游者,因为旅游者在妇女的服饰、饮酒以及男女混杂等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社会规则。突尼斯妇女认为旅游者的服饰令人反感,她们还常常提及旅游者的其他一些负面行为,如粗鲁、酗酒以及对突尼斯文化的不尊重。

第二节 旅行家与旅游传播

一 旅行家与旅游传播

(一) 旅行家是旅游的先行者、开拓者、传播者

林语堂说:“真正会旅行的人是个流浪者,具有流浪者的欢乐,诱惑和冒险精神。”^② 跋涉探险,以流浪为快乐,旅行家都有这样的

^① 孙文昌、郭伟:《现代旅游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② 林语堂:《论游览》,参见《林语堂散文全集》第2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页。

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说,旅行家是专业旅游者。旅行家又是旅游的先行者,许多旅游地首先留下了他们的脚印,然后才有一般旅游者跟进。对于旅游来说,他们是先行者、开拓者。往往是旅行家传播出某一旅游地最初的信息。

13 世纪的欧洲对于广大的亚洲的了解停留在想象和道听途说的水平上。偶尔的关于异教地区的信息充满了离奇和恐怖:“探险家到遥远的地方旅行,面对的是陌生的新世界,那里住着半人半兽的魔鬼、神奇的动物和风俗奇异的种族。……当地的女人具有人形,而男人则长得像狗。……根据可靠的资料,那里住着人形的魔鬼,两脚成牛蹄状,头部和人一样,面孔却像狗,这种怪人能说两种人类的语言,又像狗一样吼出第三种语言。……有人言之凿凿,说他们在穿过沙漠时,发现了一些人形的怪物,只有一只手,长在胸部中央,而且只有一条腿。两个怪物合用一张弓,跑得极快,连马匹都追不上。它们用一条腿跳跃,累了就以手着地跳,再用腿跳,身体就像车轮一样转来转去。”(让-皮埃尔·特来热)^①

在 13 世纪末期的欧洲,很少有人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更不要说遥远的中国了,于是许多人把《马可·波罗游记》中叙述的故事当做天花乱坠的无稽之谈。据说,当年在威尼斯的舞厅和游乐场所,马可·波罗的角色是个向观众讲些离奇故事以博观众一笑的小丑。在马可·波罗临终的时候,他的亲戚朋友出于好心,曾劝他对神表示忏悔,承认撒谎的过失,以拯救灵魂。马可·波罗则声明,他不但没有撒谎,而且讲述的故事尚不到他所见的一半。^②

中国古代的僧人中出现过杰出的旅行家,他们对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余秋雨看来,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商人牟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

①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 页。

②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1 页。

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①法显、玄奘、鉴真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图 5-3 戴进：《关山行旅图》

不少山水名胜是旅行家、旅行者发现和传播出去的。在中国古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6—377 页。

代,山水能够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然后才有山水景观。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的《关山行旅图》和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见图5-3),画的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行旅者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与山水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才有所谓的“风景”。峰峦起伏,蜿蜒的山路上有一个或几个赶路人,有的还有驴同行。在画幅中,不起眼的这小小的赶路人却是点睛之笔。

(二) 介绍几个旅行家

1. 徐霞客

明代人徐霞客(1586—1641年)从22岁开始出游,30多年间东达普陀,北到燕冀,南抵闽越,也曾远及西北、西南,足迹遍及当时14个省,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分就是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徐霞客长途西行中“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三次遇盗,四次绝粮。无数人迹罕至的自然山川由于徐霞客的到来而逐渐成为旅游景观。

张骞、郑和奉命出使,宣扬王朝的“天威”,法显、玄奘以宗教为目的取经求法,而徐霞客纯粹以考察自然为目的,没有政府的资助,毕生从事旅行事业。在中国旅行史和游记史中,旅游之专,行程之长,篇幅之巨,内容之丰富多彩,无出《徐霞客游记》之右者。

特别是他的母亲,对于徐霞客“问奇于名山大川”的志趣,给予有力支持。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她亲手为徐霞客制“远游冠”,以壮行色;每次徐霞客出游归来,“为言各方风土之异,灵怪窟宅之渺,崖壑梯蹬之所见闻,有令人舌挢汗骇者,母意反大惬”(徐霞客墓志铭)。为了打消徐霞客出游的顾虑,她以七十多岁高龄与儿子一起游了荆溪、勾曲。^①

顺便谈谈关于徐霞客通常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

^① 参见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作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公众形象是非常好的，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徐霞客有着另一张面孔。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书讲到他在两广旅游时的一些事情。

徐霞客不是官员，无权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崇祯十年（1637年）秋，地方官送给他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他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要用七八个夫役。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即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地方上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徐霞客驱赶仆役整天赶路，傍晚时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快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早已逃离，徐霞客就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名妇女，命令她们找人搬行李做饭。过一会儿，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也来了，老人怕徐霞客拿鞭子抽打他的儿子，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跛子。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替他铺好的床，徐霞客又喝令他们快去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才躺下休息。^①

2. 第一个自费完成环球旅行的人卡莱蒂

16世纪末的商人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1573—1636年）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费完成环球旅行的人。他完全靠自己做各种生意赚的钱完成了自己的旅行。1591年到塞维利亚的意大利商行做买卖，1594年与父亲一起乘船去佛得角群岛购买黑奴，同年到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卖掉奴隶并购买了本地产品后，从那里去了秘鲁的利马，在那里倒手购得了银锭，于1595年到达墨西哥。1596年搭船到菲律宾，1597年抵达日本长崎并逗留一年。1598年3月来到澳门。1600年到达果阿，在那里高价出售了随身携带的货物，并买了他所知道的在欧洲特别受欢迎的其他商品。1601年12月26日登上开往里斯本的商船，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完成了环球历险。

3. 第一个徒步环球一周的人潘德明

潘德明从1930年到1937年用了7年时间徒步环球一周，途经

^① 参见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一段路程骑脚踏车外，全部为步行。首次完成环绕地球一周的是 16 世纪初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的船队，而用双脚完成这一壮举的世界第一人是中国的潘德明。

希腊首相尼格罗斯接见了潘德明，并说：“潘德明先生，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东方古国的觉醒。”他来到古代奥运会的发祥地，在奥林匹亚广场遗址的一块石头上，他分别用中文和英文重重写下了一行字：“中国人潘德明步行到此。”1933 年 11 月，潘德明拜见英国首相麦克唐纳，麦克唐纳了解潘德明的经历后说：“我们英国有句谚语：经历是智慧之母。世界像一部百科全书，不外出旅行，就像只读了这部书的一章一节。”

二 旅行家独特的精神结构

余秋雨专门谈论过行旅者的独特精神结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地区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沉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刹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①

^① 余秋雨：《出走十五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自序，第 3—4 页。

第三节 记者、作家、艺术家、人文 社会科学家与旅游传播

记者、作家、艺术家、旅行家所写出和留下的报道和作品可以充当导游。许多游客正是读了这些报道和作品才去某一个地方旅游的。

王蒙写道：“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①为什么没有到过苏联而对它却如此熟悉，那是因为他看过有关苏联的许多报道、文学艺术作品，听过许多有关苏联的歌曲等。

游记作家芮麟曾记述：“暑假前，我除了搜罗嵩山的古今游记外，还特地读了一遍《说嵩》，对于嵩山的一切，虽然还未游过，但已大体了然于胸了。”^②参观西安雁塔时，他写道：“曲江池与乐游原，闻距此不远，读张恨水《西游小记》，知一无足观，故决定不去。”^③可见，前人的游记对后人的旅游选择还是有重要影响的。芮麟在为自己的《东南环游记》写的“自序”中说：“世之有山水癖者，其以此为东南导游也可。”^④意思是说，如果有喜欢游山玩水的人，可以以他的这本小书作为游历东南的导游。

作家梅岱在记述自己的中东之行时说：“余秋雨一本《千年一叹》成了中东之行的向导。每有不了解的背景和资料，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尤其是许多独到的有趣的见解，常常会引发对一地、一物、一人的探寻。”^⑤到滇西松山的许多游人手里拿着一本名叫《1944年松山战役笔记》，人们称它为“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

①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②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③ 同上书，第305页。

④ 同上书，第95页。

⑤ 梅岱：《看文化和文化的看——中东手记》，《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某些重大历史活动是由一些游记和艺术作品促成的。

在里斯本,哥伦布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而对东方心向往之。现今保存在塞维利亚城哥伦布图书馆中一本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留有哥伦布的亲笔批注二百六十多处。有人说,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如果不是手里拿着“游记”,至少也是头脑和心胸里装着这本书开始他的远航的。后来哥伦布曾引用过马可·波罗对东方动植物群落的描述,证明他确实发现了“印度”。^①

丁和花五年时间完整地重走了一次玄奘西行路。他说:“借摄影梳理玄奘取经之路的脉络,捡拾那些逝去的文明,并期待在认真考证与解读后,展现给世人。”^② 2008年5月,国内首个展示玄奘西行取经之旅的大型影纪展——玄奘取经之路,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展览中心展出。

一些与某地景色有关的名诗名句可能成为有些人最初的旅游梦想。一旦有机会到达这些地方,名诗名句得到了印证,对这些名诗名句的理解会更加深入贴切,其愉悦的心情自是难以形容的。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实践了中国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许多诗成为千古不朽的“导游诗”。

芮麟在陇海线的火车中默诵谭浏阳的“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句,“深佩其用字之贴切。不到西北,这种诗句是写不出,也想不到的”。^③

庐隐在记述日本的日光时写道:

① 曾彦一:《哥伦布》,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② 王磊:《丁和:用影像追随玄奘的足迹》,《光明日报》2009年1月16日,第12版。

③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山上云彩，来来去去，也只笼去富士山腰，到底没有飞上山顶去。当云彩笼着山腰时，只见山的上部，甚似一把开着的白纸扇形状。日本人咏富士的名句“白扇倒悬东海天”，这时候见到了。^①

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开篇不久即写道：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

作者在写自己，也在写别人。早年铭记在心中的名作成为日后旅行、旅游的动因和方向。

一 作家与旅游传播

(一) 作家的旅游与创作

作家的旅行、旅游与创作有密切关系。我们引述一段文字就可以

^① 凌叔华：《登富士山》，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说明这个问题了：“歌德 40 岁左右，有三年足踏意大利的旅行。如果不考虑他这个旅行的见闻与经验，就不能评价他以后的作品。日耳曼尼·德·史达尔夫人客居在被放逐的莱蒙湖畔，以及对德意志、意大利的旅行。她在各地旅行和逗留期间所接触的人物、事物，那么多地记在自己的心里。其他人如：夏多布里昂的美国旅行，拜伦的意大利、希腊旅行，福楼拜的希腊、叙利亚、埃及旅行，布拉乌尼克的意大利旅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高加索旅行等等，不能不对他们的创作生活有强烈的刺激。”^①

（二）文学家与旅游地

三游洞位于湖北宜昌市西北南津关北岸的西陵山北峰峭壁上，前临下牢溪，背靠长江。洞高约六米，深宽各约二三十米，洞室开阔，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洞内有三根垂直平行排列的钟乳石，将洞隔开。

唐元和十四年（819 年），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路经宜昌时发现此洞，并各赋诗一首，称“三游洞诗”，白居易还作了《三游洞序》，此序尾言道“以吾三人始游，故为三游洞”。“三游洞”由此得名，并成为游览胜地。此被称为“前三游”。

公元 1059 年冬，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出川，也同游此洞，并各作有“三游洞诗”，后人称之为“后三游”。苏辙诗云：“洞前危径不容足，洞中明旷坐百人。三人一去无复见，至今冠盖长满门。”正是白居易、白行简、元稹的“前三游”，引来了后来的“冠盖长满门”，即摩肩接踵，洞门拥塞。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叶衡、陆游；明代著名文学家王士禛、刘一儒、龚绍仁、鲁先榜和民国时期的文人墨客等接踵而至，留下了丰富的诗文歌赋。

出三游洞沿石阶下行到下牢溪畔，在山北的悬崖腰畔有一方形石井，依峭壁上履石亭，这便是“陆游泉”。泉是一方形小石潭。潭边崖壁石缝间，一股清泉涓涓入潭，潭水清澈。据地方志记载，南宋诗人陆游，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 年）十月八日，来三游洞时曾

^① 刘介民：《比较文学译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0 页。

在此潭取水煎茶，并赋诗《三游洞前岩下潭水甚奇取之煎茶》，其中有句：“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这便是陆游泉的来历。

三游洞也是重要的革命遗址。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是中共鄂西特和宜昌县委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当时庙中“道士”有的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1958年3月1日，周恩来为实现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曾沿着陡滑的小道，亲临三游洞察看岩石的层次并作指示。

三游洞外僧舍中的一副楹联曰：

巴、蜀、荆、楚之间，奇哉有此！

元、白、苏、黄而后，游者为谁？

三游洞的自然奇观是它成为旅游胜地的基础，然而“前三游”和“后三游”对三游洞传遍天下功不可没。元、白、苏、黄之后，游者难记其数。

邀请范仲淹为岳阳楼写记文的滕宗谅《求记书》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确实，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名闻天下。楼观是这样，其他游览对象也是如此。

(三) 因文学艺术作品而成为旅游地

唐代元稹写出传奇《莺莺传》、金代董解元写出《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在此基础上改编成杂剧《西厢记》。位于山西省西南永济市蒲州古城东三公里的峨眉塬头上的普救寺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于是这偏僻的寺院因了这桩爱情的传说而扬名天下，寺内的舍利塔也被更名为“莺莺塔”而闻名遐迩。

平山堂为欧阳修所建。宋庆历八年二月，欧阳修守扬州，于大明寺之坤隅建堂，以江南诸山，拱揖槛前，若可攀跻，故名平山堂。平山堂之所以能名震天下，固为其地位的优越、风物的清

丽，同时，也由于古今诗人的渲染和咏叹！没有欧阳修，平山堂固不会成，成亦名决不会彰！

我每游名胜，总觉得诗人与名胜的关系太密切了，竟像诗人与名胜是分不开的！如苏州的枫桥（见图 5-4），没有张继的《夜泊》一绝，扬州的二十四桥，没有杜牧的《寄韩判官》^①一绝，就是有一千座枫桥、一千座二十四桥，试问今日还有谁会知道？所以名胜往往因诗人而著，有时，诗人也往往借名胜而传。诗人与名胜，实是互相为因缘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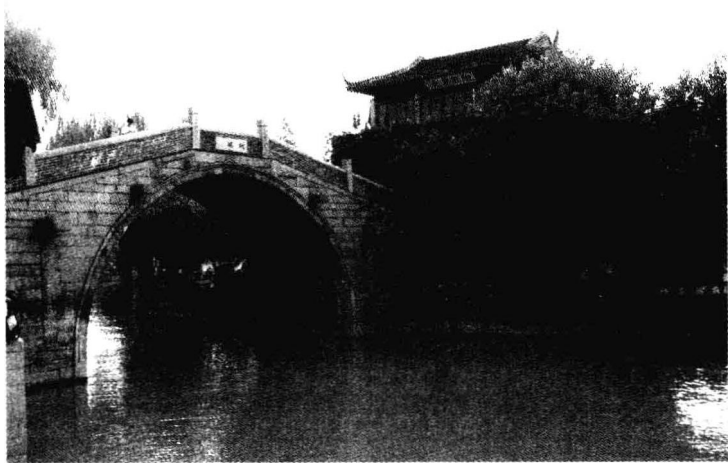


图 5-4 枫桥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

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问世，历代文人墨客追寻至常德的桃花源，探幽访古，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据历代《桃花源志略》、《桃源县志》、《洞天唱和记》、《桃花源诗话》等古籍记载，唱和桃花源的诗有 2000 多首，还有许多散文，共约 13 万余言。至于当代，政要、

① 杜牧：《寄韩判官》原诗为：“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②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189 页。

名人、大家留下的美文佳作更是浩繁璀璨,不可胜数。有人试图证明某地是陶渊明所描写的真正的桃花源,“如果一定要探寻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真实之桃花源在哪里,那是一个伪命题”。^①

正因为文学艺术经典作品的强大影响力,使有些旅游点想方设法与这些作品“套近乎”。海尔辛格是丹麦的一个小城,这里由于“哈姆雷特城堡”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其实此乃一种附会,是将一座并不相干的古堡说成哈姆雷特王子复仇的地方,古堡下的一片场地就用来做剧场。

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成为不少地方旅游策划的对象,“西游记宫”在全国就有百余个,比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还多。其实,这些地方多与《西游记》没有什么瓜葛。

二 艺术家、艺术作品与旅游传播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有一片美丽的森林,历来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人。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就是他在漫游森林的情况下创作的。森林中啼鸣的百鸟、呜咽的流泉、低吟的微风、清新的空气、有节奏的马车声都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国外不少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把定期外出旅游列为“工作守则”之一。

(一) 影视作品与旅游地

优秀影视作品感染力强、传播面大,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很突出。

在国外,《罗马假日》使罗马的旅游持续火热,有游客说:罗马城的印象多半是从电影《罗马假日》里得来的。有业界人士向人们推荐:跟随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的脚步,沿着影片《罗马假日》中的路线游罗马是一个好选择。

电影《指环王》中神话般的“中土世界”,取景于新西兰南部一片风景壮丽、人烟稀少的地方。如今只要提起《指环王》,世界各地

^① 汪肯堂:《我读桃花源》,《新华文摘》2009年第16期,第85页。

的观众都能联想到新西兰，这部影片使新西兰获得了大批游客。据一项调查显示，每十个到新西兰旅游的外国游客中，就有一个声称是被《指环王》吸引来的。

据说到英国旅游的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受了电影的感染，伦敦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在电影中出现过。如《哈利·波特》中神秘的 $9\frac{3}{4}$ 站台，让人们牢牢记住了伦敦地铁和国王十字车站。这正是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伦敦市长将其称为最大的“软广告”。^①曾有英国旅游专栏作家撰文说：“《哈利·波特》这部电影相当于为英国的历史古迹作了个绝佳的广告宣传。”

在国内，1960年春夏拍摄并于第二年全国公映的电影《刘三姐》，使桂林山水和山歌深入中国人的心，也使外国游客中流传着“不到桂林不算去过中国”的说法。

1982年上映的影片《少林寺》让少林寺驰名中外，至今游客仍络绎不绝，这里面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知有多少懵懂少年看《少林寺》后，打起铺盖卷上少林寺拜师学武，这里面就包括后来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士兵突击》的主演王宝强。据统计，1974—1978年，少林寺游客总量仅为20万人左右，而到了1983—1985年，这个数字猛增到300万人。有人说，一部电影打开了少林寺一道川流不息的大门。

近几年热播的52集电视剧《闯关东》，为“朱开山老家”山东济南章丘的朱家峪村带来大批游客，山东省章丘市获得近23亿元的旅游合作协议。

2010年初播出的电视剧《滇西1944》，引来了每天数千名旅游者来到滇西松山，狭窄的山道不时被数百辆汽车拥堵。旅游者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弹坑和掩体中穿行并拍照留念，昔日惨烈的松山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二）歌曲传唱与旅游地

一首《太阳岛上》让默默无闻的太阳岛名扬天下；一首《鼓浪屿

^① 魏月衡、王晓樱：《海南：传媒与旅游如何融汇互动》，《光明日报》2010年3月24日，第5版。

之歌》让风光旖旎的鼓浪屿趋之若鹜；曾几何时，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让无人问津的海南岛成为旅游乐土。

歌唱演员郑绪岚一曲《太阳岛上》，勾勒出一幅十分浪漫的景象：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
带着露营的篷帐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小伙子背上六弦琴
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
猎手们忘不了心爱的猎枪
心爱的猎枪
幸福的热望在青年心头燃烧
甜蜜的喜悦挂在姑娘眉梢
带着真挚的爱情
带着美好的理想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

这首歌唱红了郑绪岚，也唱红了太阳岛。到哈尔滨的外地人，除了要逛中央大街，如果再有富余时间的话，一定会去游游太阳岛。但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的太阳岛，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公园。如果没有桥，如果坐船上岛，可能还有点新鲜劲；开车直接到太阳岛那块标志性的“太阳石”前面，就没有一点岛的概念了。

有导游说：大家所熟悉的《太阳岛上》那首歌描绘的正是那种原生原态的太阳岛，也是哈尔滨人原生原态的生活写照，没有任何雕饰，没有任何浮夸。因为哈尔滨人就是这样和太阳岛的蓝天、碧水、树林、草地、江鱼、小虾、野兔、野鸭……一起快乐而和谐相处着，形成了哈尔滨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本色。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大家对太阳岛流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失望，可能是因为慕名而来的人太多，保护措施又不当，便破坏了太阳岛的原始美，加上后期对太阳岛的开发人工的痕迹太重，所以使得太阳岛落下了“名不副实”的名声。

《康定情歌》的作者无从考证。歌里说的跑马山，是县城边上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山，普通得几乎让人失望。曾经有一对法国未婚夫妇不远万里地专程跑来，要在跑马山举行婚礼。在他们的想象中，跑马山是一大片可以纵情驰骋的草原，没想到居然只是一座陡峭小山上的一小块台地——跑马山的藏名叫“登托”，意思是“垫子”。两个浪漫的法兰西人竟因此抱头痛哭起来。^①

的确，一首流传久远的歌曲，能使一个旅游地活在人们的歌声里，并成为许多人到这里旅游的动因，其传播效果是旅游广告做不到的。因此，不少旅游地就想方设法请人来为旅游景区作词、作曲并演唱，然而，真正传唱开来的是极少数。比如，《周庄好》由乔羽作词、王立平作曲、郑绪岚演唱。尽管都是名家，还是没有传唱开。周庄不出名时，没有请陈逸飞来作画，但陈逸飞自己找上门来，而且画出了杰作；周庄出了名时，主动请乔羽、王立平、郑绪岚来写歌唱歌，但《周庄好》没有叫好。个中因缘，很值得玩味。至少，我们可以从中领悟，艺术家有无创作冲动是作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从《清明上河图》到“清明上河园”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宣和年间翰林张择端以东京开封为背景所创作的巨幅长卷风景画。它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众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构图

^① 陈世旭：《跑马山》，《光明日报》2009年8月13日，第11版。

疏密有致。《清明上河图》成为研究宋代经济、文化、建筑、科学等的珍贵历史资料。

“清明上河园”位于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隅，它以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是集中再现原图风物景观的大型宋代民俗、市井风情游乐园。1998年10月28日，清明上河园开业迎宾。2009年，清明上河园荣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座以绘画作品为原型的仿古主题公园。“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2007年10月，“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导演梅帅元）首演，它是在清明上河园基础上创作的。其实，它不像“印象·漓江”那样的实景演出，因为清明上河园本身就是根据张择端的画“仿制”的。不用说，它也不同于一般的舞台演出。可以说它在“仿制”的“实景”中重现了宋代一些著名词作的意境和生活场景，是双重的作品复制。从《清明上河图》到“清明上河园”是第一重复制，在“清明上河园”中再依据一些著名的宋词复制其意境和生活场景是第二重复制。从这种双重的复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艺术是旅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旅游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传统文化。

《大宋·东京梦华》比之于别的大型实景演出，一个重要特征是浓重的文化底蕴。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序·虞美人；第一幕·醉东风；第二幕·蝶恋花；第三幕·齐天乐；第四幕·满江红；尾声·水调歌头。从这些名称就可知道它主要以宋代的著名词作展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因而文化底蕴浓重。

笔者曾现场观赏了《大宋·东京梦华》，亲身感受了它所营造出的诗情画意。应该说它是较成功的创意和创作，值得一看。当然也有不足，就场景设计来说，作为主要场景的两座主要楼阁，连接二者的电线在灯光下显得扎眼，与宋代的历史环境不协调，破坏了整体氛围，是一处“疏忽”和败笔。顺便说一句，许多景观附近的电线和电线杆，破坏了景观的和谐，影响游客凝视和游客拍照取景，旅游地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和改进。

从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荣国府到北京“大观园”、“正定荣国府”等，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不过，它显示的是从

文学作品到仿古园林景观和住宅建筑的演化过程。

类似的还有武陵源风景区桃花源。这里的风物多附会《桃花源记》而来，其主要风景名胜有缆船洲、桃花溪、菊圃、方竹亭、秦人古洞、千丘固、遇仙桥、集贤祠、桃花观、水源馆、豁然轩等。还有历代诗人的不少题咏和碑刻。

（四）画家陈逸飞与周庄

20 世纪 80 年代初，陈逸飞风尘仆仆地来到偏僻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在清澈的银子浜和南北市河交汇处，看见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联袂而成的双桥。因桥洞一方一圆，桥面一横一竖，很像古代的钥匙，古镇人称它为“钥匙桥”。石拱桥横跨南北市河，桥端有石阶引桥，伸入街巷；石梁桥平架在银子浜口，桥洞仅能容小船通过。双桥最能体现古镇神韵。碧水泱泱，绿树掩映，小船在桥洞中穿过，牵着牯牛的老农走上桥阶，村妇在桥边的河埠搓衣洗菜。

陈逸飞举目远眺，沿河面筑的吊脚楼鳞次栉比簇拥在水巷两岸，木楼粉墙黛瓦，灵巧而独具韵致，典型的江南水乡，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一连拍了十多卷胶卷带回美国，创作了几十幅江南水乡的油画，其中一幅题名为《双桥》。

1984 年，陈逸飞在纽约著名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所属的哈默画廊举办《黄金十月》画展，他的 38 幅以江南水乡为内容的油画刚展出，就被订购一空。

1985 年，油画《故乡的回忆——双桥》经陈逸飞再次加工，被阿曼德·哈默高价收购，次年阿曼德·哈默访华时将这幅油画送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1985 年 5 月，纽约联合国邮局还发行了以《双桥》为图案命名为《故乡的回忆》的国际首日封，在联合国总部以及日内瓦、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发行。陈逸飞是浙江宁波镇海人，周庄并不是陈逸飞的故乡。陈逸飞说过“周庄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一个地处偏僻、默默无闻的水乡小镇，一座名不见经传又破又旧的双桥，在画家陈逸飞的笔下生辉，像插上了翅膀，飞越大洋，走向世界。周庄人为了表达对陈逸飞的纪念，在双桥旁立了一石碑取名“陈逸飞与双桥”（见图

5—5)，并在周庄镇里设有“逸飞之家”。



图 5-5 双桥旁“陈逸飞与双桥”石碑
(赵建国摄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

其实，杨明义、陈逸飞和匡亚明、陈从周、吴冠中等人，都是周庄的最早发现者。周庄今日旅游的兴盛，有三个人功不可没。画家吴冠中，“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这句“广告语”就出自他的口；同济大学著名教授阮仪三被称为“周庄之父”，是他的大力呼吁和妙手规划才有了今日的“中国第一水乡”；陈逸飞的一幅以周庄双桥为题材的《故乡的回忆》，把周庄介绍给了全世界。

余秋雨知道周庄，也与陈逸飞有关。他在散文《江南小镇》里写道：“斑驳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

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的周庄。陈逸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①

周庄虽说是从陈逸飞的《双桥》开始名声大噪，其实以前也是名人荟萃之地，远的有刘禹锡，近代有柳亚子等人。明代的江南巨富沈万三的故居在周庄，据说明代南京城墙，有三分之一是沈万三出资修建的。这里单说柳亚子。1920年12月，柳亚子邀南社成员陈去病等人游周庄，居七日，在迷楼饮酒赋诗。尔后，将所作诗100余篇结集题名为《迷楼集》出版，迷楼因之名声远播。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人文景观多需要较长时间的文化积累。

三 人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与旅游传播

乔万尼·维兰尼从罗马一千三百年纪念中带回来的最好的东西是他想写一部历史的决心，而这是由于看到了罗马古城的遗迹而激起的。配脱拉克（通译彼特拉克）表明他自己对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古代文明的兴趣各居其半。他告诉我们怎样时常和乔万尼·科伦纳一起登临狄奥克莱齐安大浴室的高大穹隆，在澄澈的碧空里，无边的寂静中，眺望罗马周围的全景；这时他们所谈的不是日常事务或政治事件，而是在他们足下的古城遗迹使他们联想起来的历史，在他们的对话中配脱拉克赞扬古典文化，乔万尼歌颂基督教的古代文明，然后他们进而谈到哲学和艺术的创造者。从那时起，直到吉本和尼布尔的时代，这同一个遗迹曾经有多少次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沉思和回顾啊！^②

在19世纪访问美国的人文学者中，法国人托克维尔的旅游和因此而写成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影响最大。1831年4月2日，以

① 余秋雨：《江南小镇》，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②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2-173页。

考察美国新监狱制度为名获得了当时法国司法部的准许,托克维尔离开法国赴美,开始了美国考察之旅,于1832年2月22日离美回国。他个人的考察目的和计划远远超过了美国的监狱制度,而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他确实打算写出一部巨著,一部揭示在新大陆进行的在民主方面的伟大实验中的奥秘与奇迹的著作。这也许是使他成名之作。“我要去那里看看伟大的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他在动身前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1831年5月,他在罗得岛纽波特登陆,途经纽约、费城、波士顿,向西穿过大湖到达日后成为威斯康星州格林贝的一个边境城堡,然后向南下俄亥俄州及密西西比峡谷,来到新奥尔良,再北上经南北战争前的各州到达华盛顿。他访问了沿途遇到的200多人,把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记满了14本笔记本。他写的《论美国的民主》,自1835年两卷本的第一卷出版到1881年完成全书,决定他深为世界所重视。^①

甚至有些人文学者的考察及写出的文章,可能为当地旅游规划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写道:

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有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

^① 参见[美]理查德·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①

笔者没有考察过平遥县是否由于余秋雨的这个建议而恢复了平遥西大街甚至整个古城，但余秋雨的这个建议肯定是推动形成现在的平遥古城规划的合力之一。

2000年在山西平遥古城，余秋雨写道：“七年前我为了探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失落，曾到这里来苦苦寻找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旧址，和杰出的理财大师雷履泰的身影。今天，一切都变了，日升昌已辟为博物馆，还郑重地刻上了我在《抱愧山西》一文中的一段话，而雷履泰的故居也整理出来了。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其实真正要道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②

有些学者或艺术家在旅行、考察某些旅游地留下的文章或作品，可能成为广为传播的广告词。比如“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作为广告词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媒体上广泛传播，它就来自于余秋雨在游览都江堰、青城山后留下的墨迹。

① 余秋雨：《抱愧山西》，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52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页。

第六章

旅游传播者(二)——旅游介体

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交通构成旅游业的三大支柱。它们都可以大致归为旅游介体，它们也都是旅游传播者。

第一节 导游与旅游传播

一 导游

导游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通过口语、手势等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把旅游客体的相关信息传递给旅游者，是一种人际传播。通过导游的介绍和讲解，游客不仅可以了解目的地的文化，增长知识，而且能促进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导游具有提供服务与教育两大功能，导游、导吃、导用、导购全面体现了这两大功能。导游在旅游中有重要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已成为旅游地规划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导游形象是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了景区服务质量。一个好的“导游”就是一道活的风景。女作家铁凝曾记述过美国林肯中心的一位讲解员，讲解员与导游在讲解上有共同之处，我们可以粗略地把他们作为一体来看待。这位讲解员叫做弗兰克·高林，他的出色讲解给铁凝留下了美好印象：

责任心,热忱,自信和自豪,换来了人们对讲解员的尊重。何止是对讲解员的尊重,这是对林肯中心、对纽约、对美国的尊重。那些不寻常的建筑给了他们灵感,而他们又把灵感还给了那些建筑。不是还给,比还给要多。

如果说那些浸润着艺术家灵感的建筑是林肯中心之魂,那么弗兰克·高林先生们便是魂中之魂了。^①

一位优秀的讲解员竟然使铁凝把他与林肯中心、纽约、美国连在了一起,在铁凝的心目中以弗兰克·高林先生为代表的讲解员竟然是林肯中心的“魂中之魂”。

导游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自身和旅游企业的形象。笔者曾见到一个导游,在炎炎烈日下挥汗如雨,为游客讲解,但他手中夹着香烟,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见图6-1)。



图6-1 苏州狮子林园内的一个导游讲解时手里夹着香烟
(赵建国摄于2010年8月18日)

旅游解说包括人工解说和非人工解说两类。非人工解说以导游

^① 铁凝:《河之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

图、标志牌、小册子为主,内容涉及当地的景观、生态、地质、地貌、植物、民俗风情等。人工解说主要指导游人员的讲解。导游能与游客双向交流,有针对性地回答游客提出的问题。

二 导游的讲解能力与旅游传播效果成正比

(一) 旅游传播效果公式

导游传播的特征之一在于现场解说。这一点与课堂教学不同,因而其效果更好。导游的水平直接影响旅游传播的效果。下面是笔者给出的旅游传播效果公式:

$$\text{旅游传播效果} = \text{景观文化含量} \times (\text{游客知识素养} + \text{导游讲解能力} + \text{景物提示程度})$$

显然,导游讲解能力与旅游传播效果成正比。也就是说,导游讲解能力越高,旅游传播效果越好。景物提示最常见的就是景物旁边的说明牌,说明牌提供的相关景物的信息越充分,景物提示程度就越高。高素养的游客,即使不看景物提示牌也能从景物本身获取很多信息。景观文化含量包括美感程度、历史文化信息、科技信息等,它是旅游传播本源,旅游传播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

(二) 导游的选择直接影响旅游传播效果

下面是一位导游写出的文字:

每次带团到华盛顿,越战墙是我必去之处。美国人凭吊他们的亲人,十分随意,并不像我们固定在清明一类的节日里。所以,任何时候,墙角下都能见到几束玫瑰花或大小各异的花圈……

有一次,一个小女孩请求一个高高个子的军官,抱她去吻高处的一个名字,说那是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小姑娘吻得热烈长久,军官潸然泪下。游客们无不动容。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风尘仆仆的小男孩,高举着一幅标语,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和部队番号,还有一句话,谁认识我父亲?许多退役老兵和军人都认真读念那标语,然后一律对小男孩和那个名字行军礼。^①

游客的旅游线路是基本确定的,但在特定范围内,导游总是带游客到自己喜欢去的地方。导游的个性会直接影响游客的选择。

(三) 导游的讲解要注意分寸

有些导游为了让旅游者主动地参与,就把景点进行渲染夸张,说得天花乱坠,但这样做的后果却是把旅游者的期望值提得过高,最后失望也就更大,给导游自己带来麻烦。

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刚到泰国,游客们兴致勃勃,无论什么活动都踊跃参加。见到这种情况,当地导游员便顺理成章地介绍了景点——金沙岛。金沙岛的行程包括坐船出海钓鱼,在岛上吃美味海鲜,游泳晒太阳,如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椰子树下的金发裸体女郎。如此天花乱坠的介绍,无人不动心。金沙岛位于泰国芭堤雅以南150公里的罗勇府。当时,前往金沙岛那段路刚好在修路。原来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后来花了三个小时才到乘船上岛的码头。经过一路的颠簸,游客下车时,原来的神采飞扬,都变成了满脸倦容。有一两个急性子的,已经开始喊上当受骗了。在乘大船上岛时,本来很有诗情画意的海上钓鱼,却因为晕船,使得大部分游客蜷缩在座位上。经历40分钟的晕船“洗礼”后,游客们脚步虚浮地下了船,上了岛。“沙滩就在前面!”“大家快上前看!”导游立即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希望能刺激游客们的游兴。当来到沙滩时,游客的评价却是:“就这样的沙滩啊,我们虎门的沙滩都比这个大。上当了,上当了,早知这鬼沙滩,还不如不来呢!”此时导游与地陪怎样解释也是徒劳的,只好陪着笑脸,招呼他们吃午饭,与餐厅商量加菜。可无

^① 彭洪(曾为旅行社美洲部的导游):《黑色的墙——记美国越战纪念碑》,《中华散文》1995年第1期,第65—66页。

论如何细致热心,换来的仍是他们一副因感觉“上当了”而表现出的冷冰冰的面孔。导游与地陪无话可说,后悔当初把金沙岛描述得太好了。因此,导游不要盲目推销景点,事先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否则会适得其反。

第二节 旅游公司与旅游传播

旅行社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是连接旅游者与酒店、景区的桥梁,是为旅游者提供引导游览和综合服务的中介机构,其服务也是旅游服务质量高低的最敏感的标志,是现代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1年,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通济隆旅行社(Thems Cook & Son Ltd.)成立,它标志着世界近代旅游业的诞生。这家旅行社的诞生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中正好显示了旅游的体验性。库克被誉为近代旅游业的开山鼻祖。1841年7月5日,英国人托马斯·库克说服了350名主张戒酒的人,从雷斯特乘12英里火车到拉夫巴罗参加戒酒大会。库克本想借此宣传禁酒主张,却意外尝到了旅行的甜头。于是,他在雷斯特乡间正式创办通济隆旅行社。

有人评价库克说:“他是一个在旅游界很有眼光的人。他业务的成功之处在于组织旅游项目时的细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他与全世界的饭店、船运公司和铁路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确保他所出售的服务价格尽可能低,服务质量尽可能高。在旅途中由导游全程陪同顾客,可以消除第一次外出旅行的客人的顾虑。在1867年,他首先在旅游管理中引入了饭店服务保证制度;他解除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出游的顾虑,从而改变人们对旅游的态度,并且打开了市场。”(J. Christopher Holloway, 1985)^①

由于价格上的竞争力和组织的规模性,库克的业务不断扩大,库克的贵族同胞们把他的有组织旅游称为是“日益发展的新罪恶”,把

^①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本当留给贵族、有知识者和富有者欣赏的景物庸俗化了。

当时的一个势利者对库克的包价旅游尖刻地批评道：“似乎有一个进取心强而又不甚谨慎的人（指托马斯·库克），发明了一种商业项目，以一个固定的金额将 40 或 50 名旅游者从伦敦带到那不勒斯并返回。他按照合同运送他们，为他们提供餐饮、住宿和娱乐。……你看他们，40 个人一群，跟着一个导游到了街上，他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围着他们转圈，活像一只牧羊犬。欧洲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大奇观，就像一出考文特花园里的戏；他们对于这个演出想骂就骂，想笑就笑。当外国人第一次问我，这种奇怪的外国侵略意味着什么。我将那些最喜欢饶舌的熟人支到一边后，对他说我们在澳大利亚建立那些放逐罪犯的殖民地的政策曾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我们找到了将我们的这些流氓放逐到大陆去的更便宜的方法，显然是把他们当做旅游者送去。这些无赖，按照他们的兴趣或倾向，（在欧洲）四处游荡上几个星期。而那个爱瞎操心的小个子秃头（指库克）将为他们照料一切麻烦，然后，他们再回到英国。”

对此，库克回敬道：“在当今不断进步的时代，再来说此景此物应由某类人专门享用，为时已晚，上帝创造丰盈美丽的河山是为了人民；铁路、轮船是人类共同的科学智慧的产物，也是人民共享的……人类的精英分子和高尚的才智之士，看到人们随他们之后寻求生活乐趣，只会感到高兴。”^①

威尔斯·伐格（Wells Fargo）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创办人。运通公司于 1919 年 10 月举办战后第一次赴欧导游旅行，三年后又举办第一次环球水陆游乐旅行。该公司也举办全程代理的旅行，消除了旅游者的种种担忧，旅游者用不着事先了解情况，也不必有什么旅游经验。公司非常了解初次出国的旅游者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服务使得中产阶级的美国人能按照预先准确核算的费用出国旅游。至于去什么城市、住什么旅馆，公司方面早已熟练地从市场上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过去，

^①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族历程》，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587—589 页。

要把钱带到远方只能靠银行汇票和信用证来解决。这种做法相当复杂,不会讲外语、并与海外缺乏联系的普通老百姓必然会碰到困难。1891年,美国运通公司获得发行第一批旅行支票的版权,这种支票可以便利人们携带小额的钱去陌生的地方花费。这样做当然能使国外旅行进一步大众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些美国人被困于欧洲,美国运通公司的旅行支票是欧洲各国银行所承认的少数金融票据之一。到1960年时,美国运通公司的旅行支票每年售出约20亿美元。旅行支票是有保险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一种新的“不会遗失的钱”,由于它解除了旅行者的又一顾虑,长途旅行的市场进一步扩大。到了1970年,美国运通公司已在世界各地设立了上千个办事处,为各地旅游者服务。

综合包价旅游(inclusive tour)这一旅游组织方式现在被许多旅游机构采用。它是指旅行社经过事先计划、组织和编排旅游活动项目,向游客推出的包揽一切有关服务工作的旅游形式,一般规定旅游的日程、目的地、行、宿、食、游的具体地点及服务等级和各处旅游活动内容的安排,并以总价格的形式一次性地收取费用。它提供的全程旅游活动能免除旅游者因人地生疏产生的购票、寻找旅馆等一切忧虑之苦,使旅游方便易行;由于组织这种旅游的旅行社是成批购买旅游交通客票、旅馆床位及其他旅游供应产品,价格相对便宜。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第六条第一款明确指出:“旅游专业人员有义务向旅游者提供关于他们访问的目的地以及旅行、接待和逗留方面条件的客观而真实的信息;他们应当确保在承诺所提供服务的性质、价格和质量以及在他们一方单方面违反合同时的资金赔偿等方面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①旅游公司的服务质量不仅直接影响旅游传播的效果,它也成为旅游传播的内容之一。

旅游公司的广告宣传也是旅游传播的一部分。

^① 参见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第三节 旅馆、饭店与旅游传播

一 旅馆、饭店简介

美国人斯塔特勒(Ellsworth M. Statler)被称为“现代饭店之父”，他在饭店服务方面的多项创新被20世纪的饭店业视为标准。1908年建造的斯塔特勒饭店(Statler Hotel)首次在每套客房内都设了浴室，推出现代意义上的“服务”(Service)和“便利”(Convenience)等。

希尔顿饭店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饭店。1930年是英美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一年，全美饭店倒闭达80%。希尔顿饭店负债50万美元，但员工上下一致，不把心里的愁云摆在脸上，始终恪守“饭店服务员脸上的微笑是永远属于顾客的阳光”这一信条。经济大萧条一过，希尔顿饭店率先进入了经营的黄金时代，同时充实了一批又一批现代化设备，使希尔顿饭店更加名声显赫，始终成为世界上享有盛誉的饭店集团之一。

国际青年旅馆的创始人德国的理查德·希尔曼(Richard Schirrmann)是一名中学教师，1909年，他带领学生徒步旅游时遇到暴风雨，躲进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希尔曼由此产生了创办“青年旅馆”的念头，让在外徒步旅行的青年，每天都能找到休息的场所。国际青年旅馆(Hostelling International)创建于1912年的德国慕尼黑，以“安全、经济、卫生、隐私、环保”为特点，室内设备简朴，备有高架床、带锁的个人储藏柜、公共浴室和洗手间，受到了青年人的广泛欢迎。现在国际青年旅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宿连锁组织。

世界上第一所旅馆管理学校出现在瑞士的洛桑。

二 旅馆、饭店与旅游传播

旅馆、饭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传播本源，也不是最主要的旅

游传播主体,但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旅游传播者。它是旅游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因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旅游传播的责任。

河南省周口市的中州国际饭店的餐厅设有神农厅、女娲厅、陈胜厅、家骕厅、二程厅、伯驹厅、灵运厅、太昊厅、云长厅、仲尼厅、伯阳厅。这些餐厅名称都与当地历史有关,比如太昊陵就坐落在周口市淮阳县城内,周口市西华县城北十公里聂堆镇思都岗村有女娲城遗址。用这些历史文化名人作餐厅的名称,不仅有助于提高饭店的文化品位,还可以传播历史文化信息和为旅游点做宣传(见图6-2)。



图6-2 河南省周口市的中州国际饭店餐厅内老子故里的照片
(赵建国摄于2009年12月20日)

三 服务者

一个服务态度差的员工,一个厌倦“侍候人的工作”的员工的劣质服务,可能毁掉一大批业务,可能会进而扩大到对此服务不满的顾客所能影响的所有生意,而且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到他所能接触到的有关人员。

游客到异地旅游,到餐厅就餐时,也希望自己在品尝异国异地的

风味食品时,能增加一点异国食品方面的知识。他们希望了解当地菜肴的名称、来历、特色、对身体的益处等知识。他们还希望能欣赏当地菜肴富有艺术性的精美造型。为了满足游客的求知心理需要,餐厅的服务员要熟知餐厅每道菜的名称由来、用料和作料、烹调方法、食用方法和食疗作用等知识,以便为有求知需要的游客做好解说。

在为国外游客服务的过程中,中国服务人员要注意中西文化差别。

国外有学者指出,在汉语文化中,那种发自内心的要照顾外国来访者的要求导致了一种民族的责任感,即给予外国人以持续不断的关照,帮助他们适应各种不同的风俗,其程度之甚可以使西方的访问者感到心烦。中国人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宾客,是为了要满足来宾的所有需要。^①

第四节 交通和交通工具对旅游传播的影响

一 交通和交通工具与旅游

交通和交通工具是旅游活动的必要前提,离开了交通和交通工具,旅游几乎就不存在了。所以,一说旅游就涉及交通和交通工具。

旅游景区的可出入性这个术语说的正是交通和交通工具。可出入性是指接触旅游资源的可能性,也就是一般说的进得去、出得来、撒得开。

多数旅游者心目中理想的旅游线路是:旅途时间短,游览时间长,人在景中行,景在游线边。一般旅游者的想法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看最多的景点。这都与交通和交通工具密切相关。

一个具有旅游资源的地方能否成为大众旅游地与它的可出入性紧密相关。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开通后,引发了青藏高原旅游热,越来越多的游客奔向青藏高原。当然,这与青藏铁路沿线有着十

^① 参见[澳]赖辛格等《旅游跨文化行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关。但是,如果青藏铁路不通车,再丰富的旅游资源也难以成为大众旅游的热点。

交通工具的进步对旅游景区本身也有负面影响。为了便于旅游者驾车到达九寨沟,修公路砍倒了原始森林,野生动物相应减少了,水质也开始受到污染,路面和林区可以看到旅游者留下的垃圾,甚至大小便。昔日被人赞叹的原始森林和自然生态、纯净的山水、清新的空气已经大为失色。

二 交通和交通工具对旅游传播的影响

在《经济活动传播论》中,笔者曾以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为例,谈到了现代交通工具使大多数旅行者对旅行沿途的切身体验大大减弱。^①这里我们将沿着这个思路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

余秋雨指出:“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古老文明的兴衰脉络,显然不能贪图现代交通的方便,而必然要去面对。”^②“现代科技注定会删削历史,这无可奈何,我们中国的宝成铁路已经早早地删削过《蜀道难》。……只听火车呼啸一声,已把所有的历史穿过。”^③

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是不可分割的。有小轿车,必然要有宽敞的公路与之配合;有火车必然有铁路与之并存。下面我们主要谈交通工具,将分别从不同的交通工具来看它们对旅游传播的不同影响。由于前面已经较多地谈到了火车与旅游传播的有关情况,此不赘述。

(一) 从诗人骑驴说起

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

① 参见赵建国《经济活动传播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179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13—314页。

③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32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之行。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①

远游者在蒙蒙细雨中风尘仆仆，衣上有酒痕，骑驴经剑门入蜀，即景生情，在驴背上想起古人的诗句和行迹，不觉得自己进入了诗人的角色和境界，足以和前代诗人媲美了。但做一个诗人有什么用呢？祖国半壁江山落入金人手中，纵使有良辰美景也只能平添忧愁和痛苦。为什么在细雨中骑驴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



图 6-3 坐落在复旦大学校园内的雕塑“驴背诗恩”
(赵建国摄于 2009 年 12 月 12 日)

① 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参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6 页。

中国古代许多文人有骑驴旅行的经历。孟浩然在风雪中骑驴过灞桥^①，李白醉酒骑驴游华阴，杜甫有“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②的诗句，贾岛骑驴赋诗，李贺骑驴觅句，等等。也许骑驴与诗人创作的关系太密切了，现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有一座雕塑名为“驴背诗思”。(见图 6-3)

(二) 徒步旅游与旅游传播

人的双脚也算一种交通工具，而且是一种天然的、最古老的、一直延续至今的不可取代的交通工具。显然，步行旅游对于旅游传播来说是最重要的、最需要考察的方式。对于旅游和旅游传播来说，别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取代，唯独双脚不能取代。可以说，双脚旅游是最重要的旅游方式，也是最佳的旅游传播方式。

余秋雨这样描写自己徒步走向庐山三叠泉：“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尽管极度劳累，但由于产生了“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的“熔铸感”，作者还是格外看重这种劳累。他对有可能减轻这种劳累的旅游开发有着一种隐忧：

① 张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见张岱《夜航船》，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 页。

②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参见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9 页。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①

徒步旅游是最基本的旅游行走方式，不管交通工具如何发达。除非残疾人，至少到旅游景区之后都要靠双脚行走，才能完成游览。

（三）乘汽车旅游与旅游传播

汽车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对于美国社会 and 美国人有多重要，请看詹姆士·罗伯逊下面一段话：“汽车对美国人的影响来得如此之快，整个过程几乎察觉不出。头一代人尚未见识过汽车，第二代人则目睹了汽车的早期发展、生产和推广；下一代人则降生在汽车的世界里。……历史学家认为汽车改变了美国的道德和习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汽车创造了现代美国的景观，促进了城市和郊区生活的物质模式。汽车决定了几乎每一个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也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拥有汽车成了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成了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的操纵下流动的方式，因而也展示了（向他们自己、向全世界）他们的独立、力量和自由。今天的美国人简直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一些机动交通工具——主要包括小汽车，或者摩托车、卡车、搬运车、机动船、机动雪车、客货两用车、私人飞机等，还侈谈什么个人自由、个人独立和个人幸福。当代美国青少年取得独立地位和进入成年期的标志是拥有自己的汽车。进入成年的重要仪式是通过驾驶考核，取得驾驶执照。”^②

美国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就被称为是“轮子上的国家”：

20 年代时，福特把美国人放到了轮子上，这时在美国几乎

① 余秋雨：《庐山》，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3 页。

② 参见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0—261 页。

每五个人不到就有一辆汽车,美国人几乎已离不开汽车轮子了,这堪称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一次新的“解放”。汽车赋予人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使人群和家庭的迁移变得方便可行。汽车打破了往日社会因空间距离而导致的隔膜感,缩短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在此基础上,完整意义上的美国旅游业出现了。美国人随着车轮的滚动出现在许多对于他们一度曾很陌生的地方,进而使美国人成为一群好动而更见多识广的人。^①

(四) 乘船旅游与旅游传播

鲁迅在《好的故事》中写道:“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②“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的各种景物,与它们本身一样也不一样。它传播了一种“变形”的信息,梦境般的艺术化了的信息。

乘坐海轮是另一种体验。

我自少住在海滨,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到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① 庄锡昌:《20 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 页。

② 鲁迅:《好的故事》,参见《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5 页。

.....

十九日黄昏，已近神户，两岸青山，不时有渔舟往来。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圆扁的，大家说笑，便道是“馒头山”。这馒头山沿途点缀，直到夜里。远望灯光灿然，已抵神户。船徐徐停住，便有许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层上，初次看见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灯光，无声相映。不时的还有一串光明从山上横飞过，想是火车周行。^①

显然，海上视野之开阔，景物之辽远，变幻之无穷，自是河湖中不能比的。

（五）乘飞机旅游与旅游传播

乘飞机旅游与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旅游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它的角度。飞机的高度使我们有机会从“上面”这个角度俯视大地上的一切，包括大山大川。若想看到一座名山或一条大河的整体形状，大概没有比坐飞机从空中看更好了。

当然，乘飞机观风景也有缺点。“谁初次搭飞机不巴望由空中饱瞰一下地上的风景呢？但不是飞得太高，就是云雾蒙蔽，要么就是自己发晕。长途的航程结束后，到头来可回忆的不过是起飞与着陆时的屋顶瓦片，顶多是一片海峡或影影绰绰的森林而已，辽远得无从看得真确。”^②

（六）坐缆车的体验

萧乾把缆车叫做高架车，“它既不是飘空的飞机，又不是擦地而行的车，它是在半空中滑翔的怪物。但由观景来说，它是兼有空陆之美的。”“坐在高架车上，我恍惚觉得自己化为禽鸟了，不然我怎么能刚好由巨大杉树顶梢擦过呢？（叶上还挂满晶莹的雪。）亭影由树丛上

①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423页。

② 萧乾：《山村巡礼》，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掠过。有时甚而可以听到山溪的淙淙流水声，且可与钓者招手。这都是坐飞机所不可能的，然而亭子顺着钢索滑下，颤微微又宛如在飞。”^①

(七) 小结

乘飞机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大地，坐汽车和乘火车旅行可观赏沿途风光，有车移景异的效果，乘船旅游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眺望沿岸的城市和乡村以及水面的变化。可谓一路车船一路风光。挂带拖车的旅行汽车，在何处停住很方便。空中索道缆车不仅可以使到达景点的时间大大缩短，使身体不够强壮的旅游者也能欣赏险峰上的无限风光，还使滑雪成为可能。

第五节 旅游传播与传播媒体

一 旅游传播与媒体

有专门的旅游媒体，比如“环球旅游频道”、“海南旅游频道”，《中国旅游报》等，同时，几乎所有的综合类报纸都辟有“旅游版”。各大景区和旅游公司还建有网站，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大众媒体报道有关旅游的新闻自是分内之事。特别是每到春节、国庆“旅游黄金周”，旅游新闻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

媒体对景区的正面报道等于免费广告，所以，很多旅游景区都给媒体和记者以特殊优惠，规定进入景区的记者不收门票。据说，凡是记者、画家、摄影家去周庄，一律免门票、免停车费。

我们来看记者写的一篇关于泾河和六盘山的报道：

^① 萧乾：《山村巡礼》，参见钱谷融主编《现代作家国外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77页。

“泾渭分明”！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说的是泾水清、渭水浊，即使两条河流汇合之后，清浊仍然分得开。那么，泾水何以清、渭水何以浊？能够说得清的人就不多了。最近，记者来到泾河的发源地，欣喜地找到了泾水清的真正原因。

许多人感到不解：泾河流经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黄土高原，怎么会保持洁净而不携带泥沙？

泾河发源于六盘山。六盘山茂密的森林，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涵养了极为宝贵的水源。泾河的水质，特别是泾河源头的的水质，是由六盘山的环境决定的。六盘山的森林面积和植被状况直接影响到泾河的水质。历史上，六盘山确曾有过可观的天然林，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各种人为破坏和掠夺式采伐不断加剧，森林植被不断萎缩。到了1960年，六盘山的森林覆盖率就只有33%了。到1975年，又下降为31%。

六盘山植被的根本好转是近30年的事。1980年，国务院将六盘山林区确定为水源涵养林区，1988年又在那里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8.6%。2000年，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林木生长量、蓄积量双增长，到现在，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72.8%，其中核心区则超过95%。林木蓄积量也提高到198万立方米，在10年中净增了37万立方米。记者在山间看到，各类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各类花草将地表覆盖得严严实实。

由于有了植被的严密保护，天上的雨水多被留在了山上，被林草“饮用”了。直到林草“吃饱喝足”了，才将多余的雨水放下山来，而这往往要在很长一段以后。

据介绍，即使降下大雨，六盘山也不易形成山洪，在地表也不会形成大的径流。雨水从草皮上流过，沙尘都被过滤掉了。这样，从六盘山中流出的水不会裹挟泥沙，就清澈见底。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好转，泾河水现在是越来越洁净了。

千百年过去了，泾渭依旧分明，泾河水越来越清。“泾渭分明”这个成语，依然准确无误。^①

^① 参见庄电一《泾河为何这么清？》，《光明日报》2009年8月9日，第5版。

尽管记者无意为六盘山做旅游广告,但我们相信许多人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会产生到六盘山旅游的念头。

二 巧妙策划,吸引媒体

1999年,黄龙洞公司独家策划出资2600多万元,成功组织和实施的以“穿越天门,飞向21世纪”为主题的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实现了人类飞行史上驾机穿越自然山洞的创举。中央电视台与多家网络媒体全程直播,全世界几亿观众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该项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张家界以及湖南这片神奇的山水通过“天门洞”这条时空隧道,迅速飞出中国,飞向世界,成为中国旅游界策划和举办大型宣传促销活动的成功典范。天门洞位于天门山山体的中上部,高131.5米,宽57米,深60米,海拔1300米。

三 关于“看景不如听景”

这里所说的“听景”是与直接到达景区看到景色相区别的间接地听别人介绍景色,也包括从书刊中读到、从电视上看到介绍景区的情况。看景看到的是景观所有的部位,听别人说或从媒体上“听”到的景色,那是经过选择后的景色。多数是选择最佳部位、最佳角度、最佳时间段的景色,因而让人感到非常美丽。

常听到有人说一个地方美丽“像一幅画”,如果人在其中,则说“人在画中游”。实际上,画都是选取景物最美的部分或想象中最美的东西来描摹。而直接到景区接触和看到的是景观的所有部位,不一定是观看此景观的最佳时间段,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观看此景观的最佳角度,所以可能会有“看景不如听景”的遗憾。

另外,我们知道,距离产生美感。进入风景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距离美”。近看不若远观,至细则无朦胧之美,无间却少神秘韵味。

记得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说,她一直很向往北京,但参观了故

官、十三陵之后，却觉得不如想象中的好，于是大呼“距离是美的必要条件”。我在雅典也有同感：这里名声最盛的古迹早已被现代商业所包围，而在号称国宾级的饭店大堂内，我却从已经磨破褪色的沙发绒垫上知道了什么是“历史悠久”。想想也不奇怪，我们曾接触的有关古城的电视片、照片、文字之类都力图从最佳角度刻画最佳形象，又加上我们至善至美的幻想功夫，怎么经得起例行公事式的走马观花呢？我不禁空前怀疑起旅游的意义来。^①

当然，尽管“听景”有这样的一些“优点”，但直接与风景地亲密接触所带来的美感体验是任何“听景”所不能代替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满足于“听景”。

^① 杨澜：《向往希腊》，《萌芽》1996年第4期。

附 章

第五章“旅游传播主体”延伸阅读 ——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贡献

本来余秋雨作为学者和作家应该放在“作家与旅游传播”或“人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与旅游传播”中讨论，由于他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这里专设一章作为“旅游传播主体”的延伸阅读内容，尤其会了解到旅游传播在余秋雨的行走与写作中升华到一个新的界面。

关于余秋雨的生平经历主要参考了他的《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

第一节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这里所说的“文化苦旅”不是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而是指他为写《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而进行的行走、考察活动。

一 余秋雨的“出走”与意义

（一）余秋雨的坚定“出走”

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帷后，在归程的江轮

上，当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的余秋雨有了新的思考：

那彻夜的雉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有的文化风尚。^①

这是他走出学校、走出书斋、走向行旅的动因。

从甘肃，他的行旅真正开始了，从此他边走边写。

他的“出走”很彻底，辞去了行政职务——他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并有希望走上更高的行政职位，更决绝的是辞去了公职。这就等于告别了原有的体制，从体制中跳了出来，成为体制外的“游子”。敢于这么做的只是极少数人。因此，余秋雨的“出走”还具有冲破现有体制的意义，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样本。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337页。

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①

应该说这是一种几乎没有先例的选择，确实具有冒险性。“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② 他的“出走”就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人生大选择和自我挑战。

然而，风险与“效益”并存。

真的，离开“位子”和“圈子”的最大收获，不是身心突然变得自由，而是目光突然变得真实。或者说，变得更敏感于真实和虚假。^③

跳出圈子之后，会看到待在圈子里的人很难看到的“风景”。

后来，余秋雨与同行的凤凰卫视伙伴谈到自己走过的许多地方时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④ 他告别和逃离的是纯学院式学术和学术、生存氛围。

到与凤凰卫视一起进行的“千禧之旅”将要结束时，余秋雨写道：“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指辞职远行——引者注）。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⑤

（二）“出走”的意义

上面已经提到，余秋雨的“出走”具有冲破现有体制的意义，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样本。就这一点说下去，我们能从这种超出常规的举动中，发见出产生它的时代原因。正是改革开

① 余秋雨：《问卜殷墟》，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②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

③ 同上书，第434页。

④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516页。

⑤ 同上书，第5页。

放的大背景使这种“出走”成为可能，正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成为主流使这种“出走”获得成功。他自己也说过：“幸好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又被关注。很多文化人获得了创造的权利，我也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辞职远行，走遍中国，再走遍世界，对比中华文化与别种文化的异同。”^①这样说，丝毫不能减轻他“出走”所带来的压力与风险，丝毫不会减轻这种超常规举动所要付出的不寻常的艰辛，也不会使这种抉择显现出的胆识有丝毫减色。

这种“出走”对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生存方式来说，有着更重要的启示意义。学术生存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但是如何搞好学术却并非容易解决。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近代的顾炎武就非常重视实地调研，他每到一个地方，不仅查阅当地县志，从当地读书人中了解情况，还亲自问农夫、老兵。全祖望曾十分生动地刻画出顾炎武的调查情况：“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②“五四”运动以来又有到工农中去、到实际生活中去、理论联系实际的提倡。但真正走出学校、走出书斋，进入生活现场、文化现场的学者少之又少。这里有学者们自身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既要打破学者们自身的生存和学术惯性，更要突破既有体制的束缚。没有见识不会想到“出走”，没有勇气和能力不敢“出走”，“出走”了也会失败。

余秋雨“出走”的学术意义在于，他以自己的“出走”，以走向文化现场后沉甸甸的实绩，给知识分子的学术道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说他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并不意味着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出走”，而是应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文化现场，面对生活、面对实际、面对群众。余秋雨的许多方面不可简单模仿。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一位学者，单是“文化散文”不是学术论文这一项，就会使你完

① 余秋雨：《到寒舍坐一会儿》，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310页。

②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参见《鮑埼亭集》卷12，姚江借树山房藏版。

不成科研任务，因而不得晋升职称，因而变得灰溜溜。

当下，知识分子整体拥挤在申报课题、项目，做课题、项目的队列中，余秋雨的“出走”更应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学校到学校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梯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递进，从课题、项目到课题、项目的逐年申报，沉溺在这种体制运作中，就无暇考虑走向社会、走向文化现场了。在这种氛围中，即使有余秋雨的“出走”也可能使奔波在学位和职称、课题和项目中的知识分子们视若无睹。

余秋雨“出走”的另一个学术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形成学术个性。体制内的学者们为什么缺乏学术个性，很难有独立见解，更鲜有真正的突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被限制在体制内的话语体系中，项目、课题都属于“共识”的，否则你就别想立项。余秋雨则不然，既然已经从既有体制中“出走”，“我干脆把个人话语呈现得更加透彻，不仅语言风格是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向于一己仅有”。^① 依附少了或没有了，个性自然就要充分展露了。

到“文化现场”还有助于纠正许多从书本到书本的错讹，纠正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误读。“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即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② 实地考察是辨识、修正错误的最佳途径之一。

二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一）到“文化现场”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仅从这些集子的名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455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79页。

称,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与行旅有关。余秋雨说过:“我必须寻找曾经发生过伟大历史事件的文化现场。”^①

1. 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一些文化现场,对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进行了实地考察

《山居笔记》是对一些重大课题的有意考察。“为了一个课题,我会连续去很多地方,也会反复去一个地方。来来去去,风尘仆仆,都是为了某一篇文章。”^②“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③这种求是、求实精神贯穿在余秋雨的整个旅行考察、写作活动中。

到达现场,书本就不是唯一的坐标了,书本必须接受现场的考问,书本和现场应当互相印证。余秋雨在考察过许多沙漠和废墟、寺庙和洞窟后发现:“我读过很多解释它们的规范文本,但一走到它们眼前就觉得全然不对。写得并不错,但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④正因为到达了现场,所以,发现是独特的。

2. 其次,到中华之外的文化现场实地考察

当余秋雨写出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散文后,并没有停下继续走向现场的脚步。“但是,我惭愧地发现,大家都是因为我对中华文化的实地考察而倾听我,但我显然还不具备充分的发言权。道理很明白,有关中国文化的一切重大话题,都与世界文化有关,但我对世界文化的讲述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书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⑤这是一种坦白,也是一种眼界。

恰好,余秋雨遇到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大胆的、大型的计划:凤凰卫视组建一个小型吉普车队,从埃及出发,到中东,一步步向东,在2000年元旦进入中国。全球直播,行程几万公里。余秋雨被邀请,他的身份是“特邀嘉宾主持”,与凤凰卫视的许多著名女主播轮流主持。她们因受电视栏目的牵掣,只能各走一段,而他要贯穿全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

② 同上书,第463页。

③ 余秋雨:《山居笔记》序,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页。

⑤ 同上书,第468页。

程。“此行的意义，在我心中很不一般。这次世纪之交，不是百年跨越，而是千年跨越。千年之前，我们还是宋代，两千年前，则是汉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根本不存在，只有几个所谓文明古国。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一路伟大，一路废墟。我已经花了多年时间走遍了中华文明的废墟，现在只有到其他文明的废墟里去认真地走一遭，才有对比。”^①

后来，余秋雨与凤凰卫视又有了欧洲之旅，对欧洲进行实地考察。

作为学者和作家亲身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遗址现场以及许多现代文明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尽管很有价值，但对于作者来说，那只是现场感受或游记式写作，经过认真梳理、综合之后，相信应有更成熟的著作问世。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结果没有出现，那将是巨大的遗憾和损失——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社会。因为余秋雨完成这项使命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别人在许多年内都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余秋雨重视现场，但并不唯现场，他说：“我历来在旅行中寻访的重点，是遗迹现场而不是博物馆，但又喜欢在寻访之前或之后去一下博物馆，找一个索引或做一个总结。”^② 博物馆不仅有由现场而来的实物展品，而且还有各种综合，能够使参观者很快了解某一地区或某一专题的概貌。在相当程度上，博物馆可以起到某一地区文物、文化考察的导游作用。所以，余秋雨的做法很值得考察者、旅游者参考。

有人把余秋雨（走向文化现场）与白先勇、三毛看做“现代派流浪”。^③ 笔者认为这是不贴切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余秋雨走向文化现场是对历史文化的考察，而白先勇和三毛则不是。白先勇和三毛都属于作家意义上的“流浪”，余秋雨则是学者走向现场。另外，“现代派”是一个不易把握的术语，用在余秋雨身上不合适。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38页。

③ 许祖宁：《余秋雨的现代意义》（http://www.qiuyuonline.com/ear/051014qingt_13.asp）。

（二）到“现场”前后的“苦读”

读书是到文化现场考察的前提，没有读书所累积起来的文化素养，即使到达文化现场也可能毫无所获。

余秋雨的“苦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半山苦读、学院苦读和“山居”苦读。半山苦读和学院苦读大致可以归为到达现场之前的读书生涯，“山居”苦读大致可以归为到达现场之后的读书经历。所谓到达现场之后，并不是说“山居”苦读之后就不再去现场了。

1. 半山苦读

“文革”期间，余秋雨的老师盛钟健为他找到的浙江奉化大桥镇锦屏山的半山藏书楼，在这里他读的主要是中国文化古籍。余秋雨自己称这段读书岁月是“半山失踪”。

2. 学院苦读

大约在33岁生日的时候，他抛弃“一切有可能导致精力分散的课题沉溺、群聚乐趣等等文化界的时尚”，开始集中阅读欧洲经典，兼及其他古典文明。读书的主要地点在上海东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13平方米小屋，持续时间长达七年。当他读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时，他认为“自己碰上了世间最好的文章”。他成了“各国大师们的共同门生”。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读这些经典需要译作，翻译这些经典的作者包括朱光潜、贺麟。“由朱光潜、贺麟、李泽厚等先生带给我的抽象思维的快感，真是无可言喻。那么多不亲近的文字，那么多极深奥的句式，当它们组接成一条通道出现在你脚下的时候，开始你会很不自信地却步，但当你咬着牙齿一步跨入，壮着胆子一点点走下去，终究会进入一个心旷神怡的天地。精确到毫末不遗，严密到丝缕不差，环环相扣而不闻声响，高迈缥缈而不容虚假，然后终于推导出结论来了，但这结论并不是一句话，几个字，而是一种高度，一种视角，一种境界。”^①这是阅读大家、阅读经典并且真正达到能与大家和经典对话交流时所得到的一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19页。

种整体感受、精神境界、思维方式。

李泽厚被提到是因为“就我个人而言，让我从思维深处理解了德国哲学精髓的，却是李泽厚先生。他的那部《批判哲学的批判》，几乎被我读烂了。康德的思维魅力，经由李先生，让我百脉俱开”。^①

3. “山居”苦读

这是指写作《山居笔记》时，住在香港中文大学并在该校图书馆里的研读。由于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所以叫做“山居”苦读，余秋雨自己说这是他“第三次苦读”。

这次读书关注的是海外汉学界。阅读的主要是余英时、黄仁宇、周策纵、饶宗颐、杜维明、唐德刚、许倬云等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文化学者的著作。在余秋雨看来，他们是继梁启超、胡适、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国际化跃升。

三次苦读的内容不同，恰好形成知识结构和文化理念的互补，为文化散文的写作打下了文化知识基础，提供了思想理念支撑。

（三）生活经历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余秋雨说：“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②显然，“文革”对他的一生包括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勇气和思考与这场浩劫及之后的世态有密切关系。

在谈到海外汉学家时，余秋雨说：“我也有强过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苦难，考察过很多他们没有考察过的废墟；还有，我可能比他们中的大多数，更熟悉文学实践和艺术实践，因此也拥有较多的读者。”^③显然，他把“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苦难”当做搞学术研究的一种优势。关于自己优势的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② 余秋雨：《山居笔记》序，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

析显示了他的自信，应当说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具体说来，比如某种重要心态、意识和观念的确立就与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余秋雨在《长安的闪电》中说：

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吞咽的全是“乱世哲学”，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夜雨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全部青春。我们被告知，古代社会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们正在享受着一尘不染的幸福。偶尔忍不住幻想了一下古代，却还不敢幻想国外。正是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们在大醒之后很难再陷入封闭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我的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不如我开放。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们不拥有那种从灾难中带来的财富。^①

某种心态、意识和观念产生于特有的生活经历。没有承受过冰寒雪冻的人，就不会对温暖的阳光有多深的感受。没有经历过封闭，就不会真正珍惜开放和认识到开放的重要。

生活经历，尤其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切身感受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的有利条件。即使不是必要条件，也是一种有利条件。笔者常常感叹于众多的学者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之路，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有价值。

第二节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

余秋雨的主要篇什，是旅游后写的散文，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游记；是考察后写的文章，但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考察报告。若从游记角度看，他的《千年一叹》更接近传统的游记。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散文。

余秋雨自己说：“文化是一个大课题，他没有理由排除大量可触

① 余秋雨：《长安的闪电》，参见《寻魂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可摸的切实现象，也没有理由排除逼近它们的多种途径。”^①他以感性的散文来逼近文化。

一 艺术成就

余氏散文独树一帜，史上罕见。

他的个性特征全方位地渗透到散文的各个部位。并非他的散文全是主观刻意为之的结果，但又与他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我干脆把个人话语呈现得更加透彻，不仅语言风格是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向于一己仅有。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这条写作路途，我还会故意把个人对家乡生活的回忆文章穿插其间。我心中的中国，如同茅舍舟楫的家乡；漫长的文明历史，如同童年无鞋的脚印。一切由我个人体验和吞吐，一切皆是五尺之躯的偶撞、偶遇、偶感、偶思，绝不接受任何异己的指摘。”^②这段话前文在谈学术个性时曾经引用过一部分，现在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这是一种个人话语，从语言风格到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都为一己仅有。简单地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充分个性化的。

有人说余秋雨的散文属于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那是只看到了它被受众广泛接受的一面，没有看到它深入骨髓里的个性。通常意义上的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绝不会有这种个性。

（一）人物：性格·命运·文化人格

1. 几乎每篇散文作者之“我”都或隐现其中，或贯穿始终

这是余秋雨散文还叫散文的因素之一，也是他仍被有些人当做游记的原因之一。这也与他主张到达“文化现场”有关。

即使专门写别人的篇章也不例外。比如，半夜接到台北《中国时报》不相识的女记者的电话，在答记者问中谈到自己中国文化史上最

① 余秋雨：《访谈录》，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②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455页。

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放下电话，我脑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这就是著名的《苏东坡突围》的开篇。

至于“我”贯穿始终的，也不少。比如，写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我”不仅是作品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我”由于与岳麓书院相遇而发生转折。首先是改变了自己的行程。本来是由于追随“大串联”的洪流而来到了岳麓书院，但到了这里后思绪发生了变化：文化传承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①

这里改变了他的行程，这里也是他的整个人生旅程的“关键”处：

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详，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②

作者还写出了环境与“我”的个性契合：

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详，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

^① 余秋雨：《千年庭院》，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② 同上书，第130页。

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①

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这个书院使他倍感亲切，环境与“我”的个性的契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2. 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写出人物性格和命运背后的文化深度

专门写人物的诸如《苏东坡突围》、《信客》、《柳侯祠》等肯定如此，不以人物为主的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写罗振玉与甲骨文：

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学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立即觉得自己已经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

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

^① 余秋雨：《千年庭院》，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最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深知现场勘察的重要，他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〇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罗振玉的深度之一表现在对于考古现场的重视。“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罗振玉亲自到了安阳小屯，“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①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风雨天一阁》中钱绣芸选择了与书为伍的爱情婚姻，但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他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

① 余秋雨：《问卜殷墟》，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0页。

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①

在天一阁背后，我们看到了与它相关的人物的个性以及在这种个性影响下人物的命运。

写出人物的悲欢离合，余秋雨很善于抓取这种悲欢离合，哪怕是几笔带过的小人物。《抱愧山西》写的主要是大商人，但作者知道，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丰厚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作者讲述了根据黄鉴辉先生曾经记述过的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榜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②

① 余秋雨：《风雨天一阁》，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② 余秋雨：《抱愧山西》，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此乃高度浓缩了的人生故事，丝毫不亚于作家创作的戏剧、小说。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反复出现“文化人格”、“人格结构”这样的词，他不仅写人，更注重写人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游记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山水互相琢磨。“人气”不重的游记，罗列文化知识再多，也很难出色。个人与山水周旋，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与曾到过此地的先辈们周旋，从而产生人格比照。这样，山水便真正热闹起来了，文章也有了生气、变得大气。这是我的向往。^①

写出“文化人格”不仅写活了山水，同时也挖掘了文化深度。

3. 穿插当代生活、当代人

总体上来说，余秋雨写的是历史文化散文，历史文化是主干。然而，他分明是写给现代人看的，总是以现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交融来审视和观照历史，并且现代生活不时出现在历史场景周围。

到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已经是古今互现了。写古希腊文明，有专门的一篇关于当代希腊人的《闲散第一》，古今对比，而且与其他国家对比：“以前我走遍意大利南北，一直惊叹意大利人的闲散，但中国驻希腊大使杨广胜先生告诉我：论闲散，在欧洲，意大利只能排到第三。第一是希腊，第二是西班牙。”作者不失时机地评价道：“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也包含着诸多弊病。有很大一部分闲散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②

写宋代文化时，最后提到了几年前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情况。上海市民天天连续几小时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长长的队伍中有人在说，几位九旬老人，两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间。博物馆内部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员找到这些老人和病人。

^① 余秋雨：《访谈录》，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请他们先行入场。没想到，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看《清明上河图》，就应该恭恭敬敬地站那么久。我们来日无多，更要抓住这恭敬的机会。”^①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人及其行为更能表现出人们对经典作品的崇敬了。

穿插了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人，就更有时代感、现场感了。

4. 代表性人物组成的中国文化史

《寻觅中华》从黄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当代。每一个时代都选取一些重要人物，写他们与中华文化有关的主要活动，从而勾串起一部中华文化历史，蔚为大观。

为了写活这些历史人物，作者非常重视写他们的死。人物死的时候，往往最能显现文化内涵，也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王懿荣经吞金、喝毒药、投井自杀殉国，王国维自杀，孔子之死，司马迁之死，陆游的“遗嘱”，辛弃疾连喊三声“杀敌”气绝，等等，一方面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蕴，一方面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同时，一些主要人物都因此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

这是一部充满个性的中华文化史，最具特色的是其中的观点、观念，往往使人对其中的历史和人物有以往不曾有的另外的认识。

（二）散文文体的开拓

1. 对文章表述的极端重视

余秋雨在谈到《山居笔记》写作时的情形时说：“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淬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融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②这段表述，足见他对文字表达的重视。

余秋雨说自己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

① 余秋雨：《乱麻背后的蕴藏》，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② 余秋雨：《山居笔记》序，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叠叠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①在他看来，表述的艰难，是更隐秘的艰难，是对他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把表述的艰难上升到与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同样的层级，甚至更进一个层级，足见他在文章表述上所下的功夫。

我们来看他在《苏东坡突围》中谈到“成熟”时的表述功夫：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②

成熟是“从容”，是“大气”，是“微笑”，是“淡漠”，是“厚实”，是“高度”，是“豪情”，别人在谈成熟时也可能使用这些词汇，但余秋雨在这些词之前后加上了限制词时立即就立体而可感了。再加上“光辉”、“音响”、“山风”、“溪流”与“湖”被限制词一描述，成熟成了多种可看、可听、可触摸的形象而具体的实物。读者跟着作者的富有启发作用的词汇进入了一个多维空间，展开各种联想，最终，“成熟”转变成了多重立体画面交织而成的鲜活体。这个鲜活体开放而富有张力，它有限制因而方向、目标和轮廓明确，它开放而有张力因而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发展余地。

^① 余秋雨：《出走十五年》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②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2. 恰当处理散文与学术的关系

有人把余秋雨的散文称为学术散文。确实，他由学者而到散文作家，他的许多散文包含着学术内核。但是“哪怕处处与学术有关，我也必须让它们经过感觉系统的严格过滤，淬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①

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②

注意作者使用了“感觉”、“感性”这两个很接近的词，文学重感性、感觉，而学术研究尽管不能完全离开感觉、感性，但真正崇尚的是理性。作者成功地将学术内容与散文文体融会为一体，将抽象的学术思想“淬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这是余秋雨的独特的功力，正是这一功力，使他的学术思想走向大众。余氏散文存在着大量读者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来看他如何将学术的东西淬炼成最感性的散文部件：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一种伟大文化的终极生命力，一定不会是富华精细的。它不会是修剪过度的皇家园林，而是粗砺嶙峋的海边礁石；不会是宫廷御池的节庆喷泉，而是半夜山间的狂风暴雨；不会是沙龙名嘴的激烈争辩，而是白发夫妻的临别拥抱；不会是巴黎学府的字音考据，而是泥腿首领的艰难跋涉。^③

文化的终极生命力本是极端抽象的东西，到了余秋雨笔下变成了“海边礁石”、“狂风暴雨”、“临别拥抱”和“艰难跋涉”这样一些极其感性和富有动感的物品和动作，而且还有它们的反向对比物“皇家园林”、“节庆喷泉”、“激烈争辩”、“字音考据”。这段内容与刚谈过的关于“成熟”的表述似曾相识，但又有异趣，对比阅读和体会应有别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

② 余秋雨：《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总序，第4页。

③ 余秋雨：《到寒舍坐一会儿》，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一种文章表达上的心得。

正因为把学术有机地融入散文，所以，余氏散文获得了空前的深度但又不会艰涩。

3. 文体意义

关于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文体意义，有人已经作过研究，比如，田崇雪的《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把余秋雨看做“散文史上真正的大家”。^① 别人谈过的笔者不再重复，只谈笔者自有的看法。

余秋雨在谈司马迁的时候指出：“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② 余秋雨写的多数是历史文化散文，应该说借鉴了司马迁。就文体来说，它也开一代新风。

特别要指出，余氏散文文体对当下文坛的针砭、对比意义。这里只举一个例子，2009年第19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光明日报》专栏“百城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名专栏奖）。读者可以翻开这些“赋”读读，看有哪一篇文章提出了问题？在当代人手里，赋这种文体歌功颂德，极难找到提出问题的内容。而就文体形式本身来说，其中的许多文章已经与历史上那些赋体名篇相差甚远，只能说是模仿。这里谈的是现象，不针对任何作者本人。越是国运昌盛，在文坛上就越是要警惕浮华、歌功颂德，否则文坛就配不上国运昌盛的大时代。

^① 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110—112页。

^② 余秋雨：《历史的母本》，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

余秋雨本人对这种风气“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他说：“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但是，“四周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①

二 富有文化深度的思想内涵

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思想内涵，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集中论述。已经谈过的不再重复，请读者互相参阅。

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散文，是因为它有文化的内核。

对于历史的评价富有历史感而又不拘泥于已有观念，以宽阔的眼界、博大的心胸、远迈的思维审视我们的祖先。他在评说黄帝、炎帝之争时说：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而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②

① 余秋雨：《历史的母本》，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② 余秋雨：《猜测黄帝》，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甚至它的许多篇章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人又把它称作学术散文。

中华文明究竟是怎么才不中断的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我在以前自己写的史论著作以及《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都没有认真分析。那是因为，在国内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文明的延续是必然的，要讨论的只是今后怎么延续。在埃及才真正体验到，不延续是必然的，延续千年倒是一种罕见的奇迹。”^①如果有人否认余秋雨散文的学术性，可以认真看看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恐怕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也未必能回答好的。

余秋雨甚至用学术语言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②

自然，这是概括，显得干巴，具体论述时还是有血有肉的。

关于这些见解的形成过程，作者告诉读者：“很难说这些感受全部都是在考察途中形成的，但实地考察使我淘汰了很多从小接受的赞美中华文明的惯用词汇，在对比中找到了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

② 同上书，第506页。

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走向文明自觉的一项大工程。”^①

反思中华文化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主题之一，也是最能体现其深度的地方。重视人情、人际关系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他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不会不涉及它：

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入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②

在肯定它“通俗和健康”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岔道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

他还写道：“这次在国外我曾一再拜托伙伴们一起留心一个问题：这些各有危难的国家，有没有一些共同超过中华文明的优点？大家反复观察，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的国民，从整体上比中国人单纯。”“得出这个结论有点痛苦，因为我们早已明白有些国家的文明生态是难以收拾的，但居然他们比我们单纯！其实我们谁不知道，他们的单纯就是只顾自己，不大琢磨别人，结果反而彼此轻松。”^③言外之意，那就是中国人对别人“琢磨”太多。

对于中华文明的反思，甚至让一些深爱它的人接受不了，但它的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的交融思辨，确实能让真正的思想者叹服。他在谈到中国的毛笔文化时说：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页。

③ 同上。

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①

对于毛笔文化的祭奠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但我认为这个祭奠所表达的现代文化意识是值得称道的，何况作者对于书法艺术也是恋恋不舍的。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当有超越自身爱好而追随时代发展趋势的气魄和胸襟。此外，作者从笔墨文化中挖掘出的中国传统文人群体的人格更是他的冷峻、独立之处。

独立而富有人性的见解，富有哲理的辨析。

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他写道：“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或者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死轻呼和平的人。”^② 战争双方所褒奖的英雄，坐在坦克里，捧着炸药躲在街角。事实证明，这些英雄带来和平的希望渺茫。世界应该嘉许的是真正能够带来和平的另外一种英雄。

人们经常引用的托尔斯泰的名言，到了余秋雨手里升华出新的哲理。也可以说，这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辨，而是直面现实之后的收获。“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很相像，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个原则不适合沿途各国的景象，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贫困都大同小异，

① 余秋雨：《笔墨祭》，参见《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一踏进富庶则五花八门。这不奇怪，贫困因为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才真正变得不幸，所以必然单调划一；而所谓幸福也就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各有不同。”^① 贫穷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所以单调，富庶就可以有多种选择，所以各有不同。观察现实世界，不正是如此吗？

三 两个需要商榷的地方

（一）一个需要商榷的思想观念——天人感应

笔者不能不指出余秋雨文化散文思想内容方面的一个倾向——表露出一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在有些篇章中，余秋雨就明显表达了这种意蕴。在《寻觅中华》中的《天灾神话》中他写唐山大地震时说：

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有人能够领悟。

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

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了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刚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了。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宏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开启？是跌入更深的长夜，还是迎来一个黎明？^②

说大灾难是“大终结，或大开端”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有些巨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② 余秋雨：《天灾神话》，载《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大的灾难确实能够结束一个朝代，结束一段历史，开启新的朝代、新的历史。更大的灾难甚至可以毁灭人类。说它是“大警告”就需要讨论了。如果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会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可以看做大自然对人类的“大警告”。但是，不好的政治统治与大自然的大灾难之间一般并无因果关系，谈不上是“大警告”。就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例，它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没有关系。说它“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无疑是缺乏根据的。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新时期，历史确实实现了转变。然而，这种历史转变与唐山大地震并无因果关系，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是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能够认识到的。

我们再来看余秋雨作品中与上述观念类似的一段内容。他在写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很动情：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①

把甲骨文的偶然发现写得与华夏祖先的意念如此相关，诸如“强烈地感知到了”，“显然有点生气”，“甚至恼怒了”等，固然很契合中华子民的民族情感，然而，祖先的“在天之灵”让甲骨文“突然涌现

^① 余秋雨：《问卜殷墟》，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实在是余秋雨自己的主观臆测。从偶然中写出必然当然是一种功力，然而，如果经过推敲之后，发现这种偶然与必然的联系乃牵强附会，倒不如不去找这种联系。

接下来，余秋雨在写将甲骨运往安阳火车站时，更有神奇气象：

在 YH127 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泻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①

气氛的确很强烈，而且记载这种强烈气氛的，余秋雨在文中说是让他读了吃惊的“一项发掘记录”。正好赶上了“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天气变化。但这种并不少见的天象，却有来历。“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这恐怕是现代气象学不会同意的吧？即使有发掘记录这样记载，但余秋雨加上后边一句“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天人感应观念就表露无遗了。

在 2010 年写完的《我等不到了》的自传体著作中，余秋雨在写到“文革”中 70 年代的“回潮”时有这样一段话，似乎对这种观念作了一个小结：

就在这个时候，大地深处又出现了动静。我相信，每当中华文化濒临危亡，总会有一种来自古代的神秘力量发出伟大的命令。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世界都在笑看中国的土崩瓦解，突然，甲骨文的发现带来了商代的伟大命令，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带来了唐代的伟大命令，于是顷刻之间，垂死的中华文

① 余秋雨：《问卜殷墟》，参见《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43 页。

明又重新抖擞起了精神。在眼下的“文革”灾难中，这样的命令也频频从大地深处发出。先是我家乡河姆渡遗址的出土，带来了有关中国人“生存之本”的伟大命令。与此同时，兵马俑、马王堆的出土，带来了秦汉文化的伟大命令。

“重要的命令总是在黑暗中发出，集合的号声总是在黎明前响起。”他甚至说：“我听到了这些命令，这些号声。”^①重大的考古发现的确像一种“命令”和“号声”，召唤人们思索和行动。然而，“每当中华文化濒临危亡，总会有一种来自古代的神秘力量发出伟大的命令”，这就有点玄乎了。考古发现与中华文化的危亡并无这样一种正相关关系。

“天人感应”指自然现象可以显示人世灾祥。这种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无科学依据。《宋史》载孙甫给宋仁宗呈十二事，其中“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忻州赵分，地震六年。每震，则有声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孙甫认为这些自然现象都是“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而要“应天之实”，必须“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②如果我们依然延续这种观念来看历史和现实，显然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

（二）《寻觅中华》中关于中华始祖的篇什缺乏现场感

还应指出，《寻觅中华》中关于中华始祖的篇什，包括《猜测黄帝》、《天灾神话》缺乏现场感，能够到达的现场可能没有去，至少在文中没有穿插进去。

余秋雨一直提倡到达文化现场。确实，他的不少名篇都是由于到达了现场才写出了现场感，才熔铸出华彩篇章。《猜测黄帝》、《天灾神话》除了写到他在奉化半山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的现场之外，涉及中华始祖黄帝、炎帝、蚩尤活动以及“女娲补天”等传

① 余秋雨：《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5页。

② 脱脱等撰：《宋史》第一四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39页。

说的一些地方，都缺乏现场感，也未提及他曾到达现场。

四 两个个案分析、赏析

（一）《抱愧山西》思想内涵分析

我们以作者对晋商的社会、文化分析为例，来看他的思考缜密和深度，尤其是他对晋商最终衰落的根本原因的独到见解。

晋商昔日的辉煌背后历程的艰辛，人格素质的远迈与缜密，作者总结了四条：其一，坦然从商；其二，目光远大；其三，讲究信义；其四，严于管理。

其中，对于目光远大，作者特别指出：“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① 这个评价可以说赞赏有加，当然以事实为基础。

如果仅仅停留于此，还是唱赞歌的文章，尽管赞的也是事实。作者的审视意识也不跳过晋商，他还揭示了他们人格结构中脆弱的一面。作者详细描述了发生在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与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翔之间的纠纷，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这样一件事：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翔，而毛鸿翔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① 余秋雨：《抱愧山西》，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①

作者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作者没有简单地仅从这些大商人自身找原因。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②

中国社会整体的封建氛围，古老的封建传统是山西商人终于败落的内在原因。这一点，多数人都可能发现。余秋雨超越其他作者的地方还在于他寻找山西商人整体衰落的根本原因。

那么，使山西商人整体破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

① 余秋雨：《抱愧山西》，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皈依”疑为“皈依”。——引者注

商人。^①

这些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肯定会有人不同意和责难余氏的分析，这里，我们不能去作评判。但我们不能不深思余秋雨的考问——这个考问是他叙述了山西商家在太平天国以后，又经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仍能艰难撑持，甚至获得可观发展之后发出的：

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②

留下深深的疑问和思虑，是读者读过余秋雨不少散文后的所得。这不是流行、时尚的通俗作家所能做得到的，也不是他们愿意做的。所以，有人把余秋雨归位于流行的通俗作家是非常不准确的。有许多评论者不具备欣赏和评价余秋雨作品内涵和艺术的条件，却在那里指手画脚。

（二）《罗马假日》赏析

并不长的一篇文章，分成了四个部分。开篇即说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接着又谈到了罗马的雕塑和宫殿。

真正进入罗马假日时，进入读者眼中的是诧异！眼前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

^① 余秋雨：《抱愧山西》，参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① 作者知道这个数字使读者咋舌，他特意补充说，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接着作者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②

第三部分要解释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并且把欧洲人与中国人对于休假的观念与做法之不同——道来。甚至中国官员访问罗马的计划做了几个月，但访者到达前一星期，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只得重新开始计划。而这位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的神圣理由竟然是：休假去了。

对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休假时却放不下身份，一到休假地，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联系。结果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人家的休假是转换身份，我们的休假是叠加身份。叠加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叠加在山光水色之间，那是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情。矫情在别处尚能闭眼放过，矫情在私人假期，实在是糟践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秘角，让人怜悯。”^③

如果说最引人注目的是罗马人倾城出去旅行，大概最令人难忘和耐人寻味的便是，作者最后一部分写的那个在小镇别墅里度假的白发老人了。像许多篇章一样，这位被讲述的主人公与作者有真实的交往：由于这位老人曾多次到过中国，要请余秋雨一行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饭馆吃海鲜面——“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最好。”这也竟

①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是这位老者在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理由。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位不显山露水的老者当年去中国时的身份是外贸部部长、邮电部部长和参议员！这里，自然回应了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的休假，他们相映成趣。

最后，水到渠成，该画龙点睛了。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①

罗马倾城出去旅行足以令中国读者诧异，意大利做得最好的海鲜面条背后白发老人那不凡的身份也足以使读者赞叹，然而，唯有小镇“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罗马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的议论，才使《罗马假日》升华到洗涤和携升人性的境界。

第三节 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一 余秋雨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就游历面之广而言，余秋雨几乎无人可以匹敌。在国内游历时，他借助了国内文化、学术团体的力量；在国外游历时，他又借助了凤凰卫视媒体的力量。而这种“借助”是一般人难以办到的。就对游历过的地方写出的文章，其涉猎文化面之宽和所具之深度并同时获得广

^①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泛传播而言，也无人能出其右。

所谓借助国内文化、学术团体的力量，早期是开学术会议，比如，散文《庐山》开篇便是：“我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有了名气之后，邀请他去讲学的地方就多了，同样是《庐山》在结尾部分写道：“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在承德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邀请他去讲课。“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山庄里边。”于是有了《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本人曾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谈到自己如何选择行旅方式。带有文化使命的行旅，当然不能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他要去的的地方，即使到了这些地方，也会不耐烦一个学者的细细体悟和徘徊。最好是单身孤旅，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白眼敲诈所连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随香港卫视越野车队作为特邀嘉宾考察了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余秋雨本人非常看重这段不平凡的旅程，他说：“我为自己参与了这个饱含重量的旅程感到骄傲。旅程中的所见所闻，一辈子都会享用不尽。我的人生行为方式，也就此找到了一个转折点。”^①

^①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469页。

退一步讲，也许有比余秋雨旅游面更广的专业旅行家，但他们不能像余秋雨那样，几乎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颇具人文深度和艺术品位的文化篇章。也许有更加专深的文化学者，对其旅游或考察过的地方，写出过高端的研究论文或考察报告，然而他们的游历广度却难望余秋雨之项背。

在赫尔辛基，一位芬兰教授说我“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他的理由有两点：一、很多年来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行者走通过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二、即使有个别人走通了，也一定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中华文明。^①

考察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旅程充满危险。这是余秋雨与妻子的一段对话：

她笑了，说：“这就更让我自豪了。不坐飞机，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地走完这条长路的记者和职业探险家，可能还会有几个，但像你这样的教授，只会是你一个了。”

我说：“这是肯定的。从很久以来，到以后十年，都会由我保持这个纪录。”

她说：“这个纪录由中国学者保持，心里觉得很痛快。”^②

能把游历广度和文化深度二者高度融合为一体，并借助现代传媒使其广为传播的人唯有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对历史上文化旅行者的超越；这就是他对当代旅游传播的独特贡献。

二 余秋雨与传播媒体

现代文化学者与传播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哪个现代学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② 同上书，第487页。

者能够割断自己与传播媒体的血肉交融。余秋雨的成功与传播媒体密不可分。

余秋雨曾经在《出走十五年》自序中表达过对《收获》杂志的感激之情。“《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①可见，现代传媒是余秋雨走出书斋的伴行者和动力之一。

后来，在随凤凰卫视在国外考察时，他写道：“古代旅行者真正的痛苦，是无以言状的寂寞，而我们这次，虽然每天都遇到大量麻烦事，但通过铱星和海事卫星，然后再通过电视和报纸，使全球华语圈的无数读者和观众始终与我们同在。”^②余秋雨的旅行日记也同时在我国台湾《联合报》、香港《大公报》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日报》、《华侨》上连载；在内地，系统连载的是《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转载的报纸更多。这些报纸一刊登就是三个多月，100多篇。

没有大众传媒的陪伴和报道，就不会有这些系列考察。凤凰卫视搞这些考察的初衷是作媒体报道。

无疑，余秋雨是使用和利用大众传媒实现自己的文化研究和传播设想最成功的当代学者之一。

21世纪初，中国《新周刊》与几家网络合作评选跨世纪的“中国电视年度榜”，余秋雨被评为“最佳嘉宾主持人”，颁奖词为：

在陌生的文化现场，通过电视媒介的影响同步传播文化，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的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③

① 余秋雨：《出走十五年》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2页。

③ 参见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页。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这样评价凤凰卫视：“他们的许多精彩报道，都是以巨大的生命勇气换来的。连沿途与我一段段合作的女主持们，也毫无畏怯。新时代最有力量的文化话语权，来自于生命边缘的考察现场。”^①

与有些媒介知识分子不同，与媒体频繁打交道，余秋雨仍然能保持独立知识分子的本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和《中华英才》编辑给余秋雨授奖，表彰他“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把‘深度研究’、‘亲身考察’、‘有效传播’这三项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② 笔者认为这个概括很准确，抓住了余秋雨最重要的三个特征。

余秋雨对中国一些大众媒体的批评和不满在《我等不到了》的后半部中几乎随处可见。其中包括对关于这位文化名人有关争议的炒作的批评和不满。

①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

② 参见余秋雨《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主要参考文献

书籍:

1. 曹诗图:《旅游哲学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陈志辉等编著:《旅游信息学》,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3 年版。
3. 费孝通:《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
4.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5. 李周、操建华等:《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6.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7.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8. 芮麟:《神州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9.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10. 铁凝:《河之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11. 王蒙:《漫游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12. 王永忠:《西方旅游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3. 邹树梅:《旅游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14. 郭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15. 吴正平:《旅游心理学教程》,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16.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17. 徐志摩:《徐志摩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
18. 杨乃济:《旅游与生活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19. 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20. 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21.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

22. 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
23. 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24. 余秋雨:《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25. 余秋雨:《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6. 曾彦一:《哥伦布》,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27. 邹统钎、高中、钟林生:《旅游学术思想流派》,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 [德]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9. [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0. [荷兰]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31. [美]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32. [澳]赖辛格等:《旅游跨文化行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3.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4.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5. [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随笔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6. [英]达尔文:《达尔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论文:

1. 方世敏:《略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 谷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7期。
3. 郭贤智:《旅游广告媒体及其对旅游的影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4. 郭鲁芳:《旅游目的地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关键因素》,《旅游学刊》2006年第8期。
5. 金周益:《旅游地形象定位和形象传播的探讨》,《科技资讯》2006年第6期。
6. 梁海燕:《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福建地理》2005年第4期。

7. 李锋:《旅游传播学理论体系刍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 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的传播策略初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9. 刘德昌、付勇:《我国旅游景区品牌传播策略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
10. 欧阳军:《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相互作用的弹簧机制》,《人文地理》2003年第1期。
11. 石福祈:《西方哲学中的“符号”概念》,《光明日报》2010年7月13日。
12. 唐娟、孙卫华:《旅游消费过程的传播学解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7年第5期。
13. 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4. 王晓如:《试析宋代宗教对旅游的影响》,《唐都学刊》2005年第1期。
15. 巫宁:《信息传播:旅游目的地营销与服务的关键环节》,《旅游学刊》,2007年第10期。
16. 谢彦君、Douglas Jeffreg:《英国旅游者对中国旅游供给条件的认知水平及其分析》,《旅游调研》1994年第5期。
17. 徐立新:《旅游品牌营销与传播沟通机制研究》,《商业经济》2007年第5期。
18. 徐永计:《旅游垃圾文化流源辨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9. 杨园:《中国旅游业品牌创新研究》,《科协论坛》2007年第4期(下)。
20. 袁忠:《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播》,《探求》2005年第3期。
21. 赵放:《体验经济与休闲产业“体验化”经营》,《光明日报》2009年5月11日。
22. 赵飞羽、明庆忠、王波:《游客对旅游地的跨文化传播之初探》,《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年第2期。
23. 周年兴、沙润:《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过程与生命周期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年第1期。

游记、散文、报道等:

1. 毕玉才、刘勇、张继锋:《锦州:学术研究重新“发现”笔架山》,《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

2. 陈世旭：《跑马山》，《光明日报》2009年8月13日。
3. 陈祖芬：《西湖重》，《解放日报》2006年5月27日。
4. 冯骥才：《古希腊的石头》，《文汇报》2001年5月11日。
5. 高浩荣、赵展、于冬：《中国人想去朝鲜看什么》，《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4月23日。
6. 李贯通：《天缺一角》，《大家》1996年第1期。
7. 李木生：《峰山》，《美文》1996年第3期。
8. 林天宏：《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31日。
9. 彭洪：《黑色的墙——记美国越战纪念碑》，《中华散文》1995年第1期。
10. 威德刚：《塞尔维亚“金松岭”的魅力》，《光明日报》2010年5月8日。
11. 石英：《寂寞：大泽乡的土台》，《北方文学》2005年第11期。
12. 杨牧之：《在那恒河的原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11期。
13. 周华蓓：《广州遭遇暴雨“洗礼”暴露城市排水系统常年积弱》，《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3期。

后 记

我在 22 岁时才走出所居住的那座城市，去的城市也不远，就是邻居城市保定。到那里也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去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开始时还下着大雨。即使这次出远门，也没有顺便把保定的名胜，比如莲池，看一看。

真正开始旅游大约是在 27 岁前后，可以说起点比较晚。可是，我把旅游看做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所以，游兴很浓，也不怕吃苦，并利用各种机会旅游。

我曾经在张家口师专当老师，每年假期回老家石家庄探亲，多要经过北京，故宫、北海、景山、中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都是这个时期游览的。我还特意从石家庄绕道山西去张家口，这样就游览了山西太原的晋祠、双塔寺，大同的云冈石窟，浑源县的恒山和悬空寺等。在张家口工作期间，到云南昆明开全国师专文艺理论会，途中游览贵阳市的黔灵公园、花溪公园和黄果树瀑布。在昆明游览滇池和大观园，到路南看石林。返途中乘船游三峡。

利用开会之机顺便旅游，是我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

离开张家口之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都会把这个城市的所有我知道的旅游点转遍。

真正较长时间的专门旅游只有一次，那就是我的旅游结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曲阜、邹城等地的名胜几乎饱览遍。

每到一个旅游地，我就想把它看个遍。有一次随妻子单位的人到泰山旅游，第二天在玉皇顶看完日出后，人们都乘缆车下山，我只身

一人走“孔子登临处”那条路下山，想看这条路上的风景和古迹。在上来时，由于兴奋而跳跃着攀山阶，崴了脚，我跛着脚坚持向下走。没想到落下了终身的伤痛，以后每当爬有梯级的山时，时间一长，腿关节就疼痛得难以移动。更使人难堪的是，同来的人早已坐缆车到了停车场，全车人就等我一个人，很长时间。加上我不认识路，到山脚下后，找不到来时停车场，还被三轮车夫诈骗了一把。等我跟大家见面时，简直无地自容。

就这样，我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有幸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考察、观光。

拉杂写自己的游历，是想告诉读者，没有它，本书就写不出来。

我仍然会游走下去，可能比过去游走更多的地方。到那时，如果有机会修订此书，相信比现在会更完善些。

本书得到了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部分资助。感谢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教授、副院长严励教授、传媒研究所所长张举玺教授的帮助和支持。

赵建国记于2011年4月10日